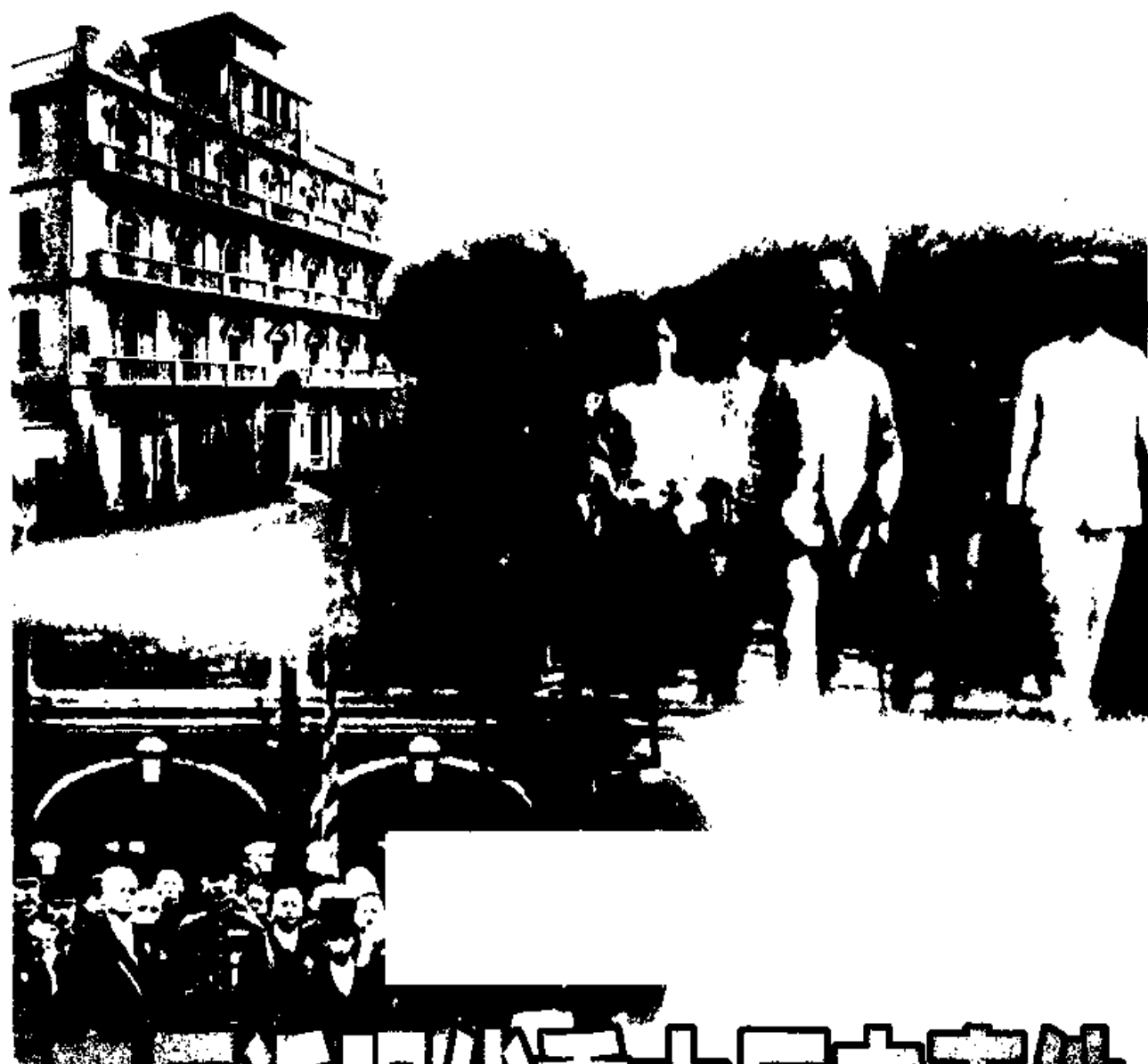


中 · 华 · 文 · 史 · 资 · 料 · 精 · 华 · 本

百年文史写真书系



亲历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
漩渦沉浮



亲历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

漩涡沉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漩涡沉浮：亲历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

ISBN 7 - 5034 - 1116 - 3

I. 漩… II. 全… III. ①中国 - 近代史 - 历史事件 - 通俗读物②中国 - 现代史 - 历史事件 - 通俗读物 IV. K250.5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150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北京市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625 字数：302 千字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出版说明

20世纪去了，21世纪来了。过去的世纪需要回顾，需要温习，新来的世纪应当展望，应当奋进。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温习是为了进一步奋进。为了回顾，回顾上一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沧桑巨变；为了温习，温习上一世纪中国先贤们的奋斗历程，我们选编了这套《百年文史写真书系》丛书。

这套丛书共分8册。分别是《硝烟弹痕》、《漩涡沉浮》、《机诈权变》、《淘金旧梦》、《文坛档案》、《学林碎影》、《丹青风骨》、《慈父遗爱》。书中的所有文章均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各种专辑史料中选出，这里有军事、政治、经济，有文化、科学、艺术，所有文章都是历史当事者和见证人的回忆。这些回忆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的特点，构成了20世纪活的历史。

编者

2001年1月

目 录

- 1 “万岁”非正常死亡别有隐情 蔡存者
- 7 民国外交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内争 叶景莘
- 16 一波三折、无疾而终的南北“弭兵会议”
..... 叶恭绰
- 53 “大总统”上台下台皆关钱财 王 坦
- 65 冯玉祥北京政变：开局容易收局难 鹿钟麟等
- 91 末代皇帝被逐出宫的详情细节 溥 佳
- 121 三·一八：“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楚溪春
- 125 “小扇子军师”涂树铮被处决真相 吴锡祺
- 129 翻云覆雨：蒋介石崛起之初策划的一场阴谋
..... 马文车
- 137 山雨欲来：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
..... 黄绍竑
- 144 瞒天过海为反共 慕中岳

- 149 张大帅皇姑屯被炸事出有因 周大文
- 156 从宁粤合作到蒋汪合流,貌合心难合 陈铭枢
- 191 两起举国震惊的暗杀事件内幕 沈 醉
- 198 破译日本密电码的特殊经历 王维钧
- 231 从苦谏哭谏到兵谏 晏道刚
- 243 法庭的审判与历史的审判 陆 诒
- 250 令人触目惊心的秦江惨案 刘 非
- 258 国军将领芷江受降中的拙劣表演 严怪愚
- 263 自作孽,不可活:周佛海的最后岁月 沈 醉
- 284 旧上海黄金风潮:一条黑线通到底 何汉文
- 302 偷梁换柱,杀窖闻一多真凶逍遥法外 王凌云
- 305 “头可断,国大代表不能让” 赵遂初
- 310 李宗仁费尽心机竞选“不值钱”的副总统
..... 王捷三
- 318 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 余湛邦

“万岁”非正常死亡别有隐情

案 存 卷

光绪死时我尚年少。其时父亲增崇在清廷内务府^①任三席大臣。叔父们（增德、增麟、增绂）也在府内任郎中、员外郎。

记得一天下午五点来钟，我父亲和我的两位叔父，还有我和两个叔伯哥哥在一起，正准备吃晚饭，内务府堂上来了一位送“知会”^②的“官人”，说：“万岁爷病重，请堂官即刻进里头预备差使。”这话由我们家管事的张俊峰入里院转告了我父亲。当时老兄弟三人一听完这口传“知会”，俱现出难以置信而且惊疑异常的神色。

父亲问张俊峰：“你认识这个送知会的人吗？”张俊峰回答说，他一听这话也很诧异，所以对送知会的人盘问了许多。听送知会的人说话不像有什么差错的样子，他才敢来向主人送话。

父亲和两位叔叔面面相觑了许多，只听父亲连声说“不对”，两位叔父也同声说：“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就是不对。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我那两个

^① 内务府：清代总管皇宫事务的机构，掌管宫廷内的祭礼、财务、警卫、刑狱等事务。

^② “知会”：通知。

叔父也说：“上头欠安，若是重的话，还不‘发抄’^①吗？”

父亲同几位叔父向来不以为皇上有什么大病。记得戊戌政变后，八国联军侵华之前，父亲还在南京任江南织造时，叔父增德、增麟、增绂三人给我父亲写家信，说他们与宫内深交的太医谈及“皇上无病，所进的药也不吃”。^②信中还说“奉旨病源许添不许撤”；^③我的姑丈，内府堂笔帖式英绅（字书卿）也曾写信给我父亲，说：“懿旨每日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带领请脉。拟方后赏饭吃”，^④姑丈与府内十余人“轮流帮同照料”，^⑤医士“终日不得闲”。^⑥他在致我父亲的信中说：“脉案一纸，奉阅可也。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无非虚不受补之意。其脉案上话语，系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父亲不仅保存了所有这些家信，并将他们抄录来的光绪脉案、药方都收藏好了。此外，我还见父亲保存的“再启者”残信，已无正文和署名，信的语气似是太医报告当时宫内情形，言及外省保荐医士四人进宫为光绪请脉（山西朱焜、江苏陈秉钧、两广卢秉政、门定鳌）。其中有的被上头斥为“脉理欠通，用药固滞”，打发回去；有的未过多久声称“家母有病”，告假回去了。余下的一人谨小慎微，一人迹近钻营。父亲保留的此残信中云：“圣躬各症……仍属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云云。然以仆观之，大局无妨，不过一时难复元耳。草此达知，外人不足道也。”我还记得抄文中言皇上“鼻塞声重，少流清涕，喉间发涩，项筋作痛；呛咳无痰……两肩坠痛，耳仍作鸣；身体倦懒，腰间作疼；心烦口渴”等等，从当时所获的光绪脉案和病情看，不过如此而已。

我父亲和叔父们因在内务府供职，与医士们来往较多，我曾听到他

① “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

②③④⑤⑥ 见《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

们和亲友讲过这么一段故事：

有位初学当差的太医，在西太后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句“舒肝顺气”。西太后把脸一沉，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奴才初学当差，不会说话，请老祖宗开恩。”有顷，太后又转变脸色，对那太医说：“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那样小心眼儿怎么办国事？偶而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那位太医经此一下，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而足。

从当时的情况看，无论太医或外省保荐的医士，给光绪请脉都得依慈禧的脸色行事。凡干不长久的，多半是违背了慈禧心意；干长了的，则是切合了慈禧的需要了。至于世人所能见到的光绪的脉案、处方究竟如何，不待言说。对于这些事，我父亲、叔父们心中有数，我听得多了，也有些明白。

故此，乍一听皇上病重，全家呆若木鸡。我在一旁，只见老兄弟三人似是怀疑有人捏造谣言。张俊峰不愧是久经“跟官”的，对官场内幕很有经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口称：“这个事情倒是请三位老爷要慎重……”我父亲问：“你没见他从哪儿来吗？”张答：“倒也问过了，送知会的人说，咱们宅是头一家。从这儿再到沙井胡同给奎大人（奎俊，首席内务府大臣）送信，然后到马大人胡同景大人（景丰，末席内务府大臣）宅，继大人（继禄，次席内务府大臣）宅，西城麻花胡同，是由别人去送知会的。”我的一位叔父说：“二哥（指我父亲），您先给奎宅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样？”我父亲想了想，“也好吧，就先问问，然后再看光景说话。”

于是这老兄弟三人一同去打电话，晚饭也停住不吃了。我们三个叔伯小兄弟愣头愣脑地跟在后头，要“旁听”个水落石出。那天晚饭正好有初冬当令的“锅子料熬白菜”^①美食一大海碗，我们小兄弟仨“票了”^②，因为要替他们老兄弟们暂时保留起来，我们是吃不成了。

等到奎家的电话接通，果然送知会的人将离去，所言真与我们听得的一般无二。

我父亲和奎俊商议定了：仍穿常服进内，备带素服，用时再换。一面由我两位叔父分头再到别的人家打听，一人去找某一个太监，一人去找和宫内消息灵通的某司员，再作一番切实的打听，然后聚到奎家见面，计议如何进内。

于是老兄弟三人备车马，分头而去。我们小兄弟三人只吃了那照例的两盘两碗的晚饭。等到约近十点半的时候，他们老兄弟回来，再去吃晚饭。我们小兄弟三人又去旁听。此时只看见他们脸上露出一些不安的神色，而没有什么疑神疑鬼的样子。我那两位叔父对我父亲说：“二哥，您上去之后，事情怎么样了？”我父亲对他们说：“还说哪，我们四个内务府大臣上去之后，太监们说：‘大人们差使我们替当了。请大人们上去看看吧。’我们上去一看，已经停放好了，当晚没事了。太监说：‘大人们请回宅歇息歇息吧，明天一早上来听旨（西太后的‘懿旨’），恭办大事吧。’我们就下来了。”

所谓“停放”，是宫中讳言，即棺木已经放在“中堂”，也可说是“停上”。言者隐约其辞，听者不便深问。据我当时的领会，“停上”是穿戴好衣冠，停放在灵床上，头东足西，尚未入棺木；若是已入棺木，搁置中堂，也叫“停放”或“停上”，那样外臣是看不见尸体形象的。

① “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

② “票了”：喻无所得。

我当时不明白父亲说的“停放”指的是哪种，叔父们俱不言语，谁知他们又是怎样领会的？

我一位叔父说：“可怎么把上头‘请’过来的哪？（指把光绪的尸身从瀛台接到宫廷内）也没传‘万年吉祥轿’呀！”平时在乾清宫西面月华门“门罩”（即门道）下陈设着一顶轿子，名称是“万年吉祥轿”。如遇皇帝死了，无论是在什么场所，就用那乘轿子抬出来。据闻系自雍正以后才设置的。我父亲说：“那谁知道啊？人家不是说都‘替’我们‘当’了吗？那还不是他们想怎么‘请’就怎么‘请’。”我父亲又说：“前天继子受命（他有管理太医院事务的职分）带大夫请脉后，他下来说带大夫的时候，上头还在外屋站着呢，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一些，还对他说：‘别的不舒服倒还没有什么，就觉得痰盛，叫大夫想法子去去痰。’只隔了一天！可怎么这么快呢？”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可怕啦！”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吧？”我父亲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这话咱们可说不清啦。”我们三个小兄弟就旁听到这里。

总之，光绪身故后，便是销声匿迹地移入宫中，不但没用“万年吉祥轿”“请”，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怎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就连在内务府供职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此后无论是内务府的司官，或是外部的司官，我三位婶母娘家的兄弟子侄们以及别的亲友，没有一个见面不说奇怪的。

我记得很清楚，过了没有一星期，这一类的话便倏然而止了。再听到的便是怎么办丧事，怎样走差使，所有的人再没有一个提光绪突然身故的话了。

过了“百日”后，从宫中发给具有得到所谓“颁赏遗念”资格的王公、大臣、懿亲、勋旧一批纪念物品，照例总是“吉服冠”一顶，“龙褂”一件，“吉服袍”一件，再搭上玉佩一类的一两件。我父亲所得“遗念”中有一件酱色宁绸面的两截羊皮袍子，在我看来，就非常奇怪：

上半截是小紫毛的羊皮，下半截是黑山羊皮，非紫羔皮。若照封建时代的实况来讲，这种两截皮袍根本不该是一个封建皇帝所用的，皮上身是小紫毛，御寒还不如一件厚棉袄。事后听许多人讲，凡是这一个等级的，得到的皮袍俱是如此，还硬要说“德宗”生平最喜好穿两截皮衣。后来听说光绪所住的屋子，冬天并不暖和，而且在光绪亲祭“坛庙”的时候，谁都看见光绪的鼻子下头总是挂着两条清鼻涕，他并不擦拭。“清鼻涕”与“小紫毛”当是有关联的了。

除了穿不暖，就是吃不饱了。在封建社会里，吃得多就得被说成是“胆大而多嘴了”。据太监们说，光绪吃饭，只有摆在眼前的几样菜食是新做出的，其余的俱和祭祀上供一样。初一搭上“膳桌”的菜食，可能到十五还是这些，所以光绪一吃饭就闹气。

再说到他的独身生活，更是凄惨。我的一位叔父（增绶，内务府员外郎）常在带“匠”（给光绪的住所换纱窗的裱匠和木匠）的时候，到太监的屋里休息，常常听到他们说点闲话。有一次，我那位叔父向一个太监说：“咱们‘老爷子’（光绪）总这样一个人，他寂寞不寂寞呀？”那个太监说：“别提啦。我们‘上夜’（夜间在光绪住的房里守更）的时候，有时就听见老爷子叫‘小珍珠，小珍珠’的，还有什么‘小宝贝儿’……”那个太监说着，脸上也很凄惨。

关于光绪突然身故，还有一说。说是西太后曾经说过：“谁要叫我不称心，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称心。”这本是在戊戌以后尽人皆知的话。另一句话就是西太后说：“我绝不能死在他（光绪）前头。”这句话在几个王府内都传说过。后来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又正好赶上光绪多多少少像有点病，便叫李莲英给光绪送了药去，叫他看着光绪吃了再回去。光绪在吃药的当天下午就死了。

民国外交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内争

叶景莘

外交委员会的产生和结束

北洋政府时期有过三个外交委员会：第一个是巴黎和会将开时于1918年12月中旬成立的，设于徐世昌总统府里。这个会因为反对签凡尔赛和约而于1919年5月3日自行结束。第二个大约是在1923年初黎元洪任张绍曾组阁时设立的，委员长为黄郛，我是委员。但这个委员会并未开过会，我不知会址何在，会的存在时期亦很短。第三个大约是在1925年段祺瑞执政时或较早些时设立的，委员长为汪大燮。他的惟一任务是邀集几个通晓国际法和熟悉条约的委员编一部不平等条约类编，将不平等的条件分类编列，以供修改不平等条约时参考。这是他的宿愿。类编印出后，会即结束。我未参加这个委员会。

现在我要叙述的是第一个外交委员会的事情。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总统，11月11日日欧战停止，12月1日外交部总长陆征祥出国赴巴黎和会。他先到日本与日首相商谈，离日上船时就发现丢了一个公事

民国外交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内争

籍。国内舆论本认为陆非外交人才，且为签订《民四条约》者^①，颇为不满。陆出国后，外交次长陈篆代行部务。他资历甚浅，声望不高，一般人都认为不足以应付局势。于是梁启超、林长民二人向徐世昌建议在总统府设一个外交委员会，任外交元老汪大燮为委员长。徐采纳了，并以孙宝琦、熊希龄、陆宗輿、李盛铎、林长民、王宠惠、沈瑞麟、陈篆为委员，林长民兼事务长，我是管秘书事务的事务员。徐世昌原是个极圆滑的老官僚，他虽被段祺瑞拥上台而自己并无实力，所以要拉拢各党派以增加他的势力。那时他已聘林长民为他的顾问。林劝他请梁启超赴欧洲游历，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为中国游说，徐也采纳了。这个外交委员会设在紫光阁西南角旁边的几间小房子里，虽在总统府内，但与府的办公处隔离较远。除汪、林二人及事务员们每日到会外，委员常来并对会务关心的只有熊希龄一人，王宠惠亦有时来，其他委员来开会时都采取敷衍的态度。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对和会的政策都是由委员会决定的，专使来电都是由外交部送委员会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重要的来电确是抄送给委员会看的，但未必是全部。

外交委员会成立后，汪、熊二人即联合提出对巴黎和会的提案。共五大纲，首列破除势力范围，分目为收回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统一管理铁路、撤销外国邮电机关。其他大纲为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梁启超出国前，亦来会与汪、熊、林、王等讨论了这个提案，以便在外接洽。提案经委员会开会讨论审查，于1919年1月6日一致决议通过，由汪、林二人亲呈徐世昌，奉命交院发。

^① 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5月7日午后3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对二十一条究竟是否承认。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奉袁世凯命照会日使馆，对最后通牒要求各节概予承认。25日，陆征祥与日本全权代表日置益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省之条约》，承认日本关于确定在南满与东蒙之权益和继承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益的要求。

次日由林长民亲交代总理钱能训，于8日电致各专使，正在陆征祥抵法之日。18日和会开幕。但以后我们才知道国务院电专使只将这个提案作为希望条件。^①

另有一事徐却完全接受了委员会的提议：陆征祥赴法途中与广州政府所派代表王正廷相遇，到法后陆即来电报告代表五人及名次，为陆、王、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驻荷公使魏宸组。汪看了这个名次甚为踌躇，因为和会只给中国三个席位，如五人轮流出席，怕有时对于和会情形有不接洽处；如由3人出席，则应为前3人，但陆无甚能力，王亦尚无外交经验，且对和会须南北一致，不知他的主张究竟如何，施则为怕多事的官僚，向不活动，这3人恐不足以应付局势。汪、林相商不决，我建议只好把顾提升到第二位，使他当冲。因为顾来电最多，与美国代表方面的接洽报告都是他这个驻英公使打来的，施并无一电；且二十一条交涉后顾所写的英文声明书颇为得体，他亦熟悉那个交涉的经过。汪采纳了，即将名次照改，与林同去请徐核定。徐同意了。汪、林回会，通知陈篆到会将新名单交他电发。陈拿这个名单出门时，低声说：“这是要捣乱了。”果然，新名单到专使处，王、施大哗，陆窘极。他到瑞士去躲避，此事即为一原因。但以后在和会上为中国辩论，确以顾为最力，并最能说。

委员会所提“破除势力范围”大纲里“统一铁路管理”一项引起了大争论。提案原文为：

^① 据刘彦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说，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虽经政府于1月8日致电陆征祥令其照办，然被日本探悉提案有铁路统一案，千方百计图谋设法由中国人自动取消。不久，果有交通部总长曹汝霖、铁路协会梁士诒等忽然积极反对铁路统一案。后竟由国务院再致陆征祥，令其勿庸提出该项。陆征祥等遂依国务院前后训令，仅作成我国提出和会之希望条件，并将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中铁路统一一项删除（见该书下卷页169—170）。

丙、凡以外资外债建造已成未成、或已订合同而尚未开工之各铁路概统一之，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以各路为共同抵押品，由中国政府延用外国专门家辅助中国人员经理之，俟中国还清该总债之日为止。各路行政及运输事宜仍须遵守中国法律，概由交通部指挥之。

这个提案的主要目标原是为收回以外资建筑、为势力范围骨干的东清、南满、安奉、胶济、滇越各路。因为国家无此实力，故欲统一管理之，又因无赎回之财力，故欲将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而以铁路收入还清。但以外债建筑的如津浦、沪杭、京汉等各路亦与势力范围有关，如不包括于统一管理之内一律待遇，既不易得据有以外资建筑各路的各国同意，且恐收入不足以早日偿清总债而亦难于举一总债，因此欲将外资、外债建造各路一概统一之。

外交委员会提案于1月8日电各专使。约一个月后，因中国代表在巴黎要发表包括西原借款合同的中日秘密协定，日使小幡于2月2日到外交部抗议，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登出反对铁路统一的社论。而交通总长曹汝霖声明对于统一铁路案尚待研究，外交委员会委员陆宗輿亦称彼在会本不赞成。先是，称为旧交通系领袖的梁士诒已有反对统一铁路的言论，至是乃与称为新交通系领袖的曹汝霖一齐反对，认为统一即是共管。那时交通部顾问贝克和中英公司经理梅尔思各拟有“万国铁路团”私案，是共管性质，反对者即以此种拟案与外交委员会提案并论。

2月18日钱能训约赞否两方集会于春藕斋。汪、熊声明提案与贝克、梅尔思拟案无关，最后梁亦表示赞成之意。钱声明双方无根本不同之意见，办法应再详议。汪推曹、梁拟案。3月7日国务院召集春藕斋第二次会议，曹、梁提出破坏原提案的草案，林长民因双方争持不下，拟了一个妥协办法。汪不同意，会后即辞职不复到外交委员会。

平心论之，委员会提案中所举借总债及延用外国专家辅助经理的条件，是因为当时实际情形不能避免，并非共管性质，但以后是否会流于共管，确应考虑。举总债时如何方可不受新银行团的压迫，更是问题。熊希龄以为此等皆系商订条件时所当注意，但政局多变，商订条件者为谁，亦难保证。另一方面，破除势力范围单靠要求，无此实力；但不破除则势将引入瓜分，提案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理由。要之，原提案人的用意在破除势力范围，并非为私，他们提出由交通部指挥，而当时他们在交通界并无一个立足之点。梁士诒提出已成外债各路不在统一计划之内，有保持他由于管理和调运铁路收入而来的“财神”头衔之嫌疑。曹汝霖在《顺天时报》反对后出场，陆宗輿在第一次春藕斋会议时，竟为高徐、济顺两路辩护是商业性质而非政治性质，则简直是与日本“一鼻孔出气”了。这是赞否两方主要不同之点。徐、钱则以圆滑手段依违两可于其间，而终偏向亲日派。曹、陆被称为亲日派，汪、熊、林等则被称为亲英美派。

亲英美派是一班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在国力太弱时，过分寄望于和会，尤其是对于威尔逊的和平条件十四条，以为公理或可战胜强权而欲借他人之力来保持自己的国土，这只能说是可怜。但外交战术本当利用形势和对方面的矛盾。在欧战中，英无力东顾，日本已几乎大嚼“狮子”的一份肥肉，战后美国在海军方面又与英并驾齐驱，纽约还要夺取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以势力平衡为传统外交政策的英国，本已利用后来的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以保持他所夺取的中国利权，战后他更得以“血浓于水”的甜言，利用日美间的矛盾以联美抗日。所以英美方面对于外交委员会所提破除势力范围一项，曾由两国公使表示赞成。美使芮恩施、英使朱尔典都曾宴请争论铁路统一政策的当事人而于宴后畅谈这个问题，并都声明贝克与梅尔思的私案与使署无关，他们二人亦不能向和会提出。与美使会谈时，汪大燮提出三点：

(1) 债权国权限只能及于投资确实，本利有着，其他不能过问；(2) 执行之权完全归中国政府，他国不得过问；(3) 为使资本家安心起见，可设立评议部，以便稽核或建议改良。其中第三点是因为当时铁路收入常被任意挪用亏欠而提出的。林长民曾刊印一本《铁路统一问题》，以披露全案的原委。梁士诒曾表示应当保存势力范围而“赖均势以求存”，他的机关报也发出了这种言论。当时我曾写了一本《撤废势力范围论》小册子送各处以辟之。

汪大燮辞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徐世昌屡次慰留，亦不肯回会。以后和会对中国形势日恶。日本原已在1917年2月至3月与英、法、俄、意订立了继承德国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力的秘密协定，至是日本代表声明如不照日本提案解决，日本将拒绝签和约。英代表劳合·乔治亦宣称日本如不参加国联，英国亦不参加。意大利代表则已因阜姆港问题不遂意而退出。于是威尔逊亦对日本让了步。中国代表团急电纷来，林长民乃亲到汤山慰汪回会视事。

4月30日，英、美、法三巨头决定了凡尔赛和约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三条，将德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都让与日本。5月1日，陆征祥来电称如不签和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将来中德直接交涉，是否较有把握，亦是问题。他怕将来与战败的德国直接交涉失败，因而就主张签字，对日本屈服。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由汪、林将致专使拒签电稿亲呈徐世昌，徐令国务院拍发。但2日国务院又密电专使签约，院里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潜去报告他。3日凌晨，汪、林到会，汪命即刻结束会务，并自草自缮辞呈送徐处而去。我将档案整理了，亲自送交外交部条约司长钱泰接收。林密电梁启超并请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他另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发电反对。我回会收拾杂务后，打了一个英文电与上海复旦公学李登辉校长，说“政府主签，我们在此已尽其

所能反对，请上海响应”，这个电的署名是随便写了三个英文字母。这个电文曾经登在英文大陆报面页第二行一个方格里，日期不记得了。傍晚我到汪处报告，汪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东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九点在他家开会商议。北大学生原定于5月7日（即1915年日本发出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之国耻纪念日）游行，于是决议将日期提早3日，因而就变为五四运动了。

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

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有会员几十人，以后逐渐增加至百余人，其中有不少各大学学生和几个湖南、贵州等西南省份的代表。协会会所系借用西单石虎胡同私立松坡图书馆西文部。协会成立时，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10人为理事；并推干事六人，为：总务陈介、外交叶景莘、文牍寿洙邻、法律王文豹、交际魏斯灵、庶务郑舜钦。以后因警察常去麻烦，郑不能应付，又请英文导报经理梁秋水任秘书。理事常到会的只熊、林、王3人，干事经常办事的只寿、郑、王3人。

5月4日当天，学生被捕32人，各校长和汪、熊、王等都请警厅释放，未允。协会决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那天清晨，梁秋水从煤渣胡同东口导报馆（今人民日报宿舍）到石虎胡同，路过公园，见园门关闭，门外有武装警察十余人，并架起机关枪。他到会不久，即有武装军警30余人进来，在院中站满。梁问何事，答谓由卫戍司令部警察总厅派来，禁止在公园开会，不遵命即

逮捕会员，封闭会所。梁问：“司令部和警察厅是日本机关，还是中国机关？”答谓：“是中国机关。”梁又问：“诸位薪饷是日本的钱，还是中国的钱？”答谓：“是中国的钱。”梁三问：“诸位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去公园开会？”众答：“不知道。”梁告以是为反对签和约，又说：“不料当局反过来禁止我们开会，这明明是帮助日本压迫我们，……诸位都是中国人，如果都是好汉，请快快与我们同去公园开会。”众皆无言，梁请他们进行休息，饷以茶烟。有一个卫戍司令部人员说：“我告诉你真话，会员可不逮捕，会所可不封闭，但公园万不可去，如去一定死人如麻。”梁答谓：“俗语说，‘来者不怕，怕者不来’。”那时会员陆续到了100多人，梁指道：“自来送死的愈来愈多了。”双方相持许久，那个卫戍司令部人员请梁想个办法。梁沉吟些时说：“如要我们今天不去公园开会，今天必须先将被捕的学生释放。”那人打了多次电话，最后说，“长官同意梁先生的办法”，但问谁负责。梁说：“我姓梁的负完全责任。”于是军警散后，会员们整队向天安门进行，在新华门前与被释放的学生相遇。大家一齐转向前门，沿路高呼“反对巴黎和约”，散发传单，熊、林二人亦赶到了。会员们一部分到商会开会，一部分到先农坛去开会，下午四五点钟回石虎胡同而散。

5月8日，北洋政府又颁布弹压学生命令。6月3日北京学生讲演，被捕的为数更多。但各地民众已相继起来，罢课罢市，抵制日货，遍及全国，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陆、章等。6月10日，徐世昌咨两院辞职，但仍通电各省主张签约。6月23日，国务院电各专使签约。28日签约之日，巴黎中国留学生包围了代表团寓所，周鲠生先生也是前往者之一。本来各专使并非无爱国思想，更非亲日派，未必愿签约。陆征祥实是个好好先生，我们常批评他不过是个“大礼官的材料”。他也许会迫于政府命令去签，如袁世凯命他签《民四条约》一样，但亦不能与曹、章一概而论。其他专使都是精明机警之人，即使专为自己着想，亦未必

肯负这个签约的责任，来蹈曹、章的覆辙。当时各处电专使拒签的电文有极严厉的。那时陆原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是总干事，王宠惠和我是副总干事，我们于3日以3人名义电陆勿签。我起的电稿最末说“如签，回国不利”，蔡以为不应恫吓他而删去了。但国民外交协会连去三电，第三电全文为“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此外各处去电必有更激烈的，专使们敢犯众怒吗？专使寓所既被包围，于是不去凡尔赛签约而对巴黎各报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历述中国代表团的苦心：如4月4日对和会的抗议，5月6日关于山东条文保留的提议，5月26日在保留条件下签约的正式通知，并举出1815年6月9日维也纳条约签字时瑞典代表保留三个条文而签约的前例，以驳斥保留无前例之说；以后中国代表又提出将保留条件作为和约附件，不被接受；又提出在赴凡尔赛签约前送一保留山东条文的声明，而和会主席只允在签字后送去；代表团以签字后的声明效力可疑，又提出修改声明字句，亦不被接受。因此，声明最后说，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① 这个声明是否预先拟好的，不得而知。

拒签凡尔赛和约，是全国人民，包括群众、学生、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统治者或曾充过统治者的一些人的爱国思想和力量联合起来所造成的结果。

^① 见麦克莫雷：《与中国订立的和有关中国的条约协定汇编》，1496页。

一波三折、无疾而终的南北“弭兵会议”

叶恭绰

漩
涡
沉
浮

辛亥革命时，曾在南京举行南北议和，南方代理以伍廷芳为首，北方代表以唐绍仪为首。和议成后，清帝逊位，民国建立，临时大总统孙文退位，袁世凯当选为第一届大总统。自此以后，南北之争，始终未断，中间又经过民国二年的癸丑之战、袁世凯洪宪帝制及张勋主持的复辟等几次巨大政变。迨1917年（民国六年），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总统后，其时北方府院之争，暗中也就是冯国璋与段祺瑞之争日形激烈；而南方组织了护法的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于是南北之间的斗争愈形复杂。当此之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客暗争，外加以帝国主义的明侵暗蚀，推波助澜，真是全国人民水深火热，国敝民贫已达极点。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国际上表面出现了和平空气，国内人民十分渴望南北统一，以纾民困，而图争取国际上之地位。在此之前，南北军阀派系之间，亦不断有谈和之声浪，但双方迄未获得较接近之机会。嗣因国内外和平空气之高涨，南北执政首脑以及各实力派均希望借此时机提出和平口号，解决当时所存在之问题。虽然免不了各为其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来作打算，而且还有一部分人，如安福系的一些人，仍坚决主张以武力统一，但却不欲公然提出反对和

平，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徐世昌于1918年9月为安福系所操纵的第二届国会选出为大总统，首先他就进行南北和谈之准备。此时南方军政府七总裁主席岑春煊亦积极要与北方拉拢，于是把酝酿已久的和谈更推进一步，双方派出代表，至1919年2月始获得正式开议。

这次会议自事先之磋商筹备，及会议中间之波折，真是迂回曲折，艰难困阻，终至于昙花一现，无疾而终，未能取得圆满结果，只是在旧的腐朽政治历史上留下黑暗的一页而已。然而此次会议所牵连之国内外方面乃是千丝万缕，对于以后所发生的影响亦不为小。今加以记述，聊为史料之助，似亦不失为有意义之举。我所能参考到的资料，主要是就当时与会者朱启铃（北方总代表）、章士钊（南方分代表）两先生的谈话，加以演绎编述。因为我当南北和谈之时已出国赴欧洲，当时真相隔膜，现所能参阅到的材料亦不够完整。朱章二先生现时皆已高年，回忆旧事，容或有恍惚之处，故本文所载难免错漏，尚希阅者是正或予补充。^①

会议的经过

1918年9月徐世昌当选大总统，继冯国璋执掌政权，欲趁国际和平空气高涨，国内人民企望南北统一的机会，积极进行和谈的准备。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自己的声誉，来巩固地位，另一方面是希图借此摆脱各军阀的挟制。他与南方的岑春煊皆属前清之督抚，有同僚的关系，与唐绍仪更有悠久的友谊。而南方军政府亦同样希望利用时机，与徐进行

^① 南北议和档案，仅参考到北方的；南方是否有档案，不可得知，故本文所记多偏于北。另外，朱启铃先生写了一篇《关于南北和议事》及章士钊先生写了一篇《我之上海会议观》，附于本文之尾，就其所记乃系当时内幕，非身历者不能道及，对本文辅助甚大，附此志谢。

和谈，所以就明商暗契，互相遣使通函，来磋商一切。初意北方代表为李纯，南方代表为岑春煊，并有不少拟议中的人物。最后的决定，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铃，南方总代表为唐绍仪，分代表南北各9人（后来南方分代表增为10人）。北方代表启程之前，由国务总理钱能训于1918年12月27日举行宴会饯行，并向各代表致宣言如后：

政府委任诸君代表南下，与西南代表会议，兹当诸君临行，愿以政府之意见宣布于诸君之前。自复辟乱后，西南数省关于法律问题，观察互异，内争扰攘，年余于兹。今大总统莅任，以和平统一为志，适值欧战终了，国际多事，本内阁承元首之意，以为协约诸友邦方战胜强权，将以崇高之人道主义，贡献于世界之进步。我国参列战团，允当顺应大势，发展国力，以尽其对于世界之义务，不当复为内部之纷争，而贻误建国之大业。是以受任伊始，即与西南开诚协商，促进和平，继复纳西南之请，而有此次派遣代表会议之举。是政府之所可首告诸君者，无他，政府为国家进步计，而深以国内平和统一为必要也。至于法律问题，政府与西南因约法条文解释之争执，致有今日不幸之现象。将来会议之时，深望各具世界眼光，均以国家为前提，以多数舆论为基础，而使真正之法意归于一，此本内阁所乐于观成而深有盼于诸君者也。若夫军事善后，烦难为甚，政府意见在根据现状妥筹收束。国家财政如此，势须速减兵额，减少支出，方能免破产之厄。而被兵省份，城邑糜烂，匪祸蜂起，如何规复治安，尤赖双方妥议。所望诸君与西南代表同察现状，妥拟方案。善后经费以必要为限，改良计划以能行为主。是不惟政府所乐闻，而西南各省疆吏亦深有期待于诸君也。抑更有进者，七年三乱，国本不宁，今世界大势不容我故步自封，是以政府尤望借此次内争之结束，为国家厉行民治，肇造新邦，其如何而能

一新人心，如何而能巩固邦本，倘有良策，尤所愿闻。行矣诸君，为国宣劳，贵艰任钜，本内阁与有厚望焉！

12月31日，代表们由津专车先赴南京，等候南方代表商讨各项问题。南方代表是于1919年1月25日陆续到沪的。

为了开会地点，即经过多次磋商。北方主张在南京开会。南方唐绍仪主张在上海租界内开会，坚决不允来南京，意谓不能在军阀包围之下开会，因为当时南京是在直系军阀李纯管辖之下。更有人提议会场设在金山寺，或是在兵舰上游弋开会；这都未免近于笑谈。北方为迁就南方的意见，最后决定在上海，借用旧德国总商会为会场。南方代表住愚园路90号，北方代表住哈同花园。

关于会议名称，双方意见又极不一致。北方曾拟称为“善后会议”，南方认为这是清代在绥靖地方土匪时才用善后字样，主张称为“上海会议”，并坚持对等议和。北方政府尤其是安福系反对对等议和。几经磋商，始终未得一个双方同意的正式名称，结果各用各的名称。北方称为“南北和平会议”。南方则称为“上海会议”。所以在北方文卷档案中未发现有一个正式规定的会议名称，亦没见到正式铃印。我今天来记述这个经过，称之为“1919年南北和议”，亦就是说不采用任何一方的会议名称。

1919年2月20日上午九时，会议于上海开幕，南北代表皆出席，唐朱二总代表分别致演说词，并摄影。现在将演说词照录于后，并检出照片注明代表等姓名，披露于此。

南北和议开幕会上的讲话：

唐总代表：今日为和平会议开幕之期，鄙人无似，获躬与其事，欣愧交并。溯自法纪凌夷，生民涂炭，年来南北所受痛苦，人民所蒙损失，不可以缕述，国家不幸，莫逾于此。然今日两方代表，犹幸得聚首

一堂，讨论国家百年大计，实人民厌乱之心理，与友邦友谊的忠告，互相促迫，始有此和平会议之组合，此不可谓非不幸中之幸也。今日为第一次会，对于国家具体问题，当俟诸以后逐期会议详细讨论。惟有一事不能不先为声明者，此次西南护法之争，揆诸正道公理，实为不得已之正当防卫，并非挟持意气，故与北方为难。所谓西南反对北方，此种不当之名词，西南绝不能承认。至年来战事蔓延，民生憔悴，南北两方同感此痛。然审世界之趋势，知公义之方张，敢信以后世界上必无战事发生，征诸美总统威尔逊之演说，当可了然。况吾国数千年来，人民心理皆酷爱和平，历史具在，斑斑可考。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多握于武力派之手，故战争纷乱，迄无宁岁耳。迨者，时势所趋，潮流相迫，将化干戈为玉帛，换刀剑以犍牛，一切干羽戈矛皆应视为过去陈旧之古董，后此战争当无从起。西南惟一之希望亦岂有他，不过欲使合法之和平，期其千万世不祥之兵气销为日月光，俾戮力同心，以发展民治精神，图谋国家巩固而已。若夫对外，则双方虽在战争，而彼此实共同一致。际此欧洲和平会议时期，吾国必不能不争国际上之地位。西南本极愿国有强固之政府，使教育、交通、实业事项积极发展，以利民生，内政修明，则外侮自无从侵入。矧世界和平之说，美总统倡于前，举世人和于后，近且国际联盟之议将形诸事实，则外侮之虑更可无虞。且也近世外交多主秘密，故尔虞我诈，诚所不免。兹者外交主义，世界已共趋于开明，则虞诈之患可无，斯侮辱之虞自免。我西南主张，宜趁此世界推诚相与之时，实行全国开放主义，借友邦资财，发展吾国实业，以吾人物产供给世界需求，民国前途殊未可遽抱悲观也。今日与诸公为第一次之会晤，鄙人所最感触不安者，为南北二字。夫吾国实一家耳，安有所谓南北。即以此次双方代表而论，南方所派出者固有北人，北方所派出者尤多南人。鄙人极愿尔后南北界线勿复再印入脑际。此外更有最切要之事，为鄙人所舌敝唇焦，迄仍未获解决者，厥为陕西问题。自停战

迄今，经已两月，而陕西战事仍未停止，陕民何辜遭此荼毒。鄙人于各代表未抵沪之前，与徐菊人先生函电交涉，不下十数次，直至于今，仍无效果。今且和平会议已第一次开会矣，而据昨日所得消息，尚有三原失守说。果尔，则以前所下之停战令，不成为一纸空文耶？务望诸君鉴陕西人民受此额外痛苦，首将此事解决，免使全国皆跻和平而西陲一隅尚遭涂炭，则幸甚。国内战争至今日已告一结束，然推厥祸原，外力实有以助长之。盖武人派苟非借助外力，则金钱无自来，军械无从购，兄弟阋墙，早已言归于好矣，何至兵连祸结延至今日，使人民痛苦，至于此极哉。此著要之点，务望诸君格外注意。所愿由今以后，双方代表彼此相见以诚。盖会议讨论范围悉关国家大计，非一人一家之事，惟推诚相与，始易解决。并愿此等不祥之会议，从速终了，俾人民获早日安宁，当亦为诸君所赞许也。

朱总代表：顷唐总代表所述各节，与启铃感想亦有同者。迩年以来，内争扰攘，迄于今日，国民希望和平有如饥渴，又值欧战告终，列邦将以大同主义贡献于世界，我国岂可长此纷争，故政府有派遣代表会议之举。今者两方代表团聚一堂，捐除畛域，共谋国是，自当有解决办法，以慰内外之望。惟是南北纠纷，各事原因复杂，其造因不尽在民国八年中，因沿历史而来者甚多，自应为根本之观察，定远大之计划。至唐总代表所谓外交问题一节，一致对外争国际上之地位，启铃极表赞同。民国六年，政府加入参战，亦为注意国际地位起见，排万难而为之，久为人所共知。经营年余，始获此结果，得在欧洲和会席上以公允正当之言论，贡献于各友邦之前，我国民自当以一致之精神，为政府之后盾。唐总代表所谓须建设强固政府一节，启铃尤为同感。欲求政府之强固，必须内外相维，共策进行，至军事方面，尤应顺世界之潮流，副国民之责望，合财政之状况，力事裁汰。惟其办法极应详慎，当为妥筹收束，引归正轨，不可因销弭兵祸，转启争端，致使人民疮痍未苏又遭

涂炭也。再停战以来，因地域辽阔，一时致有冲突，容或有之。辛亥和议时，亦不免有此种现象，自当从速设法，以纾民困。今日为会议开始之期，不及讨论具体办法，略述一二而已。诸公以国家安危为重，启铃不敏，愿共勉之。

南北代表姓名列后，并将他们所代表之背景加以注明。

北方总代表 朱启铃（桂辛）

分代表 吴鼎昌（达铨） 代表安福系
 王克敏（叔鲁） 代表直系
 方 枢（立之） 代表安福系
 汪有龄（子健） 附属安福系
 刘恩格（鲤门） 代表安福系及奉系
 李国珍（叔远） 代表研究系
 江绍杰（汉三） 代表安福系
 徐佛苏 代表研究系
 施 愚（鹤雏） 代表直系李纯

秘 书 周诒春 贾士毅

南方总代表 唐绍仪（少川）

分代表 章士钊（行严） 代表岑春煊
 胡汉民 代表孙中山
 缪嘉寿（延之） 代表云南接近唐继尧
 曾 彦（其衡） 代表桂系陆荣廷
 郭春森（松年） 代表广东莫荣新接近陆荣廷
 刘光烈（亚休） 代表四川熊克武
 王伯群 代表贵州
 李述庸（龙门） 代表陕西接近于右任
 饶鸣銮（子和） 代表海军及福建

彭允彝（静仁） 代表湖南接近谭延闿

秘书 钟文耀 某某

这个会议双方皆无固定经费，而是由总代表、分代表临时筹措。北方由王克敏向中交两银行设法垫付会场经费以及代表的车马费（每人每月300元）等，财政部派员驻会经手支付报销。南方则由唐绍仪委托卢信公向金星人寿保险公司挪用，事后金星公司因此亏闭。南方军政府亦未过问此事，竟成了唐个人的负债，在10余年后尚在清还此项债务。但是北方代表们在南京时期的一切开支，由江苏督军公署供应，闻其报销数字大可惊人。

和议开幕后，未设总的秘书处，南北代表各设有秘书厅，掌管文电档案，互不联系，竟至对外发表的文件亦不会阅，矛盾丛生。

会场保卫及代表们住所之警卫，系由钱新之（永铭）与上海工部局接洽，每日由住所赴会场均指有一定的路线，沿途有密探警卫。因当时上海情形甚为复杂，而和会又为一时众所注目，所以代表们之行止亦颇严谨。

总计自1919年2月20日会议开幕，至5月14日双方代表辞职，时间不满三个月。开始纠缠于陕西停战问题，继而唐总代表患病入院，最后为争执国会问题而止。其间自2月28日第五次会议后，因为陕西问题不能解决，而正式会议停顿，直至4月9日始再举行扃门会议。所谓扃门会议者，意在于会议中提出的问题，在未解决之前，不得暴露，以防发生阻力。例如撤换陈树藩、张敬尧的问题，不应事先透露出来，以致不能执行。但对此点未能做到，故扃门会议并未见诸实行。

根据北方档案，正式会议有纪录可稽者仅八次（中有二次改为谈话会），其余为非正式的谈话会20余次。正式会议时，只能由双方总代表发言，分代表如有意见，可写条子递与总代表，由总代表讲说。谈话会时，则可大家发言讨论。当时两方代表在自己方面意见就很不统一，甚

漩
渦
沉
浮

至有的分代表在公开场所明言朱总代表不能代表分代表的意见。今将八次会议的纪录摘要如后，以见会议中之具体情况。

第一次会议 2月21日上午9时

南北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讨论陕西问题。唐总代表谓根据陕西报告，北方军队仍未停止战斗，请撤换陈树藩。（案1918年11月16日北方徐世昌下令停战，11月23日南方军政府亦下令各守原防，静待后命。北方认为陕西、福建二省有地方土匪，不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故军队继续有冲突。旋由江苏督军李纯出面调解，提出五条办法，于1919年2月13日公布，双方公推张瑞玘赴陕执行监视划界事宜。是时北方的陕西督军为安福系陈树藩，南方的陕西总司令为于右任。）

第二次会议 2月22日上午9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甲) 陕西问题，决定请张瑞玘迅往监视划界。

(乙) 唐总代表提出请北京政府宣布与日本所订之军事密约及附件，并反对支取参战借款余额17000000元。

第三次会议 2月24日上午9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甲) 中日军事协约问题：朱总代表报告已接到国务总理钱能训复电，允将协约抄送本会，但谓协约并无附件。唐总代表说，必有附件，要求北京将全部文件交出。

(乙) 湖南问题：唐总代表提出，湖南遭受兵灾，亟待拯救，要求撤去湖南督军张敬尧。双方指定章士钊、彭允彝、徐佛苏、方枢四人审查此案。

(丙) 唐总代表提出，反对北京将发行八年公债40000000元。双方指定胡汉民、刘光烈、王克敏、吴鼎昌四人审查此案。

(丁) 商定每星期一、三、五为正式会，二、四、六为茶话会。

第四次会议 2月26日上午9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甲)唐总代表提出，接于右任电报，陕西的北军仍未停战，要求撤换陈树藩，否则和议不能进行。

朱总代表谓关于陕西军事，已由北京严飭停战，目前当地真相如何，应俟张瑞玘到陕查明，望以和会全局为重，勿因一部分之事而使会议停顿。

(乙)唐总代表提出，为对陕西事件便于大家发言，本日会议改为谈话会。

朱总代表表示同意。

第五次会议 2月28日上午9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甲)朱总代表报告：北京寄到中日军事协约全文，计有中日军事协定文书一件，陆军共同防敌协定条文一件，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条文一件，解释欧战终了文书一件，共四件；并谓寄交欧洲和会专使相机披露者亦只此四件，此外别无附件。

唐总代表云：协约文件须详加考查，惟既据北京政府声明此外无附件，本会双方代表当以全体名义向中外郑重宣言，关于中日军事协约除此次抄寄本会之文件四件外，绝无附件；将来如发现与何国政府何国人民私行订立关于中日军事协约之附件，全国人民不能承认，即不能发生效力。

朱总代表云：此次所抄寄者想系对于本会第一次电请之答复。第二次去电北京说明所指附件不必拘定签字之约文，即关系协定之一切文件皆应抄交本会。但尚未接政府复电，现应一面进行考查，一面再向政府催问，俟得复后再定办法。

(乙)唐总代表云：关于陕西问题，尚未得北京答复。今特声明，

从本日起 48 小时内如仍未得北京政府圆满答复，惟有向外交团声明和议停顿。

第六次会议 4 月 9 日上午 9 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双方提出具体议案。

唐总代表提出承前续议问题六项，主要内容如下：(1) 取消中日协定；(2) 裁撤国防军事机关及所属兵士；(3) 参战借款不得提用；(4) 和平会议未终以前，不得借入外资及发行公债；(5) 陕西问题；(6) 湖南问题。

新提出者 13 项：(1) 国会完全行使职权；(2) 实行军民分治，确定地方制度；(3) 废督裁兵，划分军区，厘定军制，实行征兵制，开通全国道路及修浚河道以安插兵士；(4) 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及海军军费军实；(5) 善后借款南北共同办理；(6) 输入外资发展各种实业；(7) 军政府一切命令认为有效；(8) 指定的款实行强迫国民教育及鼓励社会教育；(9) 整理财政，免除厘金；(10) 严行禁止贩卖人口、贩卖烟土吗啡、栽种罂粟及一切赌博；(11) 惩办祸首；(12) 各省治安善后问题；(13) 整顿海军问题。

朱总代表提出：(1) 军事问题：甲、拟留军队之编制问题，乙、额外军队之收缩问题（裁减标准与其方法，安插方法，裁减时间，裁减费用），丙、军需独立问题；(2) 政治问题：甲、军民分治，乙、厘定地方制度（省之改革，道之改革，裁减中央各署冗员，增设地方佐治官吏，扩充全国教育，推行全国警察），丙、地方自治（县自治，省自治，振兴自治事务办法），丁、发展国民经济（兴筑国道，改革币制，废除恶税，革除条约及习惯上之束缚），戊、善后借款问题（借款额数，借款用途）。

讨论时，朱总代表谓唐总代表所提第 11 条对人问题，于和会极不相宜，亦非本会职权以内之事，非本会所应议及，希望撤销；第 1 条可改

为国会问题；第7条须各种问题解决俟和议成立后，方可议及。

经过辩论后，唐总代表同意。其他各条可以归纳合并。

本日会议改为谈话会，商讨编列议案。兹将修正、合并之议案列后。

讨论结果所修正、合并之议案：

第一 国会案

第二 财政案

- 甲 善后借款问题
- 乙 改革币制
- 丙 废除恶税免除厘金
- 丁 革除条约及习惯上之束缚
- 戊 输入外资发展各种实业
- 己 兴筑国道修浚河道

第三 军事案

- 甲 军队之编制问题
- 乙 额外军队之收束问题
 - 一 安插方法
 - 二 裁减时期
 - 三 裁减费用
- 丙 废督划分军区问题
- 丁 实行征兵制问题
- 戊 军需独立问题
- 己 整顿海军问题

第四 政治案

- 甲 军民分治
- 乙 厘定地方行政制度

- 一 省之改革
- 二 道之改革
- 三 裁汰中央各署冗员增设地方佐治官吏
- 四 扩充整顿全国教育
- 五 推行全国警察

丙 地方自治

- 一 县自治
- 二 省自治
- 三 振兴自治事务办法

丁 严禁贩卖人口贩卖吗啡烟土栽种罂粟及一切赌博

第五 善后案

- 甲 各省治安善后问题
- 乙 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及海军之军费军实问题
- 丙 军政府命令有效问题

第六 承前续议案

第七次会议 5月6日上午10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讨论山东问题，由双方总代表致电巴黎中国专使，电文如后：

巴黎中国使馆转陆专使暨各专使均鉴：青岛本中国领土，租借德国，并非何国之属地。中国既对德国宣战，租借条约当然无效，青岛当然为中国所有，不能任听何国之处分，故吾人对于和会要求退还青岛，实为至当不易之举。近闻和会有不能容纳中国主张之说，人心激昂，举国一致。北京及各地人民连日均有激烈之表示，不知和会情况究属如何？倘和会承认他国之要求，不容纳中国之主张，我四万万国民为公理正义计，断无承认之理由，请勿予签字，以伸公道，而保国际之地位。谨代表公民意，特电奉闻，并盼复示。朱启钤 唐绍仪 5月6日。

第八次会议 5月13日上午11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唐总代表云：此次和平会议所议各案，大致同意。至法律问题及国家应办之事已列为八条，于本月十日开送贵总代表，今日再提出说明。第一条，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表示不承认。第二条，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国民。第三条，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第四条，恶迹昭著不恰民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第五条，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六年六月十三日命令无效（指张勋威迫下令解散国会）。第六条，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第七条，其他已经议定及付审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第八条，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总统之日止。

以上八条为承认统一之表示，最大之让步，必须第一条至第七条之实行，乃有第八条之结束，若不能实行第一至七条，则第八条仍属无效。

朱总代表云：第五条国会问题乃属本会极重要之事，贵总代表倘是绝对主张恢复国会，则北方对于时局现状，实无回旋之余地，请再加考虑。

唐总代表表示，第五条如无办法，则其他各条不必讨论，本席智能薄弱，无济时艰，当本责任问题，向军政府辞职。但不可认为和会因此决裂，军政府如有办法，仍可易人，于和会绝无牵涉也。

朱总代表表示，开会已逾数月，国会问题无转圜之方，贵总代表因此坚决辞职，实为失望，本席自渐才力不逮，亦惟有引退而已。

讨论至此改为谈话会，请各代表发表意见。

从上边所摘的会议纪录中可以看到，这次和议自2月20日开幕以

来，前后不满三个月，最后为了国会问题不得解决，双方总代表均引咎辞职。虽然当时朱唐二总代表均声明仅是为了个人责任关系而辞职，并不影响和会，可另派代表继续会谈，但事实上和议从此停顿，未能再有进行。其后北方改派王揖唐为总代表，南方改派温宗尧为总代表，双方竟未谋面，更谈不到有什么会议了。王揖唐因与南方代表不能会见，在上海所处的情形极为尴尬，乃于10月19日自己使人在哈同花园住所伪置炸弹，遂借此而远颺矣。关于和议之开始即发生许多周折，而开谈以后亦常是陷于枝节问题的纠缠，最后为了国会问题而停顿，未获得任何结果。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究根探源，其内幕甚为复杂，不仅属于国内的军阀派系之政治暗潮，并且牵连到国际上的斗争，今概述于后，览者可自得之。

南北和谈之内幕

北洋军阀当时分为直系及皖系两大派：直系以冯国璋为首，曹錕、李纯及后起之吴佩孚等皆为其重要人物；皖系以段祺瑞为首，亦称为安福系，其中实徐树铮操纵一切。各省之督军、省长及师旅长等大半皆隶属直皖两系。后来以奉系独树一帜的张作霖，此时尚接近直系。冯国璋、段祺瑞早先虽同隶袁世凯部下，长期以来，暗斗甚烈。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以马厂起义之功继续任国务总理，府院摩擦日形激烈，直皖两系之争遂更明显。皖系实力较充足，掌握了北方各省大部分的军权政权，一向主张武力统一。皖系背后有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所以在对德参战后，利用日本借款练兵并购买军械，实际上是欲假借参战名义来充实自己的武力，以达到其武力统一之目的。直系是根据冯国璋“和平统一”政策，希图与西南滇桂军阀联系，来搞南北和议以抵制安福系之专横。如长江三督之首李纯与南方酝酿和谈，及曹

镊得力部下之吴佩孚进入湖南后按兵不动，均是“主和派”。

安福系所组成的新国会，于1918年9月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冯国璋遂下野。安福系认为这次选举既能倒冯，又举一个毫无军权实力的北洋元老徐世昌来作傀儡，那末段祺瑞仍居有参战督办地位，无论是出面组阁与否，实际上操纵全部军政大权。但是徐世昌并非甘心作傀儡，他这次能被选出为大总统，亦正是利用直皖二系之争，坐收渔人之利。徐世昌就职以后，观察国际和国内形势，为了自己提高名誉、巩固地位，所以积极筹措南北和议。适在此时，国际正将召开巴黎和会，帝国主义英美法意日等亦正想进一步向中国伸开侵略的魔爪。所以徐世昌之提出南北和议，不仅是国内的形势所促成，还更有帝国主义者的威迫利诱在背后鼓动。

和议联系伊始，首先是代表的人选问题。北方总代表先有直系李纯之说，又有安福系王揖唐之说，当然都有偏于一方之嫌。最后徐世昌挽出旧友朱启铃为总代表，可以说朱是代表徐的，而不属于直或皖那一系者。在代表名单中，不难了解，安福系占半数以上，吴鼎昌为中坚分子，直系以王克敏为中坚分子。在整个会议前后过程中，几乎一切均操之于吴、王之手。南方总代表本拟为岑春煊，后由章士钊斡旋，敦请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又因为唐绍仪与徐世昌早年在东三省为同僚，本有极深密之关系，徐世昌希望唐绍仪任南方总代表，当然有他的用意，看一看下面的电报，就可以略见梗概了。

徐世昌致唐绍仪电文原稿（似系徐世昌亲笔）：

唐少川先生鉴：卅暨微日两电计均达矣。时局至此，已无从容解决之余暇。兹幸事势渐形凑拍，急应力求直捷了当办法，以免别生枝节。此间拟推桂辛代表赴会，南中不审进行若何？吾弟热心爱国，能出当斡旋之任否？兄与吾弟均愿速了此局以策治安，绸缪拮据，同具苦衷，务望统筹全局，早底于成，无任岐祷之至。世□□。

南方分代表是西南各省所推派的。章士钊系代表岑春煊，为南方代表中之主要人物。（参看本文文末所附章文。）

安福系尤其是徐树铮向来是主张武力统一的，对于这次和议当然不会赞同，但是因为慑于当时国际和平空气高涨，及国内人民期望南北统一停止战争之各方面舆论，所以不敢公开反对。他们绝不愿意和议成功，因为和议成功后，徐世昌的地位将比较稳固，不能再多受安福系的指挥；而直系是早与西南军阀有联络，自然将占居上风。可以说和议成功就是安福系之失败，尤其是怀有野心的徐树铮更是不甘心于此。

徐世昌亦早明了这点，故于1918年11月派徐树铮去日本观操，乃调虎离山之计，以免在国内兴风作浪，破坏和议。徐树铮虽勉强去日本一次，然不久就回国了，因此更怀不满。其实，在和议开会之前，安福系在代表之中已作好准备，遇有机会即设法破坏，吴鼎昌即担任这个主要角色。会议中的重要布置及文电，多由吴主持起草，总代表受成而已。会议中途，吴鼎昌曾回北京当面向政府报告情况，因为国会问题牵涉到徐世昌本人地位并北方国会是否合法，因此和议就很难进行。吴鼎昌在京与徐世昌、钱能训、段祺瑞等研究了对策，使北方代表采取强硬态度，不惜决裂。在这里可看到徐世昌与安福系段祺瑞、徐树铮本是利害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和议成功，另一方面要和议不成，但是遇到国会问题时，他们两方又有了共同利害，变成目的一致。后来徐树铮以一个参战处参谋长的资格，竟对和会代表发号施令，电报中大放厥辞，不仅暴露其专横狂妄，亦看明白徐树铮蓄意要将和议破坏。今将吴鼎昌、徐树铮电文五件录后。（各电文皆据原电纸照录，有文义费解处，当系密码有误，仍存疑。）

吴鼎昌自北京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8日）

朱总代表鉴：窃密。此电勿示人。国会事，过南京时秀山已为王谷等专议宪法之说所动，经昌力陈利害，似已了然。因迫询昌之主张，不

得已，以积极消极两说密告。秀赞成积极说，谓如府院同意，渠可与西南当局暗中接洽。陆派钮蔡王三人适抵宁，席中匆谈，钮留蔡王来京。过蚌埠，丹忱病，匆晤炳文幼丹，告以情形。渠云决裂后亦须另想和平办法。主座属又铮留京待昌，不意其母先一日死，匆回徐州。晤镜潭详述情形。主座并告又铮与西南军界有接洽者，均随时将原电呈阅，与伯文之说不同。主座告陆要一百五十万元，先给五十万，中央已允汇往，陆并未催。唐亦派人来，惟虑陆先内向。力量对于广东能否达到，陆不无踌躇。故陆刻正在粤布置，非有把握不敢催款。干老以为非至时机，不可轻举，且对外交上必须视上海会议最后情形，否则中央有联络武人破坏会议嫌疑。此种接洽亦非尽由秀山。国会问题与外人接洽者另函告。府院以整理二读会条文宣布为根本解决之法，极表赞同。主座谓即牺牲金钱亦无不可。第二案府院均难决定。款事主座甚以为必要，已属端甫进京会商。陕事查办之说，干老云难办到。此事恐有纠缠，公可不必与闻。肩门之事不能办到，以后枝节之事甚多。昌意同人态度似应强硬，力往决裂一方做去；再以金钱为饵，或可使少川就国会问题之范围。此事或有万一之结果。如何盼告，以便进行。正译电间，往晤合肥，谈甚久。合肥亦以国会办法照第一案，代表为国家负责任极是，并举与西南接洽内容见告，其说甚长，另详。昌，庚。

徐树铮电之一（5月12日）

朱总代表，呗密，转达铨、立之两兄鉴：闻两兄建议于桂老，谓东海可由两方代表签字承认为总统，而国会则签字两消之云云，不胜骇异。总统之承认与否，只是国体改革之际，外国有其说，岂有国内而需承认之理。东海就职以来，国论欣然，各国一体欢洽，何待公等二十一人之承认。二十一人承认以后，二十一人以外之人是否照旧承认，恐非公等所敢断言。然则目下之不统一，尚仅五省，一经公等无病而呻，儿戏从事，必致天下骚然，使东海不安于位而后止。如东海何？如国家

何？天无二日，国无二会。国会为东海惟一保障，国中有力之人肯为东海出力者，赖有此耳。必由公等代撤藩篱，使愿出力者无所倚傍，则凡有奢欲，皆可乘间找隙，投袂而起。公等爱国家，爱东海，是不出此。桂老老成谋国，谅不至为尊策所误。树铮忧戚之中，更复何心预闻国事，往以治乱之几，危于一发，恐将国忧之不暇，欲居家忧而不可得，故不敢不以直闻，统祈酌察，幸赐垂教。李赞侯兄到沪代述鄙见，谅亦人听矣。在苦树铮，文。

徐树铮电之二（5月12日）

朱总代表，呶密，桂老台鉴：昨闻达铨、立之两兄献策误公，当局则迷，智者容有失，冀公明察，或不为夺。弟亟思与明利害具魄力而有肝胆者一晤。计我公一行中，惟叔鲁兄为最，拟请转商设法来京，容书面与剖析大局症结，少效壤泥，庶免公等为五里雾所眩，何如？候示。在苦树铮，侵。

徐树铮电之三（5月15日）

朱总代表，呶密，转达铨、立之兄鉴：迭电谅均人览。沪议已无可为，黄粱将熟，梦可醒矣！闻伊老氏十一人已全辞，请恳劝桂老速早回京，另谋救国之方，歌浦莺花不足久恋也！夫以交通、北洋、安福三派实力，戴东海之德望，据二十四省区之大地，得桂老之明干，左右扶掖，导我辈复进以先路，稍从根本整理，何患不气吞欧亚。若五省之就范，直瞬息间事耳，何至低首下心专向流氓胯下讨生活哉！迷途未远，无事徘徊，析肝布诚，伏恳鉴纳。叔鲁、子健均性情中人，又皆一时健者，尚祈以鄙言相示，联袂归来，言寻旧景，不胜企盼之至。在苦树铮，咸。

徐树铮电之四（5月16日）

朱总代表，呶密，达铨兄鉴：寒电敬悉。政客谣啄，何足动砉砉之听。惟前承教及，所谓停顿云者，皆申合一气，借促各方之视听。更考

之诸公素日口吻，以及非外人不能统治中国等愤激之论，故此次决裂，不能不疑其别有隐情，似将故启外人干涉以为制内之计，恐徒陷于丧权辱国，而无从救挽，遂不觉大声而疾呼也。然谚虽憨直，心实无他。外人干涉虽不足吓人，惟虑法律破坠，无以维系国家耳。以弟素性而论，守法至于极点。法之所许，无论何等危苦，均不难掀天揭地而行；至法所不许者，分寸不敢挪移。使此时撤去法律，遂可恣睢自为，岂不甚便于己。峻如法所挟限我者亦遂无以限人，天地之大，材勇百倍于我者何能数计，将皆自行其是，而无复顾忌。其时如我辈者何以自存，即能竟而幸存，更复成何国体，是耿耿不能释也。如何善后，当轴谅有权衡。咸电所陈，倘足备一得之虑，幸常察教。桂老、立兄诸同人恕不另。在苦树铮，铤。

直系的首脑冯国璋，已被安福系逼迫下台，退居幕后。当时直系中有实力者为直隶督军曹锟及其部下率兵入湘的吴佩孚；长江三督之首李纯不仅拥有实力，而且与桂系早有密切联系，这次议和，他有十分重要关系。开会前之南北两方联系，如停战划界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名称之商榷，皆由李纯从中斡旋。在会议期间，朱总代表每日向南京报告情况，看来李纯实为和议之背后主持者。直系的目的就是要借这次和议成功来击败安福系，而且是表面拥护徐世昌，实际要想趁国会问题来重捧冯国璋为总统。在1918年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时，原内定选曹锟为副总统，以拉拢直系。徐世昌却不愿有一个拥有兵力的副总统，以防可随时取而代之，于是巧妙地说，大总统和副总统全是天津人影响不好，应该把副总统一席空着留给南方军政府，以便得到合作。徐世昌密囑周自齐在议院中设法破坏，几次召集开会选举，均因出席不足法定人数，遂结果未选出副总统，曹锟为此大怨。所以直系实力派与南方桂系暗中勾结，欲招国会问题喧腾起来，以便牵连到徐世昌成为非法当选总统。他们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在口头上说将来国民会议仍选举徐世昌为总统，

而实乃是一个骗局，准备在改选时选出冯国璋来。照这个预谋如果实现，则直系大获全胜。我们从吴鼎昌自北京致朱启钤电报中，可以看到李纯与陆荣廷勾结情形，亦可看出吴鼎昌在会议中活跃之姿态。以上是北方内幕情形。

南方的派系亦甚复杂。当时广州军政府有七个总裁：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孙中山、林葆懌、岑春煊，以岑为主席。这几个人之中，云南唐继尧、广西陆荣廷为实力派，亦就是所称滇系、桂系。但是另外的广东、福建、贵州、四川、陕西、湖南，皆在各地军阀势力范围之下，军政府亦无指挥之力。从南方代表名单中可看出，是每省推有代表，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辖机构。岑春煊既属赤手空拳的主席，唐绍仪亦是新自日本回来，并无实力。所以当时南方的重要势力，还是在滇桂两系，尤其以桂系陆荣廷为中坚。南方军政府本是风雨飘摇的，军政之费甚为拮据，若不趁此国际国内和平空气高涨之时积极与北方政府谈和，前途甚为阴暗，桂系所以与直系有了很密切联系。孙中山自从通电斥责滇桂两系后，不久即离开广州赴上海，只派了胡汉民当代表参加南北和议，对于当时南方军阀亦很难指挥。总之军政府是全在桂系支配下，这次南北和议主要亦是由桂系暗中与直系联络的。唐绍仪之为总代表，一方面由于与徐世昌的旧关系，一方面背后有国际上的支持，南方亦就利用这两点而推他出来。陆荣廷想借和议成功后，可以选为副总统，其他西南各省当然亦各有其目的，以图各有所获——充实力量，巩固地位。

从上述的内幕看来，还是军阀政客为了自身而作的派系斗争，说不到诚心诚意为了解决国内问题而进行南北和议，更谈不到能在国际上力争国家主权、反对外国侵略了！但是，在这内忧外患的时候，人民为了解放自己，民族自强的意志极度激昂，尤其是工人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坚决地起来斗争，要求南北和议必须成功，在国际上一定要争回主权。

所以在上海举行和谈时，各省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或是函电交驰，向政府及代表们呼吁；上海的团体及群众每日均有队伍到会请愿。对外方面，除去向巴黎和会发电表示中国民意外，全国各地亦屡次举行爱国示威运动，革命的高潮“五四运动”就在这个时期勃发了。为了反对卖国外交，北京的学生5000余人举行了爱国示威游行，提出“收回青岛”、“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等口号。在五四运动的巨大的革命洪流下，当时军阀政府不得被迫向帝国主义进行交涉，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等竟不敢签字和约。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始。上海的南北和议双方总代表亦曾在会议上决定致电巴黎陆专使等力争主权，请勿签字。在国际的复杂情况下，加以国内人民的革命运动日益蓬勃，南北和议的本身问题根本无法解决，遂于5月13日的会议上双方总代表提出辞职。以后虽然还有继续开谈的酝酿和另派总代表之事，但已是残局阑珊，不可收拾了！以后的和议余波，几乎不值得一提，且无档案可据，故尔中止叙述。

国际间的背景

当时我国内南北派系之间的斗争，表面上处于军阀割据状态，而其实乃各有帝国主义的背景。现在为了阐明南北派系的复杂情况，必须进一步将其背景揭露，借此可以了解帝国主义是怎样施其侵略伎俩来干涉我国内政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主要力量放在对德作战，无暇顾及东亚的问题，亦就是对于中国侵略暂时处于停顿状态。于是日本趁时积极侵华，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哪一方面都成了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把德国在华的非法权益，都继承过去了。等到德国失败，欧战结

束，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急将矛头指向东亚，首先就是对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那就势必不能允许日本垄断情况，而要趋于大家分肥。所以在巴黎和会里，西方国家一致采取牺牲中国而又抵御日本的政策，美其名是主持公理，维持中国独立。但是除去在和会上争辩之外，一定要在中国国内找到代理人，才能便于伸进魔爪。日本一直是偏重在北方争夺势力，况且已经有了如意的代理人安福系。那么西方国家就去另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在当时中国国内有实力而能与安福系相抗衡的，只有直系了。西方国家既然要利用直系来打倒安福系，根据中国当时情况，最好是提出南北和议，可以把安福系挤倒，也就是将日本的代理人取缔。如能达到这个目的，西方国家就可以抵制日本在华的独占，又可以把侵略政策通过他们所挟持的直系来推行。所以在南北和议之前，外交方面就出现了西方国家公使等从中奔走情事。下面有两段记载，可以证明帝国主义是直接干涉我国内政的。

1918年5月15日法国柏公使会晤外交总长的谈话：

柏公使：贵国南方军官数员托广东领事转请本使询问中央政府，如何条件可以议和？本使欲为照询，良用踌躇，今日完全以私人资格转达此语，毫无置问贵国内政之意，务希亮察。

总长：贵使善意可感，仅为传达意思，从前非无先例，本总长当于国务会议时转达同人。

1918年9月9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晤外交总长谈话：

朱公使：西南情形如何，近日有何消息？

总长：日前福建某处似有危险，日内亦无他消息。

朱公使：广东盐税前已被军政府截留，现闻又有截留关税之说。果尔，于中国前途实大可虑。

总长：中国数次革命以来，均未动及关税，因彼此均知关税有种种对外之关系。此次如有截留情事，恐将发生他项问题矣。

朱公使：贵国近来情形愈趋愈下，南北问题若不早日解决，长此以往，必有分裂灭亡之惨。现时前敌将士均不愿战，人人皆知。自外人观之，实无十分必战之理由。中央政府屡借外债，举凡国家所有可以抵押者均已抵押殆尽。此款尽充军费，而未收丝毫实效，万非长久之计。西南声称彼等实愿和平了结，因中央政府向无诚意，此说真假不可得而知。惟伍君廷芳曾向本国驻粤领事声明数次，托其向本公使转探中央政府口意，大约实有调停之余地。

总长：南北战争，全民涂炭，诚有如贵公使所言有分裂灭亡之惨。中央政府岂不愿和平解决，无如西南极坚持。如请恢复旧国会一层，此万难办到。旧国会从前所办之事，如反对宣战问题及库伦条约，种种刁难情形，实为中外所共见，断难独责中央政府之无诚意也。

朱公使：总而言之，此事若不早日解决，贵国将来地位实有不堪设想者。贵总长亦知两月以前英美驻华各界要人曾立一会，对于中国现状曾有决议，请本公使转达本国政府，设法劝告中国等情。该会要人类皆久居中国，深知中国内情，且与彼等私人亦有利益关系，均以为贵国内部如不即日平静，国家万无存在之理，此事贵国政府不可不注意也。

总长：语有云，当局者暗，旁观者明。贵公使本日所谈各节，足见关系本国之意，深为可感，明日当详细为段总理言之。

朱公使：贵总长所述贵国成语甚为恰当。段总理为人有一定不易之宗旨，本公使最为钦佩。惟时势变迁，有万不能坚持到底者，即当设法转圜，以顾全大局。欧美各国现因战事较为重要，故无暇顾及中国内乱，但战事可望早日解决，一旦议和，问贵国处何地位？此四年之中贵国有何成绩？倘届时贵总长被简为贵国议和代表，恐亦难于措辞也。不然欧战时代，中国内部如早和睦，于实业贸易上大加整顿，以中国出产之多，大可供给欧美各国之用，实利国利民之一大机会。今则失此机会，深为可惜。

总长：贵公使在中国最久，知中国情形最深，今日所谈各节，极为中肯，殊足钦佩。本总长定当转达段总理及其他阁员以备采择。

朱公使：本使拟日内以私人资格往谒新举大总统徐君，徐君亦与本使相知有年也。

总长：徐大总统极愿接见贵公使，且对于南北问题尤愿和平解决。贵使晋謁时亦可顺便一谈。

朱公使：今日与贵总长所论贵国内情，实足令人悲观，曾与曹总长谈过一次，因恐与段总理意旨不合，故未向段总理言之。

由上述外交谈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方国家对于我国南北和议早在参与。朱尔典谈话里表明段祺瑞是不主张和平的。在会议之前，朱尔典曾派商务参赞委思赴南京与北方代表会见。当上海开会期间，美国金融调查团过沪，曾到和会会场参观，表示希望南北和议代表团结一致，美国可以大量金元援助云云。日本对中国抱着垄断野心，对于西方国家所欲促成的南北和议却存着另外一种目的。现将当时大阪每日新闻社论节录一段于后。

“夫中国之治乱，微独中国国内之力得左右，外力之影响亦不亚其内力。易言以明之，即今日南北之能妥协与否，端视友邦之能调停否耳。近闻英国公使朱尔典已属以非公式向徐总统陈述英政府之意见，极愿南北妥协，并暗示英国愿助以一臂之力矣。又美大统领威尔逊亦于总统就任之祝电中明言亟望南北妥协。而挽近返美任之美国公使蓝辛氏，且以大统领之意志为本，闻亦正式提出愿任鲁仲连之职矣。准是以观，英美两国或协力助徐总统早奏戡乱之功，俾中国对之，人人感佩不置，而从此可以攫得东洋优越之地位，正未可知焉。然英国为我同盟国，美国亦我最亲爱之一国，而彼等于中国内政决不致公然行动，藐视我，而不与我一言，此吾人所深知者也。就利害之深浅、友谊之亲疏、位置之远近，以及洞悉中国之内情一切，无论何国概莫我若。故中国苟一旦须

外力调停，惟我日本出，则众论翕然。英美两国断不能独进而自由行动者也。……”

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其始英美法等国表面上是主持公道，对于中国专使顾维钧向日本关于中日密约及山东问题的抗辩，予以同情支持，并要求在和会上宣布密约。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就到外交部严重抗议，还宣传许多威吓手段。这种国际上的斗争，仿佛是要维持和平，保障中国权益，实际是英美法与日本的侵略政策中的矛盾，不过借着这几个问题来互相争夺远东的利益。最后帝国主义者还是勾结起来出卖了中国，英美法所组成的三人会议决定了德国在山东及胶州湾的所有非法权益让予日本。中国在外交上遭到了痛心的失败。

巴黎和会期间亦正是国内召开南北和议的时期，关于南北两方推派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人选，以及要在和会上宣布中日密约，和有关山东的权益等等问题，亦均是上海会议中讨论的重要内容。当时全国人民及社会团体都十分重视这次南北和议，所以各方面的函电呼吁，群众请愿，一致希望在和议中解决国内争端，南北统一，并在国际的巴黎和会上争回国家权益，真是举国瞩目，如大旱之望云霓。但是夹杂着南北军阀政客的派系之争，为了夺取个人的名誉地位，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就这样阴沉惨淡地结束了南北和议。其后1921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九国会议，其动机和结果仍是前后一贯的。帝国主义者根据侵略剥削的原则而加以成文化，在会议中所谓西方大国们，处处暴露出牺牲中国以饵日本而遂其分赃计划的态度。国内反动统治者并未引起警惕，反利用各种机会来作派别及私人的争夺，互相攻击，卒之所谓国际和平主张毫无效果，几至演成共管我国的局面。言念及此，良可痛心。直到1949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全国胜利，才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三个敌人，来建设社会主义。今天回忆前事，追述南北和议的经过始末，似仍不失为一段重要史迹，故谨述所知如上。

书至此忽忆及一事。当1918年冬朱桂辛先生将南下时，我亦将有巴黎之行。饯席上，朱先生嘱余书箴扇以志离别，余大书明人诗云：“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峙，间者解其纷，君今已间未。”盖预料此行之无结果也。时梁士诒为参议院议长，先此受徐世昌之旨，曾与西南方面有所联络，嗣以国会不选曹錕为副总统，直系以此憾于梁，故乃同意以朱启铃为北方总代表（朱为参议院副议长）。其后王揖唐以众议院议长而继朱任总代表，分代表中刘恩格则系众议院副议长。此数人皆与国会有关者，于此亦可见国会问题始终为和会之中心关键也。

附朱启铃（蠖公）先生的《关于南北和议事》及章士钊先生的《我之上海会议观》于后。

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

关于1919年南北和议一事，距今已40余载，更以年老健忘，回溯旧影，十不及一，寒舍所幸存之残档，亦属零篇断简，不能首尾衔接。今承遐翁以超然之态度，本传信之方针，记述成篇，以供史学家之参考，并承参稽质证，仅就我所能回忆者，说明于后（偏重在吴鼎昌庚电一事），聊作补充，容或尚有出入之处，尚希有关方面谅解为幸。

我以不才，荷徐东海（世昌）多年知遇，及畀以北方总代表之重任时，私意其时所倡议的南北和平统一为全国所渴望；且徐乃文治派，声望颇高，或可借以调和各派，而减少军阀的横恣，更恃有各分代表之鼎助，可以分工合作，故勉膺其责。固不料事与愿违，且适得其反，转以酿成后来长久纠纷。我自愧无能，虚劳往返，固不足论，但追穷原委，似亦有不少应负其责之人。今者事过境迁，不妨姑举其要。

*遐庵为叶恭绰委员笔名。

此事病根实在代表权之不能统一。盖南北既各有总代表又各有分代表，各分代表既分别代表某一方面，自必负有听命于其所代表的一方面之责，且有时或须听命于其所代表的一方面中之某有力者。而各代表复有时各别自有其目的与行动，其中参差矛盾，早已是先天不足。即以北方而论，各分代表皆敏干之才，尤以吴鼎昌、王克敏二人为最。王系代表直系者，而属于冯国璋的一系，于定开和议之前，早已与李纯结合，欲借此拥冯上台。李与南方陆荣廷亦早有穿插，陆又除李纯一线外，又别有通徐东海之线，以期左右逢源。其时安福系征南之计，既因所派攻粤浙军童保暄所部之观望而受挫，暂不能展其武力统一的意图，表面上只得同意召开南北和议，因而安福国会议员等出面参加和议，而以吴鼎昌为其总指挥。故自始形成各一系统，其中钩心斗角，世所周知，无待赘论。

厥后，两方图穷匕见，痕迹显著者即为吴鼎昌之庚电，今避琐屑，姑以庚电作为线索而加以铨释，以便推寻（庚电原文见前，不重录）。庚电之由来，系因南北开议累月，仍无结果，其后始探知安福系固不欲和议成功，而直系亦别有企图，根本难期合拍，不得已令吴北上，询探一切，期得真相。及得吴的庚电，始恍然大悟，直皖两派都不是肯与东海合作，且于此亦可推见吴的态度与做法。盖吴到南京晤李纯，过蚌埠晤倪嗣冲之子侄，已备知直方的计划。吴到京后，知陆荣廷已派人直接与京中各方联系，而安福系亦拟乘此另出计策，倾复南方军政府。此是否亦系吴之献策，不得而知，但离题愈远则系事实。我因此深感对东海无法交代，遂决计辞职。

吴鼎昌庚电中所谓以金钱为饵一语，据我了解，唐少川不会接受金钱运动，南方分代表亦不会受北京政府的馈遗。在会议期间，南方代表办事处没有经费，我曾囑卢信公代致一万元，作为南方开支。唐少川毅然拒绝，而在金星保险公司自行筹措，亦众所具知。李思浩、张志潭二

人曾经剽窃。系为讨论善后大借款问题，以着意询问。至于徐毓浦（世章）乃秉承其尻徐总统之命，亲沪致意慰问大家。因徐（世章）唐二人在东三省为同僚，私交甚厚，在前文内所引徐致唐的电文中，亦可了解，一般普通酬应或不能免；若说到以金钱为饵行事，我从未闻及，以理推之，亦断不会有此事。吴电中之语，可能是当时北京政府的一种打算，所惜当年参与和议的代表，大半作古，各种经过皆无人可勘询证实矣。至徐树铮各电文的措辞等于谩骂，正与吴佩孚态度同科，不值一笑，仅为收场锣鼓之一幕，其真关键固不在是也。

吴鼎昌到达南京时，与李督晤谈，已证实王（克敏）谷（钟秀）等主张另行组织新旧国会议员来南京制宪。案李督为最先与岑公（春煊）接洽和议之原动力，本心希望北以李督为总代表，南以岑之亲信为总代表，于南京举行会议。其后因章行严（士钊）任军政府秘书长，以事去日本，晤见唐少川，请他出任南方总代表，北京乃提出以我为北方总代表。李督当时主张在宁开会，以东道主自居，大肆铺张。时北方代表已到南京待命，而唐少川提出要在上海开会，并反对善后会议名称。几经磋商，北方屈从南方意见，以上海租界内旧德国俱乐部作会场。其中委曲周折，已大伤李督面子。迨和议开后，王谷等与李督协商，认为上海之会议难有进展，必须改弦更张，别开蹊径，为解决两个国会根本问题，只有从天坛制宪会议继续完成二读会宪法草案，再组织一个国民会议通过宪法，重新选举总统，来解决南北争端，为收拾时局之大计划。吴鼎昌在宁受李督威胁，及王谷等鼓吹之下，不免有所警惕，乃以积极消极二语对付李督，为机动退出重围之计。

我推测吴所谓积极是要和会屈从王谷主张，直接与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联系，进行另一套办法；消极办法即是北方坚持强硬态度，不惜停止会议。但时隔不久，五四运动勃发，北方政府已张皇失措，革命火焰燃遍全国，庚电中所说的种种已不复有研究价值。据我个

来看，此物所云云者，不过是十场幻影，无论积极或消极，绝无丝毫有意义之结果，徒留一痕迹以供人指摘而已。

综合观之，此一扬戏剧，前后绵延三年方始了结，其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五四运动及华盛顿九国会议等等巨大变迁，均有因果根苗的关系。虽会议本身一事无成，却为当时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页。其足纪者，惟有响应五四运动阻止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签字的通电及要求公布中日秘约等，不失为有价值有影响的行动，其他则全是浮光掠影也。

蠖公笔述

我之上海会议观为叶遐庵作

1919年，上海曾有一次南北和会，南北两方，各派代表十人。从2月20日开幕起，至5月14日辞职止，为会不过八次，为时亦仅三个月弱，我适忝厕南方代表之一。会之名义，纷争未定，北方号曰南北和平会议，南方号曰上海会议。名从主人，吾不得不作如是观。

1918年夏令时间，吾方息影于北京大学，以专讲逻辑为事，不问政治，自适其适。而新闻纸忽揭南方专电，广东军政府公推章某为秘书长云云。此不仅学府惊心，吾尤大诧不已。盖一年以来，南中音问殆绝。而西林（岑春煊）故由余妄腾口说，播迹于癸丑之役，中经开府端州，得返初服，诚大幸事。吾曾反复劝告，谓：“今日政治，非吾辈能问。公宜息躬养晦，以元老自重，再蹈前复，其何能淑。恕吾潜心下帷，不复随侍左右矣。”西林唯唯，吾乃浩然北首，自安于环堵至今。而今突以重长记室闻，岂非咄咄怪事？

士各有志，无能相强，吾不愿南，一辞再辞，终足了事，顾吾于西

林，不能忽然如此也。且北府以伐叛讨贼，向南用兵，而吾皮傅于南，迹属于北，目前即无危险，向后何以自处？吾退回久之，试往就商于谷九峰（钟秀）。九峰曰：“吾顷得欧阳俊明函，促君甚急，此万不可辞。西林不得君借，何能成行？”余问曰：“广东形势何如？”九峰曰：“似甚危险。”余问何故？九峰为言浙军董保暄师急攻潮汕，粤军战守两无胜算状。余曰：“印泉（李根源）何在？”九峰曰：“在上海，此次西林出山，料印泉筹策居多。”吾于是与九峰互揭近势，了无善策而罢。

明日，吾往访段芝泉（祺瑞），告以西林见招，向之辞行。时段当国，以武力统一自豪，吾知其人未必能动之以情，而要能折之以理。且曩在对德宣战时，彼以总理兼外交委员会会长，吾在会场论事，意颇相得，因断定段对我无恶感。又吾寓东城十条胡同，去段府学胡同寓邸不远。有人告我，徐又铮派人在十条胡同左近巡逻。吾惧为徐谍暗算，计不如直向段自陈其事为便，因有此行。

吾见段寒暄，且简明言事之后，段直截相告曰：“粤事固不难了，吾派董保暄劲旅攻潮汕，潮汕指日可下。潮汕下，全省动摇矣，君何必急急凑拍，充作炮灰乎？”炮灰二字，吾从来未尝闻知，言初入耳，亦殊服段之爽朗。因恳切言之曰：“西林与吾相关之谊，公所知也。人生在世，所需于友，即在患难相共。今西林有难，吾倘坐视不理，纵人不见责，吾之神明亦且自疚。承公见爱，劝吾勿充炮灰，意殊可感。然兵凶战危，人之旦夕存亡，难由自己掌握，此层吾固不甚担忧。然国家至上，南北统一事大，公今当国，所定国策，应不分南北而励行之。吾知西林比较能听鄙言，吾晤西林，必首以公之忧国至计，恺切语之。万一见听，岂不为公省却征调不少？……”吾言未毕，段即掩言：“现当暑假期间，君南行看看形势，亦佳。君速去速归，不须沾滞在南。且西林，吾之知己也。彼督两广之日，曾致电项城（袁世凯），借调北洋军官四人赴粤，相助教练，而鄙人居首。夫吾名未彰，而先见赏于西林，

可见西林能度外用人，气量甚大。事虽未成，吾至今耿耿难忘。君见西林，幸为我致意。至国家之事，公事公办，西林有何见教，力所能及，定不相违。君行矣！幸一切保重。”此次会谈，所得如此圆满，殊出意料之外。

童军攻粤事件，段口述与九峰吻合，心窃忧之。顿忆吕戴之（公望）在京，彼曩曾督浙，应与保暄有连，立驱车往晤。一谈之余，尽言无隐。非惟保暄是戴之部将，而所统士兵，亦多督部亲随，则大喜。因怂恿戴之一同赴粤，作计扭转潮汕颓势，戴之快然许诺。顾彼久羁京邑，负累山积，势难成行。吾因为王辅宜（侃）言之，辅宜适有宕款，慨予通假。数日部署，联镳南发。由上海乘“南京”号大邮船赴港，即易车抵广州，西林以下皆大欢迎。吾趋农事试验场秘书厅莅事，戴之则衔命飞驰汕头，旬日之间，事事按部，咸得董理。昔楚子代宋，投袂而起，其速不是过也。

越数日，戴之电称：童军伏濠沟作战，戴之率蒋鼎文等数辈，夜抵濠沿，高声喊话，令知来者皆乡人，兵初愕然。戴之永康人也，则用金华土音，宣称都督亲来劳军，军因大欢，群携灯来迎。戴之等径越濠以往，直趋司令部，面保暄劳苦。久之，保暄召裨将计事，戴之为演述世界和平大势，及国内政争是非曲直诸状，欢声雷动。天未明而计定，保暄率全师来归。捷闻，军府大庆赏，戴之军镇潮汕，而粤局略定。

夫粤局暂定云者，此诚暂也，以云持久，殆一无可恃。时欧战已停，巴黎和会且开，国内和平之要求亦高。学生论战及游行示威之举，屡见不一见。于是军政府拟派特使二人，分往美利坚及日本，察看东西方诸国之趋势，以资因应。所派赴美利坚者为王正廷，赴日本者为余，余于1918年秋冬之际东行。唐少川先生以军府总裁之资地，避居热海，显与军府示异。余抵东，不遽访日政府，而第一谒唐。所有对日词令，无不率先请益。大宴日阁僚之日，余以“徐行后长者”礼，请少川先致

辞。以此种种，少川厌恶军府之态，有所改变。余因矫西林之命，请其于将来可能之南北和会，勉任总枢。少川虽不遽允，而意未以为违也。余此行，所获于东邻者姑不计，而所为牢笼少川，以期一致之处，大告成功。

吾云将来可能之南北和会，所谓将来，确也。迄今为止，军府从未尝讨论南北和会。特吾意私计，粤局如此不稳，倘不争取时间，从容布置，再有人侵部队，或内部哄争，军府可能崩于一旦。余返粤日先以此意密陈西林，且告矫命约唐之罪，西林颔焉无违。独少川之所以不满于军府者，以桂系故，而桂系之中心枢纽，在陆干卿（荣廷）与莫日初（荣新）。幸也，日初之参谋长郭椿森，眼界稍宽，以能与吾辈合作自耀。经吾以椿森为钥，节节疏导，加以西林主持于上，杨永泰赞助于旁，竟使少川总持和会一道难关，安然无事。而1919年2月20日，军府所标拟之上海会议，居然在外滩旧德国总商会，如式演成。

兹和会也，如一多灾多难之胎儿，虽幸未枉死母胎，而一离于里，仍告夭阏，乃天赋之不得不然。何以言之，西南之主和会，仅为争时间，稳定局面，已如上述。又西南者，只包含五省地盘，既不能坚持对等，使成两个中国（按当时绝对无此种舆论，即联邦或邦联，亦为通识所不许）；而和议一成，南部即在北方屠刀之下，听其宰割。将来纸片所得，使之成为实际，仍非武力不为功。看来蛇不会化为龙，不如保留原状为得，此其一。北方人物，都在台上，如伪总统徐世昌，南方势不得不追认，即南方不得已而求其次，舆论亦必以争夺权利，猛烈攻击，何况又无必得之数乎？此其二。北强南弱，为革命以来既定局势。和议成后，小而军费军实，掌于北司，分配不匀，岂能称乱？大而军民职掌，去取惟命，革职令下，违即叛逆。此袁世凯往例在先，北洋军阀，一模一样，此其三。南方派系分歧，心口非一，争利虽所必先，主名又欲居后。和议席上，条款碍难提出，此其四。代表中少川眼高于顶，汉

民张脉愤兴，无论是何条款，都难得到此二人同意。料定如此，自以不提为高，此其五。

以上五因，合之时间一义，南方不废和会之名，而直不期和议之成，情势犁然，中涵至理。

如实言之，北方兵力，原优于南，和议倘成，又且抹煞南方，增高北方，北方应无不赞成和议理。如徐世昌由墨勅斜封，一变而为合法元首，其最著例也。然北方派系之多，亦如南方，凡某一系以为利者，他一系即以为害。更即徐世昌言之，世昌除利用和议，使其职守合法外，而同时所得实益，即在行使法权，制裁安福系。于是安福系不欲徐世昌铅刀可割，即同时不欲会盟告成，天下事利害相伐，往往如此。北代表中，总代表朱启铃，诚口衔东海（徐世昌）之命而出，而分代表如吴鼎昌、方枢等，却倚倚段系，从而克制之。档案内有1919年4月8日鼎昌由北京致启铃一电，其最扼要数语曰：“昌意，同人态度，似应强硬，力往决裂一方做去。”是安福系之不欲和，如十日并照之明。即此一端，已足证实和议无成于北方代表之手之可能，其他无需赘述。

南北两方，既一例以和议不成为尾闻，以吾揣之，将诚莫妙于对唱高调，以此为最光耀，而又最合乎实际之理想极致。果也，两方代表，都如此行之，档案罗罗清疏，不难一览而得。

曩见有人如此说：“这个军政府，从它开张到垮台，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导演了旨在出卖西南革命根据地，以换取个人或派系的利益，经过内部复杂尖锐的明争暗斗，同北洋军阀及其官僚政客们勾结利用，和互相欺骗，而卒至隙终凶末的所谓南北和议的一幕丑剧。”此一说法，只顾到词句之光泽，而却无事实之根据。所谓出卖，必须有实体物质，必须有高低价格，必须有一方需要。作者所指者是何种？所谓个人，个人是谁？所谓派系，是何派系？作者架空诟讪，大抵小说家之意匠，并无真实蓝图。从而溢之曰丑剧，翻可能军政府从来不作好事，而惟有此

一幕戏，值得赞美为好。作者与政学系不无渊源，今提笔叙述本系历史，遽加以并不存在之丑恶面目，用意何许，诚未易测。

作者又说到利用勾结，互相欺骗，此最犯嫌疑之一款，应是金钱。观前引吴鼎昌庚电云：“再以金钱为饵，或可使少川就国会问题之范围。”可以看出：北方拟用金钱，收买少川以及各分代表，以各分代表八九都兼有国会议员头衔也。不过北方此一恶作剧，完全没有使上。李思浩、张志潭两次长南下，闻挟有大量资金（现李思浩尚存，可以询问），即得不到张口机会而退。少川既拒绝北方恶意馈送，复不受南方正式开支，虽无人遽许为高风亮节，而事实却是如此。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分代表即无意为善，亦谁敢出头为恶？又况胡汉民何等尖刻，岂容朋辈中迹涉贪黩，而彼隐忍不宣？综而言之，此次集会，南代表中，殆无多劣迹可指，余故非取巧隐恶一流人也。至北方有人乘机贪污，如李纯报称开销经费若干万元；又吴鼎昌、王克敏二人，以财阀而屈为分代表，当然别有一番打算，此南方管不着，不必追论。其他个人利害问题，如某显者当如何位置，某军人必特别安排等，圆桌上从无一字提到。南北两集团中间，彼此友好者多，幕后亦绝不见交头接耳，有何拟议？作者所谓勾结欺骗，胡为乎来？

北方正段系当权，倘南方有意勾结，第一须从笼络段派入手，顾西南政策，恰恰与此相反。试观四月九日第六次会议，所提六项问题云：

- 一、取消中日秘密军事协定；
- 二、裁撤国防军事机关及所属士兵；
- 三、参战借款不得提用；
- 四、和平会议未终以前，不得借入外资及发行公债；
- 五、撤换陕西督军陈树藩；
- 六、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

以上六项者，几于无一不是对段痛下针砭。不仅此也，六项之外，

还提有新十三项，其中惩办祸首一款，为朱总代表当场反驳。又五月十三日补提八条，重言申明：中日一切密约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约之人，以谢国民。又声言：裁撤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废除一切假借名义、盗用库款之军事机构；撤换恶迹昭著、不洽民情之督军、省长。综括看来，会议前后所提各案，大抵范围囊括全国，主旨惩罚北方，曾无一字涉及西南本身。窥其用意，显欲利用西南数省之微薄力量，首先争取对外保护国权，排除侵略，对内驱除毒螫，疏解民困。做到哪一步，算哪一步。而最后八条之第六条，主张由和会推出负重望者若干人，组成政务会议，监督议和条件之履行，此物此志，到底不懈。至于西南本身之军民残破情况，及军实补充，人员调配等问题，一概搁置不讲。意谓：全国有好处，西南也孕育在内，无事苍头特起，讨价还价。西南当时此一精神，经少川为之充分表达，在纸面价值上十分漂亮。吾意从消极方面讲来，历史也得勉强占著一页，任后代严行评鹭。作者本身未负责任，在外随声附和，遽尔以勾结欺骗等恶劣字面，一笔骂倒，似乎不公。或有援春秋诛心之论者，谓南方故放大言，不切实际，责人怨己，诚意毫无。事纵如是，究与勾结欺骗，相去何啻万里？

北洋军阀，冯段一丘之貉，军政府以联冯倒段为职志，使目前纠缠不清，应须解决之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此一政策，并不十分高明。以政学系坚持如此，明眼人亦不肯用力翻倒。吾偶与胡汉民谈到此点，彼大为激动，愿意劝中山肩此重任。时汪精卫正由法返沪，以政治上看不出前景，重复西迈，约计正在新加坡一带途中。汉民主张电呼精卫归来，从长商讨，吾虑此事易发难收，劝其慎重而罢。尔后唐朱同时辞职，北方改派王揖唐重来，孙派政客，认为是一机会，惟以西南倒行逆施，积重难返，无法进行，付之一叹。

吾固言之，西南之需要和会，乃为争取整理内部之时间，今也无形消散，求仁而得仁，原说不上损失。独此会发生，与巴黎和会及北京五

四运动同时。此案五月十三日宣布。欧洲和会版拟山东问题条件，不予承认（指第八条中之第一条），去五四不到十日。又所谓严惩订立中日密约之人，亦即五四运动所声讨之曹、陆、章。特一则要求出于全民，一则指点由于军阀，两者大小轻重，相去甚远，世论从不许西南于和平有何贡献云。

按此一会议，北代表团保存若干档案，而南代表团无之。此缘南方不重视此会，自始无期成之意，除选择当前最要问题，制成提案，公开俵散外，根本即无何种可存文件。少川向不与军府直接通电，实际由我代表军府，而事经前定，别无细节可商。故如前引吴鼎昌庚电一类之电文，南方不可能有。寻本会之主动动力，原在北方，北方比较怀有幻想。又和议之成，大抵利于北而不利于南。加以朱总代表官场老手，遇事区划井井，一步不肯放松，因此本会斐然可观之档册，北独有而南无，毫不足怪。此一档册，三年前夔公送余浏览，余漫不经心，延未清理，疏懒之咎，谊无可辞。今遐庵珍重此一史料，更就夔公及余亲加质询。吾料遐庵撰成一文，定能包括全面，斟酌恰当。吾文为供渠参考而作，于可能犯复之处，概从刊削，故叙事着重他面，放轻正面如上。阅鄙文时，必须将遐庵所作，会合览观，方能了解南北全部面貌，谨此声明。

上文绪就，适王芸生寄示彼与曹谷冰合撰之《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中有涉及吴鼎昌数语云：“1919年南北议和，吴为北方代表之一，当时安福系当政，吴鼎昌实系安福系的代表。安福系不愿和，吴为代表，参与谋议，起了部分破坏作用，和议无成。”此与本篇所记吻合，引为证左。

章士钊

“大总统”上台下台皆关钱财

王 坦

曹锟贿选总统，是在一战胜皖，再战胜奉，控制了黄河、长江流域，经营川黔、两广，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集团统治达到登峰造极时期。由于曹、吴穷兵黩武，贿选总统的结果，促成了以段祺瑞、孙中山、张作霖为首的反直三角同盟；同时由于争夺地盘，直系军阀集团内部也呈现四分五裂状态，特别是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因之，二次直奉战中遭到惨败，直系军阀集团遂一蹶不振。在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时期，我曾任曹的副参谋长；贿选总统后，我又任陆军次长，参与了直系军阀集团的一些政治活动。现将我所了解的曹锟贿选总统前后的经过情形，叙述如下：

曹锟在清末当了多年第三镇的统制，尤其在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时候，弄了许多的钱。后来每到曹锟生日的时候，各省督军、省长纷纷前来祝寿。慢慢地，就有人奉承他，说“大帅足可以当总统”，接着就有人说“大帅愿意当总统”。

「大总统」上台下台皆关钱财

有一天我在秘书长王毓芝（兰亭）的屋内闲谈，王承斌（孝伯）忽然对我说：“养怡（我的号）是很有主意的，能不能把这—个疑案给我们打开？”我说：“什么呀？”王承斌说：“大帅愿意当总统，是当得当不得，当好不当好呢？”我说：“那就得看是为着什么。若是为国，责任艰巨，当不得；若是为自己，要快快下台，就当得。赚了一辈子钱无用处，老了不愿意干了，买一个总统当，当上两天，回家养老，以终余年，当得。为下台而当总统，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要早走，要快下，有此决心，可以当。无此决心，不可以当。钱多了，后人守不住。普通人有个三二十万尚且无好后人；能当总统的，儿子焉得有好的呢？人的一—生，就怕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尚且不好，何况当总统呢？”我说这话，好像是不愿意曹锟当总统似的，其实我早就知道曹锟要当总统，并且联络了一些议员如王泽南、战涤尘等 200 多人了，安排了几个地点作联络处所，组织了一些人领头活动。这几个活动地点，—处是猪尾巴大院，领头人张岱青；—处是汉南寄庐，领头人吴恩和、金永昌（蒙族）；—处是绒线胡同南庐，领头人王铁宇等。

某—天，我在顺治门里油房胡同—号王毓芝屋里坐着闲话，忽然进来两个人，—个是直隶议员谷芝瑞（霭堂），—个是山东议员史刚峰，他二人说话完全是要打倒吴景濂的意思。我心中暗想：“这吴景濂倒不得，若他真倒了，我们办大选就不好办了。”谷、史二人刚走，我就向王毓芝说：“咱们这个事情—年多了，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急不如快，我看还是快些好。”王毓芝说：“谁说不是呢！孝伯（王承斌）、子玉（吴佩孚）全和大头（指吴景濂）商量不好。怎么办呢？”我说：“他二人商量不好，我去未必商量不好。大头这小子怕老婆，他的老婆怕我。我去十分可行。”王毓芝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得打电话问他在家没有。”我打通电话—问，吴恰巧在家，就约定在家等我。我就坐着王毓芝的车子去了。

当时吴景濂住在小麻线胡同一号，到他家中，说了几句闲话，我就拉住大头往他老婆屋里走。我见了吴景濂的老婆就说：“大嫂，今天我来有正事，不说笑话。”接着我说：“大哥也上年纪啦，现在应该想一想养老的事情啦。大哥现在当着议长，议长不是终身的，更不是世袭的。哪天人家大家一哄，说不要就不要。不如乘着机会捞一把钱回家，哪天都可以吃饭。现在曹锟势力威望正好当大总统，只要大哥不给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就成啦。选举的时候，不用议长费一点小事，我们已经联络运动成熟了。只待定好日子，准备好一切手续，到时，大哥发通知召开选举会。只要选举成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哪一个官给他哪一个官。你看好不好？”接着我又说：“曹锟赚了一辈子钱，不买一个总统当，买个什么呢！有钱买个总统当，才叫做有钱会花呢！花钱买总统当，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字臭一生强得多呀，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事情我们都已预备好了，明天我把参谋长和秘书长领来，和大哥一见面，就等于曹锟本人和大哥见面一样。这事就算定妥，随便您哪一天开会，这事就算完成了。将来给钱的时候，我们这三个人都不管，归孝伯一人经手。好在孝伯从小时候就出入你家，已非一年，你们是如同一家人一样。”吴夫妇俩听完了我的话，沉吟了一会就说：“好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呆了一会，我告辞出来，并说：“明天我就把熊、王两位领来和大哥见面。”我由吴家回到油房胡同，就要王毓芝叫保定电话。熊炳琦（润承）接到电话，非常高兴，他说：“兰亭别挂，等我报告大帅（指曹锟）一声。”不大一会儿，熊说他报告过了，并说大帅要我当天晚上上天津和四爷（指曹锐）见面。这话我明白，就是让我再向曹锐报告一遍的意思。

当天晚车我上天津见了曹锐，并即赶回北京。第二天12点以前，我到油房胡同，等着熊炳琦来同王毓芝三人一齐吃午饭。午饭后我们三人

一同前往小麻线胡同一号吴宅。熊、王、吴三人见了面，谈得很圆满，晚车熊就赶回保定。于是我经手的人我送钱，并通知大家谁经手的谁送钱。（拿钱的地方是前门外二条胡同大有银行，这银行的负责人是汪小舫。）只是送钱的事情就办了六七天，但谈到选举这正经的事情，都是三言两语就完了。吴景濂一个人就给了40万，其他每人送给5000元。有一个湖北众议员在我们送给他5000元之后，他曾把这件事上了报，还把支票拍了照片印在报上。

后来冯玉祥倒戈时，把曹四抓去，要他拿出钱来。曹四拿不出来，说钱从前是有的，都被三爷买总统用去了。冯不信，逼着他要，曹四竟服毒而死。曹锟当了一年的贿选总统，下台后活到73岁才死。他的姨太太九思红给他生的一个儿子，听说解放以后在天津某饭店门口给人家擦皮鞋为生。

二

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被曹锟、吴佩孚击败出关以后，即处心积虑，筹划雪此一败之耻。而直系则因胜而骄，自认可以高枕无忧了。1923年10月，曹锟用贿选手段，当了大总统。吴佩孚日渐专横，妄想武力统一全国。他部下的将领，有野心的因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无大志的则奢侈淫佚，吃喝玩乐。这时直系内部是互相排挤，矛盾重重。这就给奉张造成有利机会，准备待时而起。

1924年秋，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认为时机已至，一面通电支援卢永祥，一面进兵榆关、朝阳，窥伺关内。9月17日，吴佩孚受曹锟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在中南海四照堂对各将领作军事上的部署。冯玉祥奉派为第三路总司令，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

10月22日，顾维钧约我和孙润宇（字子涵，江苏人，国会议员）、

米振标（热河督统）等人到他家吃晚饭。在席上，孙润宇用警告的语气对我说：“注意呀，冯玉祥这人靠不住，不应当叫他带队伍到前方去。”我当时对孙的话很不以为然，就不加思考，冲口而出地说：“这一桌吃饭的人都靠不住，冯玉祥也不至于靠不住。”孙听了之后，默然不语。旁人也都搭腔。我随即感到我这样说法有些失礼，就拐弯说了些笑话，才把这个场面敷衍过去。

不料第二天早晨我刚出门，就看到街上都是佩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的军队，这才知道冯玉祥已于昨夜班师回京，通电“主和”，与奉张共讨曹、吴，并已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里了。我立时想起昨天晚上孙润宇所说冯玉祥靠不住的话，觉得自己真是太没有知人之明了。

我对冯玉祥的认识，是英明机智，治军有方。在曹锟贿选总统时，我和冯经常见面，感情很好。关于他的事，我能帮忙的总是尽力帮忙。他和吴佩孚意见不合，是由河南开始而逐渐尖锐起来的。冯任河南督军时，曾到保定见曹，我适在曹处，见他痛哭流涕地向曹诉苦说：“吴玉帅压迫我，弄得我不知怎样办是好，看样子他是要缴我的械。”曹说：“不会，他怎能缴你的械？既然你俩不和，我另给你想办法，你上我身子后头呆着去吧。”不久曹就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带队移驻南苑。冯对曹很感激，一直表示竭诚拥戴。因此我决不疑他有倒曹、吴的计划，更没有估计到他竟与奉张订有共讨曹、吴的密约。

曹锟被囚后，我很关心他的安全，当即去到总统府，通过重重警卫，到了延庆楼，见到一位冯部的营长（姓名已忘记）穿着便衣陪伴曹锟坐在那里。曹的神态很镇定，看我进来，徐徐地对我说：“当时你们大家把我拥戴出来，这时又由大家把我看管起来，怎么办都可以，我没什么说的。”听他的语气，大概认为我也是倒他的一分子了。但我当时不便申辩，向他安慰了一番就告辞出来。曹锟从那时起，便由冯所派的

营长与他同吃同住，整天在一起，交通和通信机关也都有冯的部队驻守，曹与外界基本上断绝了联系。

三

之后，我从各方面断断续续了解到这次政变经过的一些情况。由于冯玉祥与吴佩孚矛盾日深，而曹锟的一些亲信有时对冯也加以排斥（如冯因请领军饷常受到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清的刁难）。这种种矛盾都给奉张以可乘之机，奉张就通过各种关系，派人与冯拉拢，使冯加入奉方，共同推倒曹、吴。我所认识的郭瀛洲、张树声就是其中最起作用的两个人。郭瀛洲是张的亲信旅长，数次来京，都是来去匆匆，还曾在我家（后门沙井胡同）住过三次，我始终不疑有他。有一次我曾问他：“你来北京有什么公干？”他说：“我想做一笔买卖。”我追问他：“做什么买卖？”他就含糊其辞，不愿明说。当时我猜他一定是在贩卖烟土，也就没往下再问。

漩
涡
沉
浮

冯玉祥因与张作霖已有勾结，所以在奉命出师讨张以后，借口筹措军需、修理军械，故意延宕时日；及至出发，每天只是前进三四十里的路程。他到达滦平，就停止不再前进。几天以后，他得到东线彭寿莘部屡战失利的消息，同时接到总部参谋长张方严“九门口危急，望速进军”的电报，便认为时机已到，遂于10月19日将后队改为前队，潜行回师北京。因为他计划周密，行动迅速，又是与负责戍守北京的孙岳等共谋，所以未放一枪，就占领了北京。由鹿钟麟派兵一营包围总统府，把曹锟囚禁起来。

这时，北京的军政要人如王毓芝、陆锦等人，都躲到东交民巷托庇于使馆界了。我想，大局如此，怎么办呢？因王承斌也曾在“主和”的通电中列名，我就拿着刊有主和电文的报纸去找王承斌，并埋怨他说：

“你们这样干法，是打算怎么着？说给我听听吧！”王说：“我也不知道。焕章（冯玉祥号）想怎么办，就让他办去吧。我也管不了。”我说：“通电有你的名，你能说不知道吗？”王说：“我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事情到了现在，就都不用说了。”

我左思右想，认为应先设法使曹锟恢复自由。一天，我到王毓芝家里（崇内大土地庙），问知王在东交民巷的住处，就去找他。当时陆锦、潘矩楹也在座。我说：“互杀乱打，还不都是为了逞英雄，争地盘。焕章这样做，也是干不好的。我想应当先设法使总统恢复自由，给他赚回被囚的脸面，过渡几天，而后平安下台。你们看怎样？”他们一听我这些话，都表示同意。经过研究，认为只有走张作霖这条路，别无办法，王毓芝并催我赶快设法进行。我又探询了一下靳云鹏的意见，靳也颇以为然。我遂到公府见曹锟，把替他转圜的意思悄悄说明。曹沉吟了好久，才对我说：“只要赚回面子，我就很满意了。反正大总统的命令在你们阁员手里拿着，你们瞧着办去吧！”这天曹并告诉我，在他被囚禁的次日，孙岳曾去看他，给了他两万块钱零用，并说孙在和他谈话时，还哭了一场。

隔了几天，我去到沈阳，因与杨宇霆是同学关系，就去找杨。一见面，我就说：“一战雪耻，可以休矣。国事如何，愿听明教。”杨说：“我们仍在计划向南进兵，非剿他（指吴）的老窝不可。”我说：“乘战胜之余威，追剿残兵败将，不成什么问题。可是国事究竟怎么办，也得想一想啊！政府中断，中华无主，万一发生国际问题，那可怎办？”杨问：“你看呢？”我说：“依我看，应先恢复曹锟的自由，让他维持一下现状，过些日子请他辞职下台，召开国会，另行选举，大总统还不是权高望重有实力的人得之吗？”杨问：“这是你个人的想法呢，还是另有说词？”我说：“是我倡议的，王兰亭、靳翼青等都同意。”杨说：“既然如此，好吧，我可以把这个意思报告给雨帅。你住几天吧。”

我在沈阳住下，就去找郭瀛洲，得知他前几次到北京，就是为了和冯玉祥联络共倒曹、吴的。我问郭说：“敢情你在我家说是做买卖，就是干这个呀？”郭笑着说：“谁叫咱俩是朋友呢！当时哪儿有你那里保险呢。”我就问他：“你们是怎样接洽的？”郭就和我说：“我们和冯玉祥的联系已经很久了，往返接洽不止一次，也不是我一个人。我是在事情说得差不多了以后，被雨帅嘱咐出马的。通过张树声，我与冯玉祥会晤过两次，后来洽妥冯部与奉军采取一致行动，我们答应协助他军饷100万元。在战争起来后，冯玉祥到达滦平时，我给他送去沈阳世合公银行开出由北京兑取的支票100万元。隔了几天，他就回师北京，把你们的大总统拘禁起来，把吴小鬼吓跑了。”郭并说：“他会花钱买总统做，我们会花钱把他关起来。”郭说罢，哈哈地笑个不停。

隔了两天，杨宇霆告诉我：“雨帅今天晚上要见你，你等着，到时我来接你。”在见到张作霖时，我将来意述说了一番。张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早就给冯玉祥打了电报，让他好好保护三爷，不准伤害，况且三爷对他也是有恩的，他一定会照办。至于以后的事情，大家商量吧，我是不够格的。”我说：“曹三爷经过这番变动，他也厌烦了。只要给他赚赚面子，平安下台，他就很满意了。阁员们都和我一样想法，直方将领也没说的，只有冯玉祥不知道，我也不能跟他谈。”张说：“好吧，回去见到曹三爷替我安慰他几句。没什么，别看打仗，我俩还是朋友。冯玉祥替咱打仗，那是120万小洋钱买的他，他不能主张国事。以后在北京有事情，可以跟李景林、张学良他们联络。”

在我与张作霖会晤之后，隔一天我就回到北京，把赴奉晤张的经过，到延庆楼向曹报告了，曹很满意。隔了几天，郭瀛洲也来到北京。我向他说明回到北京见曹后的情形，我俩又商议了一番，郭欣然回奉复命。杨宇霆听到郭的报告后，还恐事情发生变动，又亲自带着他的太太来到北京，与我重复研究了一次。杨并着重地对我说，北京事由我负

责，东北事由他自己负责。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四

在曹錕被囚后，段祺瑞就了临时执政，到11月27日，我被免职。在这一阶段，我一共到公府延庆楼去过七八次，冯所派的警卫官兵都对我很客气。有一次遇到蒋鸿遇，他对我说：“王次长，这回吴小鬼倒了，把我们几年来憋的气都出了，咱们一块干吧。”我说：“好啊，咱们怎么干，我能干什么？你说吧。”他也没说出所以然来。

我被段祺瑞免职后，就在北京住住，天津玩玩。1925年夏初，我一因无所事事，二因李景林闹穷，要没收王毓芝、赵玉珂等的财产，就又到沈阳。张作霖曾请我吃饭，并对我说：“段芝老老气横秋，不纳忠言。孙中山先生政治头脑又那么高。他的主张恐怕行不通。听说他还要拿俄国人的办法来治中国，那咋行呢！”我说：“政治总是政治，说是说，做是做。老百姓只要能安定就好了，实在也应该安定了。”他说：“是呀。咱们作官的就应当说到哪做到哪，要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老百姓。冯玉祥这小子说话没信用，一派奸诈，又想要直隶地盘了。”我说：“他说话没信用，做事有信用就行。”张说：“你又提这个啦，他那是冲着咱120万小洋钱，你当他真心跟我合作么？吴佩孚是败了，吴佩孚要是胜了，他还不是打我吗？”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么雨帅对国事怎么看法呢？”张说：“我是个军人大老粗，不懂什么政治，捧谁都行，反正我是不够格的。我跟曹三爷本来是至交，又是亲家，都是让吴佩孚这个小子闹得失了和气。别看现在这样，远近心里分，我跟他还是青山不改呀。”

我回到北京不久，奉张与冯玉祥就起了政争。国民军同李景林动起干戈，始而李景林不支败退，继而直鲁军反攻，国民军又败，在天津周

围打起拉锯战来。继之郭松龄反张，又是一场混战。郭败张胜，张作霖为了报复冯玉祥勾结郭松龄反奉之恨，乃以大军攻冯。冯不支，于1926年春宣布取消国民军名义，通电下野。鹿钟麟率部撤出北京，曹锟恢复了自由。

五

漩
涡
沉
浮

在冯部撤走、曹锟恢复自由的第二天，张学良就派人来找我，叫他们去见曹锟。第二天，我陪同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到了公府延庆楼。张学良见了曹锟就跪在地下磕头，并说：“三大爷，我给您老赔不是来了。我爸爸说对不起您，我们一定拥护您复位，大总统还是您的。”曹说：“嗨！不能干了，我德薄能鲜，以后国家大事要靠你们青年人了。”张学良接着就说：“我爸爸说了，您老尽管复位，做您的大总统，有他老在旁边站着，看谁敢说什么。”李景林、张宗昌也一齐说：“我们一致拥护您，您尽管放心。谁不听话也不行。”曹说：“一年多我什么也没办，到吵起家窝子来了，你们看还能当总统？”张学良等就齐声说：“您老别说了，再说别的，就是不原谅我们了。”我就插了两句说：“亲戚朋友会吵嘴，兄弟手足也会吵嘴，父子有时也吵嘴，夫妻吵嘴的时候更多。这都算不了什么，过去的事就都不要提了。”又闲扯了一阵，我同张学良等告辞出来。在出来时，张学良对我说：“养怡，你明天好好地跟三爷说说，咱们一定就这么办了。”我答应说：“好吧，一切包在我身上。”

第二天我又到延庆楼去见曹锟，曹说：“张学良这个小孩子，说的话靠得住吗？”我说：“靠得住，没问题，是张作霖叫他来的，这我知道。”我又把两次在沈阳和张作霖见面的事说了一遍。曹锟听了显得很高兴。这时来看曹的人也多了，这些直系旧人和曹的老亲旧友，都相

继前来探望。

曹锟恢复自由了。我为了通知这个找那个，在外面跑了两天。一天到公府去，公府秘书张廷谔对我说，曹已拍出通电，告诉各省说冯部已撤出京畿，并说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恢复总统职位，但没得到各方面的反应。后来我们经过研究和向各方面探询，才知道都是在观望着吴佩孚的动态，而吴对这个电报，并未明白表示迎拒的态度。到了这时，曹才决定迁出公府，搬到羊市大街去住。

吴佩孚自失败出走，经过通电再起，到这时已经一年多了。到底他在干些什么，不但曹锟是懵然的，连我也不大清楚。为了告诉吴佩孚关于北京的情况和了解他的情形，曹很想派人到汉口去一趟。于是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去一趟吧，也好跟子玉研究研究。”曹很同意。当时京汉路似通非通，我坐一段火车，骑一段驴，又坐一段火车，有时还坐一段大车，经过七天才到达汉口。我打电话和吴佩孚联络，约定次日上午见面。

第二天，吴一见我就取笑说：“炮手来了。这一下没把你这土旦砸碎呀！”我说：“不但没砸碎，还磨成铁的了。”接着扯了一些彼此的情况，他问我：“你想干点什么呀？”我一听他这话，知道他误会我是来找事的了。我说：“干什么都可以，不过这倒不忙。我想还是先把总统的事办停当了，再说我个人的。”我就把拥曹复位的意思说了一遍，并告诉他张作霖那边已经没有问题，都说妥了。他说：“你这种想法和作法都是应当的，不过恐怕难以实现。我自山海关下来，一到汉口，就打出通电护宪，人家都不理，怎么能再提呢！三爷这人你不是不清楚，在前台他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我说：“今非昔比，现在同你在山海关刚下来的时候不一样了，盱衡大局，还是得咱们说了算。大家还是以你的马首是瞻。”吴听我说到这里，不等我说完，就用“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一

些论调来堵截我的话。我又反复地说了一番，他仍是坚持己见，不允拥曹复位。

我从吴佩孚的查家墩司令部出来，就去找吴景濂，把和吴佩孚见面的情形告诉了他。吴景濂说：“不要提这件事了。我曾和他谈过恢复总统局面的事，他不答应。听说他曾和一些人集议过，绝对不再拥曹。”我就问吴景濂：“你看子玉到底为什么这样反常，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呢？”他说：“没什么原因，只不过他不愿头上再戴顶帽子罢了。”这时熊炳琦也在汉口，我又和他谈论了一下，他也是和吴景濂一样说法。熊并唉声叹气地表示前途暗潮很多。我一看事情是绝望的，第二天就搭车返回北京。我到了北京，就一直到了曹锞家里。见着曹锞，头一句我就说：“冯玉祥没反了您，吴佩孚可真反了您了。”曹听了一愣，问我：“他说了些什么呀？”我就将吴佩孚的话述说了一遍，曹听了以后，像是替自己解嘲又像安慰我似地说：“子玉不会不相信你，也不会不相信我。我早就想到，他会怀疑张作霖对我这样卑躬下气，是不是不怀好意？这也不用怪他。先不用说了，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不久曹锞就到保定去了。听说后来曹曾命清末状元刘春霖去过汉口，商谈关于复位的事，也没得到吴佩孚的同意，遂在5月向全国通电辞职。而张作霖对曹表面拥护复位，实际利用他作为过渡，然后攫得大总统宝座的野心，也就成了泡影。我这个跑合拉纤的政治走卒，本希望在直奉合作中再得个一官半职，也就枉费了心机。

（王毓超整理）

冯玉祥北京政变：开局容易收局难

鹿钟麟 刘 骥 邓哲熙

冯玉祥北京政变：开局容易收局难

一

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曹锟以贿选手段篡窃大总统地位之后，北京政府即完全被直系所把持，吴佩孚利用中央权力，借口统一军权，以推行他的排除异己、武力统一的政策。当时，直系的势力范围已由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吴佩孚为了实现他的武力统一的迷梦，更进一步地策动川、黔等军攻掠四川，勾结陈炯明、沈鸿英等牵制广东，而对于东北的张作霖，则派兵把守赤峰、朝阳、山海关之线，以阻其进入关内。这时的吴佩孚，已经是意气骄盈，野心勃勃，大有雄视中原、威加海内的气概。

但是，与此同时，不利于直系的种种因素也在日益发展。在直系内部，由于吴佩孚的飞扬跋扈而各怀异心，逐渐分化成为津、保、洛三派。津、保两派在拥曹抑吴的谋划之下，暗中活动，处处对吴掣肘。以后，津、保两派又因吴景濂与高凌霨争夺内阁总理的问题，也发生了矛盾。直系以外的各方面，在曹、吴的压迫下，也在积极地寻求应付和反抗的对策。如直、奉战争失败后的张作霖，锐意整顿军备，企图卷土重来。局促于浙江的皖系卢永祥，因处于直系势力的包围之中，亦亟谋自

存和发展的出路。而在广东领导国民革命的孙中山先生，还在曹锟就任贿选总统的时候，就已通电声讨曹锟，反对贿选政府，并且与张作霖、卢永祥取得联系，共同进行倒直运动。孙、张、卢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有着一个反对直系共同目的。因此，通过孙科、张学良和卢小嘉在沈阳集会的所谓三公子会议，形成了孙、张、卢反直阵线的三角同盟。

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虽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但是他的穷兵黩武的野心并不因此而稍戢。他为了先发制人，把反对势力各个击破，首先策动陈炯明等进攻广州，并勾结英帝国主义唆使广州商团叛变，以牵制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同时指使齐燮元、孙传芳夹攻浙江卢永祥，以肃清在东南仅存的皖系残余势力。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因与浙卢有同盟关系，立即通电声援卢永祥，并将所部编成战斗序列，待机出动。吴佩孚也由洛阳到北京部署军事，第二次直奉战争已到一触即发的时刻。

正在这个紧急关头，在孙、张、卢三角同盟之外，在直系势力范围内也形成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反吴的三角同盟，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发动了北京政变。

冯、胡、孙的结合并不是偶然的。由于他们的处境有着类似的遭遇，在政治上有着共同的要求，一旦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

冯玉祥在北洋军人中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人物。他立志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对当时北洋军阀的腐败情形常常流露不满情绪，同时，他的领袖欲也相当强，以致遭到北洋军阀上层人物的歧视和猜忌。又由于他有着倔强的性格，对他的上级时有违旨抗命的行动，更为当权人物所嫉恨。在皖系当权时，他曾受到徐树铮等人的排挤；到了直系当权的时候，又遭到吴佩孚的压制。但冯对吴并不肯俯首听命，在扩编队伍、催

索贿项等问题上时常发生抵触。吴在洛阳庆祝五旬生日的时候，各方称觞祝寿，馈赠惟恐不丰，阿谀惟恐不至，而冯独以清水一坛为礼，喻为君子之交，吴虽莫可如何，而心实憾之。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以援助直系击败奉军而得任河南督军，在发表冯为河南督军的同时，并发表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①。宝德全在冯与赵倜作战时，曾通电对冯大加攻击，并在郑州以北袭击冯军后路，势甚危急，幸胡景翼部由陕西开到增援，始将其击退。吴既知宝与冯嫌隙甚深，其所以荐宝为河南军务帮办，其用意固在对冯发生牵制作用。不意冯甫至开封，即将宝枪决。迨吴来电话问，冯则复以并未与宝见面，并诿称已被乱军打死。但冯尚未到职时，吴即将与自己有关的私人开列名单，向冯推荐担任督署各重要职务，仅留秘书处一职由冯任用。冯对他的左右说：“这样办，还要我这个督军干什么！”于是将吴所推荐的人选悉予拒绝。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因京汉路军事吃紧，冯曾派李鸣钟旅北上应援，战事结束后，吴即拟将李旅扩编成师，留驻保定，企图使其脱离冯的节制，以削弱冯部的力量，卒以冯坚决反对而未果。吴本视河南为其主要根据地之一，冯督豫后，曾拒吴更换省长，并且拒绝由地方拨款，这当然引起了吴的极大不满。特别是冯在河南将他的第十一师大加扩充，积极训练，更成了吴的一块心病。所有这一切，都是吴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冯督豫还不到半年，北京政府即在吴佩孚的提议和威逼之下，将冯调任为徒拥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移驻于北京南苑。冯迫于形势，不得不遵命北来。当时吴拟将其第十一师的五个补充团留在河南，冯幸得陆军总长张绍曾的支持（张任第二十镇统制时，冯在其部下任营长，张对冯的支持，一是因旧日关系，一是张拟利用冯的实力作为政治资本），方得全部北开。

^① 《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为冯玉祥被任河南督军时，宝德全被任归德镇守使。

在冯北调的时候，吴本许以每月由河南协饷 20 万元，但事后并未履行诺言，而北京政府又不能按时拨付军费，曾积欠达 11 个月之多，致冯部餉项陷于极端困难的地步。冯当时曾经把他深刻的感触写下了这样的话：“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于绝境，使我们即使不饿死，亦必瓦解。”当然，吴对他所施加的压力，他是决不甘心的。他在当时极为不利的条件下，积极扩充队伍，严格加强训练，将他的军队训练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坚强、纪律最严整的一支队伍，这是在他治军的整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当他在埋头练兵的时候，也同时注意了与各方面的联系。原来，冯在滦州起义的时候，已开始和南方的革命力量发生关系，以后又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人士，由于受到他们革命宣传的影响，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日益加深了向往的心情，特别是他读过孙中山先生手写的建国大纲之后，对于革命的奋斗目标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3 年孙、张、卢三角同盟形成，孙中山先生曾派人将联合张作霖、卢永祥的情况告知冯氏，并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这年 12 月，马伯援（冯的教友）拟有广东之行，冯即委托马伯援代表向中山先生致意，他说：“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冒险盲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请将此意转达中山先生。”这时，冯的政治态度已日益倾向于革命方面，并且看到反直阵线已经形成，更加增强了推翻直系军阀集团的决心。于是，他除了积极训练部队以加强军事力量而外，并且积极地争取同盟者，与素有结合的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等取得秘密联系。

冯玉祥与孙岳的关系，从滦州起义前订交开始，在长时期中往来无间。他们不但私人交谊甚厚，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共鸣。孙岳早年就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第三镇中校参谋，时与南方暗通消息，并与滦州驻军军官王金铭、施从云和冯玉祥等密谋起义，因吴佩孚（第三镇少校副官）的告密，被第三镇统制曹錕撤职，孙即南下，曾先后任第十

九师师长；不久，被袁世凯免职，江西都督李烈钧委以江西庐山垦牧督办之职（以后冯与李的关系即系经由孙的介绍）。黄兴任讨袁总司令时，以孙为北伐军第一路总司令。其后孙一度去陕西，与陕西国民党人胡景翼深相结纳。及曹锟为直隶督军，以旧日关系，委以军官教育团团长，直皖战起，复兼任直隶省义勇军总司令，战事结束后，因受吴佩孚的压抑，仅畀以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之职^①。孙对吴的骄横专擅，早已心怀不满，与冯见面时，常常牢骚满腹，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冯和孙不但遭遇相同，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冯为了争取反直的军事力量，所以首先把他的意图向孙岳谈了出来。这就是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草亭秘议”。

在1924年9月的一天，孙岳亲至南苑，为冯氏新建的昭忠祠的落成而前往致祭。当他在官兵义地中凭吊的时候，对冯感慨地说：“民国虽成立不过十多年，这里已经躺下了这许多战士。”冯说：“他们为国捐躯，落得一个忠字，也算不朽了。”孙说：“都是忠义好汉啊！都是精魂忠骨啊！”冯便笑着和孙打趣道：“他们死了，能得忠骨之称；孙二哥，将来你百年之后，人们应该怎样称道于你呢？”孙也笑着答道：“那不用问，像我目前这样干法，在真正的革命党看来，还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狗！”冯说：“你既统兵数千，坐镇一方，为什么甘心做人家的走狗？”冯的话引起了孙的哈哈大笑，他便对冯说，“我算什么，还有那带着三四万人的，不也是做着军阀的走狗而无可如何吗！”说着话，他们已走到义地中间一座草亭里面一同坐下。冯即正色对孙说：“目前闹到这局面，我想稍有热血良心的人，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所统辖的队伍，虽然名为一师三混成旅，但实际不到三万枝枪，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

^① 《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记载：曹锟为直隶督军时，孙岳任冀南镇守使。

能鲁莽从事；但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帐东西一股脑儿推翻，不然的话，如何对得起自己，如何对得起这些牺牲了的官兵，更如何对得起我们创造民国的先烈！”这一席话，使得孙马上振奋起来，他以十分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对冯说：“你若是决定这样干，我必竭尽全力相助。此外，还有胡笠僧（即胡景翼）也定然愿和我们合作，我可以负责去接洽。他们现在都郁郁不得志，对曹、吴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何况他们都是老革命党，更何况他们和你我有如此的交谊，合作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眼看直奉就要开火，我们有的是好机会。现在先布置一个头绪，待机行事，必有把握。”在当天夜里，他们又详商良久，决定由孙亲往与胡景翼接洽。

胡景翼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早有直接关系，辛亥革命时期曾起义于陕西耀州。在日本留学时，胡受孙中山先生的鼓励和督促而回国进行革命活动，护法之役，在三原宣布独立。冯任陕西督军，胡曾写信对冯表示，“只要你能带着我们救国卫民，任何办法都乐意接受”。冯感其诚意，乃将其所带之靖国军改编为陕军第一师。胡因敬佩冯之为人，与冯交谊日笃。胡常对人说：“我们的军队多是各方收集来的，纪律不好，在未经严加训练以前，不急于补充过多的枪械。”在政变前，胡曾派军官 200 余人到南苑冯所办的教导团学习，并且把他与苏联洽妥的一批军械转让于冯，处处对冯表示好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胡随冯出潼关援直，及冯调陆军检阅使，胡部即驻防于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拟调胡率部南下攻广东，因胡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肯开拔，以致引起吴的不满，在饷项给养等问题上多方与胡为难。胡处此困苦的环境中，乃密谋有所举动。适孙岳来与密谈在京和冯会商经过，胡闻之大喜，立即派岳维峻去北京见冯，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冯当即对岳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吴佩孚要打倒异己，对奉战事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第二，我们须利用形势，

相机行事，将来若果成功，必须迎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他是中国惟一的革命领袖，应当竭诚拥护，否则我们就是争权夺利，不是真正的革命。他的建国大纲真是太好了，如果把这个细细地读一遍，才知道真正的民国是怎么回事，真正的革命是怎么回事。第三，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我们既拿定了革命的决心，此后即当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和帮助民众，否则我们决不能成功。”岳表示对这三项意见完全接受，即返回防地向胡复命。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来与冯密谈，表示了与冯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的三角同盟亦告形成。

冯玉祥等的秘密结合进行得十分严密，甚至冯对部下也还保守秘密。只是有一次冯以试探的口气对邓哲熙说：“看来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各旅长对于目前的局势是怎样看法呢？”邓说：“他们的看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张作霖，我们就没有出路。”冯说：“对，他们的看法完全对！”至于采取怎样的办法以打开当前的局面，他却没有说明。

当时，冯玉祥已感到自己缺乏政治上的人才，而一旦推倒曹、吴，势必要有一班懂得政治的人来收拾这个大局。因此，他除了希望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外，也在留心物色在政治上有资望、有办法而又能与自己合作的人物。这时，北京政府教育总长黄郛与冯过从甚密，冯即告以“不久将有大事发生，届时将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并且一定请你大力赞助”。黄说：“只要你有办法，我一定跟着你干！”又过了些天，冯将要向热河出发的时候，想把他的计划再告知国务总理颜惠庆，争取他一致行动。试探的结果，颜却模棱两可，使冯感到失望。本来他还想争取王正廷的合作，由于和颜谈话不得要领，他感到这些外交家过于圆滑，难于说出真心话，访王之意因亦打消。当时政府中知冯秘密计划的，仅有黄郛一人。

二

1924年9月15日，奉军分向朝阳、山海关进兵，曹錕急召吴佩孚到京主持对奉作战任务。吴于17日抵京，18日北京政府发布了对张作霖的讨伐令，同日，曹责成吴佩孚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并任命吴为讨逆军总司令。吴当时还在中南海四照堂表演了一幕点将的喜剧。

漩
涡
沉
浮

吴佩孚以讨逆军总司令的身份召集高级将领发布命令，本应出之于严肃的态度，可是吴却不然，他在这天穿着一套很不像样子的短衫裤，到场后就毫无礼貌地歪坐在桌边，当众宣读了一些不伦不类的声讨张作霖的词儿，接着就点起将来：“我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后方筹备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之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平泉、朝阳；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峰。……”由于吴在事先并没有对整个作战计划加以全面周密的考虑，因之有些单位如海军、空军等都没有布置任务，等到有关负责人员向吴请命的时候，才临时一个一个地增添加到命令中去。吴的这些举动，使得不少在场的人暗暗发笑，认为吴竟把这样一件大事完全当作了儿戏（四照堂点将实况详见冯玉祥著的《我的生活》一书）。

冯玉祥所担任的这一路，交通不便，地方贫瘠，不但行军困难，且给养也无法筹措（吴曾下令不设兵站，各军给养完全就地筹措，实际上第一军是有兵站的，第二军虽无兵站，但行经之地尚较富庶，惟独第三军困难最大），越是往北进展，人烟越是稀少，困难也就越多。显然，吴是有意识地借着这次战争把冯部调离京畿，并把这部分力量消耗在荒寒瘠苦的长城以外。当时吴却假惺惺地对冯说：“古北口这一路地势险要，攻守不易，非劲旅不足以胜任。”当然，吴的不怀好意，冯是十分

清楚的，这就迫使冯对实现倒吴计划下了最后的决心。从这时起，冯就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接洽和布置。

在军事方面，首先对北京城防布置了内应。在吴佩孚发布命令后，冯即向曹錕建议：“十三师（王怀庆师）开赴前方，北京防务空虚，最好把孙禹行（孙岳）的十五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曹以冯如此关心首都治安，就很高兴地同意了冯的建议，立即调孙岳率部来京，任以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孙在一次集会的场合遇到冯，对冯耳语：“你特意把我搬来，是不是要我给你们开城门？”冯则报之以会心的一笑。

这时，奉军向朝阳进攻的一路首先与直军接触，朝阳守军以事先毫无戒备，仓猝应战，即陷于不利的地步。接着，山海关方面的战事亦日趋激烈。从整个形势看，奉军不但在兵力上占优势，而且在战略上也抢了“先着”。冯用兵向主兵贵神速，先发制人，可是这次他却采取了延宕的办法。他在9月18日被任为第三军总司令，一直拖到21日，他的先头部队才开始出发。冯将其所部分为数个梯队，先头部队为张之江旅，次为宋哲元旅，次为刘郁芬旅，次为李鸣钟旅，最后为鹿钟麟旅，至24日始开拔完竣，另以步兵一营留守北京城内的旃檀寺，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后方一切事务。在这以前，曾由河南招募新兵万人，分编为三个补充旅，以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借口留在后方训练，并未开拔。一切布置妥当后，冯始向怀柔出发。开拔各部，每日行军路程只二三十里，全不像开赴前线作战的样子。冯的司令部移动得也很慢，9月24日从北京南苑出发，当日到怀柔，28日到密云，10月1日才到达古北口。冯到古北口之后，以筹措给养为名，便又停留下来。他一方面督饬沿途各县加紧修筑公路，预作班师回京的准备，一方面令鹿钟麟每日朝着北京的方向练习行军，或50里折回，或60里折回，有时是徒手，有时又是全副武装，并且一边走着一边在路旁演习，有时刚刚支起帐篷准备露营，忽又收拾起来赶回驻地。这样做的

用意是，不仅训练部队做好急行军的准备，而且使沿途居民对其行军动作习以为常，不至使尔后班师引起外间的注意。

胡景翼被任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后，即将军队集结在通州待命。吴佩孚令胡率部由喜峰口进军热河应援王怀庆，冯则派刘治洲、田雄飞等与胡密商，决定暂缓开拔，以待战局的变化。

冯玉祥在古北口的时期内，一方面从各地收集作战情况，留心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进行了秘密的政治活动。冯当时考虑到，为着加速吴佩孚在军事上的溃败，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同时他也考虑到，孙中山先生能否北来以及何时北来，尚不可知，而大局的变化就在目前，且自己又向以军人不干涉政治为标榜，在推倒曹、吴之后，势必要有资望较深的人物出而维持局面。恰好这时段祺瑞的代表找上门来，于是冯与段之间就很自然地取得了联系。

段祺瑞自从直皖战争失败下台后，即寓居天津。他本是一个不甘蛰伏的政治野心家，遇到时局动荡不安的时候，就会寻找机会，以图再起。段知冯与吴素有芥蒂，直奉战争爆发后，就派遣他的亲信贾德耀（与冯曾同在第第七师任旅长）到古北口与冯送来一封亲笔信，大意是不赞成内战，并希望冯对贿选政府有以自处。这封信既有着试探的性质，也有着鼓励的意思。冯接信后，曾与贾进行数度密谈，最后冯向贾表示，俟计划实现后，将请段祺瑞、张绍曾等有重望的人物出来维持大局，并请贾德耀偕同田雄飞赴津见段征求意见，同时往访张绍曾表示推重之意。数日后段派宋子扬向冯表示同意合作，惟张绍曾则因与曹、吴关系甚深，而与段又向有抵触，故对此表示消极。接着冯又派刘之龙与段接洽合作办法，段谓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郑士琦已接洽妥当，届时定能采取一致行动。

在与段取得联系的同时，冯玉祥和张作霖也取得了谅解。冯的部下张树声与张作霖的驻京办事人员马炳南为夙识，张得到冯的同意，即陪

同马炳南至古北口见冯。马说：“只要推翻了曹、吴，奉方的目的即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冯也坦白地对马表示：“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翻曹、吴是不成问题的。”并说：“将来事成之后，拟请孙中山先生来主持大计，这一条你们是不是赞成？”马答以“完全不成问题，一切听你的主张，我们没有不赞成的”。冯又重复地说：“一是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二是你们的队伍不进关，只此两条就成，希望赶快回去转达此意，切勿食言，现在是怎样商定的，将来就怎样实行。我这里已经布置妥当，不久就有主和息争的通电发出。”马亦向冯表示，希望冯部在热河方面的军事行动从缓，以便奉方抽出兵力加强山海关方面的主攻力量。冯亦同意了他的要求。

吴佩孚对于冯的秘密活动虽毫无所闻，但他对冯并不是没有戒心的。他为了监视冯的行动，加派副总司令王承斌指挥二、三两路的军事，并督促冯部迅速向赤峰方面前进。冯知道王承斌因吴佩孚解除他的第二十三师师长兼职，早已心怀怨愤，所以王到古北口与冯会面时，冯为了争取他的合作，即将秘密计划完全告知与王。王对冯的主张表示同情，但不愿与冯采取一致的行动，同时也声明决不将冯的秘密泄露给吴佩孚，仅只取得了相互之间的谅解而已。王承斌在古北口停留二日即转赴承德。吴佩孚除了授意王承斌监视冯的行动外，还密嘱胡景翼对冯予以注意，如果冯有异动，可就近解决之。胡将此事密告与冯，并盼冯提高警惕。吴对冯的防范，不但未起丝毫作用，反而益加坚定了冯的决心。

10月11日，冯玉祥由古北口进驻滦平。这时直军彭寿莘的第一路正面，因遭遇到奉军的精锐部队，屡战不利，于10月7日被迫放弃九门口，山海关形势十分危急，吴佩孚乃于12日离京亲赴前线督战。在喜峰口、平泉方面，王怀庆的第二路，一经与奉军接触，即溃不成军（王怀

庆的第十三师原是直隶巡防营的底子，官兵腐败不堪，而且空额极多，王又不认真训练，故毫无战斗力），经吴令催胡景翼部驰往增援，始得相持于长城以北之线。而冯玉祥的第三路，因进军迟缓，始终未与奉军发生接触。特别是冯、张取得谅解之后，奉军即将其进攻赤峰方面的兵力抽出大部转移到山海关方面作战，从而加重了对直军第一路的压力，因此整个战局已使直军日益陷于不利的地步。

冯玉祥从北京出发前，即已布置蒋鸿遇向总统府及有关方面搜集关于吴佩孚的行动和前方战事的情报随时向冯报告。在得到直军放弃九门口和吴佩孚亲往前线督师的消息时，冯即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吴在军事上已到了崩溃的前夕，实现班师回京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即派参谋长刘骥持亲笔函回京与胡景翼、孙岳两部联系。刘与胡部岳维峻、邓宝珊及孙部何遂会于通州，告以冯决定即日班师回京，请他们早作准备。冯与胡、孙两部联系妥当之后，为了慎重从事，又给吴发了一个电报，一方面报告先头部队已抵承德以及沿途筹措给养的困难情形，一方面也探询了山海关方面的战况。旋接张方严（吴的参谋长）电，大意为“此间形势紧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并催促冯部迅速前进，且有“大局转危为安，在此一举”之语。接着蒋鸿遇亦电冯报告：“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三师（吴的精锐部队）悉数调往前方增援。”冯根据这些情况，断定时机已至，不容再缓，乃于10月19日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举行紧急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前，冯尚未宣布过他的秘密计划，但是他的将领和幕僚从这次行军的种种布置中，早已猜透了冯的心事。在会议开始时，冯对他的部下说：“你们大家跟我这多年，历尽了艰难困苦，国家闹到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会把你们带到什么道路上去。”鹿钟麟起立说：“我们大家患难相从，甘苦与共，原不是为了你我个人私利，既然是为了救国救民，我们一定永远跟着你干，任何危难，在所不计。”

鹿钟麟表明态度后，冯玉祥才正式宣布了班师回京、推倒曹吴的计划，各将领一致拥护冯的主张，于是对于班师回京的步骤和办法进行了缜密周到的讨论和布置。接着，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由平泉赶到，并参加了会议。计议既定，冯即发布命令，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人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急趋长辛店，以截断京汉、京奉两路的联络线；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立即出动，限期回京；通知胡景翼将开赴喜峰口方面的部队迅速撤回通州，以防阻吴军的回击；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以防发生意外；同时，下令封锁京热大道，遇有从热河去北京的人一律予以扣留，以防走漏班师回京的消息。北京宪兵司令兼前敌执法车庆云，是吴佩孚派驻承德专为监视冯军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为了防止他的破坏活动，冯乃命张之江派兵将其暂时扣留。

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21日开始行动，各部皆以最快速的行军向北京进发。先头部队的营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因此，数万之众，一路行来，真如流水一般，不但行军迅速，而且对沿途居民毫无惊扰，先头部队鹿钟麟部于22日即到达北苑，各部行程一般都达到一昼夜200里左右，创造了步兵行军的空前速度。

冯本人亲率刘郁芬旅于21日回至密云，对进入北京的种种措施又进行了严密的布置。22日行抵高丽营，黄郛由北京赶来相会，共商政府过渡时期办法，商定由黄负责组织摄政内阁，并对迎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的问题进行了筹划，冯并将预先拟就的主和通电请黄作了修改，谈至深夜12时，黄即赶回北京进行组阁准备。

鹿钟麟到达北苑与蒋鸿遇等会商后，即对各部分配了工作任务。先派兵一团以接运给养为名，押大车数百辆鱼贯入城，所有武器皆掩蔽在大车之内；进入北京之后，先到旃檀寺留守处集合，至夜12时，即分别

占领了电报局、电话局和车站等交通、通讯机构。鹿钟麟率部于夜12时行抵安定门，孙岳因已于事先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鹿走在队伍的前面，每到一定的地点，鹿即派出一支队伍，并告以行动时间和任务。鹿由北向南一段一段地前进，队伍也一支一支地向四下里分散，一直走到天安门前，鹿即将司令部设于太庙（即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这时，全城的防务已经很快地布置妥当，城内各重要交通路口均用大车加以封锁，将总统府及有关机关的电话线完全割断，总统府卫队由孙岳派兵包围，接洽缴械，另由鹿派兵一营守卫总统府。从这天起，曹锟即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楼内，不准其与外间接触。

冯玉祥这次举行政变，因计划周密，行动迅速，故能于一夜之间，不放一枪，不耗一弹，就在夜幕沉沉、鸡犬不惊的情况下完成了监视贿选总统和控制整个北京城的任务。在这个宁静的深夜中，像这样一件非常的举动，不但居民毫无知觉，就是曹锟和政府负责人也都还在梦中，直至第二天清晨，城内居民看到通衢要道遍布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的士兵，才知道发生了重大的事变。当时在街谈巷议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冯玉祥用兵神速，真称得起飞将军自天而下。”

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期，因请领经费、军械等遭到财政总长王克敏、公府收支处长李彦青等的多方刁难，对他们早已恨之人骨。特别是在一次请领军械的问题上，虽有曹锟亲笔批示，他们依然拒不发给，经蒋鸿遇向冯建议送给了李彦青十万元的巨款，始将枪炮弹药领到。所以冯这次回到北京之后，立即命鹿钟麟派员逮捕王克敏、李彦青；王克敏以事先闻风逃匿，得以漏网，仅将李彦青逮捕枪决。除王、李二人外，冯还计划将曹锐请来，叫他“报效”一笔军费，因曹在直隶省长任内搜刮了巨量的财富，冯对这些人是非常痛恨的，常常骂之为害民贼，只是对他们奈何不得，今既落在自己手掌之内，自然不能任其逍遥事外。这时，曹锐正和曹锟同住在中南海内，在李彦青被捕之后过了几天，即被

传至旃檀寺。万没有料到这个“舍命不舍财”的曹锐竟在事先吞服了大量鸦片，传到之后不久，即毒发身死。

三

冯玉祥于23日到达北苑，当即发出由他领衔的主和通电（全文见附录一），同时发布了安民布告；随即向曹锟提出二事：一、下令停战；二、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24日，颜惠庆内阁通过决议，发表了四道命令：一、停战；二、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三、解除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等职；四、任命吴佩孚为青海垦务督办。25日，冯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出席者为胡景翼、孙岳、王承斌、黄郛、王瑚、贾德耀及冯、胡、孙各部高级将领和幕僚20余人。会上首先讨论了改革政治的问题，一致认为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是当前中国惟一的出路，只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彻底消灭军阀统治，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决议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以打开更新的局面。当时革命意志最坚决的为胡、孙二人，对迎请中山先生北上问题，亦以胡、孙主张最力。但孙中山先生北来尚需要一定时间，为应付当前混乱局势，应先请段祺瑞出面维持；在孙、段未到京以前，贿选政府既不容许其继续存在，由黄郛组织内阁，处理政府过渡时期的一切事宜。在阁员人选问题上，冯、胡、孙等表示，他们各部的人员均不参加内阁，以示大公无私。会议公推与孙中山先生有关系的国民党人李书城为陆军总长，并在内阁以外公推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推李为参谋总长系出诸孙岳的提议），以表明欢迎孙中山先生主持大计的诚意。在讨论军队名称问题上，一致认为孙中山先生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应将参加这次政变的各部队改组为国民军，以符合为国民效用的宗旨，当即决议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

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冯等当时计划应由孙中山先生主政，由段祺瑞主军，为了促成这个计划的实现，在会议的第二天，冯、胡、孙等即联名电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26日，冯移驻城内，设国民军总司令部于旂檀寺，指挥肃清吴军残余的作战事宜。27日，冯派赴天津往见段祺瑞的吴光杰回京报告，段表示决意出山，共维大局。张绍曾亦于是日到京访冯，说明不能参加新政府的原委，且代吴佩孚缓颊，张隔日回津，并允劝吴退兵。28日，冯又领衔发出召集和平会议的通电（电文见附录二），借以通过会议处理一切善后政治问题。冯派往锦州与张作霖接洽的张树声、王国裕亦回京报告见张经过，张作霖表示愿与冯同居救国之列，并以50万元交冯作为慰劳伤兵和救济灾民之用，同时提出将热河划归东北的要求。11月1日，颜惠庆辞职照准，改任黄郛代理总理兼任交通总长和教育总长（11日复改任易培基为教育总长），王正廷为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王乃斌为农商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此外，并任命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黄郛内阁产生后的第二天，王承斌即劝曹锟自动辞职，曹即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并令内阁代行总统职权。但黄郛内阁发表后，曹锟仍拒不交出印信，且态度十分强硬，冯即派张之江、刘骥、孙连仲往见颜惠庆，请其转达曹锟限当日下午四时以前将印信交出，否则即令景山炮兵向中南海开炮；随即派薛笃弼进总统府向曹索印，鹿钟麟派兵一营随往，勒令已经解除武装的总统府卫队立即移往天坛。至此，曹才无可奈何地将印信交出。新阁成立之后，首先根据冯的提议，取消了清朝旧制官署的步军统领衙门，任命鹿钟麟为北京警备总司令；接着又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迫溥仪迁出宫外。冯为了刷新政治，向新阁提出了五项施政方案，即：一、打破雇佣体制，建设廉洁政府；二、用人以贤能为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务；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求民稳；四、讲信修睦，

以人道正义为根基，扫除一切掠夺欺诈行为；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

冯玉祥的这些雷厉风行的措施，虽然是初露锋芒，但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反感。特别是摄政内阁的成立，尽管冯部并未参加一人，可是各方面却认为这个内阁完全受着冯的操纵。首先表示不满的是张作霖，所以他不许奉系阁员王永江、王乃斌到京就职。各省直系军阀在南京组织的十省大同盟，对于摄政内阁也表示不予承认，并且在会上决议，在正式政府成立之前，北京所发命令概不接受。这个内阁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欢迎。某日，黄郛为内阁的成立设宴招待外交团，这本是一般的外交惯例，而外交团竟然谢绝参加。此外，在驱逐溥仪的问题上，也遭到了某些顽固派的反对，他们谴责冯玉祥“不近人情”。而段祺瑞竟专为此事打电报责备冯“于优待条件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总之，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腐败黑暗、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旦被冯玉祥的非常举动所打破，确乎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而遭到反动势力的疑惧和反对，当然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冯班师回京后，一方面促成了黄郛内阁的成立，结束了臭名昭著的贿选政府；另一方面，对于负隅顽抗的吴佩孚也给予了歼灭性的打击。

当吴佩孚最初在山海关得到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消息时，他还不相信胡景翼也会参加这一举动，于是矫曹錕之命派胡为第三军总司令以代冯，并以热察绥巡阅使为饵，派张敬尧到通州向胡传达命令，胡立即将这个倒霉的使节押送到京，冯即命军法处予以拘留（事定后始予释放）。到了一切真相已明的时候，吴仍图作最后的挣扎。他把对奉军的作战任务交给张福来主持，自己率领第三师和第二十六师的各一部约万余人自山海关乘车回救北京。冯事先已经料到吴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在这方面的军事早已有了如下的布置：命张之江、李虎臣部沿京奉线进攻张庄，命刘郁芬旅由北面绕攻杨村，命谷良友部迁回至北仓一带，命胡景翼部

并加派国民一军部队向天津东北地区进攻，以收围攻聚歼之效；另派孙岳部长驱保定，解决曹世杰部，以阻其北上应援。吴到天津后，即将其所率之万余人全部投入战斗，但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兵无斗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全覆没。国民一军随即占领杨村和北仓，吴的司令部被迫由天津移至军粮城。

吴佩孚初到天津时，原期望调动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由津浦路北来，李济臣、萧耀南的军队由京汉路北来，然后两路进攻北京，以挽回他的失败的命运。他万没料到，11月1日山东的郑士琦突然宣布武装中立，派兵到沧州、马厂一带阻止吴军通过山东，同时派兵南下炸毁韩庄铁路，以阻止江、浙援吴军的北来。在这同一天，山西的阎锡山也出兵石家庄，截断了京汉线的交通，因此，豫、鄂等省所派援吴军也被阻不能北上。吴所指望的这两路援军既已落空，而奉军又在这时占领了唐山、芦台等处，他的司令部所在地军粮城已处在三面包围之中，直系在冀东一线的20多万大军全部被歼灭。吴佩孚正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幸有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替他备好了华甲运输舰一艘，劝他登舰南下，徐图再举。吴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始大哭登轮南行。

吴氏既去，直奉战争遂告结束。从这时起，旧的矛盾暂时得到解决，而新的矛盾却又开始了。

冯玉祥虽然出身于北洋军阀系统，但他对于那些横行霸道、祸国殃民的军阀却有着深刻的痛恨（虽然他自己的军阀本质也并未完全改变）。他认为只要“军不成阀，阀不代阀”，就可以“永绝将来隐患之祸胎，确立健全民治之基础”。他这次举行政变，推倒曹、吴，正是为了“使国人知武力之不足恃，开根本改造之新机，为全国统一之先导，定邦国永久之大计，期以此次改革，完成历年来改革未竟之事业，解决历年纠纷之根本”。他主张“速开和平统一会议，将一切未解决的问题悉数提出，共同讨论，……期得最良结果，实力奉行，以免内争，以安邦本”。

(以上引文，均引自冯在班师回京后的几个通电)。他的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孙中山思想学说的影响的。他看到要实现这个愿望，决非那些腐败的军阀、官僚、政客所能做到，只有把孙中山先生请来主持一切，才能打开这个局面。因此，他从开始酝酿政变的时候起，就把收拾大局的重任寄托在孙中山先生的身上。可是后来局势变化，加以冯的立场摇摆不定，为了一时的权宜之计，他又不能不请出一个段祺瑞。而段又是个不甘居人下的人物，并且他与孙中山先生又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冯之迎孙，当然要遭到段祺瑞内心的反对，这就成了冯、段之间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冯在政变之后，原希望能够得到较大的地盘，借以发展他的实力，同时希望限制奉军进入关内，以便保持他在北方的势力范围。冯所提出的奉军不进关的条件，还在直、奉两军胜负未分的时候，当然可以得到张作霖的同意，可是一旦打败吴佩孚之后，张作霖眼看数省地盘唾手可得，往日的诺言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又是冯、张之间发生矛盾的关键所在。而且冯、段之间的矛盾和冯、张之间的矛盾又发展成为冯与段、张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得冯日益陷于孤立。

冯玉祥等举行政变胜利之后，首先接到孙中山先生的贺电，电文说：“义旗聿举，大愆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冯等接电后，即发出了速驾的复电，电文是：“辛亥革命，未竟全功，以致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役既平，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俾亲教诲。”接着冯又派马伯援持亲笔函南下往迎中山先生北上。孙中山先生得冯等复电，于11月13日由广州起程。这时段祺瑞在天津先后接到苏、皖、赣、浙、闽、湘、鄂、川、陕、豫等省督理表示拥戴他出山的电报，他认为上台的时机已经成熟。段得到冯等敦促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消息后，为了捷足先登，于是连电冯玉祥、张作霖促请赴津会

商收拾大局办法。最初冯本希望这个会议在北京召开（因北京是冯的实力所在），或者是等待孙中山到津后再行前往（孙到后冯即不致孤立），故迟迟未即就道。11月9日，段又派罗开榜到京催促，并云张作霖日内亦可到津，冯不得已，乃偕同刘骥、蒋鸿遇、王乃模等赴津。冯与段、张初步交换意见时，首先提出新政府应采取委员制，借以广泛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而且可以防止个人专断。这个意见立即遭到段、张的反对。同时，冯又提出催促孙中山先生北来共同商讨国家大计的问题；段、张对此虽然表面上表示赞成，但实际上并无诚意。在会议期间，皖系的卢永祥、吴光新和奉系的杨宇霆都非常活跃，在言谈之间，他们对于在会上讨论的问题，总是站在同一个方面，而且有意无意地对于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军，常常流露出歧视的语调，吴光新甚至把孙岳说成是可怕的共产党。冯看到当时的气氛，已经意识到段和张是在联合起来对付自己，他感到自己已陷入孤立的处境。加之冯每逢遇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发生争执的时候，惟恐别人说是个人的利害之争，总是表面上表示谦逊和退让，因此他在会议期间，再也没有拿出积极的主张。在会议上，张作霖提出在新政府产生前，暂组临时执政府，并推段为临时执政，执政府不设国务总理，由临时执政召集国务会议，这就无形中否定了黄郛内阁。冯对黄郛内阁亦不表示积极支持的态度，而是完全同意了由段组织临时执政府，并且与胡景翼、孙岳附名于张作霖、卢永祥拥护段祺瑞的通电。接着段即请冯推荐新内阁阁员人选，冯亦辞不推荐；当段将自己拟就的新阁名单征求冯的同意时，冯亦不表示异议。在军事方面，张作霖原已有过奉军不过关的诺言，而且段祺瑞对此还打过“保票”，可是当奉军进入天津的时候，首先就把王承斌收编的第二十三师解除了武装，王即逃往租界，不敢再到督署（王原系直隶督理兼第二十三师师长，经吴佩孚解除了他的师长职务，改派王维城接替，政变后摄政内阁令他收编第二十三师旧部，仍兼师长之职）。王承斌本是参预这次

政变的人物之一，竟然落到如此下场，使冯颇为寒心。不仅如此，奉军还向津浦、京津两路继续进兵，大有乘胜席卷关内之势。张作霖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当然引起了冯的极大不满。在会议上本已通过了以下几项决议：一、奉军在津浦线进至德州为止。二、对东南不用兵。三、对吴佩孚准其和平下野，不下通缉令。四、召集全国政治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和一切善后问题。这几项决议，几乎完全是由段决定下来的，会后，张对一、二两项大为不满，乃借口要为卢永祥出一口气，必须取得江苏地盘，并保荐吴光新（段的亲戚）继任安徽督理，而他自己则愿派兵筹饷以促成其事。段对张的意见，一则碍于卢永祥的情面，再则吴光新又是自家人，自不便坚持原来的决议，于是又继续开会，改为：由卢永祥率领张宗昌、吴光新部进攻江苏，但不侵入浙江；由国民军负责扫荡河南，但不侵入湖北。

冯玉祥在天津会议期间，虽然事事表示谦退，但依然遭到奉军将领的敌视。有一天，奉军将领李景林、张宗昌等拟乘张作霖邀冯赴宴的机会，中途设伏，加害于冯，因杨毓珣向冯告密（杨是张作霖的副官长，与冯为同乡；据杨后来对人说，张作霖当时并不同意李景林等的做法），始得免遭暗算。当时谣传冯已在津被扣，冯的部下闻讯后，旅长李鸣钟立即赶赴天津，到津后真相始白。第二天冯即偕李鸣钟等由津回京。从这次天津会议的结果中，冯已清楚地看到，段和张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特别是奉军方面那种气势凌人的态度，给了冯很大的精神威胁。虽然在会上划分了国民军与奉军的势力范围和发展方向，但是双方的矛盾随时有发生冲突的可能。这时，他已深深地感觉到，赶走了一个政敌吴佩孚，又招来了一个比吴佩孚更蛮横的政敌张作霖；而这个政敌，无论是在兵力上或者是经济上，较之国民军都占着绝对的优势；再加上段祺瑞事事以张作霖的意志为转移，而对于自己则摆在一个次要的地位，这就使得他不能不考虑下一步的做法了。

天津会议之后，段祺瑞看到冯、张都在争先恐后地拥戴他出山，而直系中的孙传芳、齐燮元、萧耀南等也对他表示拥护，他并且内有许多谋士，外有日本作为靠山，颇有志得意满、舍我其谁之概。但他对冯、张二人毕竟还是有戒心的，他的策略是“以张制冯，以日制张”。

段祺瑞、张作霖于11月21日、24日先后到京，段于24日就临时执政职，摄政内阁宣告结束。25日，冯即向段提出辞呈，发出下野通电，并且打电报给吴佩孚，说明彼此之间私交甚厚，只是对于吴的武力政策不敢苟同，因此才有旋师回都、倡导和平之举；劝吴将所统部队完全交给国家，一同出国游历，为废督裁兵之倡，循环式的内战就可以根绝，国家的和平统一就可以实现。同时他还发布了致全军官兵书，说明他所以辞职引退的苦衷，说，这次主和罢战，原是本诸良心的主张，可是吴佩孚对他屡次宣言攻击，如不早解兵权，就无以自明心迹。冯发出通电后，即避居于京西的天台山。实际上，他退隐山中之后，每天都有各方面的代表前来访问，而且他对于自己的部下也不断地有所指示，并不能全然置身事外。

在冯玉祥由天津回到北京的时候，胡景翼正在彰德和李济臣打得很激烈，有一天，岳维峻、邓宝珊前往见冯，冯即催促他们率部前往增援，他们说：“那方面的事小，我们此时还有更大的责任。”冯问何事，他们说：“趁着张作霖父子住在北京的时候，今天晚上我们就预备动手，把张作霖父子捉住枪决！”冯说：“这万万使不得，只顾一时的快意，势必引起极大的混乱。”岳、邓仍坚持要干，经冯再三说服，他们才勉强接受了冯的意见。

冯玉祥辞职下野，一方面是鉴于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颇有难于应付之苦，不如暂且躲避一时，从旁看一看局势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他在权利地位问题上，既不愿直接提出自己的要求，故不得不有此消极的表示。他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当然早被段祺瑞看

穿。在段这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他为了分化冯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把冯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就必须设法使冯得到满足，于是在几番挽留仍未打消冯的辞意的时候，便把察哈尔、绥远和京兆作为国民一军的地盘，并准冯将其所部扩编为六师、三旅。这样，冯的西北边防督办（在冯任陆军检阅使的时候就兼有西北边防督办的名义）不仅有了地盘，而且队伍也有了很大的扩充。段的这些措施，对于打消冯的辞意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原来冯自从调任陆军检阅使之后，由于没有一定的地盘，在经济上感到很大困难，常常对人说他是一个“穷困的陆军检阅使”，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他的实力发展。察、绥地区虽然比较瘠苦，但毕竟还可以作为一个发展的根据地；而且僻处在西北一隅，既可以减少今后对奉军的摩擦，又可以避免陷入政治纷争的漩涡。因此，冯在几经考虑之后，也就接受了段的这番安排，在1925年1月间悄然离开了天台山，前往张家口，开始了开发西北的计划和设施。

孙中山先生于12月4日到达天津，冯当即派熊斌代表前往欢迎；12月31日中山先生入京时，又派鹿钟麟、刘骥代表前往车站迎接；中山先生卧病协和医院后，又让他的夫人李德全前往探视。中山先生当即以《三民主义》6000册、《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1000册赠冯，冯便发给部队作为官兵的必修课。不久，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民军全体官兵持服7日，以表示哀悼。后来冯每逢谈起孙中山先生，总以为一直没有得着见他的机会而引为平生憾事。实际上，当中山先生到京的时候，冯还在离北京不远的天台中，并不是没有见面的机会，其所以没有与中山会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局势的发展已经发生了逆转的变化，和政变刚开始的时候已不大相同，他感到见了孙中山先生将不知如何谈起。而且他还顾虑到，如果与孙中山先生过于接近，将会招致段祺瑞对他的猜疑和不满。这说明冯在当时的处境是有着不少困难的。

当时，冯玉祥在政治上虽然已开始倾向于革命，但对革命的认识还

很不够，他把当时已经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还看作是“结党成派、私而不公”的政治集团；甚至对于为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都还搞不清楚。例如，他曾说：“常听到说打倒帝国主义，我总觉得纳闷。人家欺凌我国，我们反抗他，这是应当的；但是何必还要进而替人家去打倒皇帝呢？”而他所谓革命，实质上也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想法。他虽然在政变之初抱着打倒贿选政府、扫除军阀势力、拥护中山主义和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但是由于对革命认识不清，没有明确的革命主张，又由于当时的反动势力还很强大，革命的力量还很薄弱，革命的准备又很不充分，因而在军事胜利之后，便一步一步走向失败的道路，在皖系政客和奉系军阀的操纵下，使这次政变失去了革命的意义。因之这次政变，就不能不是以革命的姿态倡之于始，而以皖系政客和奉系军阀的卷土重来为其结局。所以孙中山先生在北上途中路过日本的时候，曾对当时北方情况作了如下的概括的分析：“国民军的行动初上来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到上海后，北京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为别种势力所牵掣，就不像革命的运动了。”（在日本东京中国国民党欢迎会上的演说）

到了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所发表的宣言中，对于北京政变一役又作了一次回顾，他说：“因为我对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意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虑，所以只有一二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地说出来，好让国人知道我做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原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革命的观点来说过去，若说是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不意当时有人说我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

（王式九、吴锡祺整理）

附录一：冯玉祥等主和通电

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不幸吾国自民九以还，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执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进和平，与民休息；乃者东南衅起，延及东北，动全国之兵，枯万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战？为谁而战？主其事者恐亦无从作答。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作弭战之主张，爰于10月23日决意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如有弄兵好战，殃吾国而祸吾民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关重要，自当负责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所谓多难兴邦，或即在是。临电翘企，伫候教言。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米振标、岳维峻、李纪才、邓宝珊、李虎臣、李鸣钟、张之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孙连仲、孙良诚、蒋鸿遇叩漾。

附录二：冯玉祥等主张召开和平会议通电

民国创造，十有余年，兵戎迭兴，迄无宁日。军阀强藩，棋居鼎峙；分居国疆，自擅威福，意见参差，干戈即起；逞其武力，期快己私。以多数之国民，徇一人之私欲；美其名曰讨逆，文其过曰义师；实皆睚眦之争，全与国家无涉。旱涝频仍，而忿兵迭起；度支困竭，而黷武不休。以致九有疮痍，四方困竭；哀鸿遍野，群盗满山；工商室阻，农田荒芜；万众倒悬，群伦涂炭。不特共和之真谛未获实现，反致国际之地位日益堕落。玉祥等睹此颠危，忧心如捣。恐稍贻徇，必致沦胥；内受良心之驱迫，毅然为和平之主张。知全国知武力之不足恃，开彻底

改革之新机。其目的纯在救国，其办法纯取公开，为全国统一之先导，定邦国永久之大计。期以此次改革，完成历来改革未竟之事业，解决历年纠纷之根本，永绝将来隐伏之祸胎，确立健全民治之基础。决非局部之争、恩怨之报，更无钩名沽誉之心，尤无联甲倒乙之意。愿国事之安全，不屑个人之利益；知人民之困苦，不敢避一己之艰辛。返京以来，迭次通电，区区微忱，谅荷洞鉴。现在京师安堵，商民乐业，友邦谅解，群情翕辑。如有反抗和平，武力是逞，愿为国民公敌者，则祥等惟力是视，誓与国人共弃之。政治暂维现状，企免国务纠纷。此特为过渡之初步，并非最后之办法。当兹军兴国乱之际，自不免有多少委曲求全之处，此则不能不乞国人谅解者也。祥等以为此后一切善后问题，国家建设计划，非一二人所能集中，亦非一二党派所能把持，必须举国贤豪同集京师，速开和平统一会议，将一切未决定之问题，悉数提出，共同讨论。以多数人之主张为指归，以最公平之办法为究竟，期得最良结果，实力奉行，以息内战，以安邦本。为今之计，莫急于此。惟此和平会议，究应如何组织为妥善，如何产生为适宜，海内贤豪，南北硕彦，匡时共策，宏划应多。务祈不吝说言，速予指导，发表伟论，见赐嘉猷。祥等虽戎行稚鲁，素知从善，德音早贲，虚己景从。时机迫切，披肝沥胆，引领教言，伏乞鉴察。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叩。

末代皇帝被逐出宫的详情细节*

溥 佳

我的父亲载涛，是醇亲王载沣的胞弟，载沣是溥仪的父亲，我和溥仪是亲叔伯兄弟。我幼年与溥仪在一起学习英文，经常行走宫内。1924年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将溥仪、溥杰和我圈在一起。现将此中前后经过情况，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就回忆所及记述于下。文内不妥之处，尚希识者有以指正。

出 宫 前 夕

1924年的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局的演变，很快地又迫近北京。当时，我们还认为这次战争与往昔的内战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不管直、奉哪一方面取得胜利，对于清室来说，是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因而仍旧抱着静待哪方面胜利就“欢迎”哪一方面的态度。我们很有自信地认为：凡在民国掌握政权的达官显宦，大都和清室的王公多少有些

* 此稿经溥仪及溥杰审阅，认为内容基本上确实，不过也有几点与事实不符。例如，当他们被迁到北府时，即住入溥杰的“树滋堂”，并非先住入小屋而后迁入“树滋堂”。又如，冯部士兵仅在大门外守卫，而不是在院内也有士兵。特此说明。

旧的关系。就以我的父亲载涛来说，在清朝时代，曾任军咨大臣和训练禁卫军大臣，民国时代也做过巩威将军。因此，在这些军政大员之中，都有新旧同僚和旧日属下、师生等等关系。我父亲平素颇喜交往，每当内战结束更换新的政权时，总是送往迎来酬酢不绝，彼此之间的关系搞得相当不错。在当时，上至“皇帝”，下至王公，都有恃而无恐地住在“宫廷”、“府邸”之内。

直奉战争演到正酣之际，平空传来了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消息（当时北京人都称之为冯玉祥倒戈）；同时，市内各重要路口布满了冯军士兵，有些地方还用大车封锁，禁止行人往来。这时空气已够紧张了。紧跟着又听到，曹大总统已被监禁，曹锐、李彦青等已被枪毙的惊人消息。这时我们还以为是军阀们为了争夺政权，才引起了这场突变，仍然与清室方面无关。随后，又从各方面传来消息说，冯玉祥这次来京，不但要推倒曹锟，还要驱逐溥仪出宫，并没收各王公府第。还有消息说，由于溥仪把宫内太监裁撤，引起了太监们的极大愤怒，有人把溥仪密运宝物出宫的情况向冯玉祥报告，因此冯要逮捕溥仪，追还宝物。

我们听到这些消息以后，确实感到十分惊愕和忧虑。像“皇帝之尊”的溥仪，在宫中所过的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自不必说，就以我们这些王公贵胄而论，世代代过的都是养尊处优、一呼百诺的极端优裕的生活，晴天霹雳地听到行将危及生命财产的消息，又怎能不惊慌失措呢？我记得，为了溥仪的安全问题，王公、帝师、内务府大臣等召集了两次“紧急会议”来商讨对策。会议上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尤其是宝熙（宗室，时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更是高谈阔论旁若无人。但是会议最后毫无结果，人们都悄然垂头而散。

综合当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大致有下列三点：1. 冯玉祥一贯的作风与其他军阀有些相异，不但他本人，就是他的属下从来不与清室方面来往，因而无法打通这条门路；2. 溥仪避祸出宫，事实上牵扯的事情太

多，一时也难找适当的住所。又顾虑到，假如所传消息不确，岂不是自寻引火烧身之祸；3. 敬懿、荣惠两位太妃的安置问题，最感棘手，还有端康太妃的灵柩尚未抬埋，也不能置之不顾。最后的结论是：另谋善策。其实就是“听之而已”。

为了说明我对溥仪出宫经过比较清楚，先得交代我与溥仪幼年时的情况。1919年我12岁的时候，我跟英人庄士敦（R. F. Johnston）读英文。后来庄士敦到宫内教溥仪英文时，就叫我到宫内伴读。当时，还由溥仪降了“谕旨”一道，派我“毓庆宫行走，伴读英文，紫禁城内骑马”。每天上午，陈宝琛、朱益藩教溥仪读汉文，由毓崇（贝子溥伦之子），溥杰（醇王载沣次子，他在我以后到宫内伴读）伴读，下午则由庄士敦教溥仪英文。

在冯军入城的前一个多月，因端康太妃（光绪妃）去世办理丧事，我们暂时停止上学。可是溥仪一个人在宫内颇感烦闷，每天仍叫溥杰和我到宫内陪他游玩。我们有时在养心殿（溥仪所住之处）东拉西扯地乱说一阵，有时也到御花园去游戏。我们玩得高兴时，就把“君臣”的关系扔到一边，有时也打成了一团，因此彼此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友爱的。

自冯军入城以后，传来的消息日趋紧张，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形势逼人，迟早总要离开宫内。在出宫的前十来天，我们不再到处乱跑，也偷偷地商议过，认为如果宫内不能居住时，惟一的安全地方就是天津租界。因为早在1922年前后（详细日期已记不清了），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这座楼和我家的楼房只一墙之隔，为的是溥仪将来居住时，可以随时照料他的一切。我们也考虑到一旦离开宫内，对于生活费用以及出洋留学（当时也想到外国去留学）的经费，势必感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未雨绸缪，作了一些准备。

从1922年（日期已记不清了）起，我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的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批盗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的周折。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簿上要记载清楚，还需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再开一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用赏给我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我们满以为这样严密，一定无人能知。可是，日子一长，数量又多，于是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久，就有太监和官伴（宫内当差的，每天上学时给我拿书包）问我：“这些东西都是赏您的吗？”我当时含混地对他们说：“有的是赏我的；也有修理之后还送回宫里来的。”可是长期以来，只见出，不见入，他们心里已明白大半，只是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批古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详细数字已记不清了），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可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13号路166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作溥仪将来的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天津居住是最为相宜，并且是有恃而无恐。

溥仪出宫的前两天，我们趁养心殿无人的时候，从保险柜里取出些便于携带的珍珠手串等物，分装在两个小手提箱内，准备万一的时候，好带出宫去。

写到这里，我深深地认识到，为了溥仪一人、一家，不惜将稀世之

珍盗运出宫，对国家、对人民真是一件无法补偿的巨大损失，罪恶之大，使人不寒而栗。

在这紧张时期，担任宫内守卫的护军，为了加强戒备，还表演了一幕滑稽剧。原来在辛亥革命后，由于溥仪留住宫内，就由两部分部队分别担任紫禁城内外的警卫。神武门外，由十六师（原禁卫军改编）一部担任守卫，神武门内归护军担任守卫。护军统领由毓逵（奉恩将军，宗室）充任。护军人数并不多，我所看到的大概不足200名，据说其中空额甚多。这位毓统领为了做好宫内警卫工作，“奏明”溥仪，派员检阅护军训练的情况，并检查枪支弹药等。溥仪即派我随同毓逵前往“检阅”。我首先看了护军演习分列式，只见这些位年将周甲的老官兵们，一个个嘘嘘作喘，队形散乱，演习工夫不大，其势不能不宣告结束。我们又继续检查武器，只有为了站岗所用的20来枝步枪外表还似枪样，其余大部分枪支则被多年的铁锈所侵蚀，内外已成一体，标尺、枪栓休想动它一动。再检查枪弹时，子弹和弹匣（铁制的）也是锈成一个整体。勉强拿出几枚来看，子弹已然不似它的原来形象了。最后，我们又看了看指挥刀，有几把是站岗配带的还好，余者刀和鞘永远不会离开了。只好啼笑皆非地结束了这场检查工作。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这个封建王朝，多年来自上而下的腐败程度实在达于极点了，封建统治阶级其势不能不被推翻。为封建帝王所服务的这批武器，自然而然地也要伴随着最后的这个“小朝廷”同归于尽了。

北府中的软禁生活

1924年11月5日中午，我仍照例每天一样乘马车去往宫内。到北上门时，见有冯军持枪放哨，我估计一定出了什么事故，可是又无法折

回。正犹豫间，有数名冯军士兵将马车拦住，问我：“你到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上边（指溥仪）叫我来的。”那士兵说：“等我请示回来再说。”等了许久，他回来对我说：“溥先生已然不在这里，我们送你去见他去。”当时，也不容我再说什么，叫我下了马车换坐一辆汽车，有一士兵跟随，就一直向北驶去。我心里想此去一定凶多吉少，只好“听天由命”罢。

我初未料到汽车竟开到北府（即什刹海醇王府，以下简称北府），只见府门内外军警林立，特别是阿斯门（有一对石狮的大院）外，有很多持大小枪支和背大刀的士兵，其势如临大敌，使人感到十分不安。随我来的那一士兵和另一个士兵（冯军官兵服装一律，使人无法辨别）说过几句话后，又由两个持枪的士兵简单地把身上检查了一番，将我送入一间小屋，在这里与溥仪、溥杰见了面。

当时，我们三人真是惊喜交集，不过惊的成分多一些。我低声问溥仪：“为什么不早通电话呢？”溥仪说：“打了两次都不通，大概是电线已然断了。”傍晚时候，仆人送进一提盒饭菜。因为我们惊魂未定，每人只吃了一点就拿走了。

6日晨，按照夜间我们所商妥的方法，由我出去以取漱盥用具为名，设法找我父亲探问消息，最要紧的是叫他急速设法来营救。我试探性地和冯的士兵商量了两次，那士兵对我说：“没有上边命令是不许可你们出去的。”我们听了之后，真是哑然若失，知道已然是毫无办法可想，只好听候处理了。由5日至7日，内外不通，消息隔绝。我们真是度日如年，如坐针毡地度过了三天。

8日中午，忽然来人对我说：“有人要见你们，现在随我去。”我们随同来到了“大书房”（这里原是我五伯载洋会客休息之所），看见我五伯、我父亲、载泽（宗室、奉恩镇国公）和荣源（溥仪岳父，时任总管内务府大臣），都在这书房之内。见面之后，才知道我父亲他们也是从5

日到了北府之后就不许出去了。我父亲对溥仪说：“大概是鹿钟麟（北京警备总司令）要来，我们先研究一下都和他讲什么？”经大家商定，等溥仪与鹿谈话之后，由我父亲再向鹿提出所商定的几项问题。因为我五伯平素胆小怕事，不善于言谈，且自溥仪到了北府之后，外面被军警包围，情势十分紧张，因此更使他惊慌失措，终日紧锁双眉，一语不发。

下午3时左右，由绍英（总管内务府大臣）陪同鹿钟麟、张璧（警察总监）来到北府与溥仪会面。鹿首先问：“溥仪先生对政府所修正的清室优待条件有何意见？”溥仪答：“政府对清室方面这样优待，我非常感谢，并无任何意见。”鹿问：“溥仪先生对取消皇帝尊号有何感想？”溥仪答：“我对于取消皇帝尊号是完全同意和愉快，因为我对宫廷那种不自由的生活早已感到厌烦。今后，我能够做一个中华民国的自由平民，我感觉非常高兴。”鹿问：“溥仪先生将来有什么打算？”溥仪答：“关于我个人的将来，现在没有什么打算。我只希望能在北京有个住处，仍旧继续读书。将来政府能够许可的话，我打算出洋留学以求深造。”鹿说：“溥仪先生所谈的很好，关于住处问题，政府一定要妥善安置。”这时张璧又对溥仪说：“溥仪先生所谈的我们感到满意。但是还有两个问题，要求你赶快解决。第一，关于玉玺的问题，溥仪先生既然同意取消皇帝尊号，你留着那块玉玺还有什么用处，应当现在就把它交出来；第二，应当把皇室私产全部交出来，将来经过政府查清之后，如果认为哪些是归你所有，政府还要发还给你。”众人听了要玉玺的话以后，一时瞠目不知所答。溥仪思索了一下就对张璧说：“我确实没带出什么玉玺来，如果有的话，留着也是无用，一定把它交出来。至于皇室私产，一向由内务府管理，我不清楚。绍英现在也在这里，可以叫他把皇室私产全部交出来。”张璧听了，带出很不乐意的样子说：“皇室私产既然溥仪先生答应全部交出，为什么这块传国玉玺还不肯交出来呢？”

这玉玺的问题来的非常突然，一时无人答复，要形成僵局之势。我父亲就向张说：“皇室私产已无问题。至于这块玉玺，据我所知，按清朝制度是每换一位皇帝就重刻一次玉玺，从来没有什么传国玉玺。”张璧用强硬的腔调说：“就是那块历朝相传的‘金镶玉玺’。”载涛连忙向张璧解释说：“清朝历代皇帝所用的玉玺，确如载涛先生所说的那样，张总监所说的那块玉玺，大概指的是秦代李斯所篆的那块和氏璧罢？那块玉玺不但在清朝就没有看见过，就在清朝很早以前已然失传了。如果张总监要玉玺的话，请您到宫内交泰殿，清朝历代皇帝所用的各种玉玺都在那里存放。”张璧听了之后，虽然有些不大相信，可是也没再追问，又向溥仪和绍英说：“那么，你们先把皇室私产交出来罢。”绍英显出非常为难的神气向张璧说：“内务府所管的皇室私产，除在盐业银行所存的现款可以很快地交出外，还有房产、土地很多，这些年来我们就没清查过。现在有极少数按季交租银的还可以查得出来，不交租的我们连房产、土地究竟有多少，坐落在什么地方也弄不清楚。”张璧问：“难道这些房产、土地就没有契约、合同可查吗？”绍英说：“契约、合同有的是，现在库里存放。如要清查的话，就是每天用筐子来抬也得抬上几天。最好我们双方派人一起清查罢。”

据绍英所谈，可以看出历代封建统治者们，为了个人的穷奢极欲，不知掠夺了多少人民的财富。就以内务府所管的房产、土地来说，真要是彻底清查出来，一定得出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些皇室私产，名为内务府管理，事实上等于不管理。内务府内部的腐化无能，也是达于极点了。

谈至此处，张璧也感到问题的棘手，没再说什么。最后鹿向溥仪说：“一切问题留待以后商议处理罢。溥先生还有事吗？”我父亲连忙向鹿说：“我们有几件事要向鹿总司令商议。”鹿答：“可以提出来罢。”我父亲便说：“第一，溥先生自到北府后，他们三个人（指我和溥杰）住

在一间小屋，实在感到不便，可否移到一所较大的房子居住？第二，可否把屋门外和院内的岗哨撤去，并许可到他祖母院里看看去？第三，溥先生来到北府已然四天，不但衣服没有换的，就连卧具、漱盥用具等物一概皆无，可否派人到宫内取出？第四，可否许可找回几名外随侍（裁撤太监以后，所雇的男用人称为外随侍）和厨役，以便照管溥先生的日常生活？第五，可否允许我们本族人和师傅们（指陈宝琛、朱益藩、庄士敦）到北府与溥先生见面？第六，溥先生出宫时，未带出现款来，可否由内务府所存款项中暂拨一部分使用？第七，三天以来，由于禁止一切人等出入府门，以至厨役无法到外边购办米面蔬菜等等用品，因而府内人等吃饭已大感困难。还有我们几个外来的人，也三天没有出去换换衣服或到家看看，可否准许外来人和府内厨役自由出人？最后，我们恳请鹿总司令和张总监对两位太妃（瑜、璿二太妃）迁出宫外的问题不要操之过急。因为她们在宫内已经住了几十年了，一旦迁出，自然是有些难舍，而且她们都是年老体弱的人，最好是先在外边把房子找妥，我们一定劝她们迁出宫来（当溥仪出宫之时，也让两太妃同时出宫，但两太妃不但不迁出，并以死相拒。故对鹿、张作此请求）。”鹿答：“这些问题容我回去研究后再作答复。”

鹿、张将要辞出时，荣源突然向鹿、张二人说：“你们这样做事，实在太欺侮人了。”荣源平素有些轻微的精神病，大概由于当时的空气过于紧张，精神一时失常因而说出这番话。幸而鹿钟麟一笑置之，并未答言。张璧回答说：“请荣先生冷静一些罢，这是没有办法的，来日方长，我们以后还要见面，不要着急。”这次会谈就在这十分尴尬的情况下宣告结束。事后，大家对此深以为忧，恐怕由此又要引起更严重的后果。经过溥仪与我父亲和载泽商议的结果，此后不再让荣源参加任何会谈，免得另生枝节。

鹿、张走后，我们三人即回小屋。我们研究了适才鹿、张的谈话，

认为虽有荣源最后这一场“轨外行动”，根据鹿钟麟的谈话，可能不致发生特殊的危险。此时，溥仪又开始说起笑话来了。我们经常和他在一起的人，都知道他这种特殊的作风，不论在任何紧张忙乱的情况下，总是突然而又天真地说上几句笑话，有时也效仿别人动作的特征，使人笑不可支。这样，就把一时的紧张气氛冲淡下来。我们对这种举动非常感兴趣。这天夜里，由于他说了笑话，我们又忘其所以地低声说笑起来。

9日上午，绍英来到北府，传达了鹿钟麟对昨天所提出各项问题的答复，大意是：对我们所提出的各项问题大体表示同意，并且有的问题从今日起即可照办。但有必须注意的几项是：1. 派人到宫内去取东西只限于日常所用的衣服、器具等物。养心殿内的古玩、陈设、木器等一概不许持出；2. 准许溥仪会见外来之人，但绝对不许外国人来见；3. 许可内外人自由出入，暂时还不许年轻人出入（当时虽未说明何意，大概是怕溥仪混出北府）；4. 两太妃迁出宫外，最迟不许超过20天。为了特殊照顾她们，许可把她们宫殿内的陈设、木器以及日常一切用品带出官去。对玉玺和荣源的行动却只字未提。我们感到十分安心和满意。

正午过后，果然屋门口和院内的士兵全部撤去，当时我们真像鸟出樊笼一样的高兴。下午我们就搬到溥杰夫妇所住的那所“树滋堂”，这里要比那间小屋宽敞舒适多了。

我父亲和载泽他们也到家看望之后，晚间又回到北府。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年轻”的关系，还不许出去。好在我父亲已把我的衣服等物带到北府，也就安心在北府住着罢。晚间，我随溥仪到了我们祖母和三庶祖母院里看了看，又谈了这两天的经过情况。溥仪也和他的妻、妾（在宫内称为皇后、淑妃，她们随溥仪到北府之后，即和我祖母住在一起）也见了面。我们回到“树滋堂”后，因为三四天没有睡觉，感到十分疲倦，真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雷雨之后，恬静而又舒适地睡了一夜。

9日派人到宫内取东西时，发生一件直到今天也没有打破的“谜”。事情是这样：按照双方议定，派人到宫内取东西时，由双方各派大员前往监视。溥仪这方派的是绍英、耆龄（总管内务府大臣）、毓逖前往监视，并带有护军、外随侍共八九个人。鹿钟麟派的是张璧前往监视。绍英等临行前，溥仪嘱咐他们说：“你们务必把‘佛格’（狼犬名，这条狗曾在德国警犬学校毕业，受过严格的训练，溥仪用重金买妥后，由专人自德国送到北京）牵来。还有我常戴的一顶带有钻石帽花的小帽也给我拿来。”他还指明在养心殿东暖阁的炕桌上放着。傍晚时候，绍英等人来到北府对溥仪说：“衣服、用品等项和狼犬都已取来，只有那顶小帽没有找着。”据绍英说，当他们进养心殿时，曾亲眼看见那顶小帽确实放在东暖阁的炕桌上，正当大家忙着取东西时候，他亲眼看见张璧围着那顶帽子一转，就用他戴的那顶呢子礼帽扣在那顶小帽之上，以后那顶小帽就踪影皆无了。在旁边的耆龄也附和其说。虽然，他们是言之凿凿，真伪究属难辨，记之聊作一段笑话来看罢。

自10日起，门禁稍宽的消息很快地传到外边。王公、遗老旧臣们是纷至沓来，北府大书房内，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当时还没有“奏事官”（即传达），就由我和溥杰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带到“树滋堂”去见溥仪。

正午将近，溥儒（恭亲王溥伟胞弟，号心畲，画家）来到北府。适值溥仪也在大书房。溥儒见屋内人多，就对溥仪说：“奴才（凡王公、宗室对皇帝都自称奴才）有密奏的事，这里人太多。”溥仪拉着我和溥儒来到“宝翰堂”（与大书房相联）。溥儒跪在地下痛哭流涕，即从怀中取出一柄小型匕首。我和溥仪一见，大吃一惊，不知他意欲何为。溥儒说：“奴才见皇上到了这般地步，心中实在难以忍受，要用这把匕首刺死冯玉祥或是鹿钟麟，以雪此恨。”溥仪急忙把那柄匕首抢到手中，然后对溥儒说：“你的忠心固然可嘉，但你要知道我正在患难之中，如果

你不顾一切地做出此事，不但对我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更要加深我的苦难，今后，你千万别这样任性胡为……”溥仪劝了他很大工夫，他才低头拭泪而退。溥仪当时嘱咐我不要和别人说。及至我们到了“树滋堂”，溥仪从怀中将这柄匕首拿出一看，原来是一把裁纸所用的小刀而已，觉得此事非常可笑。溥仪就把这柄“匕首”摆在书桌上，时常引为笑谈。

五花八门的营救

漩
涡
沉
浮

10日下午，大书房内真是座无隙地，王公和遗老旧臣们开始商讨如何积极营救溥仪的办法。议论中间，郑孝胥（时任内务府大臣）还有他儿子郑禹，都极力主张效申包胥哭秦庭的办法，向日本使馆请求派军队保护溥仪离开北府到交民巷避难。郑氏父子的意见，当时即遭到我父亲和载泽以及陈宝琛、朱益藩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日军来到之后，如果和这里驻守的冯军冲突起来，不仅溥仪要受到很大的危险，还有醇王的一家也不堪设想了。郑氏父子听罢，露出很不满意的神气，不待会终就悻悻然而去了。（郑的阴谋活动，后边还要谈到。）众人研究了许久，最后决定：大家尽一切力量分头向各方面急急营救。

先把王公方面所进行的营救办法叙述一下。据载泽说，以前因为东陵的关系（什么关系已记不清了），与杨宇霆、常荫槐颇为熟识，时常在一起打牌、吃饭，拟即致函杨、常，转托他们向张作霖求援。我父亲在11日晨，同庄士敦到使馆方面进行营救。先拜访了荷兰公使（名姓已记不清了），因为当时他是驻华外交使节团团长，并且在北京多年，与我父亲和我都很熟识，时常到他家作客。我父亲和庄士敦把溥仪出宫的经过和请求援救的话和他谈了之后，他很表示同情。当即商定了两个办法：1. 先以各国驻华公使的名义，口头通知冯玉祥总司令，要负责保障溥仪的生命安全；2. 由各国公使分电本国政府，以各国政府的名义请中

国政府即日恢复溥仪的自由。他并且向我父亲表示，至迟在明天即召集各国公使开会，如果有其他国家公使不同意的话，荷兰方面一定要这样去做。随后，又访问了英、法、比、意等使馆（是否还有其他使馆已记不清了），他们也都表示支持和援助的意思。后来庄士敦对我说，因为他最讨厌日本人，所以没到日本使馆。

当日下午，我父亲又去到旃檀寺冯军司令部，打算和冯玉祥直接面谈。但是未能见面，传出话来说：“冯总司令开会太忙，有什么事可向黄代总理（黄郛）去谈。”随后，我父亲又见了黄郛。因为他和我父亲以前就认识。在我父亲任军咨大臣时，曾保送他去日本留学。在颜惠庆内阁他任教育总长时，和我父亲也有往还。我父亲把来意与黄说过之后，黄表示：“溥仪的安全，决无问题；恢复自由，需待段祺瑞、张作霖到京后才能解决。”

我父亲回到北府，和载泽等研究了营救经过的情况，认为溥仪的安全可无问题，只是恢复自由依然困难重重。这时，有醇王府大管事张文治自告奋勇地向我五伯载沅和我父亲说：“听说张作霖快要到天津了，请王爷（指载沅）和您给他写封信，我即刻就到奉天把信交给他，请他赶快设法援救。”提起张彬舫（张文治号）来，当时在北京也确实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虽然没登上过政治舞台，可是他以醇王爷的大管事的身份，与军政大员都有相当密切的往来，特别是和奉系方面的张作霖、张景惠、汤玉麟等，都是盟兄弟。我父亲和载泽认为他这办法很好，因为他父亲和张作霖以及奉军其他将领们也很熟识。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张作霖在北京时，有时也请我父亲吃饭看戏。我父亲同吴俊升、汤玉麟等人，时常到天坛骑马，感情方面搞得相当不错。因此，当时就决定以载沅、载涛、载泽及全体满洲王公的名义致函张作霖，请求营救溥仪。信的大意是：11月5日，冯玉祥总司令以武力强使宣统逊帝出宫，软禁于醇王府内，军警日夜包围，生命危在旦夕。恳请上将军主

持正义，速解倒悬，即日致电冯总司令切实保障宣统逊帝安全，恢复自由等语。当夜，张文治即带信离京去奉。

当时，宝熙也在蒙古王公和满族旧臣方面进行了营救活动，还到了满蒙协进会，打算召开大会，发表营救溥仪的宣言。宝熙到该会的正、副会长那王、贡王（那彦图、贡桑诺尔布，蒙古王公）的府里商议时，他们是支支吾吾，畏避不前。还有些满族旧臣们，早已逃往交民巷或天津租界隐藏起来了，因之使会议无法开成。据我所知，像家财特别豪富的满族王公庆王载振一家，旧臣如那桐、增崇等全家，早就跑到天津租界里享受“清福”去了。这件事也很好地说明当时所谓满蒙上层人物的一种“协进”表现。

遗老旧臣方面的营救活动，由于他们人多，办法也多，更形成“五花八门、各显神通”的局面。就以执遗老旧臣之牛耳的陈宝琛、朱益藩来说，他们的意见大体与王公方面相同；不主张请求外兵强把溥仪挟出北府。其他如柯劭忞，则同庄士敦到英国使馆进行活动；冯恕（北京电灯公司创始人）则去天津求援于段祺瑞；类似朱汝珍（南书房行走）那些不胜枚举的遗老们，则分别向天津、上海、广州等地所住的遗老旧臣们求援，并通过他们向当地的军、政、报界以及社会团体等等多方面进行呼吁，请求主持正义，即日恢复溥仪的自由。

除了一心一意投向日本帝国主义怀抱的郑孝胥外，还有两个人表现的比较突出。一个就是罗振玉（南书房行走、后任伪满参议府参议），他那时经常住在大连，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早就勾勾搭搭。在营救溥仪的时候，他那种老奸巨猾的手段确比郑孝胥要高出一筹。他矢口不谈什么借助外力的话（暗地里与日人勾结），曾两度去天津向段祺瑞求援。我记得他每次由津来京时，总说是没回家就来到北府，向溥仪和王公们报告他在津与段会见的经过。当时溥仪以及王公等，对他那种不顾年迈、不辞辛苦的精神都一致表示赞许。他总是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

神气说：“君辱臣死，我只有鞠躬尽瘁而已。”当时，我们都把他看成一个“忠贞可嘉”的人物。再一个就是金梁（时任内务府大臣）。表面上来看，他不但态度骄傲，还像带些疯癫之状。他对于王公和一般遗老旧臣们，仿佛都不屑与之一谈，专门鬼鬼祟祟地一个人跑到“树滋堂”和溥仪秘密私语。有时也和郑孝胥同去。在王公方面，认为郑、金是两个最可怕的人物。

当时，我五伯载沣对郑、金两人的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动颇为忧虑，总怕他们引来外国军队挟走溥仪。到那时，不但对溥仪有很大的危险，更可怕的是给整个的醇王府带来不堪设想的灾难。我五伯与我父亲和载泽商议的结果，由于我父亲和载泽虽与溥仪有叔侄之亲，但限于“君臣之礼”，不经过“召见、请见”的手续，就不能随便到溥仪所住之处（在宫内如此，到北府后仍是如此），只好由我五伯亲自出马到“树滋堂”担任这项“监视”工作。像我五伯那样不善于应付一切事务而又怕事的人，怎能做好这种工作呢？郑、金虽然在“树滋堂”常和溥仪谈话，及至见了我五伯则闭口不言，溥仪也“王顾左右而言他”。我五伯去了两天，见毫无作用，就到大书房气愤愤地与我父亲和载泽说：“我去了他们就不谈了，简直没法办，只好听彼等所为罢！”

14日以后，相继得到情势缓和的消息。庄士敦传来的消息说，有些位公使已得冯玉祥将军的答复，对溥仪的安全决无问题；恢复自由日内即可解决。又如冯恕、张文治等也先后回京说，段祺瑞、张作霖已与冯玉祥交涉好了，不但要保障溥仪安全，驻守北府的冯军日内即可撤去。段、张还表示，对黄郛内阁所修正的清室优待条件不能同意，等他们到京之后，对溥仪的居住问题一定要妥善安置。

从17、18日起，驻守府门的冯军已日渐减少，由警察和保安队前来接替。门禁也更加放宽，年轻人也可以自由出入。往来信电，既不检查也不扣留。这一时期，从表面来看却呈现出一种暂时的小康状态。然而

在内部，郑、金、罗等人日甚一日地加紧进行阴谋活动。最后，溥仪的命运也就完全被他们所掌握了。

引狼入室

郑孝胥得与溥仪接近并当上了总管内务府大臣，可以说是由陈宝琛一手造成的。据说（我不十分清楚）郑在上海时，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事，兼以卖字为生，由于生活景况不佳，把在上海的住房卖掉来到北京，想从政治上捞它一把。可是他那如意算盘连遭失败，就不得已而思其次地找到陈宝琛之门。陈、郑既是旧雨，又是同乡，就把郑引荐宫内。当时有些遗老们对于郑有些看不起，因为他既非翰林，又不是前朝的高官大吏，就有人说他是“暂隐清宫，待机而动”。

漩
涡
沉
浮

郑到宫内大约是1923年左右（已记不甚清了），最初说是给溥仪讲书。由于他的巧言善辩，逐渐得到溥仪的宠信。从旁又有陈宝琛的大力支持，不久就一跃而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为的是叫他改革内务府多年以来的腐败积习。当时这个“小朝廷”，在“圣旨”不出神武门，“封官”只限内务府的情况下，总管内务府大臣竟有绍英、耆龄、宝熙、荣源、金梁和郑孝胥六位之多，这也是“回光返照”下的盛极一时罢。郑到任后，还想大刀阔斧地认真整顿一下，无奈内务府早已病人膏肓，已到无法救治的地步，再遇到一个利欲熏心的郑孝胥，更弄得一塌糊涂了。

内务府的职员，大都是世代相承的职业，由于世代贪污，积累的家资有的甚至驾于一般王公之上。自从派了郑孝胥以后，因为他以汉人而充内务府大臣，由绍英以至大小官员，都抱不满态度。他们纷纷议论说，这几位新贵实难伺候，我们回家抱娃子去罢。不少家资富有的官员们都相继辞职，甚至有的就不辞而别了，连承上启下最主要的堂郎中，竟悬缺无人。郑还想利用此机，就把他既亲近而又同乡的佟济煦补为堂

郎中，但内务府已成头重脚轻、有官无兵的局面，郑只好徒唤奈何而已（当时我岳父增德任内务府卿，对我讲的这些情况）。

郑孝胥对各方面的拉拢手段，也是八面玲珑。由于他到京未久，尚未孚众望，因而对陈宝琛、朱益藩这两位帝师，真是恭维备至，百般讨好。尤其是对于陈宝琛，他知道溥仪不但对陈是非常敬重，并且对陈所说的话也是百依百随。我记得每当溥仪做出任何人都不能劝阻的事情时（其实都是些琐事），总得请陈师傅上殿才能挽回。所以郑对陈，总以后辈自居，颇得陈的信任。在王公方面，他很愿意和我父亲交结。可是我父亲一向不爱和那些骚人墨客往来，总说他们“酸气”；偶然相遇，只是敷衍一下罢了。他见此路不通，就和溥儒、溥忻（贝子，号雪斋，书画家）常以吟诗弄墨互相往还。郑对庄士敦也是特别拉拢。他知道溥仪对庄士敦所说的话也非常听信，就借着与庄士敦互相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佛学为名，彼此之间十分友好。庄士敦时常对人称赞郑在遗老之中，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由于郑孝胥用的这种八面玲珑的拉拢手法，果然很快地就取得了上自溥仪下至王公、帝师、遗老旧臣们的相当重视。

当时，郑孝胥还利用他的政治地位，由他的两个儿子郑垂、郑禹（皆精通日语，与日本使馆方面早有联系）逐渐和日本使馆方面勾搭起来。还不止此，我记得溥仪正在北府时，溥忻在大书房对大家说：“段祺瑞快要到北京就任执政组织新内阁了。听说已然内定郑苏戡（孝胥字）不是教育就是交通总长。”不移时，郑也来到。溥忻赶忙上前，连呼苏老，预祝他将荣任总长。郑满面得意地说：“还没发表。”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发表，可见郑、段之间也有相当的拉拢。郑之为人，若从他的外表来看，却像是个道貌岸然的学者，其实却是一个野心勃勃、十分险诈的投机分子。

郑孝胥的政治投机眼光却也不容轻视。他也看出当时在国际方面，

有虎视眈眈、早想侵吞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国内方面，在军阀互相残杀的混乱局面之下，各地不仅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强烈幻想复辟的活动分子，甚至还有一部分幻想复辟的军阀和政客，特别是在东北奉系势力范围之内。因此，郑把溥仪早看成是“奇货可居”，怎能轻易地放手呢？他看见溥仪到了北府之后，对外应付差不多都由我父亲和载泽来处理，他认为溥仪又落到了王公之手，更是格外眼红。为了达到他的阴谋目的，为了把溥仪垄断到他一人之手，首先必须离间溥仪和王公之间的关系。这时，他一方面积极地拉拢陈宝琛和庄士敦，为的是容易劝说溥仪离开北府；另一方面，他暂时和罗振玉、金梁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为的是把溥仪引诱出北府之后，再由他一人独揽大权，进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阴谋复辟的活动。果然，由于溥仪少不更事、胸无主见，当时又处在那种险夷难测的环境之中，就使郑孝胥的阴谋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郑孝胥阴谋得逞

郑孝胥的阴谋活动能以得逞，却也不是偶然的。他不仅了解并且也掌握了当时的客观情况。先以溥仪个人来说，由于他自幼即住在那深宫之内，不用说对社会上的一切事务缺乏经验，就是家族间的长幼称呼他都弄不清楚。其实，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就以我这个封建家庭的王公子弟来说，在进宫念书之前，还要先跟我父亲和年老的太监学习好多天的宫廷语言和礼节。及至我初次到宫内的时候，感到宫内简直可以说是“别有洞天”，紫禁城内和紫禁城外虽只一墙之隔，却像把人带到纯封建社会时代一样。我看见溥仪从养心殿到毓庆宫来念书的时候，虽然是短短的几步路，还要端坐在一乘明黄色的小轿之上，由两个太监抬着他。轿子的周围，还有成群的太监前呼后拥，叫人看起来，有些“神圣不可

侵犯”之感。据太监们说，这是皇上的尊严，宫廷的体制。我初见溥仪时，他穿的是长袍马褂，背后垂着一条长长的辫子。据太监对我说：“万岁爷（宫内太监都是那样称呼溥仪）的穿装打扮可跟从前大不一样了，维新多了。”看他们说话的表情，带有过于“维新”的意思。太监们见了我总是讥笑地说：“哪有府里的爷们不留辫子的。大概念洋文就不留辫子了。”当时，如陈宝琛、朱益藩以及毓崇都有辫子。每逢我们遇在一起时，我总感到有些局促不安。当时，王宫内所保持的那种封建气氛，确实极端浓厚。溥仪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与辛亥革命前的皇帝生活完全一样。

自从庄士敦到宫内教授英文之后，在书本里面或言谈之中，溥仪才开始接受了一些比较新的知识。例如他感到那条辫子过于腐败，同时也看见我没有辫子，后来他就不顾许多人的劝阻，违反了“祖宗家法”，毅然地把那条永不许动的辫子剪掉。其实，这本是一件小事，可是当时在宫内就成了一件“翻天覆地”了不起的大事了。又如庄士敦对于太监颇为厌恶，时常对溥仪说：“现在只有中国还有太监，实在太腐败了。”当时，宫内太监的腐败情况也确实相当严重，因而在1923年前后（详细年月已记不甚清），溥仪就把宫内太监裁撤（关于裁撤太监的一切经过，因与本文无关，将来另文记述）。在这一段时期，我感到他似乎有些厌恶宫廷的腐化生活的表现。

我和溥仪，由于相处日子一长，渐渐地就不被那种“君臣之礼”所限，后来也就无话不说了。我记得有两次我和溥杰要出宫回家的时候，溥仪很不高兴的样子对我们说：“我真羡慕你们两个人这样出入自由，实在比我这样钻在宫里强的多了。”有时我们也谈到将来出洋留学的问题，幻想着怎样一起到英国去念书。就是到了北府之后，他也和我们说过：“这可好了，今后我也是一个平民了，将来我们能够随便出去的时候，我们想到哪里都可以的。”

毕竟由于溥仪从小就受的是那套完整的、道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教育，并且也习惯了那种宫廷式的生活，不能不说是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后来他虽接受了一点比较新的思想，也仅仅就是那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那是毫无所补的。因此，溥仪在出宫之后，依旧不肯扔掉他那“皇帝”架子。在他周围的王公、遗老旧臣，依旧把他奉若“至尊”，依旧偷偷摸摸地行那“君臣之礼”。最可笑的，把被逐出宫来到北府的溥仪，美其名曰“皇上蒙尘”。虽然，溥仪口口声声说，愿意做一个平民，可是他所说的平民，似乎是一个不失掉皇帝身份的平民。而王公、遗老旧臣们也 and 溥仪所想像的完全相同，只要溥仪不失掉皇帝身份，大家还谨守“臣节”，这就心满意足了。当时，在王公、遗老旧臣之中，许多人虽没搞什么复辟活动，可是对复辟也不持反对态度，并且对那套封建制度还有些依依不舍。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阴谋复辟分子们，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到宫内之后，看到溥仪和王公之间的隔阂是十分突出的。一般的王公更不必提，就是近支王公也要比遗老旧臣们疏远的多。例如，溥仪和我五伯载沅虽是父子之亲，可是见面谈话时是非常客气，时间也很短。我在旁边也听过几次，谈话的内容，每次总离不了天气的冷暖，和日常生活上的饮食起居等等那些细小问题。我从来没听到有关时事方面或其他比较重要问题的谈话。溥仪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在王公之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有时也把我父亲找进宫内，对于他个人的某些问题或是宫内的婚丧等事，互相商议处理，可是也不能开诚布公地来谈。遇到彼此不好谈或是意见相左的时候，就叫我做一个传声筒。如我六伯载洵（载沅胞弟，贝勒），虽然和溥仪也是叔侄关系，可是在我的记忆里，他和溥仪坐在一起谈话的事，简直一次也想不起来。其他王公有极少数还见过面，大多数溥仪根本就不认识。当然，其中也有历史原因存在，不需多述。仅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从辛亥革命以后，王公们在

宫内已无任何职守，大都在各人府邸之内养尊处优。按宫廷制度，王公们如不经皇帝召见或是有事请见，谁也不敢随便进宫；而且皇帝对于王公们的礼节规矩，向来是比对汉族大臣的要求更为严格，真有动辄得咎之感。所以王公们对进宫去见皇帝都视为畏途，就是有事想去见的，也怕偶一不慎，闹成“失仪之罪”，还是不如不见。因此，就造成溥仪和王公之间极端隔阂的现象。

我还感到溥仪对待王公，总认为多半都是无能，带些轻视的态度。这也并非偶然的，其中却有些原因存在。我曾听我父亲和长辈们谈过辛亥革命前夕的一些情况。据说，当时西太后和王公大臣们，对于清朝行将灭亡的那种混乱的政治局面，丝毫不加过问。只是一心一意地研究京剧。宫中府中，每日锣鼓喧天，昼以继夜。有些王公们都能粉墨登场，时常演到天已大亮，来不及把脸洗净就得进宫应差。那时，官府之中的京剧可称盛极一时。辛亥革命后，一度销声匿迹，民国3、4年后又开始活跃起来，几乎每月轮流在各王府都要演出几场。如溥侗（字西园、溥伦胞弟、镇国将军、别号红豆馆主）对京剧、昆曲造诣殊深，在王公票友中，可称手屈一指。像我六伯羲洵、我父亲和溥伦等人，对京剧艺术，也有相当的水平。我在七八岁时，就随我父亲登台演戏。当时，蒙古王公也时常参加演出。后来发展到和京剧著名演员如尚小云、杨小楼、郝寿臣等合作演出，因此，王公们演戏的名声真是哄动一时。

还有对京剧不爱好的王公们，像溥忻、溥儒等就以琴棋书画来自娱。他们不仅在书画上有相当的水平，就是在古琴、曲艺上也有研究。还有不少王公们，因在民国初年府内遗有余资，饱食终日，尽情追求享乐。在旧社会时代，对于戏曲十分轻视，尤其是以王公贵胄的身份搞这些文艺活动，更与人以口实。因此，不但在遗老旧臣方面，就是满族群众中间也经常听到带有讽刺性的谈论，说辛亥革命前由于亲贵当权把清朝已然断送了，现在这些王公不是琴棋书画就是粉墨登场，因此结论总

是“不务正业”。这种论调，由遗老旧臣以及宫内太监的口中，很自然地就传到了溥仪耳内，因此溥仪对王公的看法就是懦弱无能、不务正业了。

18日以后的北府，虽然情况缓和，在表面上呈现一种平静状态，但在内部里却由于郑孝胥等的积极活动，很快地就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在这时，由北洋政府和清室双方已经成立了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清室方面组成了一个以载润为首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有绍英、耆龄和宝熙等约六七人（人数、姓名已记不清了）。北洋政府方面有李石曾、张璧等多人（也记不清了）。每日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岁费、皇室私产和清宫管理权等问题，特别是在岁费数字上争执不休，毫无结果，后来就成为胶着状态。王公方面的主张是：一面开着这个善后会议，另一面是已经得到段祺瑞、张作霖即日到京的消息，等段、张到京后再商讨解决办法。

此时郑孝胥和金梁二人在紧密勾结下，几乎每天轮流到北府与溥仪进行密谈，有时也在一起吃饭。当然，他们所谈的内容我是不得而知，可是，从溥仪的言行上，我完全可以看出，他和初到北府时对我父亲和载泽的态度是大相径庭。他不仅和我父亲他们日益疏远，就是在谈话中也带出不满的意思。我记得他和我说：“你阿玛（满族称父亲为阿玛）和载泽他们总是叫我看一看、等一等，不知要等到何时为止。夜长梦多，将来不定又起什么变化。”当时，我对溥仪的谈话颇表同情，殊不知已中了郑、金等离间之计。更因溥仪一贯对王公们的轻视，认为看看、等等这种办法，就是懦弱无能的表现。这样，就使郑、金的诡计迅速地取得成功。

同时，郑孝胥对陈宝琛、庄士敦也积极进行拉拢。有一天庄士敦叫我到他家谈话，大意是说他已经和郑、陈商议过，他同意郑的意见，早日使溥仪离开北府，另找一个安全的住处，叫我父亲好好考虑一下。因

为庄士敦和我父亲感情很好（庄士敦进宫内教英文，是由我父亲所介绍），所以才把这话透露出来，并不是郑叫他说的。我和我父亲说了之后，经过大家商议，结果还是看看再说。庄士敦听了之后，对王公方面的主张也表示不满。郑孝胥和陈宝琛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当然陈对郑的意见也表赞同。后来，陈和庄士敦帮同郑、金使溥仪离开北府起了很大作用。

老谋深算的罗振玉，却与郑、金的作风完全不同，我没有看见过他和溥仪进行秘密谈话。有时他也到大书房，和王公们谈些他怎样和段祺瑞以及其他方面交涉的情况，对溥仪早日离开北府的话，是只字不谈。其实，他不但在背后与郑、金互相勾结策划一切阴谋活动，并且和日本使馆方面早已取得联系，直到溥仪到了日本使馆以后，他的狰狞面目和阴谋计划才暴露出来。

一阵怪风，身陷魔窟

24日以后，由于段祺瑞、张作霖相继到达北京，北府大书房内此往彼来，情况十分活跃。王公这方，有我父亲和载涛分别与段、张会谈，商议各项急待解决的问题。他们回来后，总是喜形于色。有一次他对大家说，段、张对冯玉祥所修正的清室优待条件也不同意，将来可能仍旧履行原来的优待条件，他们正在研究中。遗老旧臣们也是纷纷向段、张接洽，答复也大致相同。在大书房多日未曾出现的金梁，也得意洋洋地来向大家说，他和张雨亭有很深的关系，他已经和张商妥，仍照原来条件办理，想段方也无何问题。当时大家对前途非常乐观。

从25日起，驻守北府的冯军全部撤走，只由几名警察担任守卫，出入无阻，已回复了常态。这时，北府之中，无不欢天喜地、颔首称庆。就连多日以来愁眉不展的我五伯，也是面带喜色。这时，在大书房又聚

集了不少遗老旧臣和王公们，开始商讨起溥仪的将来许多问题。抱极端乐观主义者说，既是能够履行原来的优待条件，就是恢复11月5日前的状况，请溥仪还宫恢复帝号，有的主张应该退居颐和园。也还有人说，在北京市内买一所房居住，免得再蹈这次的覆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还是毫无结果而散。这时，来的王公比先前也多了。我父亲和载涛就想了一个“久安长治”的办法，由他二人各率几名王公，轮流在北府值宿，认为一切问题既告解决，勿论郑、金进行任何活动，也不会发生其他意外之事。其实，王公们对溥仪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就像蒙在鼓里一样。

26日傍晚，我和溥仪正在“树滋堂”闲谈，忽然有人进来说郑孝胥陪同大夫来了。我当时感到非常惊奇，知道溥仪并没有生病。此时，郑和他的儿子郑垂陪同两个身着西装呢帽戴到眉上的人进来，与溥仪一同到内室去了。我因一时好奇，在室外偷听了半天，由于他们谈话声音很低，什么也没有听到。时间并不太久，仍由郑氏父子陪同这两人匆匆告辞而去。这次会见是否与溥仪预先约定，我始终不得而知。饭后无人时，溥仪才对我说：“刚才来的是日本使馆武官（或许是参赞，已记不清楚）和一个翻译，他们对我住在北府也感到很不安全，最好是先到交民巷，他们一定帮忙再给我找一个安全地方居住。”溥仪还说：“我也考虑过，段、张的话也不能使人完全相信，一旦再有变化，再想走也走不成了。我打算在这两三天内，先到交民巷。你们暂时还留在北府，等我有了一定的住处时，你们再找我去。”最后，他还再三叮嘱说：“这件事非常重要，在我未走之前，千万别对王爷（指我五伯）和你阿玛说。如果泄露出去，不但我走不了，生命还有危险。”我从来对溥仪所吩咐的话总是奉命惟谨。因为从我幼小的时候，就被那种封建礼教所渗透，在思想之中就知道“君父之命”必须无条件地去遵守。到了宫内之后，也听溥仪对我说过，官里的事情不能随便到外面去说，而且我和溥仪感情

素笃，尤其是我对于溥仪、庄士敦所说的不能久居北府的意见，认为是非常正确。对于我父亲和其他王公所主张的在北府听候解决的意见，认为是保守。这样，对我父亲尚且守口如瓶，其他王公更是毫无所知了。

当晚，溥仪和我，还有两三名外随侍，就把从宫内所带出来的珠宝等整理在一个手提箱内，准备溥仪走时携带方便。溥仪忽然想起他最为珍视的一颗珍珠“顶珠”没有装在箱内。他说是放在卧室床头柜的抽屉内，及至我们取时，这颗顶珠竟然不翼而飞了。事情是这样：10日派人到宫内取东西时，有外随侍严桐江，趁众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把这颗顶珠从朝冠上取下藏在怀内。到了北府之后，我亲眼看见严桐江把它交溥仪之手。这颗顶珠很大，长约有市寸二寸左右，其形仿佛橄榄核，色泽莹润非常，从来我没有见过那样大那样好的珍珠。据说是从康熙时代传留下来（当初恭王溥伟对我谈过这颗顶珠的历史甚详，我已忘记了），历代皇帝对此珠非常重视，在大典（如元旦受贺）穿朝服（与一般袍褂样式不同）的时候，朝冠上那颗顶珠就是此珠。平时是不戴用的。北京旗人口中很早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别看我戴的是白顶子，连皇上还带白顶子呢。”清朝白顶子的品级很低，有人轻视时，就爱这样说，意思是指此珠而言。可见这颗顶珠确有相当长的历史。我们找到深夜，仍然是杳如黄鹤。严桐江就说，他在宫里听老太监们说过，这颗顶珠是颗宝珠，很早以前，每当皇帝有了灾难的时候，例如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及辛亥皇帝退位，这颗顶珠都曾不见了。等到灾难时期过去，皇帝再戴用的时候，它自己又回来了。我在宫内时，也听太监说过这样的话。当时我们迷信很深，认为这颗奇异的宝珠“它又走了”，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次晚，溥仪对这颗顶珠还是念念不忘。我们又开始寻找起来，“树滋堂”内真是翻箱倒柜重寻了一遍，结果，把这颗所谓能够来去自如的奇异宝珠在一只装衣服皮箱内找到了。当时，真是如获至宝，欣喜非

常。其实并不是这颗顶珠会不翼而飞，原是溥仪平素有些马马虎虎，对任何物件到处随便乱置的缘故。在宫内像这种迷信传说，真是不胜枚举。为的就是把皇帝说成是“天神”一般，天下的奇珍异宝都是为皇帝一个人来享用的。这就是历来封建统治阶级所常玩弄的一套鬼把戏，用来以迷惑人民。在伪满时期，每逢阴历元旦，我还看见溥仪偷偷地穿上朝服，戴上这珠顶朝冠，在祖宗牌位前行叩首礼。现在这颗宝珠一定回到人民手中来了。

29日正午稍过，正当狂风怒吼、尘沙蔽日的时候，陈宝琛、庄士敦和郑孝胥一同来到北府。他们低声地和溥仪密议了片刻，就吩咐把溥仪的汽车开到阿斯门外。溥仪临行时对我们说：“我现在就到交民巷，住处还没找好，皇后和淑妃先不要去，等我找好了住处之后，再派人接她们来。你们以后再找我去罢。”说罢，由陈、庄、郑三人把溥仪围在中间，匆匆离开北府登车而去。

溥仪走了很久之后，消息才传到我祖母那里，她当时就把我叫了去。我从来还没见过我祖母那样严厉的态度，她问我：“你整天和皇帝（我祖母向来称溥仪为皇帝）在一起，为什么事先也不和我说一声，也好叫他把皇后、淑妃一起带走呀！”我五伯和我父亲也追问我，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溥仪的妻妾也流着眼泪向我追问。我当时感到十分尴尬，只好欺骗我祖母他们说：“事先我真是不知道。临走时，说到交民巷，究竟住在哪里我也弄不清楚。”我趁大家议论中间，就悄悄地溜出去了。

傍晚，给溥仪开车的（姓黄，原来给我五伯开车）回来说，他把溥仪送到交民巷德国医院（即今北京医院）之后，等郑孝胥和庄士敦出去接洽了许久，后来就把溥仪送到日本使馆里边去了。他还说：“在途中还有一辆坐有军人的汽车追赶他们，直到溥仪的车开进交民巷才不见了。”据黄所云如此，不知确否。

溥仪被这阵狂风送入了魔窟——日本使馆以后，完全被这群恶魔所迷惑，并且是愈迷愈深，直到后来，就连个人的命运也任凭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复辟分子们随意摆布。

日本使馆中的“火并”

12月3日下午，我初次到日本使馆去见溥仪。他住的是一座二层楼房。据说，这里原是芳泽（日本驻华大使）住的，临时迁出，让给溥仪居住。有几名改穿便服的护军在那里担任传达和一切勤杂事务。我告诉他们要见溥仪。有一个护军（原任队长，姓名已记不清楚）和我很熟，低声地告诉我说：“这里可跟北府不一样了，什么事都必须先和郑孝胥、罗振玉说一声，不然他们要申斥我们。”我听了之后，感到十分不痛快，可是到了日本使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到楼上见了溥仪，他脸上带着不愉快的样子说：“我来到日本使馆以后，感觉很不方便，就连院子走走都不随便。每天郑孝胥、罗振玉他们总是为了争优待条件在我这里吵个不休，实在烦闷极了。以后你还是常到这里来，我们好随便闲谈一谈。”我说：“到日本使馆来很不方便，等过几天再来。”当时，我感到郑、罗对溥仪的一切事务把持的相当厉害，我就不想再去了。

大概是在8日或9日，溥仪又找到我到日本使馆去。自然要先和郑、罗说一下。我记得那天还有三四个王公和几个遗老一起要见溥仪，罗振玉就正言厉色地向我们说：“这里不同在北府，每天来的人太多，对于使馆治安上很不相宜。我已和使馆方面商妥，今后有事要来的就在星期三、五两日；其他的日子要来，就必须经过使馆方面许可才能进来。”众人听了就都悄然散去。我到楼上，溥仪一见面就和我说：“这几天实在把人住腻了，可是北府也不能再回去了，我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里。”他还说：“这两天罗振玉、郑孝胥和金梁他们争吵得很厉害，前两天他

们大声嚷嚷，连我在楼上都听见了。”溥仪还叫我时常到这里来，我就把罗方才说的话向他说了。他完全不知道有这事。我们相对愀然。在无可奈何中我就辞去。这就是在溥仪离北京前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

我到楼下，那个护军对于这几天的经过十分了解，他就向我作了介绍（其中也有事后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情况大致是这样：自从溥仪到了日本使馆以后，郑、罗之间无日不在争吵。因为溥仪住在日本使馆，是由郑所接洽，郑自然要独揽大权，凡事都由他与日本使馆来联系。不料从中又出来一个久居大连、被日本帝国主义豢养多年的罗振玉，当然要比郑受到日本使馆的重视和信任。因此，使馆方面有事联系时，总是找罗而不理郑，郑自然是不服气。最初，郑、罗之间在表面上只是借着争论优待条件的意见不同为名互相争吵，到了6日、7日，就成为对溥仪居住日本使馆这件事互相争起功来。最后，二人是拍案大骂，声达户外。但罗已胸有成竹，他知道郑背后有陈宝琛给他撑腰，因此他来到日本使馆后，就电召升允来京。（辛亥革命前，升允任陕甘总督，辛亥革命后即逃往日本，在东京曾开设一座饭馆，取名“陶陶亭”，名为谋生，暗中勾结日本军人、政客和浪人之流，积极进行复辟阴谋活动，我在日本读书时，略闻其事。）升允在当时，不仅在遗老旧臣中颇负声望，并且他和溥儒有翁婿关系，所以和王公们也比较接近。升允到日本使馆见了溥仪之后，不仅在优待条件上完全按照罗的意见办理，特别是日本使馆方面，对罗更加垂青。郑知道不能与罗争锋，就一怒而去天津。“火并”这一幕，就由罗取得一时的胜利而告结束。

1925年1月24日是阴历元旦。这一天，日本使馆准许人到使馆与溥仪拜年。我跟随我父亲到了使馆，约有四五十人，除王公四五人外，余者尽是遗老。我们都到楼上一间大厅里排班站立。溥仪出来之后，众人齐向他行三跪九叩的“君臣大礼”。正当举行“朝贺”最严肃的时刻，在朝班中只听“嗵”的一声怪叫，立刻打破了这严肃的气氛，秩序陷于

混乱状态。众人趋前一看，见金梁匍匐在地、号啕痛哭。当由几名护军将金梁抬下楼去。这一场风波过后，众人也未待礼成，就纷纷狼狈下楼而去。当时，议论纷纷。迷信家说，在这样隆重大典中号哭，是“不祥之兆”。也有人说金梁是沽名钓誉，当众显示忠贞。还有人说金梁见郑孝胥一走，他当然有兔死狐悲之感。我认为最后的这一评论，虽然带些讽刺性，但还确切。

2月5日，我跟随我父亲又到日本使馆祝贺溥仪的生辰（在宫廷也是大典之一，称为“万寿”）。这次倒是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行礼如仪后而退的。我两次来祝贺，并没有和溥仪单独见面。我知道他平素非常胆小，自从听了罗振玉那番话以后，再不敢找到日本使馆去了。因此，在溥仪离北京前，我们再未见面。

我在最后这一次到日本使馆，有两件值得记述的事。首先是：参加祝贺的人群中，王公来的简直是寥若晨星，而遗老方面则是成群结队。大概由于遗老之间互相援引的关系，有不少都是从来所未见的人，真假遗老，实难辨别。甚至还有三四十岁的人也参加在遗老行列之内。据说这里边有遗老之子和冒充遗老的。有人称这些人为“遗少”，也颇耐人寻味。自溥仪出宫以后，由于不受宫廷的限制，这种难分真假的遗老人数，确是方兴未艾。其中也出现了不少阴谋复辟的分子。其次是：在溥仪左右，除了狰狞跋扈的罗振玉和胁肩谄笑的佟济煦外，又增加了一个胡嗣瑗。听说他是张辮帅（张勋）的人幕之宾，由万福棊引荐而来的。张勋复辟时，胡曾在幕后为张筹划一切，后来论功行赏时还做了两天内閣閣丞。胡为人外似刚直，内颇阴险，自他来到日本使馆以后，颇得溥仪的信任，大有言听计从、如鱼得水之概。他在郑、罗之间，总是看风使舵、朝秦暮楚。郑、罗“火并”的一幕，罗能取得暂时的胜利，胡从中也出力不少。从此以后，胡不但极力排斥王公，就连陈宝琛和不顺从他意旨的遗老们也在排斥之列。特别是溥仪的行动，多为胡所左右。真

是魔窟之中又多一巨魔。

隔了两天，我到庄士敦家中。他一见面就十分气愤地对我说：“我被郑孝胥所欺骗了。”情况大致是这样：庄士敦对郑与日本使馆早有联系一层，他事先毫无所知，他本想与郑合作把溥仪接入交民巷德国医院之后，由庄士敦向英国或荷兰使馆联系住处和其他一切善后办法。哪知在庄士敦联系好了以后，溥仪已由郑接到日本使馆去了。最后，庄士敦对我说：“他（指溥仪）到了日本人手中，恐怕不会再放他出来了。”庄士敦这一句话却有些“先见之明”。他见事情已无法挽回，同时又失去了“高官厚禄”，为期不久便把汽车家具等变卖之后，就悄然返回英国去了。

大概在24日，在日本使馆的那个护军来见我父亲，说是溥仪在23日夜，利用日本军队瓜代的机会，化装称为日侨逃往天津去了。我父亲听了之后，很不痛快地对我说：“已然被遗老们所包围，到了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也只好徒唤奈何而已。

写到此处，我的这篇叙述暂且告一段落。

三·一八：“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楚溪春

1926年春，我在北洋军阀执政府卫队旅担任上校参谋长，当时旅长是宋玉珍中将（此人解放后三四年在北京病故）。

当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半个月，已经有几次学生游行，反对外人欺压我国，均未出事故。那几次学生游行，都有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的大刀队在两旁随行。三一八惨案前一天，卫队旅接到上级命令说：第二天学生要在天安门前开会，会后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请愿，要我们旅告知守卫官兵到吉兆胡同和执政府（即原海军部，今张自忠路人民大学东边那座楼）分别严加戒备，并一再叮嘱在与学生接触的时候要万般忍耐，打不准还手，骂不准还嘴，以免发生意外不幸事件。当时又听说，这次游行北京警卫司令部没有派大刀队随行，因为鹿钟麟带着队伍到天津与奉军作战去了。旅部当天晚上就召集卫队旅负责警卫的军官们训话，按照上级命令执行任务。

第二天，即3月18日下午，为了怕学生开会后到吉兆胡同请愿，闹出事故，我便亲身到吉兆胡同布置警备事宜；执政府那边，派当时卫队旅少校参谋王子江去布置警备事宜。布置时要求警备部队前几排的士兵不许扎皮带，以免接触时发生无理的殴打；中几排的士兵可扎皮带，但

不准拿武器；后几排的士兵才许带武器。守卫执政府的是卫队旅第一团第三营。

我在吉兆胡同段宅等候很久，计算时间，游行的学生队伍早该到来了，可是还一直毫无消息。我就想用电话去问执政府，但是我把耳机子刚拿下来，就听见西方传来几声枪声。我想那方面一定出事故了，没有来得及摇电话，就坐上汽车奔执政府而去。当时段执政的侄子段宏纲还劝我不要去，我说：“恐怕已经发生误会了，我不能不赶紧前去做处理。”我坐车走到东四牌楼十条中间的时候，看到很多学生手拿小旗，满街满巷，迎面跑来，有没戴帽子的，有满脸泥土的，有不穿鞋的，有的大声喊叫：“真厉害呀！真厉害呀！”因为人太拥挤，汽车不能再往前开，我就下车向西步行。出了十条西口，就到执政府大门前，进了东辕门，看见约有十几个学生被打倒，满身是血，有的还在呻吟。卫队旅的警卫士兵还在端着枪四下搜寻。我当即吹哨命令士兵赶快集合到营房里去，大声命令他们：“赶紧回去！”

官兵正在集合回营房时，北京警卫司令部代警卫司令李鸣钟和当时在警卫司令部担任对文化教育界的联系工作的李秦棻也坐汽车同时赶到。李鸣钟见到我时，神态很惊慌，说：“晴波（我的号），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我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于是我随李鸣钟马上坐汽车赶回吉兆胡同段宅看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在同吴清源下围棋，见我们两个人进屋后，马上声色俱厉，大声对李鸣钟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鸣钟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祺瑞接着对我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我和李鸣钟赶紧退出。我们离开段宅，就分手走了。

那一天是阴天，天上飘着小雪花，当我再经过执政府门前时，就看见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摆在执政府门前。

当天晚上，我们卫队旅奉命严加戒备，幸而平静无事。

过了三五天（日期记不清了），司法部、高等法院、陆军部联合组成了一个处理这个案子的机构，要我们卫队旅派人去对质作证。我当时因为另有一个重要会议，打算找少校参谋王子江去出庭对质，因为他当时正是负责在执政府门口指挥警卫的人。当我面告王子江时，他神色不定，连声说：“我不能去，我不能去，还是请参谋长去吧！”我当时莫名其妙，不知他为什么这么害怕胆小。稍后，上尉军械员邱霖（现是北京市民革成员）偷偷告诉我说：“寿图（王子江号）不能去，您知道开枪时的实在情形吗？”我说：“我不知道当时实在情形。”他说：“当学生向执政府门口拥挤时，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当时士兵曾被迫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门口时，寿图就命令附近的士兵：‘开枪吧！’他原来的意思是想叫士兵向天鸣枪，把学生吓跑了就算了，不料东西辕门的守卫士兵就真的平射起学生队伍来了，以致酿成当天的惨案。”我这才彻底了解了具体情况。既然没有人肯去出庭作证，我只好自己去了。

当时为了颠倒是非，旅部就开会决定，马上找来几支旧手枪，说是学生们的凶器；又找了几把笞帚和几个煤油桶，装了一些煤油，说学生拿这些东西准备放火烧执政府；同时还拿了学生们的各色纸旗子一大捆（这捆旗子是真的证据，我记得旗子上写着“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字样）；并且以执政府南面楼上玻璃被子弹打穿的圆孔作为学生先由南向北开枪的证据。这个圆孔是真的当场被打穿的，不过不一定是学生打的，也许是东西辕门的卫队士兵向北打偏了的。当时卫队旅也有一名士兵被枪弹打死，于是又以此来诬赖学生先开枪、卫队旅是被迫自卫开枪的。到底被打死的这个卫队旅士兵是怎样被枪弹打死的，我们也搞

不清，可能是混在学生群众中被流弹打死的。

陆军部、高等法院和司法部当然袒护段祺瑞卫队旅，偏听卫队旅这方面的一面之词。当时问案子的法官，我只熟悉一个高等法院法官蒋贡梁（直隶博野县人），其余全不认识。

这个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地结了案，官兵未受到处分，被打死的学生也就含冤而死，无声无息地被埋葬了。

以上的经过，是我亲眼看到的、听到的和亲身经历的事实。我今天追忆这一段历史事实，目的就是为了暴露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残酷与无耻。从这一段事实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动统治政权是怎样地在迫害、残杀爱国青年学生；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青年学生们在党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爱国运动，正如星火燎原，不管反动统治政权怎样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是始终扑灭不掉的，终于最后和党领导的全国人民革命力量汇在一起，将反动统治阶级埋葬。

“小扇子军师”徐树铮被处决真相

吴锡祺

徐树铮是北洋派安福系政治集团的中心人物之一，被称为段祺瑞的灵魂。1916年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任陆军总长的时候，徐树铮以陆军次长和参陆办公处（这个办公处，是执行大总统——陆海空军大元帅职权的机构）负责人的身份，执掌了军令和军政的大权。他为段运筹决策，有“小扇子军师”之称。段内阁一切重大措施，往往被他所左右。他在段的信任之下，独断专行，目空一切。当时一些趋炎附势的军人、政客，无不攀附这个段内阁的中坚人物。

冯玉祥虽亦出身于北洋系统，并且在第六镇任下级军官时曾经受过段祺瑞（第六镇统制）的赏识，与段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因冯秉性耿介，不随流俗；在政治上又有他自己的见解，不肯俯仰随人；而在治军方面，更是当时北洋军阀中一个特殊的人物，因此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嫉妒和歧视。又因为冯与陆建章有密切的关系（冯在第六镇时，陆为第六镇协统，对冯多所奖掖和提拔，并以其内侄女为冯妻室；冯在滦州起义失败被执时，得陆多方掩护，始免于难；陆任陕西督军时，冯亦率部随陆入陕，并由团长提升为旅长），而安福系的徐树铮等则与陆夙有嫌怨，因此，徐对冯始终抱有猜忌的态度。又由于冯在四川响应云南护国军讨

「小扇子军师」徐树铮被处决真相

伐袁世凯之役，认为他以北洋军人而附和南方，益为徐等所不满。

1916年秋，冯率第十六混成旅由四川调驻廊坊，徐树铮、傅良佐（与徐同为陆军次长）等即在驻地、餉项和被服等问题上多方与冯为难。他们借口财政困难，要裁减十六混成旅的兵员，接着又要将十六混成旅的一个团调往甘肃，借以拆散和削弱冯的实力。由于冯不肯接受这些办法，因而触怒了徐树铮，下令免去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务，以夙与安福系有拉拢的杨桂堂（过去曾任第十六混成旅的团长）继任旅长。冯的被撤，并非段意，撤职令下达以后，段始闻知，但又不便收回成命，乃改派冯为直隶南路巡防统领（巡防营为腐败不堪的地方队伍）。不久，张勋复辟运动起，冯始乘机回到十六混成旅，参加了讨伐张勋之役，恢复了旅长的职位。1917年，孙中山宣言护法，北伐戡乱，福建督军李厚基为护法军所击败，连电段祺瑞告急，段即派冯率部援闽。冯部开至浦口，即按兵不动；旋又改派援湘，冯复在武穴宣布独立，通电主和，因之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经曹錕从中斡旋，始改为革职留任，戴罪立功。冯在重大压力下，乃不得不率部开往湖南的湘西一带。1917年的冬天，徐树铮又在天津诱杀了冯的多年知遇长官陆建章。因此，冯与徐之间不仅存在着政治上的矛盾，而且还结下了私人的仇恨。

1924年10月江浙战争结束后，徐树铮因在上海不能立足，乃出国作政治活动。不久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为徐发表了考察政治专使的名义，叫他以段本人专使的身份在各国进行外交活动。徐在国外活动的期间中，从法国订购了一批军械，拟归国后以此为饵，联络孙传芳，打击冯玉祥，以巩固段祺瑞的政权。1925年12月初，徐刚一跨进国门，回到上海，就发表了恢复旧国会和拥段为总统的政治主张，并竭力鼓吹奉、直、皖三系联合起来，使北洋派趋于大团结，推段为惟一领袖。接着徐去杭州与孙传芳取得联系后，即北上至天津。在这以前，冯与段之间的斗争已日益尖锐化，冯并且命令北京警备总司令兼警察总监鹿钟麟逮捕

了安福系曾毓雋、姚震诸人，吴光新、朱深等亦逃往天津。段祺瑞知冯、徐之间恶感甚深，得悉徐树铮到津之讯，立即派人阻徐入京，免生意外。但徐并不以此为意，竟于12月27日入京见段，并且为了证实他的专使身份，还郑重其事地举行了一次向国家元首——段祺瑞公开觐见的仪式，以便于进一步向各国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活动。

在徐树铮到京后某一天，北京警备总司令部接警察厅电话报告：“在西直门车站发现形迹可疑者数十人，身穿便衣，暗携武器，由张家口来京，在西直门车站下车，请示处理办法。”警备总司令部当即命其扣押解送司令部处理，解到后方知是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带人来京进行暗杀徐树铮的活动。据陆承武说，他在张家口闻徐树铮由津到京，即请求冯玉祥助其为父报仇，冯即从手枪队拨给士兵20名，化装随同来京，拟伺机暗杀徐树铮，以报杀父之仇。

徐到京后，出入警备甚严，陆竟无从下手，乃请求鹿钟麟于徐来警备司令部拜访时预先通知，以便在门前予以狙击。鹿恐招物议，不允所请。12月29日，鹿得悉徐树铮在京事毕，定于是日乘车返津。鹿知陆承武行刺之事并未得手，即对人说：“陆承武连这点子事都办不到，亏他还带了这么多打手，真是‘癞狗扶不上墙去。’”随即以电话报告给驻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冯没有立刻表示意见。约两小时以后，冯才来电话告鹿：“处置徐树铮的办法，就是逮捕枪决！”鹿说：“这个问题太大”，冯厉声说：“天塌了有柱子接着！”时徐树铮所乘专车已由北京开出，鹿乃急命参谋处与丰台车站联系，得到的答复是：“车已开过丰台，计时尚未到达廊坊。”鹿又以电话向冯报告，冯当时尚有些犹豫。鹿说：“小徐一走，从此多事，如决心干他，仍可用电话命令张之江执行。”冯意乃决，即命鹿转达。鹿即以电话对驻在廊坊的张之江传达冯意，要张就地执行这一任务。张谓：“此事重大，不宜鲁莽。”鹿说：“这是命令！”张即派参谋张铨率卫队驰往车站守候。少顷，徐专车到站，张铨率卫队

士兵登车对徐说：“张师长请专使下车，有事面谈。”徐辞以无暇。张铎乃命卫队拥徐下车，甫出站，即执行枪决。

鹿得到廊坊电话后，立即派人告知陆承武，要他于当夜赶往廊坊车站。陆在梦中惊醒，知徐已被处决，即对来说：“还需要我去吗？”来说：“你不去怎么行？非去不可！”陆不得已，乃连夜赶至廊坊扮演了一个为父报仇的角色。徐树铮被杀的第二天，各报都登载了陆承武替父报仇的新闻，实际上北京警备总司令部早在事先拟就了这一新闻报道，借以掩人耳目。这一消息传至段祺瑞耳中时，段曾放声大哭。

距徐树铮被杀后 20 年——1945 年，徐子徐道邻拟在法院控诉冯玉祥非法杀害乃父，经人疏解，其事遂息。

翻云覆雨：蒋介石崛起之初 策划的一场阴谋

马文车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的前一年，1925年8月进行第二次东征时，我在东征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长兼军法处长；同年年底，二次东征结束，所有高级官佐大多调至卫戍总司令部，我则由蒋介石亲拟电稿致国民政府，推荐为潮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常来往于汕穗之间。此时，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兼卫戍总司令等职。他利用亲信爪牙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兹就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追述如下。

东征结束后广东政局概况

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统一了广东，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逐渐壮大起来，他的政治野心也就从此更大。因此，当时在军政领导方面就存在着以下矛盾：（一）蒋介石同汪精卫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二）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

孙中山先生在世时，蒋介石与汪精卫因工作关系彼此经常接触，有着一定的交谊。蒋、汪都是政治野心家，为了互相利用，结成换帖兄

弟。蒋称汪为“季兄”，汪称蒋为“介弟”。

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时又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虽在表面上予以辅翊，而在骨子里则是别有用心。但是汪精卫善于笼络元老派，一面又假惺惺地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故在当时尚有一定政治声誉。因此，汪就想大权独揽，特别是在人事任用方面，几乎一手包办，不会征求蒋的意见。于是，蒋介石为了同汪对抗，就在黄埔军校组成了一个所谓“孙文主义学会”，其中主要成员有教育长王柏龄，学生邓文仪、贺衷寒、缪斌等。后来，所有蒋的亲信，如陈肇英、欧阳格、徐枋、陈策、吴铁城等也都成为该会的重要分子。当该会成立之初，王、陈、吴等虽也曾请汪精卫去讲讲话，表面上装作对汪尊重，背后却经常造谣，挑拨离间，企图造成政局不安，并且支持蒋介石反俄、反共，其中最恶毒的是王柏龄。

当年的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心情是：一则恐惧，二则怀恨。因为蒋自认为“惟一军事家”，深知“有了军权就有了一切”。他在军事上植势之后，就一意孤行，要想实施独裁制度，压制民主，在一切措施上，一贯蒙蔽和欺骗群众。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日高，他很害怕共产党员会在军队里深得人心，由猜忌而恐惧而怀恨。所以在东征结束后，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企图把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排挤出去，特别是在原由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方面，他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

蒋介石阴谋制造“事变”

由于以上两种矛盾的存在，蒋介石蓄意兴风作浪，企图反俄、反共；同时打击汪精卫，使他应付困难，以利于排除异己，夺取领导地

位。有名的中山舰“政变”事件，于是发生。“政变”的制造者，其实就是蒋介石；参加策划的则有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王柏龄、陈肇英、徐榘、欧阳格、吴铁城、陈策、缪斌等。

陈肇英也是蒋介石的换帖兄弟，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情谊很深，是当时蒋的心腹人物之一。他职充虎门要塞司令，手下拥有几艘兵舰，平时常常假借职权，利用兵舰大做走私生意，获利甚多。当时有李之龙者，系海军局局长，品质超凡，作风正派。他发现陈肇英以兵舰走私一事之后，深为愤慨，就向汪精卫报告，经汪批准，由李出动海军制止，曾经将其人货一并扣留在海军局。由此，陈肇英与李之龙结下怨仇，就想寻事报复。

当蒋介石蓄意制造混乱局面，企图乘乱屠杀共产党员，同时逼走汪精卫的时候，陈肇英为了陷害李之龙，就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怂恿，推波助澜。大约是在蒋、陈和上述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通过密室策划后，隔不了几天，在3月17日早晨，从黄埔军校发出了惊人的谣言，说是“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谣传散布，引起人心不安，叫喊得最为热烈的是王柏龄，他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兼第一军第二师师长。

“事变”的经过

3月17日黎明，蒋介石突然由黄埔乘汽艇来到广州东堤八旗会馆——卫戍总司令部（原东征军总部）。先一天，我刚从汕头回到广州，因眷属尚在汕头，宿在该部秘书长房间里。他进入办公室同我碰面，我看他这次没有带便衣卫队，而其神气有些紧张。正在猜想间，他先问我：“你有没有听到特别情况？”

我答：“没有。”问他：“有什么特殊情况？”

他说：“中山舰开到黄埔，有阴谋。”

我说：“我没听到，是不是需要了解一下？”

他说：“不需要，我要回家看看。”说罢，就坐了汽车回东山公馆去了。

3月18、19两天，我都在卫戍总部休息，未曾出外。19日深夜时分（大约已11时左右），我已就寝，忽然由经理处派来了汽车来接我，要我马上去经理处见蒋校长，刻不容缓。经理处在广州火车站附近，我到达时，看到刘峙和蒋鼎文、惠东昇两个团长都在；还有陈肇英、徐桴、欧阳格等亦在座。蒋对我的说话很简单，只说：“今晚要戒严，卫戍总司令部的印信在哪里？”其时，卫戍总部因东征军总部成立后，大部分人员都已调开，仅留参谋长李章达及少数职员。我去汕头五、六个月才回来，情况亦已有些隔膜。我随口回答：“印信已不归我管，总在卫戍总部吧。”他要我立即去找来。于是我又赶回卫戍总部，唤醒有关职员，拿到印信交由蒋的侍从书记吴家送到经理处去。正在此时，卫戍总部参谋长李章达来电话询问：“今晚为什么要戒严？”我回答不知。李又说：“请你问问校长。”于是我又到了经理处，打听戒严原因。据欧阳格说：“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唆使中山舰开进黄埔，劫去蒋校长，送往海参崴转送莫斯科，该舰已于昨日窜泊黄埔水面，事态十分严重。刘峙和两个团长是前来接受命令部署军事行动的。”

戒严是在深夜12时开始的。其时蒋介石就在经理处亲作严密布置：他以兼卫戍总司令的职权，调动了较多的武装部队，而其主要的兵力却放在包围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包括“省港罢工委员会”，派惠东昇负责，以惠的全团兵力再加上广州公安局的武装警察，执行这一任务；出动时个个枪膛实弹，枪头上了刺刀，准备厮杀。派公安局长吴铁城率领一部分武装警察，执行包围汪精卫住宅的任务，名义上称为“保护”。派蒋鼎文率部占领海军局，解除该局的武装力量。派陈肇英和

欧阳格率部逮捕海军局长李之龙，并指定欧阳格兼负劫夺中山舰任务，并令暂代该舰舰长。蒋介石又亲自以电话命令第一军亲信的各师、团长，要他们将各该部队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立即加以扣押，并加派刘峙率部配合这一行动。蒋布置完毕，又匆忙地接见了滇军将领朱培德，密谈了约半小时，内容不详。朱辞出，已是后半夜2点多钟了。蒋即从经理处潜往造币厂（惠团团部所在地）隐匿。因为该处地段较为静僻，当时知道他所在的只有我和经理处处长徐桴。蒋走时，叫我仍回卫戍总部坐守，听到什么情况，随时打电话给他。

到3月20日早晨止，广州没有发现大量的火药气味，这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的。事后得悉：是晚亏得共产党机关和共产党领导人都能镇静从事，对惠团兵员及武装警察的骚扰，甚至于有个别开枪射击的，共产党机关绝对不予回击。这样一来，就逼使惠团官兵无法滋事。

戒严一直持续到3月20日上午，还没有停止。那时我在卫戍总司令部，深感此事没有如此严重的必要，并且这次“戒严”又没有通过国民政府。因此我想去看看汪精卫，但是汪的住宅已在“保护”的名义下受了包围，并且是蒋所不满的，不便前往。次而想起谭延闿，平素比较为蒋所尊重，因此我就到了谭宅（20日上午7时许）。谭问起“戒严”之事，他认为事态搞得太严重了，应该及时挽回；并且表示很想和蒋介石谈一谈，问我蒋校长现在何处。我不便即时据实告知，只说待我去联系一下即来回话。于是我又回到卫戍总司令部，与蒋摇通电话，告以谭的意见，蒋表示愿意和他谈谈。我又立刻赶去谭宅，和谭同车至蒋处。蒋在接见谭时，神色很镇定，表示可以和平解决，允即下令通知解严，并将惠东昇一团调回造币厂，暂负“侍卫”之责。

此时，蒋的亲信缪斌进来向蒋报告：“所有第一军的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已予一律扣押。”蒋在当时不作表示。谭和缪斌走后不久，惠东昇的部队刚开到，就有何香凝及周恩来相继而至。周等坐候多时，蒋始

出而接谈。这时，惠东昇在大门口把守，竟将周的汽车上卫兵的枪械缴去。惠对我说：“看他进得来，就出不去。”我说，“未奉令而缴枪，是违反军纪。你把事情看错了。”接着惠东昇得知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就将枪支发还。何、周二位和蒋所谈内容，我不清楚。在当日（20日）下午，许多被扣的共产党员就恢复了自由，情形开始好转。蒋介石对我说：“中山舰是受海军局命令开进黄埔的，‘事变’的责任主要在李之龙身上，现已将李扣押在经理处，交给你去审讯。”蒋因我当过东征军的军法处长，所以要我做帮凶。

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是在3月19日后半夜被陈肇英等率兵逮捕的。李新婚不久，在梦中被拖出来，上身只穿一件衬衣，下身只穿一条短裤，双手反绑，眼睛蒙起，嘴巴塞住，像架“肉票”那样把他弄到经理处。我向经理处处长徐桴等出示蒋的手谕之后，开庭提审二次。李之龙连称冤枉，对所谓“通同共产党劫持蒋介石之事”坚不承认，同时一再申明：“中山舰开进黄埔，是由于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朱一鸿，亲自来海军局向我传达蒋校长的口头命令，说该校急需使用中山舰，着速开往黄埔停泊候调，这是17日下午的事。乃于18日早晨，命令该舰驶去黄埔候差。”等语。除此之外，再也审不出其他口供。当晚，我向蒋介石报告审问情况。蒋对我的报告很不满意，气愤地说：“那么你去将朱一鸿逮捕起来吧！”我看他的神色不对，只得随风转舵，轻轻地回答：“如将此事看得太严重也不大好。”蒋的表情没有什么反映，也不再提起逮捕朱一鸿之事（朱驻省城专管招待及船艇事务）。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一个人审问不了，加派第二军军法处长戴贞纘会审。”

第二天我和戴贞纘在经理处碰头，事前研究了怎样进行审讯。戴说：“李之龙不肯承认，是刁猾。”他主张用刑讯，我坚决反对，结果没有动刑。经会同庭讯多次，仍无所得。于是我用书面向蒋介石建议：“李案叠经会审，仍无充分罪证，原报告是否完全属实，有待调查，拟

先准保释。”蒋介石的批示是“暂行看管，再侦查。”此案就是这样搁起。李之龙被移押何处，我不知道，直到7月间才把他释放出来。

“事变”的结局

经此事件之后，汪精卫经常称病不视事，各方面也对蒋介石颇有不好的评论。蒋在这时还不敢公开反共，还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来进行北伐；并且顾虑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一事，会引起苏联的反感，会影响苏联对军事上的援助（其时苏联有一批枪弹要运来）。因此，他又不得不假惺惺地去见汪精卫，承认错误，并请汪转向苏联顾问鲍罗廷解释，因为当时汪和鲍比较亲近。但蒋对事件的责任则又全部推在李之龙和其他部属的身上，表示要“严加处分”。据闻，当时汪对蒋的态度也很冷淡。

同年4月9日，蒋介石致汪精卫信上说，3月20日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他在辞职未获批示的期间，军纪废弛，整顿无方，遂致一发不可收拾；其次是“我兄（汪）于3月初召集孙文主义学会会员讲话时，有‘中国革命不成，又欲杀共产党乎’之语，以致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的恶感，迫使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举。”云云。从这里可以看出，蒋是如何来掩饰自己的阴谋诡计而把责任推到部属身上了。接着，他就对“中山舰事件”作出了所谓“处分”。实际上只是李之龙无辜下狱，真正吃到一些苦头，而对于他自己的亲信人员则无非是一出愿打愿挨的“苦肉计”而已。当将王柏龄解除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职务，陈肇英免去虎门要塞司令职务，均着即离开广州。欧阳格也被免去暂代中山舰舰长，吴铁城免去新编第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公安局长，均送往虎门炮台“软禁”。

蒋介石作出“处理”时，曾召我到他的“公馆”中，就叫我坐在他的办公桌上起稿子。当时我觉得吴铁城等罪责不轻，向蒋请示。蒋答：

“就用图谋不轨的罪名吧！”蒋介石所一手制造的风波——中山舰“政变”事件，至此告一结束。

自此而后，汪精卫眼看蒋介石的声势逐步咄咄逼人，他因为不甘心做傀儡主席，就在同年4月中旬弃职出国。

汪精卫走后，蒋即支持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会主席改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由张静江继任；蒋即自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谭是好好先生，他兼任第二军军长，要受军事委员会节制；而蒋对于张，根本无所顾忌。事实上他们都是傀儡。党、政、军大权从此就为蒋介石所控制。而在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后，蒋介石以缪斌为党代表，第一军就成为他的清一色嫡系部队了。

当汪走了之后，蒋介石曾经叫我将政局变化情况，用密电通知徐桴和陈肇英等。因此，我对“中山舰事件”的内幕，就更为明了。蒋既大权在握，就处心积虑地为实现其独裁的政治野心而积极创造条件。及至北伐取得胜利，他就悍然背叛革命了。

濂
涸
沉
浮

山雨欲来：四·一二政变前的 秘密反共会议

黄绍竑

山雨欲来：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

一

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我是同蒋介石合谋发动的桂系军阀首脑之一。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会议，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枢纽，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济深都参加过那次会议。这次反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满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愿意接触的。李济深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鼓励我写历史资料。他说，“你应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哪里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诉你。”现在李济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会议的，在国内只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我写这一篇资料，目的主要是暴露事实真相，可能写得不够全面，分析批判更是不够的，希望读者指正并严加批判。

二

1927年3月下旬某日，我在南宁接到李济深从广州拍来急电，要我

立刻秘密去广州商量要事。那时我因家眷还住在广州珠江颐养园，广州是时常来往的，因而我这次去广州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乘专轮到广州后，立即同李济深见了面。他取出一份蒋介石由南昌拍来的密电给我看，内容是要李济深和我两人克日到上海同他商量重要问题。电报里虽然没有说明是什么重要问题，可是李济深和我都不约而同地料定，一定是为了反共，因为那时候南昌、武汉以及各地的国共斗争已经很露骨了。我和李济深互相交换了一些情况和看法，在反共这个问题上彼此所见略同，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就决定同去上海。他说，到香港和上海的船票都已经准备好了，下午就要动身；他并且提醒我说，现在码头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监视很严，我们行动要秘密。我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妻子。为了保持行动秘密，她劝我把留了六七年的落腮胡须剃去。我就匆匆忙忙剃去胡子，坐了一只小艇悄悄地登上了省港轮船泰山号。

在泰山号船上，我同李济深见了面，同行的还有冯祝万（那时他是参谋长还是财政厅长，已记不清）、陈孚木及随从一人。我们当晚10点多钟就到了香港，李民欣早已在码头上秘密迎接。他同香港的一班买办有联系（他的老婆是香港某买办的女儿），从香港到上海的船票已经由他办好了。我们下了省港轮船泰山号，马上就上了美国邮船底亚士总统号。第二天，邮船就向上海开行了。

在由香港赴沪途中，我们在船上也作了几次秘密谈话，内容无非是补述一些当地情况和商量到上海以后的共同主张，由陈孚木作记录。陈孚木是廖仲恺被刺时同时遇难的陈秋霖的老弟，此行替我们担任秘书。

4月2日上午，邮船驶入黄浦江，还没有泊码头，白崇禧就派他的参谋长兼上海市市长张定璠乘海关小火轮到船上来迎接我们了。他一见面，就告诉我们说，租界里万不能住。他说：“自从我军克复上海之后，租界的周围都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他们同租界里的外

国军警隔着铁丝网对峙着，住在租界不但出入不方便，而且很危险。白总指挥要你们两位到他的总指挥部去住。”我们就乘小火轮直接开往设
在高昌庙江南兵工厂里面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我们在小火轮上看见
满江外国兵舰的大炮都褪了炮衣，指向上海市区，情况的确相当严重。
船到了高昌庙，李宗仁、白崇禧都在码头上迎接我们，李宗仁也住在总
指挥部里。

三

在我们到达上海以前不久，蒋介石就已经到了上海。我们到上海那天（4月2日）的下午，他和何应钦、吴稚晖（当时任南昌总政治部主任）、李石曾、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陈立夫（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来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同来的这几个人之外，还有住在总指挥部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我。蒋介石首先发言，说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和为什么要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他说：“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最后，他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到会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主张“反共”的，自然决不会有相反的意见，而是从一致的反动立场出发，罗列一些歪曲事实的“亲身见闻”加以渲染夸大，来诬蔑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以此来加强“反共清党”的气氛。李济深首先报告广东方面特别

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我也接着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番，并且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从而，我的结论自然也是“必须早日清党反共”。

何应钦在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况时着重谈到南京惨案。他居然为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恶作辩护，把南京惨案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说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白崇禧发言最多。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他还诬蔑共产党“离间”军队，说：“第一军住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一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反共）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他；第二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白崇禧又说：“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

吴稚晖的发言满口无锡土音，我不大听得懂，只听见他说什么“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等等谬论。他的话我虽然不太懂，但是当时我对他这个人还是相当“敬仰”的，认为他是“理论家”（蒋介石称他为国民党的“瑰宝”）。陈果夫不大说话，我同他是第一次会

面。他身穿长衫，罩上一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钱庄的挡手。李宗仁也谈了一些军队政治部问题以及他在地方上所看到的问题。

这次秘密会议上各个人的发言，深刻地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面前战栗危惧的心情，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企图扑杀革命的反动阶级本能。“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就在这次充满血腥气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而我们这几个桂系军阀头目追随蒋介石合谋叛变革命的滔天罪行也就从此开始。

四

在4月2日秘密会议以后，为了使“反共清党”合法化，4月5日上午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参加的有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查阅当时上海报载出席的还有汪精卫、甘乃光，实际上此二人并未参加）。由于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这次会上就决定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并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据以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地方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这个咨文是由蒋介石授意，由吴稚晖、陈果夫等包办的，内容如何，当时我并未看过，现在将查到的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咨文摘录如下：

（衔略）窃本会职责所在，“党员施政方针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尚应过问，则弃裂本党政纲、酿成亡党卖国之行为尤应举发。是以本会委员分赴各地，遇集上海，遂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开

临时会议，决定于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到会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人杰、吴敬恒、李煜瀛、陈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讨论，……全场一致议决将访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请贵委员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一面由贵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下略）

这个咨文表面上好像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进行处理，实际上不过是替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阴谋作政治上、舆论上的准备，替他制造借口而已。而且这个咨文所称四月二日举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一节，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即使把那天的秘密会议改头换面，冒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话，当时在场的也只有李宗仁、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五人，只占全体中监委二十人的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三人并未参加，即使把这三个人加上，也还不足半数。可是咨文不但把三个不在场的人加上，“公推”一个不在场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人数说成是三分之二。这种睁着眼睛说胡话的撒谎伎俩也实在太拙劣可笑了。

蒋介石在接到咨文后，复函中央监察委员会称，“中正接奉四月二日贵会全体紧急会议决议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来咨，……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辖各军汛地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矣。”从中监会的咨文和蒋介石的这个复函看来，似乎蒋介石的反共并非出于他的策动，而是根据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举发，实际上，这完全是蒋介石一手布置的烟幕。从1926年3月20日

中山舰事件开始，蒋介石是一贯搬弄这一套手法来掩人耳目的。

最后，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又在4月9日联名发表了一通长达3000余言的“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摘武汉国民党左派“不合者”二事，列举“可痛心者”九事。电文最后说：“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险象如此，詎能再安缄默？爰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被发纓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披沥奉陈，敬候明教。”

此电发出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下手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从这个“护党救国”通电发出后的第三天——4月12日起，在蒋介石、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帮会流氓以及我们这一小撮反动军阀和投机政客的共同合作下，一场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

瞒天过海为反共

幕中岳

漩
涡
沉
浮

1927年初，北伐军进入浙江境内后，原来属于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第三师（即浙江陆军第二师），在师长周凤岐率领下于衢州宣告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为着对这个新参加革命行列的旧浙军做些政治工作，由政治部于进入浙西的各军中抽调一批干部，到这个军担任政治工作^①。我是被抽调的一个，派在第二团二营（团长赵观涛，营长杨俊英）^②，担任营政治指导员，随该军由浙西的衢州转绍兴、苏州到达上海。

上海驻军的类别

二十六军到上海后，驻南站附近的普育堂。那时上海市的驻军，约有下列几个类型：

① 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为白崇禧，他所指挥进入浙江的部队为第一军的一、二、二十一、二十二师，以及李明扬的先遣队等。

② 赵观涛、杨俊英均系保定三期生。杨为团内资深的营长。赵则新由另外的团以营长调升团长的。

1. 工人武装纠察队 我到上海，首先看到的，为着浅蓝色服装、左臂上带红青两色袖章、情绪饱满、态度和藹的工人武装纠察队。我们问路问事，均热情亲切地回答，感到比同一部队还要亲密，因此亦与纠察队员谈了不少的话。

2. 先遣队与游击队 工人纠察队外，尚有穿便衣带手枪、左臂上亦带着识别带的李明扬所率领的先遣队与王桂林所率领的游击队^①。

3. 国民革命军 先于二十六军到上海的有第一军的一、二两师，而各商号门上则发现很多粉笔写的“挽留薛师驻沪，反对刘师来沪”等标语^②。

在蒙蔽下当了刽子手

4月11日，二营营长杨俊英与我到市内看戏、下馆子，及回到普育堂已经快到夜间12时。我们刚刚睡下，突然团部有个副官仓忙跑来，说团长有紧要事，请营长和指导员立刻到团部去。我与杨俊英就立即起床到四楼团部去。及到团部，一、三两营营长已经先到场。团长赵观涛见我们到后，用行军作战部署战斗的方式宣布其目的。他说，王桂林的游击队到上海后，军风纪不好，团奉令收缴其枪械，解散其部队。于是他下达命令：(1) 游击队王桂林部，驻南站附近，军风纪很坏，团奉令收缴其枪械，解散其部队。(2) 各部队的任务：第一营担任……第二营担任对火车站方面游击队的缴械任务；第三营暨机关枪连为预备队，暂控

^① 北伐军进入浙江，每到一城镇均有李明扬先遣队司令部先行张贴的布告。王桂林为浙东老军官，曾任宁台镇守使等职。

^② 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为薛岳，第二师师长为刘峙。首先攻进上海的为第一师。第二师随后跟进，未曾参加战斗。第一师的军风纪比第二师较好。薛岳当时比较同情师内的共产党员同志。

置于普育堂内，依情况再行使用。

团长下达命令后，我们回到营部，集合四个连长，部署营的命令。即以第五连担任对车站附近的警戒，第六、第七连担任向游击队的驻地前进，收缴其枪械，第八连为营预备队。当时我们就在这种状况下充当了镇压、屠杀武装工人的刽子手。

三山会馆的悲剧

漩
涡
沉
浮

部队于12时后开到指定地点，12日晨三时就枪声四起。杨俊英在营内未动。我亦依然躺床休息。及拂晓后，激烈枪声虽停，仍有稀疏的枪声。杨俊英忽然起来说：“我们到外边看看吧。”我们走出普育堂，原来南市的早晨很为热闹，现则因为部队的戒严而寂无人声，居民与大夏大学的学生很多在楼上或栅栏内向外了望。偶有两三居民要通过马路亦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所阻止。我们的行动当然未受限制。杨俊英尚边走边谈王桂林与旧浙军的一些故事。我们走得很慢，快到八时，走到三山会馆。第六连士兵担任门卫。我们进去后，连长翁国华正在指挥士兵搬运收缴的枪械。及进到第二院，忽然发现有五六个穿工人纠察队服装的士兵受了伤坐在廊檐下。第七连的汪排长忙来报告，他连上亦收缴不少的枪。

我与杨俊英上到楼上，室内突然发现何同志^①在那里。他看见我，立即迎上来说：“慕同志，你们军队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一声，深夜来缴我们的枪械？我们为着顾全大局，没有下令还枪。否则双方损失才大呢。”我说：“何同志，我想不到你在王桂林这个游击队工作，今天在这里相见。”何同志气愤地说：“什么王桂林游击队，你们缴的是工人武装

^① 何同志的名字已遗忘，只记得是湖南人，在黄埔军校政治科学习时，我是第一队，他是第三队，负责各种刊物、各种小册、画报的发行工作。我与他经常联系接洽，在黄埔很熟的。

纠察队的枪呵！”他接着又说：“慕同志，你总还记得我们政治科^①在广州中山大学集训的情况吧！你分配到军队工作，我是校长^②派我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直鲁军、五省联军，最后在上海对工人特别残酷，我们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同这些军阀军队打了很多仗。如果不是工人纠察队在市内干起来，你们怎样会进占上海那么快呢！”接着他又说：“总理革命四十年，最后把革命任务交给校长，万想不到他竟会对工人开枪！”旁边的一位女同志插上说：“纵然要我们工人纠察队缴枪，通知一声就行。夜间动手，牺牲的还不都是我们革命同志、我们中国人。”何同志又说：“我们同志同军阀在上海打，牺牲并不大，昨夜则我们黄埔学生就牺牲好几个。原来同我们在黄埔军校常来往的第二队同学周异三，你们第一队同学李玉等都牺牲了^③。简直太不成话了！”我至此才了解缴的是工人纠察队的枪。我急忙找到杨俊英，对他说：“我们搞错了，缴的是工人纠察队的枪，不是王桂林游击队的枪。”同时派传令兵通知六七两连，不准再收纠察队的枪。杨俊英却狡猾地应付我说：“真的错了吗？我们回团部向团长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离开时饬令六连连长翁国华照料部队不得再有什么行动。

反革命假面具的拆穿

我与杨俊英回到普育堂，我直到四楼团部，团长赵观涛没有在，杨

^① 北伐军队出发前夕，政治科学生由黄埔开到广州中山大学集训三个星期，提前派出担任工作。一部到敌后方工作，大部派到军队担任连队政治工作。集训期间，担任讲师的都是共产党员如恽代英等。

^② “校长”系指蒋介石。当时在军队或其他方面工作的黄埔学生，对蒋一般不提他的官衔，概以校长称之。

^③ 四一二事变中，黄埔各期学生派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死者不少。何同志当时提出的我只记得周异三一人，其他的都记不起了。

俊英拉我回营部说：“休息一下，再说吧。”第六连长翁国华接二连三送来缴来的物品书籍，而书籍很多是《工人运动浅说》、《共产主义ABC》等。我即对杨说：“这些书都是黄埔军校的一些课本，为什么亦向纠察队收缴呢？翁国华太莫名其妙了！”时间很快到了12时，市上警戒撤销，报纸送来，我才如梦初醒。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血腥大进攻。从而感到杨俊英在三山会馆与回普育堂的一系列行动，是对付我的一些手法，怕我会与纠察队方面有什么联系。杨俊英与赵观涛这批军阀军队老军官，只是换个番号，根本不懂革命，更谈不上对革命同志的同情的。因此我十分担心在三山会馆的何同志的安全问题，乃借辞外出，重到三山会馆，则已经景象全非。除两三个守门工役外，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抱着失望、难以形容的情绪离开这个为我永远所不能忘记的地方。

张大帅皇姑屯被炸事出有因

周大文

张大帅皇姑屯被炸事出有因

1928年6月3日早，我到中南海内福祿居密电处上班，在中南海丰泽园后上房与大元帅府秘书长任毓麟相晤，他匆忙地告诉我：“大元帅今天决定回奉，你可以回家作些准备。”我听到以后，即时回家把行李收拾好，随即回到中南海待命出发。是日午后六时，我率领密电处全体人员约20余人到东单车站，并在行前发了一件密电致奉天留守吴俊升，通知他如有要电可拍到京奉沿线专车上。晚上八点多钟张作霖来到车站，随行的人除大元帅府人员和卫队外，还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德惠、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太太和三公子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嵯峨等。专车共有22节，张作霖乘坐的包车在中间，是前清慈禧太后所坐的花车。包车后边是饭车，前边是两辆蓝钢车，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在这两辆蓝钢车中。在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

我们这次随张作霖出关返奉，许多人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故。因为前些日子张作霖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有过一场面对面的严重冲突：

5月17日晚上张作霖和梁士诒、李宣威等几位客人打麻将牌的时

候，芳泽来访（是预先约定的）。梁、李等人要走，张作霖坚留他们说：“我与芳泽没什么可谈的，不大工夫就能说完。”可是，他由纯一斋里间屋出来会见芳泽以后，过了很长一阵时间还没谈完。在里间屋的那几位客人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大家叫李宣威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因为李懂得日语。李听了听，也没听出什么来，只听到张作霖说：“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是张作霖常用的口头语），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跟着，不待芳泽辞去，他就先离开了客厅进入里间。当时留在里间的几位客人都很惊讶，不知道芳泽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惹起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

事后据张作霖的承启官长赵锡福和当时在场的差官们透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晚上芳泽来见张作霖，向他提出了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无理要求。并且诱惑张作霖说，如果他能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未为所动，正色回答说：“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张作霖不上圈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交给张作霖（可能就是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两方的觉书），接着又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回答说他尚未接到报告。芳泽竟然用恫吓的口吻对他说：“张宗昌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听罢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里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向地下一摔，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收场了。

张作霖和芳泽既有了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所以我们大家在临行时

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预感，惟恐在山海关出事。我在出发时私自备妥一个裹伤包，还有两盒饼干，以防万一。

二

专车由北京开出后，直驶天津，过津时靳云鹏、潘复、杨毓珣和日籍顾问町野等在津站下去（町野系张作霖派往联系阎锡山，因与阎不熟，准备到天津找一个与阎认识的日军官同去）。专车到山海关时，车站上只有一两名日本守备队站岗，态度如常，看不出紧张的样子。吴俊升已先由奉天赶到山海关站迎接。他还向我说：“老弟，给我来的电报看见了，你们都辛苦了。”

专车平安开出山海关后，大家觉得放了心，都解衣而睡。吴俊升上车同张作霖见了面，彼此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们就和刘哲、莫德惠、常荫槐等玩起了扑克牌，一直快到皇姑屯时才散。车到新民时已经天亮，我看沿线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哨姿式，十余步就是一岗，可是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地点附近，就没有看到哨兵警戒了。

专车过皇姑屯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齐登车后，专车即向东行驶，开往小西边门外奉天车站。数分钟后穿过南满铁路桥洞时，我正在走廊向外张望，忽见南边有两个着黄色制服的人跑上南满铁路大堤。我进入包房，尚未坐定，即闻轰然一声巨响，刹那间又是一声，比前一声更大，车煞住，我被震昏倒在地板上。等我恢复知觉，睁眼一看，包房里车窗和窗前小桌不知去向，满地都是玻璃碎片。当时我疑惑已经受伤，可是试试四肢皆能够动，站起来又摸摸身上，也如平常，并无疼痛之处，只发现左手掌流血，可能是被碎玻璃扎破的。我取出药布药棉擦了伤口，没来得及包扎，就赶快跑出包房。在车厢走廊上看到我

们的机枪卫队，列队向南北两方扫射约数秒钟，经何丰林喝令停止射击，枪声停止。我下车一看，大吃一惊，张作霖那辆包车全部车厢塌下，已不成车形，后边那辆饭车也是一样，还直冒烟，开始起火。再一看南满铁路桥东面桥栏矮铁墙炸的向上竖立起来，洋灰桥墩东面上半截炸去三分之一。这时大家忙于抢救受伤的人员。首先我看见吴俊升被数人架上一辆皮棚马车，向市内而去（后闻当时已死，头顶穿入一大铁钉）；接着看见日籍顾问嵯峨满面是血，向车头方面跑去；又看见莫德惠从车上抬下来，送往小西边门外奉天市立医院，刘哲是带着伤自己走去的。这时张作霖已经被抬上宪兵司令齐恩铭的一辆破旧汽车，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车中，回转帅府去了。当时我叫勤务兵郭万元到列车上把照相机取来，准备拍照。正在此时，由南方沿着南满路来了一队日本兵，持枪向列车方面跃进。我赶紧跑入市内，因而未能把这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拍成，至今思之，仍觉遗憾。

我入市内，因为不了解此事是否有内部原因，所以未敢径直回家，先给家中去了一个电话试探一下。接电话的是家中的厨师老褚，我问他听见响声没有，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声，他回答说，听见了响声，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流畅而自然，估计没有什么问题，我这才回家。我一到家，就先给北京张学良打电话，没叫通。恰好奉天电报局局长张志忻来看我，我立刻求他到密电处代发一个急电给张学良报告此事。只说“大元帅受伤较重，但不要紧”。然后匆匆忙忙洗脸换衣服，吃了点东西就赶紧到帅府。我先到秘书厅见到袁秘书（袁世凯的九弟），他告诉我说，张作霖因出血过多，无法挽救，已于半小时前故去了，并告我严守秘密。

后来张作霖的卢夫人曾经把张作霖临死的情况告诉过我。据她说，那天当差官跑进来报告说：“大元帅被炸受伤，车已到大门口。”大家慌作一团，赶快跑出去迎接。汽车从花园门口开了进来，大家把张作霖从

车上抬入小楼楼下屋内。他满袖是血，用剪刀把衣服剪开，发现已折断一臂，随即派社仁承启接来杜医官施行紧急治疗。这时张作霖还能说话，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张学良将军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说完不久，就瞑目长逝，时间是6月4日午前9时30分。

当时军署参谋长臧式毅怕张作霖去世的消息透露出去，引起地方人心不安，更顾虑日本将会乘机有所举动，而且张学良还未回来，因此决定严密封锁消息。每日令厨房照常开张作霖的饭，杜医官天天来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处方等等，以瞒过日本人的窥探。日本方面不断有人来慰问求见，皆被婉言谢绝。一直到张学良回到沈阳以后，始宣布张作霖于6月21日因伤逝世的消息。在哀挽录、行状内也是填的6月21日，其实都是假日期。

三

在张作霖回奉前好几日，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的铁桥附近一带，日方即不许行人通过，有日本守备队在该处放步哨。到6月3日午后，南满铁路来往火车全部停止。这事很惹人注意，因为平日南满铁路每五分钟就有一次列车开行。在张作霖决定启程回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曾有密电到北京说，老道口（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口）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加防备。但是张作霖对这个报告未加重视，给吴俊升和奉天省长刘尚清去电说：“齐随本帅多年，素知其本人向来轻举妄动，好造谣言，现日本方面对我缓和，勿庸顾虑，应严予申斥。”云云。

在上述情况发现之前，5月22日夜间在该桥左近还发生了一件日军

用枪刺刀挑死两名所谓“南方便衣队”的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日本驻奉总领事馆打电话给奉天交涉署请派员调查，该署派第一科科长关庚泽前往。后据关向我所述调查情况如下：

他来到现场，见地上倒有年约 30 余岁的男尸两具，身着新灰布制服，足穿黑布面鞋。尸首旁边放着一个破搪瓷面盆，里面有两个上锈的小炸弹。在死尸的旁边，还有印着“救国军总司令部公用笺”字样的一张信笺，上面写着“兹派 x x x 等去东北三省一带工作”。据日方说：“这是南方派来的两名便衣队来扰乱东北的，走到我们守备队步哨网内，向他们盘诘，他们不答，我们就照军规把他们扎死了。”但是，据关庚泽说，在调查这个案件以后的二三天，又发生一件事，揭穿了日方所布置的这个“南方便衣队”的阴谋：头几天奉天监狱忽然跑来一名身着灰布制服、黑布面鞋的人请求收容保护。据这个人说：“我们数人在南满站作小工，因吸食白面，被日本警察抓走，拘留在一处，也没有审问，先给我剃头洗澡，然后换上我穿着的这身新衣服和新鞋，并且给我们吃好的，喝好的。住了好几天以后，昨天半夜忽然把我们几个人叫出来，带到南满路铁桥地方，对我们说：‘你们随便走吧。’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可是我准知道日本小鬼没安好心眼，我早就提防上了。果然，这时过来几个日本兵，一语未发，用枪刺向先头的几个人就扎。我一看不好，撒腿飞跑，拼命逃进城来，那几个人死活不知。”

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后，日本总领事馆派内田领事到交涉署请派员会同调查。该署署长高清和仍派科长关庚泽前往。关来到现场，看见桥帮被炸改形，桥上铁板被炸得飞出去很远，水泥桥墩东头炸去一部，火车两辆已无车箱，光剩底盘。关科长按照现场情形推测，爆炸物显然是由上而下的，其破坏力之大，也非手掷炸弹可及。旋军署参谋长臧式毅又令兵工厂派专家前往查勘。据兵工厂两名白俄技师报称，根据爆炸破坏的情况来看，爆炸物须在五百磅左右，才能有这样大的爆破力量。爆炸

物是装置在南满铁路桥上的，装置这样重的爆炸物，绝非徒手所能办到，而且装置所需要的时间至少须数小时。

关庚泽会同日本内田领事到现场调查的第二天，内田又到交涉署找他。拿出一张用打字机打好的日文报告，硬说这次爆炸是南方便衣队所为，要他签名盖章，联合汇报，当他拒绝后，内田威胁关说：“如果你不签名盖章，日本军人将跟你过不去，于你不利。”关回答说：“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死，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任凭它吧。”内田无法，只好辞去。

在炸车案发生的当天，陶尚铭曾到关东军司令部找斋藤参谋长探问炸车案情形，斋藤也推说：“这里得到的情报，此事是南方便衣队所为。”陶以后多方探访，始知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所为。1929年春，日本众议院为某重大案件（即皇姑屯炸车案）向军部提出质问时，始把河本大作大佐免职。1930年河本来奉，住奉天满铁医院时，满铁本社情报课课员野田兰藏是河本密友，向他问炸车事始末，他回答说：“这事就算我干的吧，否则牵连过多。”云云。

从宁粤合作到蒋汪合流,貌合心难合

陈铭枢

漩
涡
沉
浮

自蒋介石公开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后,国民党已走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绝路,致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愈益无所顾忌。迨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惊醒了中国人民,唤起了大众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也震撼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在此内忧外患的严重情况下,分崩离析的国民党及其内部派系——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能不发生一些变化。这一事件,曾迫使蒋介石宣告下野,孙科上台又下台,蒋、汪合作,胡汉民一去不返。接着发生了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

宁粤合作之前,有一段分裂过程。这一分裂与我在广东有关,故先从我在广东说起。

我在广东

1929年春,我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任第八路军总指挥,分掌广东军政。自打退张(发奎)、桂联军进犯后,统一了广东全省,并占据了梧州,扼制着广西惟一通向海口的咽喉。陈济棠在最短的时期内,

随着军事胜利的进展，把兵力由原有一个师（第十一师）迅速扩充为五个师，并控制了驻广东的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我于1928年由闽回粤时，所属的第十一军有蔡廷锴的第十师、黄质胜的第二十四师，后又恢复第二十六师，戴戟任师长，蒋光鼐仍任副军长。

先是，北伐军攻克平、津，全国除东北外，形式上已具统一雏形。其时我驻防广东南路，于琼州军次通电全国军人，倡议裁军，拥护统一，力主军权归还中央。后又北上，在香港与胡汉民（胡方自欧洲回）同赴沪，企图以裁军主张游说各方。抵上海与李济深同住诸昌年家，晤李宗仁，他讥消我是傻子，并郑重地对我说：“当今治天下非我们军人不可，‘长衫客’（指文人）是不行的。”到南京见蒋介石，他对我的主张当然很喜欢。到北平晤白崇禧，见其气焰之盛，使我对裁军问题不能开口。盘桓几天后，又在天津与傅作义见面。后取道武汉返南京，复与李宗仁见面。我已知李、白同一鼻孔出气，无必要再同他们谈裁军问题了。但我并不因游说无成，放弃自己原来的倡议，故在南京编遣会议前夕，即致电陈济棠、蒋光鼐，囑他们拥护裁军方案，并自动将所属第十一军的三个师，缩编为一个师、一个独立旅。蒋光鼐任广东编遣区第三师师长，戴戟任副师长，蔡廷锴任独立第二旅旅长，裁去戴戟之二十六师。半年后，蔡旅改编为第六十师，蒋师改编为第六十一师。因历史关系，名义上两师虽不相隶属，但实际上仍由蒋光鼐统率，教育作战，未尝稍事分离。我自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第十一军军部即撤消，蒋、蔡两部归陈济棠节制。省政府有保安队四团，分驻各县，负地方绥靖之责。

我同陈济棠在广东，虽然是军政分治，但因陈是我早年在“阳江起义”时的旧部，共事有年，故他对于重要的军事问题，不仅要依靠我替他策划，并且要我为他部署作战。中间有几次较大的战役，如1929年冬，在花县与张、桂军作战，就由我计划，并亲到前线布置。这一战役

的胜败关头，决定于前十天的攻势防御阵地的布置，由正面向左延伸到芦包西江边沿作防守地带，并于事前一星期筑好一条由广州到花县的公路，以利运输和为出击地带展开强大的纵深配备。战斗结果，张军被击溃，桂军亦撤围逃逸。从此结束了广东境内的粤桂战争。

其时，我因鉴于广东富庶之区，军队驻防过久，容易腐化堕落；且两个自成系统的队伍（我部与陈济棠部）同在一起，日久必会发生摩擦，甚至引起权利之争。况蒋、蔡两师将士，正锐气方刚，大足有为，自应面向全局，不宜安于现状，留恋桑梓。故当省内战争结束后，我即将此意向蒋、蔡说明，要他们剴切转告全体将士，作好精神准备，随时候命出发。又因陈济棠是有名的败兵之将，如1927年冬，我军由闽回粤与张发奎军大战于东江，陈时任左翼，与敌一触即溃，并将军队撤向后方远扬，致陷我军于败绩，因此全军上下，对陈极为不满。此役结束后，白崇禧在南京以总参谋长名义致电李济深，主张按军法惩办陈济棠；但事平之后，陈不仅未受处分，却升为军长，军队且驻在广州附近的好地方。现陈既总揽军权，且不断扩充实力，野心勃勃，因此更加不满其所为，故亦愿外调，不与共处。

当1930年夏，蒋与冯、阎大战于中原，战争剧烈；我电蒋说：“蒋、蔡两师已作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不久，张、桂军乘机再起，直入湖南，图出武汉与冯、阎相策应。时武汉空虚、南京震动，蒋急调蒋、蔡两师出韶关入湘，以蹙张、桂军之后。时张军已占领长沙，桂军（由黄绍竑、白崇禧率领）已抵浏阳，闻我军讯，忽变更计划，回师应战，且有夺取广东意图。我闻讯，即与陈济棠会商，任命蒋光鼐为前敌总指挥，以陈部李扬敬师归蒋指挥，驰往接应；并决定由陈亲率余汉谋、香翰屏两师为后续部队。时蒋、蔡军次耒阳，白部前锋已抵茶陵，预计两日内，双方即将遭遇。因敌我众寡悬殊，而李扬敬师刚越过大庾岭，当此军事机动关头，我正筹算未决，忽接蒋光鼐电称：“拟将兵力

移向左側方，扼守衡阳，撤去后方，使敌扑个空，然后与后续部队夹击敌人。”我心所踌躇者，至此始得解决，立即找陈济棠商量。殊料他不同意蒋光鼐的计划，定要将部队撤回大庾岭，在九峰、坪石一带布防，凭险固守。我再三解释无效，乃即直电蒋光鼐说：“你的计划好极！我军撤移衡阳，拊敌前进侧背，如猛虎在山，虽属险着，的是妙算。陈总指挥要你退回，是行不得的！万勿变更原计划。”我电未到，蒋光鼐已先接陈电，即电我说：“陈总指挥来电，真使人头痛，我不能接受。”我再复电说：“前电此时谅已收到，兄此着诚妙，歼敌必矣！谨先预祝，静候捷音。”结果张军惨败，几乎全军覆没，黄、白所率桂军，亦狼狈退回广西老巢。战事刚结束，蒋、蔡两师即被调到津浦线与阎军作战，出奇兵克济南，正式改编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任总指挥。后蒋光鼐又亲率两师突出平汉线，与冯军作战，大胜；战事结束，又被调到江西与红军作战。至我到江西就任“剿赤”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官时，始重领该军。

已如上述，广东为富庶之区，税源甚富，蒋为笼络陈济棠，并使粤军替他看守桂系，故指定以中央在粤税收，全部拨给陈作军费，连同省收入项下拨给的一部分，每月共达430万，加上广西梧州税款，共达500万以上。按当时中央规定，每师军费为30万，陈只五师，加上每月对出省部队（蒋、蔡部）最小部分的协饷，超额经费极为庞大。因此为中央规定，我亦不甚注意。同时，我亦曾利用职权，弄了一批钱来做我个人想做的事，如以巨资接办上海神州国光社，筹办广东艺术学院和大剧院等等。陈对我职权范围内的政务从未干涉，因而我同陈根本不存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

其时，最使我伤脑筋的倒是留在广东的胡派人物。自张发奎、黄琪翔在广东失势后，汪派在粤已无立足余地，胡派在粤势力最雄厚，党政军学各界都有。其代表性人物为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李文范、刘芦鹇、胡毅生（胡之胞弟）等人，都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奉胡

汉民为正统。按当时臧否人物之说，这些人亦有清浊之分，清者如林云陔、李文范、刘芦隐等人，尚有刚劲之气，且能廉洁自守。浊者如古应芬之流，常凭借资格，利用政治背景来朋比营私，甚至胡夫人陈淑子，亦公然出面向财政厅长范其务介绍极不体面的包赌包烟。我同范都极尊重胡，并爱护胡的声誉，故不徇所求；又因蒋、胡两次合作，都曾由我主动斡旋，故深愿由此提高胡的威望，以利国民党的统一和巩固，自信动机纯正，故亦不以此介意。不料竟因此而开罪了胡家，并遭到大部分胡派的嫉视，因而他们捧“扮猪吃老虎”（广东土语）的陈济棠同我对立。后来又引进了他们过去的“眼中钉”汪精卫，终于酿成宁粤分裂的局面。

宁粤分裂前后

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汤山。消息传到广州，军政各界都极震动，且大惑不解。一时谣诼繁兴，纷纷揣测不一。不几天蒋由南京来一通“解释误会”的电文，说：“胡展堂先生对国民会议，坚持主张不得议及约法，恐因此引起党内无穷纠纷，俭（二十八）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以政见不合，欲辞本兼各职，并欲择地静居，谢见宾客，故于本日往汤山暂住。乃闻谣传扣留，殊觉失实。”此电文欲盖弥彰，反证实了胡确已遭遇和李济深相同的命运，在汤山被囚了。大家相对时，无不怒形于色，都以行政院长（时蒋兼行政院长）扣留立法院长，毁法乱纪，中外所无，纷纷表示愤慨。

胡与李济深本有师生之谊，而我及粤军将领又多李之旧属，感情自然容易冲动。加以胡派首脑古应芬之流，又到处点火，不久就掀起了反蒋高潮。当时我对蒋独裁之不满，以及对胡、李之爱重，并不下于其他军政人员，但以中央扣留一两大员，就要兴师动众、分裂对立，这种想

法在我脑子里是不存在的。如上年李济深被扣时，粤军将领亦纷主用兵，胡同我均不同意此举。我曾公开对他们说：“你们如果因李总长（李时任参谋总长）被扣而用兵，对他并无丝毫好处，反而坐实了他勾结桂系、拥兵自卫（蒋扣李时所加的罪名）的罪名。”几经疏解，始免了那场干戈。

在此局势动荡不安之际，我曾电在江西的蒋光鼐、蔡廷锴，征询他们对于反蒋的意见。他们复电表示，“拥护统一，反对内战”，这就坚定了我的主张。为了缓和空气，我借故出巡各县，拟俟诸人情绪平复后，再从长计议。不料在我出巡期间，陈济棠信使四出，古应芬又同我的朋友黄居素勾搭起来。黄公然说：“对陈真如暂不必征其同意，等我们酝酿成熟，布置好了，他就会跟着走。”我闻讯，极为激愤，心想这不是要做成圈套来套我吗？我立即回广州，开始仍图挽回局势，但古、陈等已与汪精卫拉拢，情况极为复杂，且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这与我初衷不合，故即悄然离开了广州。

我到香港后，广州局势突变，不几天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4月30日，四监委（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时林、萧两人尚在国外）以通电形式发表“弹劾蒋中正提案”，5月3日，陈济棠发表响应通电，接着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亦发出响应通电。先是，孙科曾以调解宁粤争端为名南下，到港后突与汪精卫合流，并相继进了广州。27日，广州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邓泽如、孙科、邹鲁、许崇智、林森、古应芬、李宗仁、陈济棠、陈友仁、李烈钧、熊克武、唐生智、蒋尊簋等16人为国府委员^①，成立国民政府。28

^① 据黄美真等主编《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称国府委员为17人，包括伍朝枢。

日，发表宣言并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告，限于24小时内即行引退。

5月初，我尚在香港，住九龙半岛饭店，省保安队第四团团长沙翁照垣来见，他激动地说：“只要主席点头，我回去把陈济棠干了！”我说：“这使不得！我之离粤是为了避免纠纷，并不是对陈济棠有什么私人仇恨，过去同张发奎自相残杀的历史，万不能重演。”他又说：“如陈要来打我，就要同他拼到底，即使只剩一枪一弹，我也不屈服。”我说：“你回去看情形再说吧。”其时我对粤局深感不安，恐他们因我在港未远离，容易发生误解，故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本人对职务毫无留恋，此后欲赴日本、印度及南洋群岛考察经济、政治。”9日我就到上海，原来尚拟到南京一行，后因得朋友之约，即变更计划，提前赴日本旅行。在日期间，迭接广东方面消息，知陈济棠曾使用武力解决省保安队，缴了琼州黄固团的械，继又使用陆海空军与顽强抵抗的翁照垣团激战于黄埔，翁弹尽时始泅水搭轮赴港。我即致电责陈说：“粤省保安队数千人，保卫地方，无关权位得失，竟欲灭之，毁民保障。若以枢去国为未足，为此而泄愤，则非枢所敢闻也。”陈自解决省保安队后，亦自相惊扰，一面给我复电，解释“误会”；一面又派他的师长香翰屏到赣州游说蒋、蔡，请守“中立”。蒋、蔡答以拥护中央解决粤局的方案。陈见计不得逞，乃调李扬敬、余汉谋两师开往韶关，在南雄、仁化一带，布成三道防线；又调香翰屏师扼守惠州、河源一带，实行军事戒备，以防十九路军的回粤。

我与蒋介石的勾当

我在日本住了20几天，即取道长崎回国。因上船时避过日警探注意，行踪甚秘，故回上海后，蒋介石才知道我已回国，立电邀见。时我已得赣州消息，知十九路军全体，在此局势混沌时，有彷徨无主状况，

急图回入军队，故即应蒋召入京，初并无任何打算。抵南京后，蒋见我，欢喜异常，当天即将他悬而待决的腹案告我，即：要我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将部队集中吉安，并要我担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官。他并对我说：“‘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不难看出，他要我到江西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图粤。我明知十九路军将士不愿内战，而我自己也无染指广东的意图，但因急于回军，故只得姑且应允，俟时机成熟，再作良图。这是我当时打定的主意。计议既定，我就准备到江西去指挥军事了。

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突接到蒋的电话，要我前往晤谈。时蒋住在中山陵园官邸。我去时，他从草坪上走来迎接，亲切对我说：“你明天就要出发了，我们随便谈吧！”其时院内和坪地四周，静悄悄地看不见一个人影，只有他同我两人坐在草坪的藤椅上。我初尚不介意，事后才明白，这是他事先作好的密谈安排。

两人入座后，蒋先开口了，他带着几分喟叹的口吻说：“革命大业的创造，还很艰难，北洋军阀虽然被打倒，‘赤祸’又来，而我们党内各地同志，又各怀异心，隐患重重，现在又临到多难的时候了。”谈至此，他加强语调说：“今日必须仗忠义之士，精诚团结，作为中央骨干，同心协力，生死以之，才能奠定国家，巩固统一。”他稍停顿了一下，我立即发现其用意所在。果然，他并不转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国家前途的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膀上了，我们义不容辞，要负担起来，就必须合为一个整体，成为不可分的巨大力量。”他望着我又说：“我想到此，我两人可以效法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你以为如何？”他把话说完，就倒在椅上静待我的回答。我听了他这一席话，顿时想到：——你早几年（1927年宁汉分裂时）由徐州败退下来，我同你在一列火车并同在一个车厢，你对我殷勤备至，你草拟下野通电，表示引咎。我趁你失意时，进行忠告，很委婉地提出：你在上海拜青帮头子

黄金荣为师，同杜月笙、张啸林等拜兄弟（后又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结拜金兰），这些作风同时代并不适合。你现在又用这手法来套我，我怎能受你的套呢？——旧的回忆和新的感受，一齐涌上心头，不到一分钟，我立即用严肃的口吻对他说：“桃园结义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今天用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总司令！你现在是国家元首（国府主席），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陆海空军总司令），只要你能开诚心、布公道，政策方针昭示得正确，自然四海归心，一切忠义才智之士，都会不待招而自至。倘若不然，单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结合，将示人心不广，反杜塞了贤路。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对你的向背！”我的话不啻泼了一盆冷水，他听了气氛顿改，沉静了许久，找不出一句话来对我表示。我呆了半晌，觉得彼此都很窘，乃即告退。第二天，我乘飞机到了江西。

7月11日，我到赣州后，即同蒋光鼐（时他已到沪养病）、蔡廷锴、戴戟等联名发出通电，拥护中央统一，同时就任“剿赤”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官职。14日，我致电陈济棠，提出三点：（一）请古应芬交出政权，迅即离开广州；（二）恢复以前之省保安队；（三）省通运公司及禁烟局维持四月前现状，以维持保安队原来经费。在此期间，我同汪精卫文电来往，互相责难，我的主要精神不外：反对内战，拥护国民党中央统一；力求党内团结，一致对外；特别对于反共之坚决，跃然纸上，如我的电文中有“誓与共党决最后之命运”等句。汪的回电，则以“剿共必倒蒋，倒蒋必剿共”立说，但又有“蒋之扬言剿共，果能实行，则此间决不以一矢相加遗”等语，足见国民党内部，虽然有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反共问题上，仍属“一丘之貉”。自我到赣州后，粤方深感不安，他们亦料到蒋将利用我图粤，故汪致我的电中又说：“若借‘剿共’之名，入寇广东革命根据地，则此间武装同志，固已严阵以待矣。”当然这是一种姿态。

7月中旬，我将十九路军集中吉安，总司令部又将右翼各军如陈诚、卫立煌、上官云相、郝梦龄、赵观涛等部，拨归我节制，统率部队虽多，能战者甚少；且蒋本人常直接下命令给各军、师长，名虽归我节制，实际不归我指挥（例如韩德勤一师，未通知我被调往进攻红军，至被消灭时始接到该师的“呼救号”，尚不知其陷在何处）。只有十九路军所辖的三师（原有第六十、六十一两师，后又扩编第七十八师）在我掌握，且较有战斗能力。

我入赣后不久，已深深感到：对红军作战不易；十九路军长期转战，兵力渐感疲敝；东北自万宝山案发生后，日军蠢蠢欲动，强邻压境，东陲堪虞；蒋对军事指挥，亦复低能，加以私心太重，赏罚不明，如他的嫡系蒋鼎文，屡吃败仗，不惟不受处分，且不次擢升，渐跻方面。环顾内外形势，使我不能不重新考虑问题——主要是怎样使十九路军摆脱目前处境，并怎样避免对广东的军事冲突。

我与邓择生（演达）是同学、同事，向来交谊甚笃，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同甘共苦，关系尤为密切。虽然他早已同蒋对立，势如水火，但他同我仍保持旧交，且经常密切联系。我在江西时，他曾来信同我交换对时局的意见，我即以个人所见相告，希望彼此能进一步合作，共筹应付时局办法。经密函来往，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即：待江西军事告一段落，乘蒋调我攻粤机会，俟军队进入粤北，即急转潮、梅，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邓并通知我说，陈诚是他的人。我同邓计议好后，即同蔡元培联系，立得同意，他并派其秘书杨铨（杏佛）到吉安我军中密商。决定后，我又将全部计划通知蔡廷锴，并预先约定好通讯“暗语”。其时，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择生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三人合作计划实

现，定可另开一新局面。这一密计的时间，大约是在8月上旬，距我到江西时还不到一个月。

9月中旬，十九路军在高兴圩与红军决战，战事告一段落。时蒋急于图粤，要我领十九路军打前锋，并派蒋鼎文部为后续部队（名为策应，实欲待广东平定之后，坐享其成，他以前之被蒋不次擢升，至此我方明白其用意所在）。我即下令将十九路军集中赣州，并另给蔡廷锴密令，说我三日内即来赣州，一切照“计划”行事（即我同蔡元培、邓演达合作的计划）。接着我又乘飞机到南昌见蒋介石，向他报告说：“我的部队已作好准备，即将回粤讨伐陈济棠，特来请示。”蒋很高兴地回答说：“你就照前定计划行事（蒋同我先商定好的图粤计划），先回赣州吧！”

九一八事变后

当我到南昌向蒋“请示”的那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次日早饭后十时，我正要上车赴飞机场时（到赣州），突接参谋长熊式辉的电话，说有紧急事讲，蒋要我到总司令部去。我前去，直入蒋的办公室，见蒋及何应钦、熊式辉三人，呆坐一室，神气颓丧，面面相觑，形同木偶，我入内也没有人招呼。我很纳闷，心想出了什么奇祸吗？半晌，他们才拿出一通电报给我看，原来是张学良报告日军侵占沈阳的急电。我阅毕，极感震动，觉得形势极端严重，立即想到我同蔡元培、邓演达三人的合作计划，现应根本打消。我随即对蒋说：“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强敌人寇，应当举国一致，共御外侮；而团结全国，首先要求全党团结；目前同西南对立的局面，必须由中央主动解除，争取他们言归于好，非常必要。”大家听了我的话，都默相首肯。蒋考虑了一下，随即问：“谁能去呢？”我立即答：“我是从广东出来的，当然我

去。”态度十分坚定。蒋听了完全首肯，连说：“好，好！就这样办。我们就准备回京吧！”决定后，我同蒋及何应钦三人，于当日下午，搭上专机，飞到了南京。

当晚，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了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主要讨论派代表去广东的问题。会议由蒋主持，首先由他提出我的建议，全体一致赞成。接着有人提出说：“陈真如去是再好不过了，但还要派一二元老同去才好。”又有人提议：“请李石曾、张溥泉两先生同去吧（宁粤分裂初期，李石曾到粤进行疏解，但无结果）！”我因一向深恶李之为人，故立即起来反对说：“如要派李先生去，我就不去。”大家问：“再派谁呢？”我说：“蔡子民先生最好。”有人又说：“蔡子民先生固然好，但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呢（时蔡因不满蒋之所为，早携眷离京赴沪）？”因我同蔡曾有过一段秘密合作历史，心想由我邀他，断定其必来，故说：“国难当头，如中央推定了他，我相信他是会来的。”大家完全同意。会散后，我立即致杨杏佛一电，请他同蔡明早一定来京。次日蔡果然来了，我即陪他去见蒋，经过几度会商。其时，因粤府（广东国民政府）发出马（21日）电，提出解决时局三个办法：“（一）蒋中正下野；（二）取消广东国民政府；（三）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因此蒋亦提出解决粤局的三个原则：“（一）如粤中能负全责，则中央同志，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地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切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此其一也；（二）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此其二也；（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京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此其三也。”蒋另又写一亲笔函交我直交汪精卫、孙科等人，函中有：“弟当国三年，愆尤丛集，过去之是非曲直，弟愿一人承乏，谴责之加，何心复求推卸……毋使五千年神明之胄，自我而斩；毋使亡国之惨史，将

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懂国难之所致”等语。24日，我同蔡、张抵沪，并致粤方诸人一电，告知南下日期，要他们命驾来港，共同商榷救国大计。我们一行于25日乘荷兰船由沪赴港。

南下议和

漩
涡
沉
浮

我同蔡元培、张继等三人于9月28日抵达香港，粤方派傅秉常（孙派）到码头迎接。粤非常会议正式派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同日到港，住九龙半岛饭店，我们立即前往会晤。我除当面递交蒋的亲笔函外，并把蒋的三个原则提出，汪等亦提出他们的马电三办法，随即广泛交换意见，并详细讨论具体办法，惟未作出决定。次日，他们复到我们住的麦斯林饭店会谈，新由欧洲回国的伍朝枢（伍廷芳养子，胡派骨干，接近孙科）亦应邀参加，共同议妥办法两条，由蔡、张同我以艳（29日）电向蒋报告，其要点为：“（一）钧座（指蒋）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粤亦发一通电，向国民引咎，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赴京开会，取消国民政府（即广东新成立的政府），并不以钧座下野为条件，两电须同时发表，电稿均在草拟，容即电闻。目前两方均训令各级党部及报纸，停止两方互相攻讦之言论。（二）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备组织，俾粤方诸同志可以安心来京，在总理灵前，宣誓开会，决议统一政府办法。”30日，我们同汪、孙等入广州，同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等多人晤面，随即至退思园与粤方全体举行会谈。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我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兼淞沪警备司令，此为蒋得我们的艳电后，接受粤方变更京沪卫戍警备组织条件的表示。后粤方又要求调十九路军入京卫戍，作粤代表北来的安全保证，经电蒋后，亦得同意。此时双方表示尚好，和议颇有进展。后粤又提出蒋发表下野通电的日期，因而激起蒋之冲动，他给我们的电，

重提他的所谓三个原则，并带着埋怨的口吻说：“兄等竟忘此三个原则和无条件三字，而来此绝无磋商余地之东电，未知何意？诚令人不解！且中正接兄等艳电提议后，故立任真兄为卫戍总司令官，此亦不愿有条件，渴望竭诚合作之意也。”事情发展至10月5日，粤方决不让步，非常会议决议：“（一）最低限度先释放胡汉民；（二）全体联名请胡复出，函交陈铭枢代表带往；（三）本决议案由京代表电蒋。”同时广东国民政府亦作出决议：“（一）由蒋决定发表下野通电日期；（二）十九路军调宁后，粤代表方北上；（三）俟在沪商有头绪，粤委始赴京。”

后得蒋复电，表示：“对通电原则（即蒋下野的通电），前已赞同，且早愿早发，无所犹豫，惟当此外交紧急，存亡呼吸之秋，不可一日无政府，此电文虽发，电后即未下野，中外心理与事实，实已入无政府状态……如粤中同志能早到沪，或精卫、哲生、湘芹（古应芬）、君佩（李文范）诸兄先来亦可。诸兄朝到沪，此电夕发出。”此电为粤方最初允派代表赴沪和谈的根据。六日广东非常会议发表麻（六日）电，强调“民主政治之先决条件，在使武力受政治支配”；又提出四项办法：“（一）废除陆海空军总司令；（二）设军区，军区之划分，不同于行政区域之划分；（三）军需之独立，革除以个人支配军队、以军队长官支配军需之恶习；（四）国防统一于中央，保安属于地方”等等。至此，双方谈判告一段落。

接着，决定我先行回京，蔡、张暂行留粤，候胡汉民释放、得我复电后，粤代表始北上。我于10月11日返沪，与顾孟余（汪派）、黄华表（桂系）同行。抵上海后，我对记者说：“本人至京复命后，蒋、胡当定期约粤方同志来沪会商，蔡、张两先生回来时，和平统一，即可实现。”其时，我对和谈甚感乐观，以为只要粤方能派代表来会谈，统一局面，不难立致，团结御侮，大有可为，故继又对记者表示：“本人就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时，即将辞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及国府委员，以免以军问

政。”这是我当时主观的想法。

以上是我南下议和的简单过程。我在此行感到突出的印象是：汪对和谈最感兴趣，古应芬、陈济棠最冷淡，孙科和桂系是中间偏向汪之主张；而非常会议领衔的唐绍仪，仅备一格，不起任何作用。和谈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

蒋汪胡会见后的波折

此次宁粤分裂，是以蒋扣留胡为导火线，我在南下议和中，粤方以最低限度须先释放胡为先决条件。10月12日，我到南京，向蒋报告了议和经过后，立即提出释放胡的问题，蒋亦明知此点如做不到，粤方代表是不会来的，蒋被迫答应。次日下午我即去见胡（时胡已由汤山迁回双龙巷住宅，有军警看守），递交了汪、孙等人的联名信，并详述粤中情况，同时劝他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胡表示首肯。我随即劝他先去见蒋，他亦同意，我即陪同他前去。他们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当即由蒋决定，推我及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我们陪同胡赴沪。此为胡自1928年入京后第一次离开南京。当时南京高级官员，每周末都要乘专车到上海租界去度纸醉金迷的生活，惟胡能洁身自爱，从不出都门一步，一时传为美谈。

胡抵上海后，即致电唐绍仪、汪精卫、孙科等人，说：“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然平日自检，担负以往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最切。”最后请粤方推代表来沪，进行和议。至此，粤非常会议乃正式决定派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伍朝枢为代表（后加派邹鲁、陈友仁二人）同蔡元培、张继来沪，进行和谈。

10月21日，上海黄浦江中停泊了一艘外国邮船，载来了汪精卫、孙科等粤方代表，同行有京方的蔡元培、张继外，尚有张发奎、唐生智等多人，连同随员共达100余人。据当时上海报载，当天自晨六时起，江海关码头聚集欢迎者达数千人，反映了当时上海各界对于和平御侮的渴望。南京中央派来以于右任为首的欢迎人员甚多，并以贺耀组任招待。船驶入吴淞口时，我同上海市长张群等人乘小轮直到杨树浦登轮迎接。汪、孙等登岸后，立即到胡寓与胡汉民会商。后蔡、张约我同到孙寓，详细安排蒋、汪、胡的会见。汪、胡、孙等住所，门庭若市，一时上海顿成政治中心。

22日，蒋介石乘飞机抵沪，立即同宋子文会商，然后才约于右任、蔡元培、张继和我晤谈。是日下午一时，蒋到孙科寓所与汪、胡等人会见，彼此握手后，互道契阔，旋即正式举行会谈。出席者为：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于右任、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李文范、邹鲁、伍朝枢、张人杰（静江）、李煜瀛（石曾）、陈友仁、邵元冲、孙科、林森等16人。众人入座后，胡请汪先发言，汪起立说：“同志们年来隔离，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次代表粤方同志，解决一切，共赴国难。”同时并提出粤方三项主张：“（一）国府组织宜如德、法总统制，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除总司令职；（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同时对蒋所拟关于他个人进退的电稿，表示赞同。蒋继起发言，先赞成汪发言，并说：“本人亦如是，公而忘私。”又说：“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我无不同意照行；若我不行，尽可严责。”言毕，李石曾发言，先述及国难和团结的必要，主张大家马上入京，已无须在沪会议。蔡元培、张继等即表同意。孙科立即起来反对说：“我们此来系代表粤府，须照预定程序，议有端倪始可入京，否则须电粤府请示。”汪随即说：“入京本无不可，不过现下若入京，则协议签诺之事，各方

将误会吾人为自由意志，反为不佳。”蒋对汪言，表示谅解，赞成即在沪会议，并说：“胡先生可代表本人。”继又叮咛说：“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无不照办。”在会谈中并正式决议两点：“（一）彼此须求得外交一致，共赴国难；（二）关于党政军问题，由京派代表与粤方代表在沪详商办法，俟将草案拟定，再入京开正式会议，谋彻底办法。”谈毕，蒋即径赴龙华机场，乘飞机回南京去了。此次会谈共历三小时。

此次蒋、汪、胡三人的会见，反映了国民党内部又一次的动荡。自1925年秋，胡因廖仲恺被刺案涉嫌赴苏联时起，他们就开始参商。汪自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悄然离粤，中间经过宁汉分裂、扩大会议、非常会议三个阶段，与蒋对抗；胡自宁汉分裂起，至他被蒋扣留止，中间与蒋两次合作。此次三人会见以后，蒋、汪曾有两次合作，在抗战中汪出走做了汉奸；胡在此次和谈中赴粤，一去不返，继续凭借陈济棠以抗蒋，以终其身。这短短三小时的会见，是他们在此六年间仅有的一次，也是他们毕生的最后一次。

根据此次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宁粤统一会议（即上海会议），粤方代表为汪精卫、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邹鲁、陈友仁；京方代表为李石曾、张继、蔡元培、张静江、陈铭枢、吴铁城。会议在20年前南北议和（即伍廷芳、唐绍仪各代表民国、清廷在沪议和）的伍宅（伍廷芳私邸，为伍朝枢继承所有）举行，共开了七次会议。会议前和会议中发生许多波折，粤方坚持中央政制改革和一、二、三届中委决定党事两提案，京方则坚持政治主张必须根据建国大纲及约法，并强调党的法统，不容紊乱，以与粤方提案针锋相对。就是说，粤方一定要蒋下台，京方一定要蒋呆下去，双方钩心斗角，极尽诡谲之能事。自粤方提出党政改革提案后，蒋公开翻脸，继则因京方“某中委”（吴稚晖化名）发表讽刺粤方谈话，因而引起蒋、胡交谪，舌戟唇枪，互不相让，至开第五次会议时，和谈遂告中断。后经张继等人的斡旋，继续开了第六、第七两

次会议，最后决定京粤双方同时召开四全大会，草草结束了这次会议。

双方分别召开四全大会，已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而粤方召开的四全大会，竟在会上大演“全武行”，部分代表宣告退席，粤方内部再告分裂。后来汪派代表又在上海“大世界”开会，选出中委十人。广东选出中委 22 人之后，大会即行结束。

先是，上海会议决定京粤分别召开四全大会时，曾推孙科、李文范、陈友仁回粤报告，后因粤方内部分裂，孙科负气赴港转澳门，汪、胡等乃在上海集议，决定推胡回粤解释。胡行前对人说：“此行责任重大，决只到港，不进广州，若两派不能一致，本人决不返沪，就将赴欧养痾。”胡之缺乏政治担当，由此可见一斑。他之一去不返，促使了蒋、汪的合流。

蒋介石被迫下野

四全会结束后，主要议程就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粤、沪两地中委仍不愿入京开会。自胡南下后，广东方面的态度更转强硬，粤曾用中常会名义作出决议：“至二十日（十一月）若蒋下野事未办到，即在粤召开一中全会。”至此，蒋方表示愿意立即下野，并同意粤方提出的以孙科继任行政院长。

其时，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全国学生的抗日运动，波澜壮阔，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巨流。首先是北平九大学的学生 2000 多人，发起赴京请愿，要求搭车南下，路局拒不开车。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说：“宁可停车，不许通行。”僵持达数日，平、津铁路交通完全断绝。后张再与蒋电商，始行挂车运送，高举抗日救亡旗帜的学生，胜利地到了南京。不久南京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29 个大专学校的学生，共达一万多人。他们到国民政府请愿，逼着蒋硬着头皮出来接见，后又到中央党部请

愿。值中央常会开会，大家推蔡元培同我去接见，群情激昂，蔡同我均被殴。

在学生到中央党部请愿前，蒋已决定辞职，他曾约于右任谈话，并派我同何应钦赴沪，促粤中委入京主持一切。

12月15日，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举行临时常会，在京中央执监委均参加，于右任为主席，通过决议案：

“（一）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请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

（二）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

会后蒋发表辞职通电，略谓：“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的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诺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徵（五）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使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能实现。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

同日，林森同我联名发表就职通电，大意为：“对于施政大端，一切维持现状，无所更张。即望第四届第一次全会早日开会；政府正式改组，俾完成党国大计。”

我之被推为代理行政院长，全属于粤方的主张，而蒋亦要我来缓和双方的争议，且早已说明是过渡时期的“看守政府”性质。此种趋势，客观上早已形成，无可记述者。惟林森之代理国府主席，且由此一直蝉联到他的死，为时竟达12年之久。在他被推选时，是出人意外的，因林与蒋本不甚密切，在宁粤分裂时，他还是弹劾蒋的四监委之一。因其中尚有一段史话，外间尚鲜有知者，特在此记述之。

当第二次讨袁（世凯）失败，我同林森相识于上海，他同我的几位

朋友都很相契，我很喜欢其恬适淡泊及其山林隐逸的风貌。我以后无论在南京或上海，总喜欢同他清谈，有时同逛夫子庙（南京）、城隍庙（上海），看他搜集的许多假古董。宁粤分裂时，他本在海外，被列名参加弹劾蒋的提案。上海和谈时他始归国，随即到南京，不预闻宁粤任何一方的争议，表现了他的超然地位，但并未被蒋重视。当蒋决定下野时，曾约我到他的书斋密谈，他向我提出将以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我初并未察觉他早已属意于于，以为只是偶尔论及，故说：“于先生固然好，但还有一位更好的人，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此人既有清望，又没有各方面的政治背景，完全符合粤所提的主席标准——年高德劭。”蒋急问：“是谁？”我答：“林子超（林森字）。”他听了恍然若有所悟似地说：“林一向爱清闲，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我说：“我可以劝驾。”蒋立即写了一封亲笔函致林，交我面递。林因事出意外，开始尚有顾虑，经我劝说，他答应了。事后我才知道，蒋早已属意于右任，且有种种迹象，如汪、孙初到沪时，蒋即派于为欢迎的首要人员；蒋、汪、胡在上海会见时，参加者名单，于名列前茅；蒋辞职前夕，特约于密谈，等等。因我心粗，且因和谈事双方奔走，故未暇注意及此。后来闻于因未登上主席“宝座”，还流了老泪，我感到有些歉然。林自正式任主席后，参军长吕超是由我推荐的，侍卫长由我的侍从副官充任。

蒋被迫下野前，早有卷土重来的打算，故设下重重陷阱，使后来者难乎为继。就在他辞职那天，他还主持了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改组苏、浙、赣、甘四省省政府，以他的亲信军人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以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时因孙蔚如部入甘，孙兼任甘肃省府主席，杨虎城因某种原因，觉得困难，故电蒋荐邵为甘省主席，此时乃一并发表），贺耀组任甘宁青宣慰使。

最阴险毒辣的是他还枪杀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邓在上海被捕时，

我正在江西指挥军事，距离我同他密谋合作的时间甚近，但他的被捕消息，是我到了京沪后才知道的。其兄演存累向我探讯消息，我还说：“照目前蒋的情况（逼着他要下台了）看来，他还不致下毒手。”且我十分相信择生对我说的，陈诚是他的人，以为陈总会暗中维护，故很放心。同时我又深知蒋之残忍成性，凡被他扣押的人，若有人出面营救，只会促其早死（实例甚多）。有人曾这样设想：在和谈中若果由粤方代表出面营救，蒋会被迫接受。但应知粤方诸人，特别是汪精卫恨邓之深，并不下于蒋（邓曾公开骂汪，说汪除“倒蒋拥蒋之外无主张”），他们不送“催命符”已算好了，遑言营救？我事后得知，蒋杀邓时，曾组临时军事法庭，由恨邓最深的吴稚晖、戴季陶、何应钦审讯。我闻择生凶讯后，惊悼异常，只得给资交其兄演存，收殮遗骸葬于南京麒麟门外，并亲书“故友邓择生之墓”，竖碑志之。

我代理行政院长职务，为时甚短，约有数事可记：

行政院各部部长及重要司长，莫不纷纷辞职，无论是否批准，是否有人接收，都先一走了事。外交部长顾维钧，留下辞呈径赴上海去了。财政部长宋子文向我提出辞呈，声明只负责到一中全会开会时为止。财政部科长以上人员，都同时总辞职，各署长已不到机关办公，纷纷作鸟兽散。

在此期间（或以前），行政院曾接到溥仪自天津来电一通，表示内向，并请示行止。我记得在行政院国务会议（或中政会议）讨论过。记得当时大家都以溥仪为一“皇室”，扈从人员必多，政府很穷，没有这笔钱来做接待费，竟搁置起来，并不答复。最近我曾托载涛委员询问溥仪对此事的回忆。据复，溥本人对此已记忆不起。又查“中外历史年表”载明：“日本特务拥清废帝溥仪至东北”，为11月间事。此事如不在我代理行政院长期中，则当在以前，因我为中政会议委员及国府委员，重要会议我均参加，至今对此事记忆犹新。

四届一中全会

自蒋介石下野后，各地中委纷纷入京，孙科偕粤方中委同日到中山陵谒陵后，并与蒋晤谈，惟汪、胡均称病不来。1931年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到有中委90人。蒋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以后，就带着宋美龄偷偷地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他的老家奉化去了。蒋行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此为蒋、汪后来在烟霞洞会议的伏笔。同时蒋又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既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次日，蒋果然登上了溪口妙高台。蒋走后，一部分中委力主蒋回京，有主以大会名义“速驾”者；惟另有一部分中委认为可遵蒋意，予以“休养”机会。

在首次大会那天，有名在案的“某中委”吴稚晖又大放厥词，他说：“蒋一再声明亲自北上，收复失地，而北上种种亦有相当布置，今被辞职还乡，个人认为实不该准其辞、让其走，今日上了他的当”云云。在讨论东北事件时，吴又说：“东北事件非张学良酿成，系由于国内有卖国贼，此贼即在眼前。”粤委认为吴是指摘粤委中人，又因吴曾电张学良为蒋打“抱不平”，中有“外不见容于强盗倭寇，内不见容于卖国之贼”等语，故认为吴语言闪烁，显然别有用心，因而群起表示不满。孙科于散会后，愤然乘车赴沪，随即发表谈话，说吴“含血喷人，蓄意中伤”，并表示如蒋、汪、胡不入京，“只有暂不问党事”。

自蒋离京，汪、胡又裹足不前，孙科已成了南京惟一重心人物，且宁粤双方早已协议由孙组“统一政府”。现孙拂袖而去，京方中委亦感

不安，故即派于右任、何应钦、蒋作宾等人赴沪劝孙回京；一面又派人劝吴稚晖不要再随便发言，一场意气之争，始告平息。

26日开第三次大会，决议要案：“（一）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案；（二）通过国民政府主席选举标准，以年高德劭者选之。”

28日举行末次大会，通过决议案如下：

“（一）推举胡汉民、汪兆铭、蒋中正、于右任、叶楚伦、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九人为中执会常委，并以叶楚伦为秘书长。

（二）选任国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案，主席团对于国府人选，提出声明两点：（1）五院院长及所属各部长、委员长不兼国委；（2）现任军人不兼国委。众无异议。

（三）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四）选任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唐绍仪、张人杰、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伦、宋子文、王柏龄、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王树翰、刘尚清、薛笃弼、柏文蔚、程潜、经亨颐、孔祥熙、恩克巴图、杨庶堪、马福祥等33人为国府委员。

（五）选任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行政院副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长，覃振为副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居正为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长，刘芦隐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丁惟汾为副院长。

（六）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1）中央政治会议以中执监委组织之；（2）中政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主席；（3）中央候补执监委得列席中政会议。

（七）选举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为中政会议常务委员。

（八）关于国难会议、国民会议及国民代表大会等之组织及缩短训政实行宪政各案，决议：（1）国难会议由国民政府于半个月內召集，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2）国民救国会议之组织及召集，由中常

会筹议办理；(3) 应从速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筹备召集国民代表机关，交中常会遵照建国大纲妥速议定办法。”

一中全会闭幕时，冯玉祥始到京，当天他着青布短棉袄进入会场，其朴素作风便引起了全场的注意。他在会上发表演说，说：“只有自己到总理陵前痛哭流涕，责骂自己对不起国家，痛自忏悔。党中先进同志，汪先生学识宏富，胡先生是总理信徒，玉祥自己是混账。蒋先生有其长处，有其短处，在郑州同我结金兰时，有海枯石烂、此志不渝之志，结果竟自打起来，致成今日之局。盼同志用手用嘴将此三人拉在一起，到总理陵前认罪忏悔。”这种坦率的语言，为全会带来了新的气氛，引起了我对他的好感。

会后，第一次中常会决议：新任国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副院长定于次年（1932年）元旦举行宣誓就职。接着，中政会决议行政院各部人选如下：

内政李文范、外交陈友仁、军政何应钦、财政黄汉梁署理、教育朱家骅、实业陈公博、交通陈铭枢、铁道叶恭绰、司法行政罗文干、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参谋总长朱培德、训练总监李济深、军事参议院长唐生智、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

所谓“统一合作”政府，至此始正式成立。

孙科政府种种

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蒋、汪、胡为中政会议常委，又为中常会、国府委员，形式上表现了他们的“合作”，但蒋对于军政大权，仍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更由于蒋赴奉化，汪病上海，胡滞香港，他们三人之间，神既分离，貌又不合，以致孙科组织的号称“合作政府”，实际是合而不作。兹将这一阶段的情形，简述如下。

孙科政府既组成，蒋、汪、胡仍天各一方，且互相牵制。时林森曾致电胡汉民说：“哲生为总理单传之子，素为公所爱护者，今既然不避艰险，肯牺牲一切，公而忘私，我辈深嘉其志，尤表同情，似不忍袖手旁观，任其焦头烂额，而不加以援助。”以“焦头烂额”来形容当时孙科的情景，确属事实。其时，我曾致电蒋、汪、胡，其中有：“政府虽告成立，而我重要领袖，犹天各一方，未能荟萃，致使党政最高机关，提挈无人，失其重心，一切安攘大计，何所秉承？”又有：“铭枢负调护使命，从斯即以不加入政府自誓，和平观成之日，即役人卸责之时。嗣因我重要领袖谦让不过，哲生同志受各方敦促，出膺艰巨，以共同负担相要，京方同志亦以此相督责”等语。表明我之参加政府，“乃临时迫于牵率”，且已明知，“以个人利害言，不免徒作牺牲，以时论是非言，岂能尽求谅解”。故在单独致胡的信函中说：“铭枢为求领袖团结而来，非至团结果真绝望时，不敢言去，殆至力尽能竭，贡献无路，然后奉此待罪之身以退，付诸国人论制。”

其时使我感到差强人意的事，就是慨然南下的冯玉祥，与我的意见颇为接近。冯自参加一中全会闭幕会以后，旋即到沪晤汪。冯对人说：“此次南来目的，完全想团结同志，以谋抵制暴日，故望各领袖能在一块负起救国责任。”又说：“若汪于最近期内痊可，当劝其速入京；对胡亦同样希望，必要时拟到香港一行；对蒋亦望其能尽其责，共赴国难。”冯在此期间，对团结合作，极为努力。

在一片劝驾声中，蒋、汪、胡仍无人京表示，孙科于1月8日晚中委谈话会中说：“愿回粤一行，促胡北来。”于右任等力阻，以孙负行政责任甚重，不能离开。孙说：“将短期离京，到奉化请蒋，到上海请汪。”各方仍多方劝阻。散会后，孙即同财政部长黄汉梁乘车赴沪。事为居正得知，立即赶到车站，时车已开动，居即嘱站员摇铃停车，旋登车劝阻。孙坚决表示：“本人定将胡、汪、蒋一齐拉到南京，以求达到

真正团结之目的。”孙到沪后，即电胡速驾，又准备到奉化劝蒋，因未得蒋肯与接见的复电，故未便成行，乃改派何应钦、居正前往。此时的孙科真是彷徨失措，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1月11日，我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先叙述近日奔走情形，并说：“看现在情形，似乎已成革命的退潮，渐至山穷水尽，如革命重心不能建立，听其沉顿下去，即将无声无息地完了。我们必要挽回逆流，重新激起，否则便无法挽救。”其时我对蒋、汪、胡的袖手旁观，已大感愤慨，故又说：“万一三领袖不来，或迟迟其来，重心不立，政府不固，我们也不能等死。无论如何要撑起来向前拼命，为党国争人格，为民族争生存，成败利钝，生死存亡，在所不计。如不能复活民国十四、十五年的革命激情，这个退潮，就挽不起了。大祸临头，迫不及待，大家要一齐振作起来，去求我们的生路。”当时我已意识到中政会之常委如再不来，只有重建政治重心，此为后来与冯玉祥、李宗仁等合作，组织中政会特务委员会的张本。

第二天，孙科同我便在沪约集了邹鲁、李文范、陈友仁、马超俊、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吴铁城等人会商，决定蒋、汪、胡不能入京时，设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以适应国难及迅速处理各项政务。会谈后即一同入京，召开第二次中常会，决议：

“（一）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二）推于右任、张人杰、张继、居正、孙科、陈铭枢、朱培德、何应钦、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陈友仁、顾孟余为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委员。”

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一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未实行责任以前，为应付国难，迅速处理政务起见，于中央政治会议设特务委员会，负其责任。但关于重要方针，仍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其中“但书”是于、张（静江）等人的意见。至此孙科政府虽有较能自由处理政务的可能，但仍有种种限制。

孙科向来是没有肩膀的，他早年在广东时，就有人叫他是“阿斗官”（比喻三国时刘备的阿斗）。在四届一中全会前夕，京方中委会商，讨论接受粤方条件——以孙科继任行政院长的问题时，担任南京市长的石瑛，就挺身而出反对；终因是粤方提出，仍得多数通过。石为同盟会会员、老留英学生，以刚正不阿称于世，我素视为畏友。故会后我即前往拜访，意在疏解。石见我时，声色俱厉地责备我说：“真如先生！行政院长由你来担任就好。孙科是总理不肖之子，其为人好色好货，且不负责任，怎能担任非常时期的大事，这岂不是儿戏吗？”我只好以“委曲求全，力谋团结，共赴国难”应之。我又说：“孙是粤方提出来的，不答应不行。我本想新政府成立时，即摆脱政务，专任军职，才合我保证人的地位，但孙坚要拉我参加政府，否则就不干，我为了贯彻初衷，故只得硬着头皮同孙合作。”石听完了我的话，喟然叹了一口气，默尔而已。

财政外交逼孙科下台

根据上述种种，孙科政府之难乎为继，早已在意料中。若果孙稍为有一点儿担当，情况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最低限度也不会那样短促，即告夭折。兹将当时最感棘手的财政、外交两方的情况，分别概述如下。

当时的财政，正如孙科所说：“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债，于事何补？最近财政、税收，每月不过六百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照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每月仍须一千八百万。”其时，广东自扣留税收后，旧扣未还，新税仍继续扣留；自东北失陷后，东北军经费完全取之于华北，且每月不敷甚巨；湖北何成浚截用江汉关税；山东韩复榘截

用国税；福建地方截用统税……税收情况，极为混乱。

自宋子文下台时，黄汉梁派员接收国库，未得分文现金，而宋还拖欠了银行界 1000 万。因蒋、宋事先各种布置，银行界人物又多老奸巨滑，拒不与政府合作。黄本人为财政界后进，资望甚浅，惟一希望是新任财次林康侯为之策划；但林本人并无特定银行做背景，故亦孤军无援。黄第一次到沪，曾想筹款 1000 万，经多方设法，只得 300 万，照中央军政费 2200 万计算，仅够四天开销。加以各军代表 40 多人，齐集军政部索发欠饷。种种情势，使孙科和我不能不采取新的措施。

当我们在上海讨论设立特务委员会时，曾拟议提用公债基金，暂行停付内债本息。当日参加会议的人不多，除粤方中委外，另有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等人，京方仅我同吴铁城两人。不料上午刚有此动议，下午就有银行界代表向孙科质询，孙未作正面答复，随即返京。第二天，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发出通电反对，北平、天津银、钱业亦通电反对。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证券商人公然提出维持内债信用办法三项：“（一）由持券人自行接收债券抵押各税之税收机关；（二）对于现在经收税收之中央银行及保管内债基金委员会之负责人，责成负责遵守政府从前法令；（三）破坏公债信用及截留税收之政府官员，社会上应严重反抗之。”这是上海商人对政府提出的哀的美教书。事后得知，上海银行界的消息有这样灵通，是因有吴铁城在替他们当坐探。

黄汉梁、林康侯均慑于上海商人的恫吓，当日提出辞呈，孙科也跟着不辞而跑到上海去了（孙像这样不辞而去，先后共有几次）。我闻讯，即乘飞机到沪找孙，见面后，我问：“你怎么又走了呢？”他说：“上海银行界不支持，财政无办法，黄汉梁又辞职了，没有人肯来当财政部长，我没有办法。”我说：“笑话！政权在我们手里，操刀必割，你还怕商人不就范吗？”他又说：“谁来当财政部长呢？”我说：“我早同你说说过，我既被拉入了政府，你纵有任何苦难，我都愿意替你承当！财政部

长没人当，就让我来好了。”孙听了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好了，那就好了。”我们这席谈话，仍然像上次会谈一样，消息像风一样传出去，真是“不胫而走”，立刻传遍了全上海和全国重要城市，乃至港、澳地区。当天下午我就接到在香港作寓公已久的梁士诒（交通系领袖）来电，大意是：“陈将军！你是军人，千万不要在中国财政界开这一恶例（意思是军人不能做财政部长）。”这种半是忠告、半是恫吓的电文，我并没有理会。第二天早上，吴铁城在他家中约集各方面的代表同我见面，到有银行界代表张嘉璈、钱业代表秦润卿、市商会代表王晓籁、债券管理委员会代表李铭、持券人代表杜月笙和张啸林，以及报界代表史量才等十余人，都是当时上海租界的所谓“大亨”，也就是“地头蛇”。我到后刚坐下，他们先向我表明态度，说话的内容，大体同梁士诒的电文相似。我说：“问题很简单，这件事是起于你们，不是起于政府，政府为了维持国家政权，不能因为你们不合作而垮台。我们是革命政府，事情办不通，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来处理。如果你们愿意同政府合作，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诸位想想：我是当财政部长的人吗？解铃还是系铃人，现在政府是否收回成命，全在于你们。”这班人听了我的话以后，纷纷起来表示：“愿意同政府合作，并欢迎黄部长复职。”我答复说：“那就好办。”

此后，张静江又托张群、吴铁城同各方代表会商，最后决定每月由上海银行界与证券交易所共同负担900万，加上政府每月可收入的国税（关余、盐余）有700万，共有1600万。照当时军政费预算，虽然还是不够，若再裁减一些军政费，也尽可维持。

当时，立法院副院长覃振曾就此事对银行界表示不满。他说：“当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一年间发行公债三万万供军费，当局不顾国库损失，以半价抵销，上海银行界利用机会，重利盘剥，对政府视同愚主，数年获利，已甚可观。”又说：“中国资产阶级，平时为政府承销公债，重利盘剥，乱时为私利反对政府，将款存入外国银行（时上海财团将现

款存入外国银行达两万万)，真是国可亡，私利不可不争。”真是一针见血之语。

其次，关于外交方面：自东北事变后十日，南京学生请愿团因激于爱国热忱，将外交部长王正廷殴伤。王辞职后由施肇基继任，时因施尚在国外，蒋即以顾维钧署理外长，留施在日内瓦与国联交涉。当时政府的对外政策，简言之，就是“不抵抗”三字，开始时就完全依赖国联，以为国联万能，可以主张公道，进而裁制日本，竟向国联提出：“日本不撤兵，决不直接交涉”，以示依赖国联之专。后顾又公然自动提请，将锦州划为“中立区”，置东北广大沦陷区于不顾。为了要叙述孙科政府的外交政策，故必须进一步将蒋、汪、胡三人的对日主张，加以概括的说明。

顾维钧就任外长时，蒋介石曾亲书训词，大意为：“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求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这就是蒋后来的“攘外必先安内”与“安内重于攘外”的“理论”根据，也就是他后来对内对外的基本方针。汪精卫在上海会议时常说：“余前曾反对南京政府，但是因民主政治而反对，非因外而反对（意为非对外问题而反蒋）。自他公开与蒋合流后，即高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与蒋的“三日亡国论”相呼应。在他破坏了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后，又亲自进行了许多投降外交，最后终于公开投日，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胡汉民的对日态度，虽貌似强硬，如他说，“应先确定坚定原则，即绝对不屈服于任何暴力”与“不能不有拼命之决心与准备”。后来他在香港曾发表过一些抗日言论，谴责蒋、汪的媚日政策，但都是隔岸观火的空谈。他还有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之链锁，即：“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反蒋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剿共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可见他

们在对日问题上，表现虽各有不同，而究其实际，则全属一致，即“对外不抵抗，对内不妥协”。

孙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是孙科手中的一张王牌。陈在北伐前任广东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同英帝国主义办理过沙基惨案的外交。后北伐军攻下武汉，他在收回汉、浔英租界的交涉中，由于有广大人民做后盾，北伐军的先声夺人，获得了外交上的胜利。据当时报纸记载，陈与英代办阿马利谈判时情景，说陈“胆壮气盛，使英人神为之摇”。可以看出，陈在外交手腕上的运用，确有其独到之处。由于我国近一百年的外交史，实际是辱国史，陈当时有此成就，时论推他为革命外交家，人们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陈于宁粤分裂前数月回国，曾携其新夫人张荔英（张静江之女）到上海、南京一行，意在探亲，旋即入粤，参加非常会议，并任粤府外交部长。后陈曾被派赴日，到东京后，日政府表示，南京抗议已到，故未便正式接待。陈与日外相币原私人接触，已感觉日对华已有决心，不愿与中国谈问题，故匆匆回国。当九一八事件发生后，陈致电币原说：“前游日本时，在东京面谈，执事谓满、蒙为中国领土，日本当尊重中华领土之主权。今突然派兵占领东三省，此种举动，是否与执事前言相矛盾。”后南京吴稚晖之流，曾借此攻讦粤方，说陈之赴日是出卖东北；后又把陈所坚持的对日政策，说成是陈有意洗刷个人名誉，这是怪诞不经之谈。查币原为日本政府的“文治派”，其对华政策虽同以侵略为目的，但在具体措施上与军阀是有出入的。当日军占领东北时，币原曾说：“日本吞并东北，等于吞了一枚炸弹。”后币原为日本军人毒死。

在陈友仁就任孙科政府的外交部长前夕，曾发表谈话说：“锦州事件在今日以前，尚为过渡政府之责，本人不负任何责任，必自明日起，方为新政府责任。但本所知可得言者，过渡政府对锦州曾迭令张学良坚守，昨日仍有电令张，无论如何牺牲，必须坚守。新政府成立，亦必须

继续令张坚守。”陈正式就任外长职后，即发表宣言，仍重申政府决令张学良坚守锦州。后因日军节节进逼，锦州失守，张学良军全部撤入关内；益以日本发动其侨居上海的浪人，烧毁代表我国民族工业的三友实业社，直接威胁东南沿海各地。于是陈友仁建议政府采取对日绝交方针。此一方针提出时，蒋、汪已在杭州会谈，后即相继入京。

1932年1月24日，南京召开中政会议特务委员会，蒋、汪同时出席，讨论对日问题。其他各委均未发表任何意见，惟蒋、汪二人发言最多，论调完全一致，都认为：“已往既不能战，又不能和，今后将为国家百年大计打算。”并说：“陈的外交政策，是不懂国情，徒作孤注之一掷。”继又表示：“决将以忍辱负重、脚踏实地之精神，为有效之努力。”此种论调与曾国藩、李鸿章当时之言论相同，因他们都是勇于私斗，怯于对外的“异代同工”。

同日，陈以他的外交方针未被采纳，故即愤然辞职，与孙科一同赴沪。陈至沪即发表声明说：“过去蒋介石对东三省事件，原是一贯主张其消极不抵抗政策之故，以致锦州失陷，而中国军队且全部撤退于关内，外交问题至是乃愈陷于困难……余经两星期之考虑，以为贯彻和会所决定之政策，则对日绝交之事，实为必要而不可避免之方法。惟此外交政策，为蒋历来所反对，其最近发表对日问题之讲演，以对日绝交为中国之绝路，其论断之坚决，且无磋商之余地，使余对外方针之进行，受严重之打击。余敢警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对于全国人民为日人暴行引起之抗日救国运动，加以武力之压迫。蒋氏至今实力犹存，而其反对余之外交主张，又若是其坚决，此余所以不能不辞职以谢国人也。”同时，孙科亦向国府辞职，其致蒋、汪电中有：“溯自受事至今，已将一月，而最关重要之外交方针，迄未能有所决定。该部长陈友仁亦以贡献之对日政策，未蒙中央诸同志采纳，今已提出辞职，虽科再三挽留，而去志弥坚，未可相强”等

语。

孙辞职后，所谓“统一合作”政府，即宣告垮台。

烟霞洞会议

1932年1月18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在杭州西湖风景幽美的烟霞洞举行会议。蒋、汪合作，孙科政府的垮台，以及此后蒋、汪在内政、外交上的种种措施，均以此次会议为起点。其中内幕，我虽然微有所闻（如蒋在此发表“三日亡国论”），但其究竟，惜未亲自参加，故难臆测。兹将所搜集的当时报刊记载，加上个人回忆和最近朋友们补充的材料，略加整理，简述如下。

漩
涡
沉
浮

1月12日，孙科同我在上海会商设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之次日，蒋就由奉化到了杭州。15日我得蒋电召，即同范其务（前广东财政厅，后任十九路军上海办事处处长）由京飞杭。其时到杭州的人甚多，有顾祝同、贺耀组多人。我见蒋后，将京中情况向他报告，并说明特委会之设，仅在中政会三常委不到京的情况下，便于迅速处理政务。我记得很清楚，蒋对我的谈话，并没有不同意见的表示。当夜十时，我同张群乘火车返沪。车抵笕桥，蒋来电令折回，即下火车改乘蒋派来的汽车回杭，重到澄庐晤蒋。他书亲笔函一封，交我携沪转汪。16日晨至沪，即将蒋函交顾孟余转汪，我随即回了南京。

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行前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和我，说已应蒋邀赴杭，当晚蒋、汪晤面。次日蒋、汪合电致孙科，说他们将候胡来，联袂入京，并要孙电胡速驾。同时，蒋汪又合电致胡，请他北来，“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及诸同志”。17日胡复汪电，除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并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必能发展开一新局”。

17日，张继、张静江由京乘汽车赴杭，当晚与蒋、宋（子文）密谈。次日上午，蒋派毛邦初亲驾蒋自备飞机到京，直入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去（事后我始知悉），当日下午一时许抵杭，即赴烟霞洞。其时张继、张静江正宴在杭各中委，蒋、汪均在座。宴毕即在别室密谈，参加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此即后来所谓的“烟霞洞会议”。

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孙答：“圆满，圆满。”又问：“何时回京？”孙答：“就去。”孙在杭呆了两天，20日同汪一起由沪入京，21日蒋直接由杭入京。此时蒋、汪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拍一合，俨似表演双簧（最近贺贵严委员提供一段当时的秘闻：汪先曾派其妻陈璧君出面同蒋密谈，提出蒋、汪的上台，应出于互相推重，以坚蒋之信任，汪曾表示“誓不一人单独入京”）。原来蒋、汪之间，在此以前已在暗中勾搭。

自蒋、汪先后入京，22日在京中委齐集励志社会谈，开始时由何应钦报告关于接到朱绍良、熊式辉电报前方“剿赤”军事及军实问题，次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人暴乱情形，再次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状况。报告毕，与会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起立发言，说：“关于对日问题，无论和与战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总之金甌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23日蒋、汪、孙等在宋子文家密谈，达三小时，闻对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反对者居多。24日开特务委员会，蒋、汪二人发言最多，其余中委未发表任何意见，会上否决了陈的对日方针。当日陈提出辞呈，与孙科一同赴沪，旋孙亦辞职。以后中执会、中常会均有电致孙，请打消辞意，并派居正、张继、张静江赴沪挽留。后又派何应钦、吴铁城前往，以孙行踪秘密，终日寻找不获。

27日中政会议开会，到会委员60人，汪精卫主席，决议要案：

“（一）函中央执行委员会，本会议常务委员已进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

（二）成立外交委员会，选出委员人选，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顾孟余、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干为常务委员。”

28日开中常会，对陈友仁在上海所发表的谈话，以其忘却党员立场，外长非责任内阁比，外部以上尚有中政会决定方针，不能以政策不行而走；以党员论，为干犯党纪，以国民论，为丧心病狂，决交监察委员会惩戒。

同日，又开中常会，蒋中正主席，决议：

“（一）行政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兆铭为行政院长；

（二）立法院长张继辞职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孙科未到职以前，由覃振代理。”

就在当天晚上开会后的数小时以后，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体人民的推动下，在淞沪揭开了民族抗战的序幕。

两起举国震惊的暗杀事件内幕

沈 醉

1933年与1934年，杨杏佛与史量才先后被军统特务暗杀于上海和沪杭公路，其间经过当时外间传说颇多。我于1933年参加军统（当时为复兴社特务处，以后才改为军统）特务组织时，即在上海华东区（以后改上海特区）担任过区交通与组长等职，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抗战期间，军统大规模举办特务训练班时，我又长时期兼任许多特务训练班的“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罪恶活动）基本教官，负责主编过军统各特训班的行动术讲义，将这两件血案均列为教材。在编写讲义过程中，曾多次向两血案直接主持的凶犯赵理君搜集过有关材料，并调阅过有关档案。现就记忆所及分别写出案情经过，但由于事隔多年，可能仍有遗漏与错误之处，尚请了解当时情况者有以补充和指正，俾使此项震惊当时的反动暴行能更具体地揭发出来，更清楚地看到蒋介石集团的凶狠嘴脸。

1933年6月18日早上，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发生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暗杀身死的事件，曾轰动一时，极为各方面所重视。这是戴笠所领导的特务在上海租界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多年以后，一直为军统特务们所最爱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

两起举国震惊的暗杀事件内幕

而局外人却很少了解其内幕。蒋介石当时决定杀杨，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自1933年初，宋所发起的人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了同盟的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他们即为蒋所厌恶。因对宋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恐怖的威吓。加上杨于1933年春天又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不但到处鼓吹人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便造成了他致死的主因。

戴笠奉命杀杨是在1933年4、5月间，杨从北平回上海不久，就开始了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即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杨嗜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每天早上有空便去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正进行准备时，蒋介石却不同意在这个地区动手，因为把杨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的目的，又增加反动政府本身的麻烦，怕引起各方面指责非破案不可，便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特务力量又可以不负责任破案。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当时那一带均系住宅区，来往的人很少。戴于6月初即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化名赵立俊、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上海负责军统行动工作多年，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赵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及几个行动员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组部也设在那里。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六人，事前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17日早上动手，因为凶犯们刚一到达中研院附近即碰上法巡捕房一辆巡逻警车，以后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因此凶犯们不敢动手即分别溜回。18日早上6点多钟又由赵理君带着凶手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向马斯南路转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分散在中研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约8时左右，便看到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特务们便走近门前。杨等上车后一会儿又走了下来，特务们还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的时候，杨领着儿子又登上另一辆汽车。当汽车徐徐驶出亚尔培路32号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杨先生一闻枪声，立刻知道是要杀害他。因早在一个多月前便接到过几封恐吓信和特务寄给他的子弹，一再警告过他，他不但置之不理，还比过去活动得更积极，但没有预料到特务们真正敢对他下此毒手。在这生死关头，杨自知不免，但因爱子心切，立刻把身子袒护着小佛。所以特务们连发十多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凶犯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上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一听到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车开动。这时过得诚因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去追汽车时，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着“等一等我”。赵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还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向他发射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他的要害，便加足马力开车飞奔。这个凶手刚完成任务，没想到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他还是想挣扎着逃命，但四面围追过来的巡捕已快接近他时，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一弹从胸侧穿过，他虽痛极倒地，却仍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杨先生抵医院不久即以重伤不及救治逝世。

过得诚经急救之后，到下午即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向他追问，曾说出他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

但还不敢说出真实情况。当时戴笠听到杨被刺身死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但一听到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长的军统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接近过。当晚，这个凶犯便也弄成了“重伤不治”而死去。第二天报纸刊出杨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刺杨时，因凶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去云云。20晚日上，戴笠便很得意地回转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戴对于过得诚之死，除了假仁假义地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抚恤，过得诚的儿子也一直由军统负责养育。到抗日战争期间，戴笠还想以过得诚这种“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来教育特务学生，曾多次在对重庆等特务训练班学生们作“精神讲话”时，一再赞扬他；以后在重庆修建中美所范围内的马路时，又把一条路命名“过得诚路”。

当杨杏佛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又举行追悼时，华东区一些担任情报工作的特务又不断去那里侦察监视，看有些什么人去掉唁和当场说些什么话。当时去的人最为特务们所注意的还是宋庆龄先生。她在20日下午带着两个女秘书到殡仪馆吊唁，表情异常悲愤，语气也很激昂。当一大群新闻记者（其中就有特务利用记者身份的几人参加在内）包围着她的时候，她当即表示为此事已发表了一篇声明向全世界公告，指明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吓倒。可是人权保障同盟副主席蔡元培却真被这一血腥罪恶行动吓破了胆，一再声明已辞去了副主席职务，并不再过问这些事。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先生，特务们对这些人也很注意，并将他们去的情况和当场说过的话一一汇集起来报告南京方面转报蒋介石。

* * *

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我所了解的主要是

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再加上他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意于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正如《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上钱芝生所说的致死的原因，这里就不再重述。可是当初军统华东区行动组奉令去杀害史量才的时候，戴笠却说史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而真正的主要原因，一直到抗战时期我在重庆重行整编军统行动课程教材时才弄清楚。但在讲课中举这一血案为例时，却还是说他因得到日本人支持在搞上海独立运动，是一种“叛变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而不敢把这些真正的原因让学生们知道。如果仅仅是由于申报有过一些反蒋言论引起CC的不满，便不会由军统去暗杀，而要由CC领导的中统去执行。因当时戴笠和中统一直在闹摩擦，他是不会为中统效劳的。

史量才于1934年10月间去杭州调养胃病，给了特务们一个最好下毒手的机会。他一向提防反动派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上海人叫保镖）。戴笠于这年夏秋间即奉到蒋介石命令要暗杀他，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没有找到，戴就亲自去上海布置。他最担心的是怕又和暗杀杨杏佛一样，凶手逃不了而泄漏出去，引起严重的麻烦。以后监视史的特务们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的汽车司机结识，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戴笠才决定不在上海租界内进行。不久，史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于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因不但警察局长赵龙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这样一来便是自找麻烦，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去进行。

参加这一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汽车司机张秉午（河北人，抗战期间任军统汽车大队长）。使用的汽车是当时军统经常用来搞暗杀绑架的一辆老式别克牌敞篷车，平日停在南京鸡鹅巷53号军统接头处。

当史量才决定于11月14日由杭州乘自备汽车回上海的前一两天，特务们便从司机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先由赵理君去察看动手的地点，选择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72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是10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先是用京字72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到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张秉午曾多次向我谈过这一段情况，军统的老司机们一向把这辆车叫做“功臣车”，因当时军统汽车很少，经常要使用到它。抗战时戴笠还叫人把它驶到重庆，便很少再去用它。

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泳康的同学邓祖询。这是因为特务们误认邓为史的保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以灭口。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史泳康父子便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又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泳康，一连发射

20余弹，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走。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却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枪声停止了约半小时后，史咏虞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血案发生以后，举国震惊，责难纷起。蒋介石和汪精卫还猫哭老鼠地严令江浙两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奖金。同时，特务们又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了一笔五千元的犒赏费。以后特务们见面时还曾以此开玩笑地说：“如果自己破自己的案，倒可多得五千元的奖金啦！”

破译日本密电码的特殊经历

王 维 钧

密电检译所的成立

漩
涡
沉
浮

我于1932年夏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对口就业极为困难，经光华教授颜任光老师的介绍，参加了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工作。局长为温毓庆氏（以下简称温），温氏早期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温与颜都熟习无线电技术业务，我国第一座国际无线电台——真如国际电台是由颜温二氏于斯时共同筹划建立的。颜当时系交通部电政司长。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策划侵略并吞我国的阴谋，其使领馆遍设在我国大、中城市，有时还深入内地探测各种情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自行秘密建立大功率无线电台，直接与东京外务省通报联系。日本使领馆人员通过各驻地的我国电报局拍发电报极为频繁。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野心和行动，严重地打击了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党内一部分显要就打算收集对日情报工作，以维持其统治政权，并作为对日交涉讨价还价的依据。

1934年秋初的一个星期天，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长温毓庆约我到

他的上海住宅，说有事和我商谈。我如约去后，温首先向我谈了很多抗日的道理，接着他拿出一张日本外交密电报底，问我能看懂否？我说看不懂。温就接着说：“对日战争，迟早是要打的，宋子文部长已向蒋委员长（以下简称蒋）谈过，要研究日本的外交密码。我已用英文写好一份建议书，请你翻译成中文，并用正楷抄写在手折^①上，由宋部长转上去。”温毓庆最后叮嘱我说：“这件事务必严守秘密。如果被日本人知道了，就会有生命危险^②。就连你的妻子也不能讲。”我听后，心情极为兴奋。就很认真地将温所写的建议译成中文，并用毛笔工整地写在手折上。这次谈话是用英文进行的。温的英语很好，英文很通顺，但中文不行。我写好后交给了他，就告别返家。记得当天上午为完成这项工作，连午饭都忘却了。在返家的途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学生时代参加了抗日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运动，现在开始就要做一些抗日的切实的工作了。

手折的内容大意是建议研究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所拍发的往来密码电报。除逐日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上海电报局和国际电台所拍发的来往密码电报外，还要逐日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中国内地以及南京大使馆来往的密电。香港电报局是由我国政府管辖的，也可收集香港日本人来往的密电。有了这些密码报底，才能做分析研究工作，在解决了它的密码组织之后，才有可能将日文转译成中文。建议先行聘请少数人试办，等以后有了成绩再行发展等语。

事隔两月未见动静，我曾向温探询那个手折是否已批下来了？温说没有。

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一次改组，原交通部长朱家骅去职，

^① 手折是当时流行的下级向上级提建议的一种小册子，约同现在小本工作本大小，用一整张纸通长折成数页。

^②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到处横行，并可随时暗中将中国人逮捕杀害。

改由次长俞飞鵬代理部务，同时颜任光辞去了电政司长职务，蒋介石手谕任命温毓庆为交通部电政司长。温毓庆由上海去南京就职时，亦将我带去南京，任交通部技士，在电政局办事，实际是做他的秘书工作。当时由于这项秘书工作十分繁忙，已无暇考虑研究日本外交密码之事。

我在电政司工作四五个月后，温毓庆才告知，那个研究日本外交密码的建议，已经蒋介石批准了。定名叫密电检译所，是一个极为保密的机关，直属蒋介石本人领导，设在南京市新市区西桥七号，是一幢比较僻静隐蔽的二层小洋房，并有一个小院落。

估计蒋介石手谕温毓庆任电政司司长之时，也即批准温毓庆研究日本密电码之日。密电检译所的成立约在1935年初。

温毓庆嘱我白天仍和他在电政司工作，晚间和他去西桥七号研究日本外交密码。每日下午，我从电政司下班后，赶回家吃了晚饭，就匆匆忙忙去到西桥7号。对家人讲，我是去教晚课。每晚都要搞到11时至12时才离开。温毓庆也亲自参加研究工作，每晚同样搞到深夜才离去。

顺利地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码

温毓庆系宋子文的姨表兄弟，广东台山县人，留美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任宋子文的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和财政部参事等职。在蒋介石内战中，曾为蒋介石研究过中文密电。那时，一般人士都认为他背景很硬。温毓庆曾和我谈过，在蒋介石与唐生智交战中，他曾截获了唐生智的一份密电，哪知系唐颁发的一个月的军用口令。由于蒋介石获得这一情报，因而能出奇制胜。温毓庆曾为蒋介石在蒋、桂，蒋、阎，蒋、冯的内战中，破译过不少密电码，提供了适时的情报。有助于蒋的胜利。一说因温向蒋索取1亿元高额报酬而激怒于蒋；一说因其内部人事倾轧，温放弃了中文密电研究工作，交给其妹婿黄季弼负

责，改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以下简称毛）领导。定名为“中文股”。当时的中文密电码变化极其简单，多采用加减法，破译容易。研究日本外交密电码则难度要大得多，组织变化要复杂得多。

在温毓庆就职电政司司长之后，电政司就秘密行文，通知全国各地电报局和上海国际电信局，将当日所有日本使、领馆人员所交发的来往密电，每日抄送报底1份，寄至电政司。香港电报局的报底是温毓庆去香港联系的。这些都是研究的原始材料。起初，这些寄来的大宗报底均交温毓庆收存。自从他叫我参加这项工作后，每日这些报底改后由我收集，每晚带至西桥7号。

我去参加密电检译所工作时，西桥7号已有3人在工作，再加上温和我，共5人。其中有1人系日本留学生，名叫霍实，广东人，与陈铭枢有交往，曾宣布脱离殷汝耕冀东伪政权逃来南京的。一人系交通部电政司日文报务员，名叫叶钟骅。一个姓连的负责行政事务工作。那时的工作还没有细致分工，都是大家一齐动手来做，但也各有重点。熟习日语、日文的人偏重研究日文、日语在电码中的应用；温毓庆和我均不懂日文、日语，就研究其密码的组织构造。我们首先在大堆的报底中先找到报头标志，分门别类地归类，然后做统计、归纳、分析、研究工作，研究其密码如何构成；日本的电码不像我国的电码是用数字来表示，它是用英文字母来表示的，它是用两个英文字母来代替日文的片假名字母的编码，然后再进行任意的、不规则的各种变化来迷惑他人。这种变化有比较简单的，也有比较复杂的，但使用次数多了，总有一定规律性可循，深入下去，就可将其逐个解决，顺理成章。将其杂乱的变化的组织理顺后，再根据其字码出现的多寡，词字出现的多寡，及其文字在电报中的习惯用法，按照一个国家语言、文字使用频率曲线，就可研译出电文的全文。密码的诀窍在于不时的变换，又能迅速的译出。破译的可贵，贵在于一二日内和寥寥可数的报底中迅速解决。

抗日救亡，是人心所向。国家民族的观念，当时紧扣着人们的心头。因此，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大家情绪高昂，干劲很大。每晚都要工作到深夜才散，温亦伴随我们到深夜。密码检译所成立不久，就很快破译了两种日本外交密码。记得我们工作不久，即归纳研究出一种 LA 密码。这个 LA 密码组织是比较简单的，是日本外交人员在国外使用的一般通用密码，通报一些日常工作之用。这个密码一直使用到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更换。因此，密电检译所能逐日译出一些日本外交密电情报，历久不断。译出的日本外交密电，起初逐日送至机要室毛庆祥转蒋介石。当时军统、中统也争相研究日本外交密电，但始终无一突破。译出的日本外交密电的内容，大致是日本外交人员的来往行踪和调动，使、领馆的经费等，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对华外交上来往的意见。这时正是日帝进一步攫取华北，蒋搞何梅协定之时，破译了一些有关日本在这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对蒋并未起多大作用。丧权辱国的外交，本无外交可言，至多作为蒋在出卖华北主权上和日帝作讨价还价之用，华北还是被出卖了。

此时，温毓庆叫我为他写一个报告给蒋介石，除报功外，报告日本外交密电码已能破译，并要求扩大组织，增加人手，增加经费。蒋介石不久就批准了。

扩大规模，自行设台

这时日本比较复杂和重要的外交密电码尚不能破译。在蒋批准扩大组织的报告之后，温毓庆即着手网罗人才。1935 年秋，我的表兄，光华大学同学杨肆（光华数学系毕业，以下简称杨）在南宁广西大学任数学助教。因他在数学上对排列、组合方面有些研究，温毓庆即同意他来密电检译所工作。杨来后，我因交通部电政司的工作极为繁忙，即向温辞

去密电研究工作，交杨负责。我仍作为温的秘书兼做有关密电检译所的秘书工作。

杨肆来后不久，就能破译日本外交使、领人员的比较复杂的和比较重要的密码组织。日本东京外务省在对华外交上的一些指示以及他们在华使领馆人员的行动，可以从破译的密电中获悉一二，从而可以获悉日帝对华的一些动态。并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大使馆设有秘密的大功率无线电台，和东京外务省直接作通讯联系。当时，日帝侵吞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双方外交关系，有随时断绝的可能。万一使、领馆人员下旗归国，所有研究日本外交密电码的报底来源也就随之断绝。温于是决定，一面在鼓楼附近设台侦察日本在南京大使馆的秘密电台，从而取得日本外务省的对外通讯联系，一面自行训练报务人员，准备设台直接侦收日本外交密电，以取得今后密电报底的来源。同时，也预见到中日战争在所难免，一旦抗战发生，进一步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的陆、海、空军的密电，也是极其重要的。

温毓庆在电政司下设立一个侦察电台，指定一位工程师负责，配备军用收报机两部 and 定向装置，由日文报务员数人，日夜轮流侦察日本大使馆无线电台的所在。叶钟骅曾参加这项工作。温毓庆同时与军统通讯科长魏大铭（以下简称魏）^①联系，亦派人协助。不久就侦察到日本大使馆确实设有秘密无线电台，并且就设在大使馆的院内。同时也就侦察到电台呼号、波长、通报时间等。进而侦察到日本东京外务省的国际无线电台以及它和世界各国首都的大使馆的通讯联络网，都侦察到了。这就为密电检译所对日本外交密电研究，打开了广开门路，发展了研究范

^① 魏大铭原系国际无线电台技术熟练的报务员，后应军统的要求，调给军统。

围，并取得切实可靠的报底来源。

温毓庆还与康泽合作，在羊皮巷合办了一个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交通队，培训报务员 30 名，为自行设立侦察电台，侦收日本外交密电作准备。这个训练班结业后，未继续举办下去。以后报务员的来源是温毓庆委托魏大铭培训供给。

1935 年底，密电检译所的研究工作已取得较好的进展，日本外交密电多数已能破译，自行设台直接侦收日本外交无线电台密电亦具备了条件。温毓庆再一次写报告给蒋介石，要求增加研究人手和报务员，自行设立侦察电台，侦收日本外交无线电密电，并要求发给一部分外汇向美国 RCA 胜利公司购买当时最新的军用收报机。这个报告也很快就被批准了。

1936 年，密电检译所已初具规模，在研究工作上，已能跟上日本密电码的变换而及时破译。在报务侦收工作上，除电政司所属各地电报局抄送的日本人拍发的报底外，自己已设台侦收以东京外务省为中心的日本外交国际无线电台密电。当时进行了工作分工。成立了一个研译组，一个研究组和一个侦察电台。研译组由霍实负责，研究组由杨肆负责，侦察电台台长为梁伯仑。研译组聚集了日本留学生约六七人，其中有冈石麟、孟广治等，叶钟骅参加了研译组。在解决了日本密码的组织以后，由这个组研究出日本的明码电文，然后再译成中文，加工成最后的产品送出。研究组网罗了一批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约六七人。这时，我的光华大学同学杨贻清、李立民等相继被录用进来，他们都是光华数学系毕业。研究组进行各种密码的打字、分类、统计、归纳、分析、研究工作，找出其中的规律性，解破各种密电码的组织。只有密电码组织解破了，才能进一步研译出日文的电文，进而翻译成中文。侦察电台购置了军用无线电收报机约四五部，配备报务员约 20 人。报底抄收质量也是极为重要的，只有抄收正确无误，才能促使研究人员找出其中的规律性。

同时还有打字人员、事务人员和医生等数人。

密电检译所原在西桥七号的住所，已不敷应用，改迁至新市区山西路十四号两栋较大的两层楼房，研译、研究两组各住一栋。在撤离西桥七号时，我将住宅内外，前前后后，彻底清理一遍，将所有不需要的文件资料彻底焚毁，不留痕迹，因为这个机关当时还需要极端保密的。

当时工作流程是这样的：电政司收集来的报底和自行抄收的报底，每日有100份之多，均送给研究组进行分类打字，由各研究人员解破其密码组织。凡已破译的密电码报底，即送至研译组译成中文。由研译组复写3份，1份加火漆固封，由专人每日送至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由他转给蒋介石。另1份加火漆固封送交我转给温毓庆阅看。而后退还给我归档。另1份留研译组存档。此时每日译出的成品达50—60份之多。

在筹办初期，密电检译所的经费每月大约为1800元。有一次温的财会人员不在，温毓庆将蒋介石的手谕交给我前往军需署会计科具领。手谕写明“发给温毓庆特别费1800元”，下署“中正”二字。估计初期每月经费大约如此。及至1936年，密电检译所共约有人员40余人，经费大约已增至5000余元。

七七抗战和南京撤退

进入1937年，对日形势日见紧张。我们的工作亦随之紧张。但大家的情绪是异常饱满。因为抗战很快就要爆发了，因而我们的工作也很有起色。日本东京外务省对华交涉上的一些指示，可从破译的密码中获知一二，日本外务省和巴黎等国外大使馆的通讯也能破译。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抗战形势，全面掌握日本外务省的通讯联络是十分必要的。这时，军用收报机迅速增加到20余部，报务人员增加到50余人左右。同时筹备自己的通讯联络电台，为今后战时分开通讯之用。这些新增加的

报务员均委托魏代招代培的。电台台长原已是魏的推荐。这就为军统后来染指这个机关带来无穷的后患。

我的表弟，也是杨肆的堂弟杨德基（后改名杨述）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青少年时期，思想就比较激进，清华读书时期，在清华做抗日救亡工作，一二九运动时，负责宣传工作，并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每次放假回家，以及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南下抗日时，路过南京和我们见面，有时寄宿在山西路十四号。杨肆曾将我们所从事的工作转告给他。这是我和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最初联系。

七七抗战终于爆发了。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救亡图存。这给我们以很大的力量和智慧。日寇在进攻上海时，当时它原地兵力单薄，我们多次从日本外交密电中收到其从海上增援上海战争的消息，以及部队番号 and 人数，我们多么盼望能从海上予以拦截，消灭它，但这对蒋介石是无补于事的。这时，上海失守在即，南京亦将不保。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不能不考虑我们今后工作的安排。我们所依靠的国内各电报局抄送的日本外交密电行将断绝。温毓庆于是决定全力侦察、抄收以东京外务省为中心的国际无线电通讯和日本国际无线电台的通讯。并准备进一步侦察日本在华陆、海、空军的无线电台，研究在抗战中的日本军事密码。同时，建立了自己通讯用的联络电台。俾将来分散后的通讯联系。香港电报局的报底此后尚可陆续寄到。

进入9月，南京形势更趋紧张。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西迁重庆，交通部先撤至汉口，再去重庆。电政司大部人员迁至重庆，一小部分人员则随蒋介石的行营撤至长沙。10月初，我随电政司一小部分人员首批乘江轮去汉口转往长沙。在我从南京撤退之时，电政司人心惶惶，各自料理自己的私事。办公室内的一切文卷档案无人过问。为了不让这些文件在日军占领南京时落入敌人之手，我曾将档案柜内的文件亲手予以销毁，不留痕迹。

在我撤离南京时，密电检译所撤至何处，请示蒋介石时，未做定案。我们于是决定，将研究、研译两组随蒋介石行动。侦察电台撤至长沙，以后用自己的电台通讯联系，专人传送抄收的报底。

我到长沙后，即为侦察电台租了一栋旧式大宅院。对外名义是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交通队。侦察电台不久就由南京迁来长沙。研究、研译两组 11 月间迁至汉口。电政司在长沙的一小部分人员于 1938 年初又迁至汉口，与交通部合署办公。我亦随之来到汉口。侦察电台则留长沙未动。

在长沙、汉口的一段时期，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空气十分浓厚。这直接推动我们工作的进展。这时，日本外务省与世界各国首都大使馆的无线电通讯密电几乎全部能侦收到，并可从日本国际无线电台抄收到一些日本外交密电。日寇在华的军用电台也能侦察到一些。香港电报局的日本密电报底则逐日由航空寄来。从所破译的情报中有时有一些蒋政权下的大员与日寇暗中秘密来往的消息。记得我们曾侦收到一份外交密电，系蒋手下人员与日本人暗中来往的一些人员的姓名，其中有霍实的名字，我们十分惊讶。但此情报送出后，未见有任何动静。

在武汉，集中力量侦收日本军用密电

密电检译所的侦察电台以及和魏大铭的日常联系，以往均是由温毓庆亲自掌握的。我由长沙到汉口后，温就即改由我和他们联系，有些重要事项才请示温毓庆处理。我和魏大铭的相识，也是在汉口由温毓庆介绍的。在以后和魏的往来中即感觉到“军统”有攫取这个组织的野心。这时，侦察电台集中力量侦察前沿日军的军用电台，并已能掌握其前线各部队各自的局部的通讯联络和呼号、波长，以及呼叫时间。

在武汉时，国民党政府又经过一次改组，俞飞鹏辞去交通部次长和

代理部务的职务，改由张嘉璈任交通部长。温毓庆的电政司长职务未动。温系宋子文派系下的人员，张与宋在宋夺取了张原先掌握的中国银行大权之后，彼此矛盾很深。张对温虽更换不得，但也是有成见的。加之电政司内部本分有两派，温是在北京邮电派的拥戴之下的。这时上海交大派（其领头的是CC系统）因政治空气的变化，就在内部掀起倒温的暗流。所以，温在交通部的处境就不佳了。记得1939年底，张欲派温出国考察电信业务。（这是当时一种较体面的更换职务的手法）温要我写报告给蒋请示。随即由侍从室以蒋的名义用代电^①通知张嘉璈，说温司长公务在身，不宜出国。于是此议作罢。但不是问题的终结。

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不宣而战。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全面抗战，南京日本大使馆不得不下旗归国，在我国各地的日本使领馆人员不得不全部撤退。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为非作恶的行为也就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到达汉口后，大家认为密电检译所已没有作为绝密机关的必要。温是主张所为一个保密机关对待有利。这是内部一些人员对温有了矛盾的萌芽。大家认为，工作以来和家庭通信，说不出所在机关的名称，和亲友见面，说不出机关和职称，长期成为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感到很不方便。希望有一个可以公开的名称对外。经请示温毓庆，暂沿用了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交通队的名称。有些对外联系工作，也就用此机关名义了。

和中共取得联系

在汉口时，研译组和研究组是租赁靠近郊区飞机场附近的两幢小洋

^① “代电”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公文格式，显示比一般公文重要，但不以电报方式发送，将行文抄录在“代电”纸上，以书信方式发送。

房分别办公兼住宿的。我的表弟杨德基这时也来到汉口，由于研究组的人员不多，加之都是同学亲友，他又是杨肆的堂弟，所以他经常寄宿在研究组。大家不以为意。这时他已介绍杨肆和当时在汉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王明见了面。不久，杨肆将此事告诉了我，并约我准备一起去会晤当时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有一天晚间，我们3人一同过江前往汉阳一个茶馆的楼上，秘密与李克农见面。这个茶馆面临江岸，我们走上二楼，即见楼上仅有一位戴着黑色茶镜的人独自沿着栏杆面对江心坐着。我们3人走近后，德基将我们2人分别介绍给李克农。寒暄后，杨肆将日本密码组织的情况相告，告知系用两个英文字母代替日本的片假名字母。我将我们侦察电台呈送给温毓庆的一本最新侦察情况总结报告给李克农。这是厚厚的一本总结，内绘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讯联络网以及在华日军前沿军用电台相互联络通讯的联络网，并有电台呼号、波长和通报时间以及文字说明。这个总结，按月呈送1本，温毓庆阅后即交我保存，封面注明电台台长梁伯仑和他的名章。李克农同志接过去后，即对我们说：“我们也要研究日本密电。”这是我们正式和党取得联系的开端。在武汉时，读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心胸豁然开朗，更加增强我们抗战的信心。

在武汉尚未沦陷时，我们家乡一些亲友和要好的同学，因不堪家乡沦亡、做亡国奴的痛苦，纷纷逃来汉口，甚至举家迁来。大多数青年亲友和同学均通过德基的介绍去投奔延安，其中有叶林同志夫妇等。举家迁来的路过汉口，前往重庆、成都定居，个别的以后又辗转到了延安，例如德基的全家。在当时我们是可以将这些青年、亲友、同学介绍给温毓庆的，因为那时研究日本密电也正需要人。但看到国民党政府贪赃卖国、腐化无能，是没有光明前途的。

在桂林相继破译了日本海、 陆、空军密码

在武汉沦陷前1个月，密电检译所即迁至桂林。我在武汉沦陷前1星期才离开汉口，此时电政司的一小部分人马迁到衡阳，我也就到了衡阳。在长沙大火之后，电政司又从衡阳撤退到桂林。这条撤退路线是随着当时蒋介石行营的行动而行动的。

温和我在衡阳时，杨肆来看望我们。杨和温在一起谈话，话不投机就吵了起来。温把帽子向桌上一扔，对杨肆说：“你滚。”杨在气愤之下对我说，决定离开密电检译所投奔延安。吵后温和杨肆均去桂林。我仍和电政司人马留在衡阳。我考虑杨离开去延安也好，不打算挽回此事。过了一星期，温几次叫人打长途电话给我，要我速去桂林。杨肆也来信要我去桂林。我到了桂林，温表示要挽留杨肆；杨也说研究组的同事不愿他离去，意思就留下来。这场内部的风波也就这样平息了。

南京撤退辗转长沙、武汉、衡阳、桂林之间，所谓戎马倥偬，对日军军用密码的研究未能专心致志，尚无成效。到达桂林以后，有一个喘息机会，温毓庆即着令侦察电台集中精力侦察抄收日本太平洋海军军舰无线电通讯联络。当时就侦收到了一些日本军舰的通讯来往，并可以从中获知其位置和调动情况，其密码也能破译。侵华陆军的密码也破译了一些。日本关东军的密码，逐日抄收的报底很多。虽努力钻研，未能破译。它另成一个系统，其密码组织的构成，始终未能突破。不久，又掌握了日本的空军密码。日本陆、海、空军密码，其组织的严密性，均不如其外交密码，特别是空军密码，更为简单，一经抄收到其通讯，随时就能破译。但它们都更换频繁，必须紧跟不放，才能随换随破。

1938年，汪精卫已是公开的投降派。他和日本的往来，可以从破译

的日本外交密电中获知一二。汪精卫派要员陈公博、曾仲鸣、周佛海、褚民谊等与日寇的往来，电文中均有报道。抗日胜利后，据《中央日报》登载的消息，陈公博乘飞机逃往日本时，根据破译的密电，才得悉其行踪的。蒋介石手下某些大员也有暗地派遣人员在上海和日本保持某种联系。我们到了重庆以后，也曾从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见到云南龙云也派人和日本秘密接触。记得这个密电码是使用比较复杂的组织拍发的。后来蒋介石向龙云发难，指摘他有通敌嫌疑，就是根据这个情报。相反，在我从事这项工作的8年中，从未见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任何一个人员与日寇有往来的情报。

在破译日本陆、海、空军密电码之后，密电检译所又进行了一次扩充，军用收报机增加到30余部。温毓庆从香港和其亲友中招来理工大学毕业生数人，充实了研究组的人手。其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努力，有的迅速成为能手。例如陈振泰、丁绪曾等人。

由桂林迁到昆明，继迁重庆

1938年底，密电检译所大部分人员由桂林迁往昆明。那时贵阳到昆明尚无公路可通，人员和机器只有假道河内前往昆明。桂林和昆明均非蒋介石的地盘，这个机关设在桂滇系所在地，均是温毓庆亲自与白崇禧、龙云洽商同意的。假道越南也是温毓庆与越南当局亲自交涉商妥的。

研究、检译两组和侦察电台均迁到昆明，昆明和重庆的通讯联系由自己设立的电台联络，信件用航空传递。在重庆只有几个行政人员和报务员数人。1939年下半年，温毓庆考虑密电检译所主力放在昆明不很妥善，于是又全部迁来重庆。

我于1939年初随同电政司的最后人员由桂林撤退。沿桂黔、川黔公

路到达重庆，与早期由南京、汉口撤退到渝的人员汇合，大家相见甚欢、大家又团聚在一起了。

1939年初，蒋政权的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机关大都撤退到渝，有了一个较长期的喘息机会，蒋政权下的派系斗争益趋激烈。日本虽不紧逼，但侵占武汉以后，仍用兵西进。1939年春，日本数次猛烈轰炸重庆闹市区，火光烛天，群众惊惶万状，夜间人声鼎沸，数日不停，扶老携幼，迁往乡村。电政司在渝的临时办公地址，这时亦被毁于火。密电检译所由于迁至昆明，未遭损失。温毓庆到渝后的处境较前更感困难了。

在桂林、昆明、重庆这段期间，密电检译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大家一如既往，尚能专心致志的工作。侦察、抄收、研究、研译工作，都有显著的进展。一些日本外交密码多数均能适时破译，侵华日军的密码也在掌握之中，每日送出的情报多至100余份，是研究日本密电全面发展的时期。

军统的野心

温毓庆在闲谈中告诉我，他和戴笠是在香港中国银行总经理贝祖贻家相识的。他到渝后，和戴笠过从颇密。大轰炸期间，有时住在曾家岩的戴公馆。我们不以为然，温毓庆亦曾表示不很愿意住此。我就和他的汽车司机将温的被褥搬至他的另一友人家借住。不久，温就租赁到学田湾衡舍顶层一栋楼房为其住处，我也同住在此。以后，衡舍即作为密电检译所在渝的办事处。衡舍与电政司上清寺办公处相距不远。

戴笠在我们面前表示非常尊敬温毓庆的学识和为人。就在我们到重庆不久，戴笠就向温毓庆建议，鉴于抗日战争形势，应集中力量研究日本密电。将军统、中统研究密码人员统一交给温毓庆领导，并组织成立正式机关，不再作为一个秘密组织。实际上，密码研究工作，不应视为

一种特务情报工作，应视为一种尖端技术工作。戴笠的建议是以集中力量为名，以交给温毓庆领导为诱饵，着手染指这个组织。温毓庆将此意告我，也洞悉这个诡计，他表示不赞同合并。我未表示可否。

接着，魏大铭向温毓庆提出要求，请他派出熟练的密码组织研究人员两人到军统作技术指导。温迟疑很久，但不得不同意这个请求。于是指派杨肆等人前去。杨肆由昆明来到重庆，只作一般性的技术指导。魏大铭见其作用不大，又向温提出拟派军统技术人员两人到研究组见习，温毓庆同样不得不同意这个请求。派来的两人中，其中一人是日本留学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名叫夏隆坚，是他们阵营中的佼佼者。事后了解，此人是上当受骗才参加军统的。

研究日本密电工作，对戴笠来说，是很重要的，必欲取之而后快。因为有了这个特殊工具在手，他可以为所欲为，大展“宏图”，还可以伪造情报，任意伤害他人。起初，戴笠对温毓庆是百般拉拢，甚为尊敬，意欲他参加军统组织，归其门下。则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但温毓庆本身是个学者，长时间受英美的传统教育，甘心作为军统特务，是难以想象的。何况他还有宋子文一家的后台，不甘心屈居戴笠之下，也是人情之常。所以温一直虚与委蛇，未上戴的圈套，于是这场明争暗斗，也就愈演愈烈了。

将译出的情报交给中共地下党

我一到重庆，我的表弟杨德基就到电政司来看我，我们到上清寺一个茶馆中晤谈，他提出能否将我们破译的日本密电也送给地下党一份。我同意他的要求，并研究了如何作好秘密传递。他说能否由我亲手抄录一份送出。我说每日译件多达100余份，我俩边工作，实在无法抄录。我想到每日由研译组译出的报底全份，有一份用火漆固封交由我转给温

阅，温阅后退还给我，即将温拆阅后的这一全份报底由专人和我联系取至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当晚抄录下来，再将原件退回给我送交归档，比较天衣无缝。德基亦认为可行，于是就决定这样办了。指派的专人每隔一二日来见我，相互交换文件。来和我联系的是一位青年同志，说好我们是老同学，约好在几个不同地点见面。其中有赖家桥乡下我家，上清寺祥德村交通部宿舍，上清寺电政司办公处等。事情办得很顺利。

德基还介绍我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怡同志秘密见面^①。几经考虑，他和周怡同志决定到我家相见。当时，为了避免空袭，我将家安置在重庆市农村三圣宫赖家桥叶家院子一个农民家里，地方比较偏僻隐蔽。他们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来到我家，我从重庆市赶回赖家桥，相见甚欢。晤谈极为融洽，并在我家用了晚餐。当晚，两人留宿我家，第二天清晨离去。之后，我每月都要和周怡同志秘密见面一次，未出任何问题。

1982年春，我和内子去重庆作旧地重游，曾拾级登上红岩村，拜谒曾和我有过一度交往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也是过去想去而不能去的地方。回首以往，无限激动。登上三楼，在紧挨楼梯的一个小间卧室内，见到山墙上悬挂有周怡同志与徐特立同志合摄的全身照。周怡同志身着军装，英武不减当年，缅怀先烈更增怀想！并得知三楼系当时的机要重地。由红岩村言旋时购得四川工艺美术品竹编“红岩青松”山水画一幅，带归留作永久纪念。

^① 当时杨德基向我介绍周怡同志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我也曾见到八路军办事处给电政司写的一份公函，请求安装电话事，署名处长周怡，副处长钱之光。

成立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

1939年夏，温毓庆勉强接受了戴笠的建议，集中研究日本密码人手，将密电检译所改组扩大为一正式公开机构。

温毓庆叫我起草了扩大组织，集中力量的文件，报请蒋介石批准。温和我们商定，定名为军事委员会技术室，将军统、中统研究日本密电码的人员和机器合并过来。温将文稿交戴过目。戴在“技术室”的“技术”二字后亲笔加添“研究”二字，因而以后就正式定名为“技术研究室”了，其他未作改动。

技术研究室下设5个组，1个主任办公室。研译组为第1组，研究组为第2组，原密电检译所的人员组织照旧。军统合并来的研究人员也不打乱其原建制，成为第3组。人数约30余人。由陈祖舜带队而来。这是温不愿将军统人员渗透到原密电检译所已有技术成就的两组之中的一种苦衷，是分而治之的一种措施。中统研究日本密码的人员只有吴玉良等4至5人，均系日本留学生，且中统此时确已放弃研究日本密电的打算，所以合并到第1组。第4组为侦收组，侦察电台归其管辖，并将军统合并过来的报务员和收报机十余部，并入此组。侦察电台原是温放手由魏大铭培训组成的，实际上温已放手由魏掌握。第4组组长方砚农也是由魏推荐而来的。但研译、研究两组工作，特别是研究组的工作，温是不让他人插手的。第5组为总务组，办理事务行政工作。这5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是：

第1组组长霍实，副组长孟广治；第2组组长杨贻清，副组长李立民；第3组组长杨肆，副组长陈祖舜；第4组组长方砚农，副组长张雅焯；第5组组长施家幹（温的妻弟），副组长张廷启（毛的至亲）；侦察电台台长梁伯仑。

合并后的技术研究室职工人数激增至 300 余人。第 1 组约有研译人员 30 余人。第 2 组有研究人员 20 余人。第 3 组共有研译、研究人员 30 余人。第 4 组共有报务员 180 余人，军用收报机 40 余部。另有自己的收发报机，3 班作业。第 5 组约有事务行政人员 20 余人。主任办公室办事人员 4、5 人。设主任 1 人，副主任 2 人。主任由温兼任；副主任为毛庆祥与魏大铭，我兼首席秘书。

合并后技术研究室的技术业务还是向前发展的。职工的情绪还是高涨的。这一时期曾被译了日寇外交密码上一些重要密电。凡蒋政权下官员与日寇暗地来往和互派使者（电文中有具体来往人姓名）的情报，多是用这类密码发出的。日寇空军密电，我们随时都可破译。日寇空军的气象密电也被破译了。记得日寇空军从武汉机场一起飞，我们就立即知道它出动的机群架数、飞行方向和轰炸目标。那时重庆空袭警报的预警标志，是高高挂起灯笼。当我们的情报送出后，就看到灯笼挂起来了。

扩大组织，集中力量研究日本外交军事密电的报告很快就获得批准了。主任定为同中将级，副主任和各组正组长及首席秘书均为同少将级。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不久也分别发给任命状。研究、研译两组人员的宿愿如愿以偿了。批准全月经费 5 万余元，另有约 300 元美金的外汇，为购置器材之用。这个机关经过这次的扩大和改组，经费是充裕的，但需要办理正式报销手续，不能像特别费那样可办可不办了。但温在以后辞职之前，还是责令施家幹把过去的特别费给予报销。

技术研究室改归侍从室领导，是侍从室下的一个单位。所有研译出来的密电情报，均按日改送侍从室，由侍从室第 6 组归纳整理后送蒋阅。我们只负责送出译出的密电原文。

在技术研究室成立伊始，毛庆祥就和温商量将他所领导的贵州安顺黄季弼股（中文股）亦合并进来。温当时并不愿意。因为这个黄季弼股原系温亲自创立，研究非蒋嫡系的军政密电，（当时研究桂、滇、闽系

的密码)。对蒋曾立有功劳。后因内外人事关系，温拂袖而去。这次重归温的领导，温自然不很愿意。记得温曾和我谈，我们不研究中文密码，也不研究中共密码。尔后又几经磋商，戴笠也同意合并，黄季弼本人两次从安顺来到重庆向温面恳。最后还是合并进来。因为技术研究室的组织建制业经蒋批定，所以番号定名为第6组。组长为黄季弼，副组长为黄锦民。这个组约有人员70至80人，收报机10余部，业务照旧，按原组织未动。1940年初从安顺迁至重庆。这时全室职工人数共达400人，收报机约60部，是技术研究室鼎盛时期。

有一次，温和我去杨肆等人神仙洞宿舍，见到杨肆床上有一本《群众》杂志，温声色俱厉地对我说：“这给老蒋知道了，要杀头的。”并说不许看这类东西。事后我对杨肆讲，要注意，要警惕，不能这样堂而皇之的行动。

因为技术研究室是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单位，所以当时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写了一封私人信给温，要求将翻译出来的密电情报也送给他一份。温要我写报告向蒋请示。蒋的回文是，系研究日本的外交密电，今后如有有关军事方面的情报可以抄送一份等语。实际是不同意抄送。还记得当时行政院院长张群，也想拉拢温毓庆。有一次，张群下了一张堂皇的请帖，请温吃饭，虽然温是应约去了，但他叫我将这份请帖烧掉，不要留下痕迹。因张属政学系，温之举措，可能是不愿参加政学系。

技术研究室成立之初，因为在重庆侦收日本陆、海、空军电台通讯，远水不解近渴。温于是决定组成两个工作队，分驻宜昌和桂林，就近侦收侵华日军的电台通讯。宜昌工作队队长为叶钟骅，侦收日本陆、海、空军为主。桂林工作队队长为吴玉良，以侦收日本太平洋海军为主。不但能侦察到其相互间的通讯联络、部队、舰只、番号、调动情况也都一目了然，相互之间的通讯密码，也大都能破译。以后毛来主持技术研究室工作，又向陕坝傅作义部派去一个工作队，队长为王明德兼，

副队长为孟广治。派去后，效果不很好，联系也不经常。每队携带军用收报机两部，人员 10 余人。成果每日用自己的电台发回重庆。

温毓庆的引退和军统的侵吞

1940 年以后，日本对重庆的狂轰滥炸，逐渐减少，军事上也不用兵向西穷追。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势头加剧，内部人事倾轧，互相排斥的情况也就加重了。温毓庆的处境更加困难，加之又身患黄疸性肝炎和钩虫病，几次去香港治病，迟迟不返，他的情绪日见消极。

1940 年初，蒋介石突然给技术研究室发来一个代电，大意是说，这项秘密研究工作事关机密，所有技术研究室工作人员今后应定为终身职务，不得擅自离职，此后该室的人事，统归戴副局长雨农管辖等语。温毓庆见到后，没有作任何处理，就将文件交给我了。不久，温以治病为名去香港，一去不复返了。技术研究室第 1、第 2 两组人员闻讯，群情大哗，不愿将技术研究室拱手送给军统，6 个组长也绝不愿隶属于军统之下。我们一方面挽留温毓庆仍回渝主持工作，另一方面必须设法取消这个代电的意图，解除这个强加的无形的束缚。

当时由 6 个组长和我联名写了一个报告给蒋介石，要求温毓庆回技术研究室主持工作。同时不愿接受军统的人事管辖，定为终身职务。我们的理由是优秀人员是应长期留在这样的机关工作，但表现不好的人，不能允许定为终身职务。

这时我们找到毛庆祥表示了我们的态度，并将我们给蒋介石的文稿让他过目，他表示赞同。毛庆祥见温毓庆不归，很想掌握技术研究室的主任职务。所以他就要我去见侍从室第 4 组组长陈方，陈述我们的意见。毛庆祥说：“陈方主管这些事情，我再用电话和他联系。”并嘱咐将我们给蒋介石的呈文交由陈方转。我们当时就作了另一种打算，万一温

毓庆不返渝，我们就拥毛庆祥出来主持工作。这比交给军统管辖要好得多。毛庆祥是蒋介石的内侄，留学法国，所谓名门子弟，可以暂时合作一个阶段，以渡过当前的危机。

温毓庆在去香港治病之时，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是由副主任魏大铭代理主任职务，因而我和魏的接触也就更加频繁了。我将大家要温毓庆回来主持工作的意见向他一再陈述，并经常和他聊天。海阔天空的谈得很多。记得有一次，魏盛赞我的才华说：“戴先生（指戴笠）^① 面前就缺少像你这样的秘书人才。”我听后毛骨悚然，但态度极为冷静，未作任何表示。我返回来告诉了杨肆，事情不能干下去了，认为必须打破他的这个打算。以后，我多次和魏大铭谈话，表示我们坚决要求温毓庆回来的意见。魏大铭若有所思的说：“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后来我被称为“温派”。其实魏大铭并不真正明白是怎样一个政治问题。

“就是不能和军统合作”

这期间，周怡和我每隔一个月秘密晤面一次未断，密电译件仍照常每隔一二日由专人来取。我将军统要吞并技术研究室的情况告诉了周怡，并请示他如何应付？周怡斩钉截铁地说：“别的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和军统合作。”说时态度极为严肃。金石良言，掷之有声，它长时期萦回于我的耳际，我始终是记住的！

杨德基 1940 年初在重庆暴露了身份，他到交通部来找我，告诉我日内即将去延安，不能在重庆多留。以后和周怡的联系，就由我直接处理了。临走前，他送给我一些进步书籍，其中有新民主主义论。他说，现

^① 当时军统人员谈到戴笠，均称戴先生，以示尊重；对外谈，则称戴老板。当时毛人凤系戴笠的秘书。

在是新民主主义，将来还是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

周怡曾询问我，国民党当局还有哪些反共的行为。那时国共双方摩擦加剧了。我说魏大铭要将军统一名特务派往延安，充当延安电报局局长。化名是汪光毅。那时，延安电报局由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直接管辖，局长由交通部任命。并规定电报局长要由报务人员充任，所以才按照这样程序手续进行。这些任命文件都是经过我手的。我告诉周怡后，他说立即转告延安，查明情况。1个多月后，周怡告诉我，现已查明，确系军统特务，并携有秘密无线电台，已将其驱逐出境，电台没收，延安电报局长以后不准再由交通部委派了。我1949年初参加东北化工局工作，锦州合成厂第一任总支书记赵子卿曾对我说：“这件事我知道，那时我是县委书记，中央曾发过通报。”

有一次，周怡曾和我商谈，周恩来同志见到我们的情报中有一份系蒋介石手下的人员和日寇秘密来往、卖国求和的消息，打算根据这一情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抨击蒋介石卖国求和的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能否发表。当时我说，等我回去商量一下。我曾和杨肆商量。这期间，正巧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把我们的一份有关日本国内经济情况衰退的情报，在大公报上全文发表了，并加以评论。温毓庆见报后，大发雷霆，立即要我写报告给蒋介石，并说我们的密电情报是极为机密的，不能拿到报上发表。我和杨肆商量后，将此事转报了周恩来副主席，我认为最好不要发表。因为如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必然惊动国民党当局大肆追查，那就不好了。后来，周怡转告我：“周恩来同志决定尊重你的意见，不发表了。”我听后，如释重负，心情轻松了。听到“尊重”二字，当时的心情是不敢当的。周恩来副主席对我们这些人总是爱护备至的。这种宽广的情谊，至今难忘。

周怡曾告我，我们所送的情报，均由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阅看的。有一个星期天周怡来到赖家桥我家，说叶剑英和他在北碚一起参加了一

位民主人士的追悼会，本想会后一同来看你，由于目标过大，没有能来。我深深体会到当时我们所做的这项工作是深受党的重视和奖勉的。

毛庆祥来接替温的情况

1940年夏，温毓庆滞留香港不归，大家推我去港见他，要求他毅然返来主持工作。这个意见在当时技术研究室是一致的。我去香港，必须征得魏、戴的同意，否则是去不成的。魏大铭和戴笠也很同意我去。戴并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去，毛也写了一封信交我带去，均表示挽留之意。我到香港后，即住在温毓庆家。他对我说：“你带来的这些意见和信件，都是要我回去的，但我已经决定不回去了。”并说：“香港这个地方，日本人也要占领的，我在此也不能久留。”意思是全家不久要去美国。我住在他家约四五日，几经谈话，他不回的意见极为坚决。他在言谈中暗示，待他走后，你们不妨和军统合作。我表示坚决不与军统合作。他最后带安慰之意说：“我走后，你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妨拿点钱去成都住下，买点房子和田地维持生活，等抗战胜利了，再回江苏。”温还说：“10年之后，我们再见面时，你就能理解了。”从此以后，就未能再和他见面。现在回忆起来，温毓庆坚决不归，立意是对的。他如果回到重庆，很有可能被秘密拘留，暗中软禁，技术研究室在这样邪恶势力重压下，军统就可垂手而得了。

我离港言旋时，温毓庆要我写一个报告带回给蒋介石，说因病在身，请辞去技术研究室主任职务。我请温在呈文后段建议由毛庆祥来代理主任职务。他最初不甚同意，经我坚请，也就同意了。至于辞去电政司司长职务的呈文，温说稍后一步，等他的指示，再将辞呈递给交通部长张嘉璈。

返渝后，我的情绪也很消极，将温毓庆的辞呈送交待从室后，我就

回到赖家桥家中，迟迟未返市内。魏大铭派车来接我。我回后即与大家商量，我们7个人（6个组长加我）再联名写一个报告给蒋介石，一致要求毛庆祥来代理主任职务。我们找毛庆祥表示了我们的意见，并要求取消人事归戴笠管辖的代电。毛庆祥有些半推半就，并叫我再去找陈方，将我们的意见转告给陈布雷（侍从室主任）和蒋介石。

秘密通缉和通缉令的撤销

温毓庆的辞呈并未立即批示。据毛庆祥透露，在我去香港之后，戴笠亲自去香港面邀温毓庆回渝，遭到了拒绝。戴笠曾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将温毓庆引渡，英国当局亦未同意。不久，温就去了美国。他到美国后，在宋子文经管的美国援华租借法案下工作。毛庆祥对我讲，蒋介石已秘密下令通缉温毓庆，并说温将永久不能回来了。温被通缉，又不得不放弃租借法案工作，留居美国。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居里来华到重庆。据说居里和蒋介石在谈话中曾提到温毓庆。居里说，像中国温毓庆这样的人才留居国外，颇为可惜。蒋介石于是又下令撤销了这个秘密通缉令。但温毓庆以后始终未见返国。据说，居里和温毓庆在美国哈佛大学是同学，温找到这个特殊关系，才获得取消对他的通缉令，亦云幸矣！但温如回国想作什么贡献，已是无可奈何了。

温在美国租借法案下工作时，和我还有书信来往。其中提到我们所破译的日本外交军事密码组织的底稿已被戴笠秘密出售给美国，代价为500至600万美元。温信中说，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也是值得骄傲的。这是极端无耻的卖国勾当。把国家的尖端机密就这样廉价出售了。我估计这些底稿被窃取，是军统派在第2组的两名人员干的。温毓庆滞留香港时，也曾有书信往来，温多系交给重庆香港往来的国民党要员、他的好友带交给我的。这就避免了军统掌握的邮电检查。有一次，一位

要员（即张禹久）将温信交给我后，立即叫我阅后当他面烧掉。我有些迟疑，他严厉的责备说：“你们太不知厉害，还这样神气。”并告诫说，以后少在外面走动。我们当时的确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做的。那时军统在重庆确实嚣张已极，疯狂迫害人民，就连国民党的要员也难幸免。我曾在市区人民道旁见到军统用黑色吉普车逮捕了经济部一些司局长。

监视、盯梢和“不得离开重庆”

在1940年上半年，当温毓庆去香港不归时，军统就开始迫害我们。他们不仅派特务在衡舍大门外监视我们，而且派人跟踪盯梢。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其监视之中。我曾向魏大铭提出责问，他伪称那是监视共产党的。实际上既监视邹韬奋，也监视我们。因为那时邹韬奋同志住在衡舍坡下。接着，我突然收到重庆卫戍区司令部稽查处的一份公函，内容说，奉上级命令对你室施家幹等15人要严密监视，不得离开重庆，其中尤其要注意施家幹、杨肆、王维钧等3人的行踪。我们见到这个文件后，气愤异常，我们再一次上书给蒋介石，表示抗议，并将稽查处的原件抄附。我们分别向毛庆祥和魏大铭提出我们的愤激情绪。据毛庆祥后来秘密告诉我，军统曾两次打报告给蒋介石，诬陷我们与美国大使馆人员有通谍嫌疑，要求逮捕我们，被陈布雷挡住了。陈认为对这些青年技术人员不能这样做。我们才幸免于难^①。

1940年夏末秋初，技术研究室第6组副组长黄锦民，突然失踪，后来得知是军统秘密抓去了。我数次向魏大铭交涉，要求释放，他均含糊其

^① 1956年我在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工作时，副经理芮杏文同志（后曾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告知，关于我在重庆受军统迫害事，外调人员去重庆看到敌伪档案，确有其事。

词。过了1个月，魏大铭对我讲，戴笠约我去吃午饭。我还是去了，并部署了我万一被扣留的后事。这顿午饭是在曾家岩所谓戴公馆内吃的。魏大铭和一两名戴笠左右的大特务在座，还有一名年轻的女秘书，并介绍说我的光华同学。饭间，我向戴笠提出一名副组长被捕的事。戴佯称不知，转脸嘱魏大铭查明，如果确有这件事，明天就释放。这位副组长果然第二天安全的回来了。

怎样和中共失去联系的

在上述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和周怡的秘密联系未断。那位专门与我联系的同志仍秘密和我来往，周怡也定时见面。有个星期天，这位联系同志来到赖家桥我的家相告，组织上决定让他休养，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肺病，并决定另换专人和我联系。我因相互之间搞得已很熟识，工作也联系得很好，希望不要换人。他回去转达后又来告我，组织上已决定让他休养，并决定另换新人和我联系。他辞别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相见。不久，一位身材魁梧的同志^①持周怡的亲笔介绍信来到电政司找我，这样我们又联系上了。但尚未及交换所传递的文件。有一天，我从衡舍枣子岚垭上观音岩石坡，迎面见到这位同志也从观音岩下坡，对面相见时未打招呼，他走近下坡“漱庐”（军统局总部所在地）门口，就从容走进去了，门口警卫未加阻拦。当时我顿生疑虑。回到衡舍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杨肆，考虑暂时断绝往来为好。此后，这个人曾数次来找我，我均未见。本来，同一天晚间约好和周怡同志见面，我按指定地址前往，周围因敌机轰炸，不能找到指定地址。因此，这项工作就暂时断绝了。

相隔大半年以后，我将这段情况转告我的可靠同学周梦麇，让他到新

^① 因时隔太久，这两位和我专门联系同志的姓名，已记忆不清。

华日报社去找他的大夏同学戈宝权，请戈将这一情况转达给周怡，并请示今后的联系办法。戈回告说，已将意见转达。周怡考虑，现在双方都在严密监视之中，还是不联系为好。过去派的那位专人是有些欠妥的。1943年我去新疆建设一座小型硫酸厂，抗战胜利后，我在北平敌伪产业处理局工作，都曾想和党取得联系，因没有找到可靠的联系人而未果。1948年下半年，我在天津时，曾嘱已去解放区的外甥全钰嘉联系我进入解放区，因全家都去，目标太大，不如静候天津的解放。

北平解放后，我于1949年9月在北平见到杨述。他告诉我，周怡已不幸逝世。抗日战争期间，周怡由重庆回到延安，在延安杨和周见到面，曾谈起我们，周向杨说，我们还是好的。这可以说是周怡对我们的鉴定。

毛庆祥就职和带来的上方宝剑

1940年9、10月间，蒋介石发布了毛庆祥代理技术研究室主任的命令，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毛庆祥来接事时，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手谕：“所有在技术研究室的军统人员魏大铭等以下全部调回军统局，原军统局合并过来的器材亦交回军统。”这是毛带来的上方宝剑。接着，侍从室又以蒋介石的名义来了一个代电，撤销以前规定的技术研究室的人事归戴笠管辖的意见。并说优秀的人员是需要长期保留下来工作的，一些不好的人员没有这样的必要。因此，我们糊里糊涂地堕入军统的怀抱之中的危害被消除了，规定为终身职务这一条，也就无形取消了。

毛带来的蒋介石的手谕是要将技术研究室和军统截然分开，如何分开，是很棘手的问题。第3组的人员原是青一色军统，一律遣回军统局毫无问题。问题却是在第4组，如果魏大铭一声令下全部撤走了，则技术研究室就没有密码电底的来源，工作就难以为继了。我们考虑，第4组的报务员虽然绝大部分是由魏大铭代培而来，但并不一定已参加了军统组织，

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不愿隶属于军统之下的。事不宜迟，在毛庆祥前来就职的当晚，我们征得毛的同意，立即会同他委派的新的第4组组长王兴智去到黄葛梯埡深山中的凉风埡（第4组所在地），向全体人员谈了话，表示新主任毛庆祥要大家安心工作，要大家继续留在技术研究室。军统方面如果有人来煽动大家回军统，千万不要上当。大家经过商量后，表示都不愿去军统。于是我们要每人填写了一张志愿书，声明本人并未加入军统组织，不是军统所属人员，现愿意继续留在技术研究室工作。这项手续整整办到深夜1时才全部填好。所有报务员都填了。因而第4组就稳定下来。这件事是办得迅雷不及掩耳的。事前已有风声要派车全部接走。如果撤走了，事情就棘手了。回忆当夜月光似水，繁星满天，凉风习习的深山中，步行回到黄葛梯埡时，有的人正为我们捏了一把汗。

在毛庆祥尚未来代理主任职务之前，有一次魏大铭曾和我谈，我们这些机关都要归党（指国民党）领导了。军统局将成立区党部，技术研究室人员可共同参加一个党部。这是他又一次要吞并技术研究室的如意算盘。我当时对魏说，我们还是独立成立一个区党部好。我随即将此意告知毛庆祥，他同意我的意见，并由毛介绍我去军事委员会特别党部联系成立事宜。毛庆祥就职后，这个区党部也就成立了。这是技术研究室成立党部的由来。

毛庆祥和军统的矛盾这时就尖锐化了。当时毛和我们都住在黄葛梯埡的新市场。一天的深夜，军统以查户口为名，敲开毛庆祥的家门进行搜查，毛一怒之下欲开枪射击，被其妻阻止，未酿成火并。这是军统威胁毛的一种举措。

破译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海军密电

太平洋事变发生一星期前，我们从日本海军军舰通讯联络中了解到它

们相互靠拢的调动情况，并破译了一份海军密电，得到了它们即将偷袭珍珠港，准备出动空军轰炸的情报。我们立即将此情报专送侍从室。过了两三天，又同样截获破译了一份海军即将偷袭珍珠港密电，我们也立即送出。我们确信日军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了。不出二三日，日军果然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毫无防备，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据沈醉在《戴笠其人》一书所载，“军统研译密电的技术室^①，侦译到日本空军有在太平洋方面进行轰炸的准备情况后，戴笠想以此讨好美帝，引起它的注意，便决定把这一消息通知了美国站长肖勃^②，由肖勃告诉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郭便急忙转告美帝一些有关部门，请他们注意”。据说美国一些将军们听了捧腹大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并感到中国人是在破坏美日关系，因为日本这时在军火方面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两国间的关系很好。以后军统又陆续获得这方面有关情况，经肖勃转告郭德权，郭自己也有点怀疑，不敢正式通知美方，只和与他私交较好的一些美帝军官们谈谈，而他们也当作神话一样听听，毫不在意。结果日空军于1941年12月8日，在东栖三郎赴美商谈途中，美帝全无防范的情况下，偷袭珍珠港成功。这时美帝一些平日骄傲到极点的将军们才想起郭德权事前通知他们的消息是可靠的，便去找郭询问这些消息的来源。以后晓得是军统方面得到的，这时美帝对外活动的情报机关，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才找肖勃商谈，并通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找戴笠联系。这时戴笠真是高兴极了，便在他公馆里大宴宾客，招待迪帕斯。他并连忙向蒋介石报告，蒋也赞成他早日与美帝发生联系。

现在据我推测，我们将上述两份日本海军密电情报送到侍从室后，可能是由侍从室第6组组长唐纵交给戴笠，再由戴笠通知肖勃的。前面提到

^① 沈文中所说“军统研译密电的技术室”，实际上就是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但当时并未归军统领导和管辖。

^② 肖勃当时对外名义是驻美大使馆副武官。

温毓庆来信告知，我们破译的日本密码组织被秘密出售给美国得手一事，估计时间也正好在这个时候。

1939年至1941年，军统曾聘请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比较有名望的密码专家“约得来”来重庆当军统的密码顾问，并由魏大铭和杨肆与他接谈工作。据杨肆讲，此人技术业已陈旧落后，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水平，因此无所作为。在重庆两年，享受了丰厚待遇回国。

1940年左右，军统和苏联曾有一个秘密协议，由苏联派来报务员（人数不详）及收报机，在重庆南岸设立电台侦收日本外交军事的密电。苏联报务员抄收到的密电报底，也送给我们一份。我们看到所抄收的报底字迹非常潦草，错误很多，远远不能与我们所抄收的质量相比。如果报底抄错了，是无法破译其密码的。

改变研究方向的企图未能实现

皖南事变之后，194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庆祥一早来到技术研究室上班，带来了一张蒋介石的亲笔手谕交给我，要我们研究中共和苏联的密码。这是蒋要转研究方向了。我对杨肆说，这项工作，我们再也不能干下去了。能离开就离开罢。杨肆也很同意我的意见。我一面对毛庆祥讲，现在抗日形势很紧张，应付日本外交军事密电的人手很感不足，有些重要复杂的密码还不能破译。这项工作，还是稍等等再说。毛表示同意。于是这张手谕就被我留中了（不向下发去执行的意思）。1941年的一天，毛庆祥同样在一个早晨上班时，又带来蒋介石的同样亲笔手谕一纸交给我。我考虑像前次搪塞的措词是不行了。于是对毛讲，第1组、第2组现在还是要专心致志的对日本密电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就交给第6组去执行。毛同意我的意见。第6组是中文组，这是他们工作范围之内的事。第6组当时只能破译一些桂真阁等系的密码。中共的密码，按

照第6组的技术水平是破译不了的。我对毛说，第6组如果感到技术力量有限，可派人到第2组去见习，提高了技术水平再说。事后就派了第6组技术副组长黄锦民（前述被军统秘密逮捕的人）来到第2组。第6组以后也只能搞出当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拍发给延安的一种极为简单的加减法密码。内容是当时中央日报所登载的社论和中央通讯社的一些消息。直到我1942年10月离开技术研究室时，情况都是如此。

我的辞退

1942年初，我就将由我介绍进技术研究室工作的同事杨钰等设法辞去职务，脱离了技术研究室。这是准许技术研究室工作人员辞职离开的开端。这说明过去坚决要求撤销那个定为终身职务的代电有用了。

毛庆祥这时认为已能掌握技术研究室的工作，军统对他的捣乱，也不能得逞。我们这些所谓“温派”人员也不能尽如己意。毛并想方设法拉拢杨肆，认为杨是掌握技术的，介绍蒋介石对杨的召见等。我看到局势更不可为，我自己必须离开不可。我当时宣称，我是学化学的，要去干我的本行。我决心选择时机，脱离这个技术研究室。

毛庆祥未就事之初，要我暂行摆脱电政司的工作，专职在技术研究室。我同意向交通部暂行借调。工资仍归交通部发给。毛为我办了借调手续。1942年10月，我乘机向毛提出了辞职，要求仍回交通部工作。我对毛讲：“你已来到两年了，情况已能掌握，论理我早就应该辞去首席秘书职务，恐怕你初来有些情况不熟悉，现在是我应该辞去的时候了，请你允许我仍回到交通部电政司工作。”毛同意了我的辞职，行文送我回交通部工作。首席秘书职务，毛指派黄季弼兼。我从此脱离了 this 兴衰动乱的技术研究室。此后再也没有踏进这个机关的大门。回到交通部时，人事司王司长问我：“你已彻底离开了吗？”我说：“彻底离开了。”

技术研究室第1组组长霍实对我讲：“这是你的急流勇退。”军统特务还来了2人到我家，对我的妻子说：“王某某为什么连少将都不干？”第5组组长施家幹随同我辞职。杨肆调任军事委员会军用译电管理处处长。抗战胜利前夕，第1组组长霍实和第2组组长杨贻清亦均辞退他就。有些技术骨干力量也离开了，例如陈振泰转职中国航空公司。

对日密码研究工作，可以讲是一项尖端技术研究工作，也是国防上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早期那种蓬蓬勃勃的精神状态，经过这样大的动乱之后，大家均无心安静的工作下去，技术和业务也就一落千丈。这是蒋介石实行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方针的深可痛惜的后果。

1943年春，我在杜重远所著《盛世才与新疆》一书的鼓动下，去新疆乌鲁木齐建设一个新疆省营制酸厂，一年后建成，又不得不返回重庆。原因是那时的新疆更加法西斯化了。在那儿也不能久留。

抗战胜利后，据说重提集中力量研究中共密码一事。因为抗日已经胜利了，蒋介石旧事重提，查问技术研究室的工作情况。他听说“温派”的人员多数已散去，要重行召回这些人。我那时在北平敌伪产业处理局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有些暗自担心。但并未召我回去，大约因为我是干秘书工作的。被召回去的人也为数寥寥，杨肆就是此时被召回南京当顾问的。据说军事委员会撤销后，这个机关归国防部领导，由郑介民、魏大铭主持其事，还是落入军统之手了！

从苦谏哭谏到兵谏

晏道刚

从苦谏哭谏到兵谏

1935年秋，蒋介石令“鄂豫皖剿匪司令部”迁到西安，改名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仍以张学良任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职务。钱大钧坚辞参谋长，久不到差。张学良向蒋介石保举晏道刚、林蔚、贺国光三人，请择一任参谋长。张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希望与蒋联系密切，便于合作共事，而不是与这三个人有什么特别感情与联系。当我应允到西北，向蒋辞行时说：“我的能力薄弱，恐怕做不好。”蒋嘱以“与张汉卿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云云。

及到西安三个月后，我知道张汉卿常驻陕北洛川，与延安已有联系，东北军前线官兵与红军时有往来。张汉卿曾派栗又文到新疆去联系，进步人士高崇民经常在张汉卿公馆居住，为张的顾问。这类事情我佯装不知，只劝张不要久驻洛川，免人怀疑，而驻西安的特务们又直接给蒋的情报很多。蒋为表示对张推诚相与，竟把这些报告原文抄送张学良，叫他答复。这时张学良感到惶恐不安，对我往往诉说东北军官兵责难他的苦境，但却仍隐讳他个人的真正意图。我见张既然隐讳，亦不便

明说，一面安慰张，一面电蒋为张解释。兹抄录 1936 年 7 月 20 日张学良给我的亲笔函一件：

甸樵吾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张学良 七月二十日于王曲军官训练团

漩
涡
沉
浮

同时蒋的特务组织（西北总部办公厅第二科即是特务组织）对杨虎城的报告也很多，说杨虎城部的职员内有共产党员潜伏，力谋反蒋，杨虎城的夫人也是共产党员云云。

特务们的这些诡秘行动迫使人人自危。至于军队方面，此时更是一筹莫展。

“西北总部”所指挥的兵力是陕、甘、宁、青四省的部队，计共兵力：张学良部约 20 万人，杨虎城部约 4 万人，宁夏马鸿逵部约 2 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 1 万余人，还有其他零星部队约 1 万人，总计共约 28 万余人。另有胡宗南部驻甘肃约 3 万余人，归蒋介石直接指挥，“总部”不能调用。

“总部”所指挥的 28 万余人的兵力中，张学良部和杨虎城部不但不愿对红军作战，而且也不能与红军作战。宁、青两省的部队也不愿与红军作战，更不能对红军作战。

自从我于1936年3月到西北，直至同年11月间，前线军队彼此各守原防，好像国共双方互不侵犯似的，甚至前线官兵彼此还有联系。张学良既对我隐讳，我亦不能向张明说。张之联共抗日主张是到西安事变的当时才明白提出的。他开始向蒋请求的，还只是希望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而未提出联共主张。我虽了解一般情况，然彼此相处日浅，有不便说明之苦；只能就职务上消弭蒋、张之间的冲突，适当地调和张之行动，使之感情不致破裂而已。我在此期间屡次向蒋婉说东北军官兵的痛苦及其一致要求抗日的心理；说他们对张学良已心怀抱怨，张指挥部下“剿共”确有困难；希望蒋能谅其处境，考虑张之意见，不要严厉督责，过于刺激；并与当时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相约，对蒋作同样之请求。但蒋那种骄躁顽固的态度，迄无转变，反而声色俱厉，口不择言地痛骂张学良，致使张不能容忍。蒋并且对我面责不该替张讲话。当时局势的演变和蒋介石的一些措施，真是不可思议。

二

1936年8月，蒋介石接到阎锡山的报告说：共产党军大部分已过黄河到山西地区，陕北的红军只有少数，希望陕北军队乘机进攻，可以消灭红军。蒋即据以电张：速令陕北和陇东的军队向陕北红军进攻。但西北总部所得情报，则是红军只有一部分过河，主力仍在陕北。便据以向蒋复电。但蒋仍相信阎锡山的报告，疑惑张汉卿是畏缩不前。张乃与我商议，要我到南京去面向蒋报告。

我赶往南京，径去见蒋，踏进蒋的客厅，适蒋廷黻在座。蒋介石到客厅后，我即提出陕北军情报告，蒋阻止说：“今天是请蒋廷黻先生讲白皮书的意义，你且缓讲。”候蒋廷黻讲完，蒋接着与胡宗南谈话很久，随即送客。我只得站在客厅门前和他面谈，当然不能毕其所欲言。蒋乃

坚持阎锡山的报告，主张从速向陕北进攻。我再次见蒋，均不能消除他的成见，即不得要领而回陕。

1936年10月蒋介石电令“西北总部”，限期向陕北红军进攻。他并直接电令胡宗南出一个军约三万人编成一个纵队，由陇东向东北方向推进，包围红军的右翼；东北军王以哲部编成一个纵队，在胡宗南部军队右翼，与之齐头并进；其他部队则在原阵地一齐向北推进。“西北总部”只好据以转令前线各部。

这时张学良抑郁不安。前线各部则按兵不动。王以哲部无线电叫呼不应，命令无法下达。惟胡宗南军按蒋的命令向东北方向开进。他既不向“西北总部”报告，又不与邻军联系，孤军深入，约在11月中旬，这一纵队前卫两个团进至陕北山城堡地方，被红军消灭。蒋闻讯大为震怒，严电斥张，追究责任，限期电复，意在惩办王以哲。张学良上下为难，惶恐不安，数日不至“总部”。我即往商，张言：“我遭受国难家仇，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有何面目？”我竭力安慰，张向蒋当面解释，电报恐不能说明详情，解决问题。张云：只得如此。

10月29日，蒋以避寿为名到达洛阳。张即飞往洛阳，蒋见张后大为震怒，使张不能尽其所言，更无法进行解释。原来蒋对胡宗南的军队爱惜备至，今见胡军损失两个团，乃归咎于王以哲不听命令，对王以哲痛恨至极，并怪张学良无能。张学良一提抗日，即遭痛骂。

张学良在洛阳军校住了一星期。有一日，蒋在军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张站在台下军官中听讲。蒋在台上大骂主张抗日的人，说什么“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张站在前面，在场的人都向张偷望，张神气自若。张右边站的是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他恐怕张学良不好

受，会后即邀张到洛阳街上去买古董。到会的人说：“蒋这一番话，实在使张过于难受。”我在西安听说这种情形，向蒋去一电报——即所谓“有亥”电，电文大意如下：

东北军自去冬陕北直罗镇役之后，一〇九、一一〇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一一〇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畏怯，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心理。前线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于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

这一电文发出后，据钱大钧告我：蒋介石接到电报，曾有较长时间的考虑，然终未转变他的顽固态度。

11月29日张汉卿由洛阳打一长途电话来，叫我召集东北军旅长以上的军官于12月2日以前到西安听蒋委员长训话。蒋于12月4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我在蒋未到之前对邵力子先生讲：“希望我们一致要求蒋委员长对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之难受。”邵亦同意。

4日下午4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上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等三人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杨、邵和我等上车与蒋略谈几句便下车，我即到钱的车厢去约张同行。我问钱：“委员长到西安邀集一些将领来，他是

一个什么作法？”钱答：“大概是对各将领打打气，并作‘进剿’布置吧！”

此一行人同到华清池后，我个人到蒋介石的住室，对蒋婉言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困苦情形，前线官兵不愿“剿共”的思想。张学良处境困难，内心痛苦，请勿对张督责过严，使他不能忍受。并又一次建议，最好将东北军调赴察绥一带，他们对抗日是有决心的云云。我这一番话并不能动蒋之听，蒋厉声答复我：“依你的说法，然则‘共匪’不剿了吗？此刻把东北军调到察绥，再调哪个军队来接防呢？国家养了许多军队不能替国家‘剿匪’，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你为何不说服张汉卿，反帮他说话呢？”我说：“这不是帮他说话，而是报告真实情况，以求适当的措置。”蒋仍然顽固地要“剿共”，对于我的建议毫不加以考虑。

三

蒋到临潼后，分别召见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所问的皆是：“你父母在否？兄弟和儿女几人？你现在看些什么书？有什么心得？家中生活怎样？……”并说些鼓励“剿共”之类的话。他何曾知道这些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话却毫不感兴趣。

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在西安请蒋介石训话。张、杨已先商定，所召集的人中，不能有过于激动的人，或者社会关系复杂的人，要求到时发言的人不准对“委员长”有何不敬的地方。因此会场上说话的人并不多，想说话的人也不敢说了。

蒋在他的训话中说：“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打仗要先近后远；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

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

蒋的训话，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再要联共抗日，不听命令，“中央”便要处置你们了。也就是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而张、杨二人于无可奈何中仍一而再地向蒋进行哭谏，痛哭流涕地哀求其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介石毫无所动，反而大声呵道：“你们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剿共政策！”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蒋介石毫不理会，拔脚便走。

12月9日，西安的学生集体游行请愿，要求抗日。学生们先到“西北总部”。门卫告知我，我即以电话商之张副司令，张答：“你不必管，我来对他们说。”游行队伍乃由“总部”沿西安向临潼道路前进。张学良单人匹马赶到十里铺，挡住队伍，向学生们说：“你们不要去找委员长，我是副司令，可以代表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你们有什么都可向我说，我决替你们转达。”学生们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就回来了。张这样的做法，总算是对得起蒋介石了；然而蒋介石却偏不是这么想，他疑心这是张、杨二人为贯彻他们的主张而搞的一套穿插。张学良向蒋报告学生游行请愿情况时，他反而责骂张学良说：“你不懂得拥护领袖的方法！领袖是你们的父母，有人侮辱你们的父母，就应该奋起和他拼命，你何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呢？”他这一番话，使张学良哭笑不得。最后，张学良仍然叫黎天才等去向蒋恳切要求，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结果又遭到蒋的一顿痛骂，并怀疑黎等接近共产党。

到12月11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谏净”可说是技穷力竭了。而蒋这时已召集了“中央”各高级将领积极布置大举“剿共”的一切措施。调兵遣将，急如星火。

张见这情形已万无扭转之可能，内心至为痛苦，乃于11日决心用“兵谏”的方法，孤注一掷，于是急作“兵谏”的部署。

12日早晨二时许，西安城内忽有枪声，时疏时密。我住在西安城内通济南坊，以电话询问办公厅第二科科长江雄风，江称不知。约半小时江来电话告诉我说：“杨虎城的队伍有一部兵变，正在抢银行。”这时枪声愈加紧密，我即以电话找张学良，张学良公馆答云，张不在家。我怀疑杨部兵变，张或避开了。电话问临潼，接线人说线路不通。我随以电话找杨虎城，却是张学良声音接电话。张对我说：“我是汉卿。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再问，则电话挂了。张这番话乃是故布疑阵，好像是杨部兵变，他与蒋介石均被杨所俘获，他也不自由似的。但我仔细思虑，张既不自由，何以能代杨虎城接电话呢？断定是张、杨同谋反蒋，大难将作。

漩
涡
沉
浮

我宅驻有东北军一排担任警卫，这排卫兵尚不知情，正在布置警戒，保护住宅周围。我的参谋和秘书人员再三劝我暂避他处，以免危险。但我亟欲面见张学良，以谋善后之解决。至七时许，张派一副官，并带一卫兵乘汽车至我门前，传达张学良意旨，接我到他的公馆。

及至张公馆，见到缪晋流师长，缪出示油印纸一张，上面写明“兵谏”八项主张。

缪对我说：“‘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见着副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日。”我答道：“你们的处境我很同情，你们这八项主张我也赞成，但我觉得这样做还欠研究；如果因此引起国家大乱，自相残杀，对消抗战力量，岂不是让侵略者坐收渔人之利吗？”缪说：“依你怎么办？”我答道：“我见了张副司令再说。”缪晋流即派车送我至西京招待所。

西京招待所就是招待这次“中央”来的大员们的旅馆，事变时即作为他们的集中点。我进门时，见他们这些大员坐在餐厅长桌周围，独不见陈诚。约半小时，见两个士兵押着陈诚来了。陈诚浑身粘满尘土，来后也坐在餐桌旁边，沉闷不言。原来他听到枪响时，即潜伏在招待所一个贮藏啤酒瓶的大木柜内，直到早上七点多钟才被士兵搜出。

当时西京招待所住的人是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夫妇、陈调元、蒋百里、蒋作宾、万耀煌夫妇、李基鸿、邵元冲等。当12日早上四时许，杨虎城派兵包围西京招待所，士兵入内挨房搜查。陈诚在搜查之前闻听枪声即行逃出。邵元冲住在楼下窗户边房内。当搜房士兵喝令不准动的时候，他仍然翻越窗户，士兵开枪，弹中下部，送入医院后即毙命。搜至陈继承房间，兵士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陈答云：“我是陈继承。”这士兵说：“你是陈诚啦！”便举枪欲击。陈继承的老婆大声疾呼说：“他不是陈诚，他是陈继承，打不得呀！”这兵士才把枪放下。因为陈诚素来轻视杂牌部队，宗派成见很深，地方部队对之多怀怨恨。假使当时不是他先行逃出，则陈诚之命运殊难逆料。

12日上午9点多钟，孙铭九等已经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这时张学良带着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直到西京招待所，招集“中央”各大员宣布，他说：“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道：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剧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艰，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齐心抗战？乃前方之

守土战士浴血杀敌，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陈辞，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八项主张略）……以上八项为吾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贯彻救亡主张，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哲流、钱大钧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15日，张又将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员迁移到张公馆附近的玄风桥、金家巷房屋居住。一切都很优待，分送每人一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书及扑克等消遣东西。张学良除每天到蒋介石住所谈谈外，还经常到这里说说情况，交换意见。

16日，张学良对南京的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华县、渭南进攻，前线接触，虎城部队已有伤亡。我这几天要到前线指挥，少陪各位。如果他进攻不已，只好请蒋先生及各位转移其他地方。”陈诚道：“你这话可向委员长说，请委员长写信给何敬之，与其他的人说是没有用的。”我对张说：“你是不是要请蒋先生派人到南京去通一个消息哪？”张答道：“回头商量再说吧。”随后蒋百里向张学良建议：“你可与蒋委员长

商议，派蒋铭三（蒋鼎文）到南京去与何敬之商议办法。”张即表示首肯，转向蒋介石商议，蒋亦应允。当由蒋百里先生、蒋鼎文分别去见蒋介石，商议派蒋鼎文去南京。

五

自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后，南京来西安的诸人住所即行撤除警卫的监视，大部分人员于27日乘飞机返回南京。我于是晚回到西安通济南坊原住所。总部高级人员及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旧友多来访问，了解一些情况。我于28日上午乘第二批飞机到南京。到京后听到许多消息，如蒋介石因西安事变将向国民党中央呈请辞职，并自请处分。我以为这事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又说：张学良将向蒋介石谢罪，并自请处分。中央将开军事法庭审判，并预先判张学良以十年徒刑，由蒋介石请求赦免等语。我以为这事可不简单。蒋介石素来憎恨心重，他在西安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恨不得将张、杨一棍打死，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张学良既到了南京，死罪虽免，恐怕活罪难逃。

12月29日我到宋公馆去访问张学良，张对这次由西安回南京的人表示歉意，嘱我转达。我说：“事已过去，不必再谈。”我问候他的起居，他像是气愤填膺，颇有难言之隐，我恐怕说话不便，即兴辞而出。

12月30日，我住在南京中央饭店，军事委员会一副官会我，出示军委会办公厅一抄录委员长手条，内开：“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我问这副官：“你将这手条给我是什么意思呀？”他答道：“这是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叫我拿来给你看的，他说请你到羊皮巷军法处去。”我说：“我是什么罪名？何以将我与曾扩情并列呀？”副官说：“这是委员长亲笔写的。朱主任曾亲自问过委员长，委员长说，晏道刚是不尽职责，曾扩情是不知廉耻。大概为的是西安事变吧！办公

厅也不好确定罪名，只好抄录原条给你看，请你即刻到军法处去，汽车也预备好了。”我答道：“好！我就同你一道去。”我从此又受了一段时间的牢狱之灾。

当时南京有些人不同意蒋介石这一决定，有人曾打电话给军法处长王震南说：“晏甸樵是个无罪的人，要他在军法处不过是委员长的西安受伤，回来发泄他的脾气而已，你处要优待他。”军法处指定我住在邓演达先生蒙难前曾住过的那间房屋内，看书写字尚觉安静。

我在军法处住了两个多月，因病迁住南京广东医院，军法处派有两名职员随身监视。我屡次催他们定案，迄未得审判。直到两个多月后，日寇侵占上海，南京告警，蒋介石才有手条恢复我的自由。

法庭的审判与历史的审判

陆 诒

1937年6月25日上午，我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旁听席上，采访审讯全国瞩目的“救国有罪”的“七君子”案。尽管我坐在旁听席上，但我当时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员之一，既是上海《新闻报》的记者，又是救国会半公开的机关刊物《救亡情报》的编委之一，这就不仅是作为旁观者来此听审而已。现就回忆所及，记其梗概。

正是江南梅雨季节，风雨凄切的一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先生等七人的案件在江苏高等法院的第一法庭公开审理。

被告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等六位先生，由法院派一名书记官会同法警用小汽车从看守所中接到法院。法院也用汽车将史良女士接来了。此案，同时受审的还有罗青先生，另有顾留馨和任崇高两位是自己到法院投案的。

为了审理这一件“救国有罪”案，苏州高等法院这天特意租了三辆出租小汽车迎送被告。当时，在苏州每辆小汽车租一天要付租金法币50元。法院如此“优待”，也许是别开生面，但略一沉思，也就由此可知他们的案子决不是私人问题，而是有关我们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

候审室门口，警察戒备林严，被告们都在上午九点以前到达。候审

法庭的审判与历史的审判

室中的“七君子”却谈笑自若，态度从容。真理在救国会，有什么罪？

9点30分，审判长朱宗周、检察官翁赞年以及陪审的两个推事，分别穿了不同的制服，坐上法庭的正面，周围的法警板起面孔站在各人应站的岗位，被告的家属和一批新闻记者挤坐在旁听席上，注视着法庭的动静。辩护律师一共有20多位，那天出庭的有18位，由长髯飘指的刘崇佑律师领队到庭，分别坐在两行律师席上。被告最先进来的是沈钧儒先生，其次是史良女士，再次是章、邹、王、沙、李、罗、任、顾等人。据事后采访，他们曾在候审室中经过民主协商，按照尊敬长者、尊重妇女的次序，组成堂堂正正的阵容。

审判长先把各人的姓名、住址等问了一遍，继由检察官翁赞年站起来宣读“起诉书”。尽管他装模作样，指手划脚，但大家都投以轻蔑的嗤笑。他读完，其他被告暂时退席，独留沈老在庭上。其时，法庭壁钟，时针刚指到9点50分。审讯沈老历时最久，沈老精神奋发，从容答辩。当问到“要求解放政治犯”时，他特别声明：“个人从事救国运动不自今日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上海就有各团体救国联合会，那时我也参加的，在这个会里也有过‘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提案。我还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我记得在国民党的历届中央全会中也有过这种提案，即使到了今天，在党国要人中还有一部分人作如此主张，我们救国会有此主张是理直气壮的。”最后，审判长朱宗周问沈老有关上海学生罢课的情况。沈老当场提出：“请庭上一一指明，罢课发生在哪一天，哪一个学校？因为上海各大、中学校罢课的事情太多了，你这样含糊地问，叫我如何具体地答复。何况，困难如此严重，民族危机威胁着每一个人，叫这班热血的青年怎么能安心读书？”审判长无话可说，即匆匆要沈老退庭。

10点45分，讯问章乃器“为什么要提出抗日问题？”章立即回答：“中国目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形势危急，凡是中国人，谁都有切

身感受，‘要抗日’这句话，我想即使今天高坐在庭上的审判长也会同意的。”审判长无言可对，就说：“你们发表文章批评宪法，这算不算违法？”章闻言笑了一笑，然后缓缓回答：“谈到宪法问题，当宪法划案公布之日，政府曾公开登报，征求人民发表批评意见，而各界人民批评宪草的文章在报章杂志上也发表得很多，可是审判长少见多怪，才问出这样幼稚可笑的问题。”这一段话引起人们会心的微笑，而审判长也为此面红耳赤。

接下去，就传问王造时和李公仆。王曾留学美国，研究政治法律，所以当法官问到政权与政府的问题时，他以滔滔雄辩解释这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法庭几乎成了大学讲堂，王造时教授不是在受审，而是在讲学，闻者都敬佩。

李公仆先生那天穿了长袍，在回答提问时常常手理长髯，镇定异常。他谈了1936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上当场成立援助日本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和募捐的情况，十分翔实。最后，他说：“如果审判长那天也参加此会，听了罢工工人的紧急呼吁，也会慷慨解囊援助他们的。”

审问邹韬奋先生进行到一半时，已过12点钟，审判长宣布退庭，定下午二时续审。所有的辩护律师、被告的家属和新闻记者都应苏州律师界名宿张一鹏^①之邀，到他家中共进午餐。几位被告就在候审室中吃了一顿由法院向鸿运楼预订的丰盛午餐，但是被告中间对已审与未审的是分批隔离入席的。

下午2时35分，继续开庭讯问邹韬奋。邹历举去年七月份在香港《生活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为证，声明也曾劝过大家不要再用“人民阵

^① 此次午餐，究竟由何人邀请，陆诒与李文杰《回忆上海律师界为“七君子”案进行辩护的斗争》一文中说法不同，姑容两说并存。

线”这个名词。2时55分，检察官翁赞年突然起立发言，强调救国会曾致电张学良，因此此案与西安事变有关，邹韬奋同志当场大声疾呼：“被告可以不侵犯检察官的权利，但检察官也不能禁止我作出解释的权利。为什么今天检察官只提到我们致电张学良将军，而独不提及我们在同一时间也致电国民政府和当时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前线的宋哲元将军和傅作义将军？这是公开的事实，随时可以调查证实的。”最后，邹还拿出自己的著作《展望》，指出其中一篇他写的文章，题为《现代国家与民众运动》，说明他本人热望政府开展民众运动，增强御侮力量，决无危害之意。如果说到“危害”两字，只能说危害到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谈不上所谓“危害民国”^①！庭上默然无言。

3点5分，审问沙千里先生有关职业界救国会的事，沙对答如流，掌握分寸很恰当。继讯史良，时在3点20分。她身穿西装，足登革履，精神焕发地进行答辩，而且在发言中善作譬喻。当讲到救国会主张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时，她说：“这好比一家人家，有强盗打进了大门，叫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再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应当联合起来去抵抗那些强盗们，这有什么错？”又说：“时至今日，抗日两字，即使你随便去问哪个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法院的检察官是日本人，才会判我们‘救国有罪’！”语颇刺耳，但义正词严，难以驳倒。

史良讲完后，被告辩护律师俞钟骆、俞承修两人相继发言，并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出版的《妇女救护十讲》和刊载上海纱厂工会书记段义林因被控煽动罢工在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审讯消息的一份《新闻报》，呈案请求调查。

这时，审判进入了高潮。沈老的辩护律师刘崇佑，虽年逾六旬，这时精神抖擞地站起来发言，声若洪钟，震惊四座。他说：“国家到了今

^① 当时检察官控诉救国会七君子是犯“危害民国”罪。

天的地步，老实说，做中国人，有哪一个不要救国？救国，是一种义务，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权利。谁敢侵犯这种权利？……”其他几位辩护律师继起发言，一致要求应向张学良将军作调查，以明确去年西安事变与被告的关系。那位检察官当时手足失措，大发脾气，竟说：“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等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其中就有召开救国会议和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这两条，单凭这两条就可以构成‘危害民国’罪，其他的反动行为更不必论了。”

法庭上群情愤慨，沈钧儒等纷纷起来驳斥，审判长为此坐立不安，力劝双方保持秩序。这时，章乃器大声疾呼：“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他的职权是应当的，但我们还希望他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否则给他做一个中国人，也丢尽我们老百姓的脸！”

这句话单刀直入，促使检察官暴跳如雷，一面怒斥章乃器肆意侮辱，一面不断叫书记官：“记明笔录。”在好几声“记明笔录”中，全体辩护律师一致起立，严正要求庭上把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审理张学良案的记录，调来作证。审判长对此不置可否，接下去提讯罗青、任崇高和顾留馨等三人。最后，辩护律师秦职奎再次发言。他说，以他做律师 26 年的经验，总极力避免与检察官作不必要的摩擦。不过，今天我们集体提出要调张学良案的记录作为旁证，这是一个合乎国法与人情的要求，务必请庭上注意这一点。

5 点 30 分，审判长宣布退庭评议。律师们集中到休息室中交换意见，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在议论检察官其人其言。

6 点 10 分，又继续开庭。审判长朱宗周当众宣布：关于西安事变与救国会关系问题，候向军委会军事法庭调取张学良案记录再行审核，被告等其他要求调查事项，无调查必要，今后被告等尚有可供调查参改文件，可径送法院备核。

退庭后，所有的辩护律师、被告的家属新闻记者由当地刘宜望律师

邀至朱家花园寓所晚餐。

此案不仅动员了上海和苏州两地的著名律师仗义执言，而且法庭公审的新闻报道，也使全国人民明了“救国有罪”一案的真相。

那次采访，我是6月23日就到苏州的，当天下午就到高等法院看守所去看望沈老等七人，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待了我。我除了向他们汇报一些工作问题外，特请他们逐一题字留念。

沈老用毛笔当场写下这几行字：

“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那里去了？我要去追寻！”

沈老于诗词后，还亲自作了注解：“新生事件宣判之第四日，我自杭州返沪，车中写此诗于报纸角上，随吟随写，泪随声下，湿报纸。今两年矣！书引不自禁其感之深也！ 二十六年六月 沈钧儒识于江苏法院看守所”

其他六人也都有题字，现照录如下：

章乃器：“正义感是我们这一阶层人为民族、为社会奋斗的发动机，但这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做我们的舵。”

王造时：“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全国一致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大家团结起来御侮不可。”

沙千里：“民族解放的斗争必得最后的胜利，爱国无罪，将为大众和历史一致的裁判！”

李公朴：“我们要使每个中国人认识自己有着抗日的任务，并要了解怎样能各就范围的去执行这个任务，更要加紧一般的政治训练，以增强抗日的力量。这样把广大群众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把救国的工作和民众运动联合起来！”

邹韬奋：“为争救国无罪，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着救亡运动的前途。不许侮辱人格，也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人格的光辉。”

史良：“除非把我幽禁到无人的荒岛，我才没有办法宣传和抵抗侵略者的残暴。但是我还要设法训练着不害人的野兽，准备有一天同侵略者作最后的决斗，因为侵略者的残暴实在超过野兽百倍！”

1937年7月31日，沈钧儒等七君子终于获释。

令人触目惊心的綦江惨案

刘 非

漩
涡
沉
浮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于1938年春创立。战干团共设四个团，均由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而由教育长实际负责。第一团，初设武昌，后迁四川綦江，教育长桂永清。第二团设山西，实际未成立，而由阎锡山另办了一个集训团。第三团设江西零都，教育长唐冠英。第四团设西安，教育长先后为胡宗南、蒋坚忍。1940年夏，震惊中外的綦江惨案发生时，我正是第一团第五期第三总队第二大第七中队的学生，身历其境，现将当时所见所闻就记忆所及追述于下。

大捕杀的开始

1940年4月，战干团第一团第五期入伍训练结束，第六期新生入学时，陈诚突然来到第一团第一总队（在綦江广兴场），主持开学典礼并检阅第五期学生的阅兵式。不久以后所发生的事实，证明陈诚此行就是骇人听闻的綦江惨案的先兆。

1940年6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上课，大队长张少泉（湖南

沅陵人，国民党中央军校八期出身）带着两个警卫来到第七队；不一会，指导员胡寿昌（河北人，战干团第一期出身）来到课堂将一个四川籍学生杨霞村叫去。十几分钟后，从队长室传出张少泉的咆哮和杨霞村的惨叫声，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下课时，队长邓一飞（辽宁盖平县人，国民党中央军校九期出身）命令我们就地休息，不准离开。到午饭时，杨霞村两手被捆绑着，鼻青脸肿，面部流血，由两个卫兵从队长室架出，押往后面地下室去。

这天下午，正常的操课停止，队长邓一飞集合全队学生讲话。他说：“你们之中有共产党捣乱，要进行暴动。为了你们的安全，现在宣布两项命令：一、除各班班长之外（班长又称分队长，也是学生），其余各人的子弹一律交出；二、从现在起，所有学生非经报告许可，不准离开本队范围，否则以抗命论处。”后来我们了解到，像杨霞村突然被捕和命令学生交出子弹这样的事，其他各队也都在同时进行。我们第七队这天被捕的只有杨霞村一人，其他的队人数多少不等。从这时起，全部学生实际已被软禁，大规模的逮捕正在进行。

当天夜晚，我们刚入睡不久，即被一阵阵的骚动声所惊醒，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来来去去，仿佛来了不少的人，也听到一些低沉的谈话声，但听不清说些什么。我们躺在铺上暗暗以手推碰，相互示意，谁也不敢出声。不久，我们第三区队区队长林国球（广东梅县人，国民党航空学校及中央军校十四期出身）进入寝室，用电筒将我们察看一遍。他命令三个班长起床，持枪同他站在门口，然后大声向我们说：“大家注意听着：待会儿叫到谁的名字谁就起来，没有叫到的不准起床，不准乱动。”说完，他点燃室内油灯，吩咐三个班长看守，然后走了。我们躺在床上，心情紧张，都担心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久，从队长室断断续续传出问话声，接着又听到张少泉的叫骂声，也听到拍桌子的声音，随着而来的是吊打和被打人的惨叫声，白天

杨震村被虐待的那种可怕形象，立刻浮现在眼前，令人有说不出的恐惧！这种恐怖的声音，通宵达旦，一直没有停歇。到快天亮时，叫到了我们第三区队，接连叫去了好几个人。我们第七班被叫去的有：张振英（湖北钟祥人）、盛楚雄（上海人）、李笃根（四川人）等。我的心情越来越紧张，害怕叫到我。正在此时，林国球已在叫我的名字了。我赶忙穿上衣服，战战兢兢跟着他走进队长室。大队长张少泉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架电话机（原先没有的），机旁接有一根三四米长的电线，队长邓一飞和指导员胡寿昌站在张的背后，还有几个武装卫兵站在两边。屋子里，梁柱上悬着一根长吊绳，地上摆着棍棒等刑具，沿墙边一排歪歪斜斜倒着十来个被押绑的学生，都在痛苦地呻吟着。我和几个被叫去的同学站在桌子前面，大队长张少泉满脸杀气，一个挨一个问我们的姓名、年龄、籍贯等等，俨然审讯犯人一般。他还提出一些人名来问，我们都回答不知道或不认识。这时，邓一飞向张少泉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张就厉声向我们说：“你们这些小鬼，共产党三个字压都可以把你们压死，以后可不要和别人乱搞。下去吧！”我们懵里懵懂回到寝室，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躺在床上还提心吊胆，深怕再被叫去。

奇怪的枪声

次日起床以后，我看到被捆绑的学生，并不全是我们第七队的，第五、第六和第八队的都有。本队昨夜有多少人受到审讯起初谁也不敢说，慢慢地一个一个讲出来了。全队120多人，被叫去审讯的超过半数。先被叫去的，有的遭到吊打，有的受过电刑。审讯的方式和过程几乎是一律的，即根据前一人所说（在严刑拷打下被迫胡说），追查所牵连的人。有的人被讯问，回答不上来，只得将上茶馆、进饭馆，一起吃花生、糖果等琐事说了出来。而这些生活上的来往，就被认作秘密开会或

是暗地串连，追问开会的内容与阴谋。如果说不出所以然来，就将受到吊打或电刑。据一个受过电刑的同学说，卫兵将电线的一头触在他的手腕上，张少泉摇动电话机，他就感到五脏崩裂，全身皮肉像撕开一样剧痛；摇上两三次，就会神志不清，形同半死。在这种严刑逼供之下，为了少受痛苦，只好胡说。因此，株连甚广，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战干团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家乡被日寇占领的流亡青年。由于伪币贬值，物价飞涨，团里原定给养这时已不能维持最低生活，形式上每日三餐，但不得其饱，抢饭之事常有发生。因此每到开饭，不得不由值星官掌握饭勺，维持秩序。学生大多是20岁上下的青年，得不到足够的饭食，又加出操劳累，以致面黄肌瘦，苦恼不堪。少数学生家在云、贵、川的，还有一部分华侨学生，得到家里的补助，遇到假日顺便请同学坐坐茶馆，吃点小食也是有的，却不料因此而招来莫须有的罪名，追悔莫及。

我们学生被解除武装和限定只能在本队范围以内活动之后，接着就被禁止与家属和朋友通信，同外面的关系完全隔绝。有一天，队长邓一飞宣布：“共产党正在加紧捣乱，大家要特别小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要注意听我的哨音。哨音一响，都要就地卧下不动。谁要是违抗，就地枪毙。”我们听了，心想不知又将发生什么事情，人人惶恐不安，但也只好听天由命，坐待变化。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并没有什么动静。不料第四天的晚上，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这天晚上九点钟，我们刚下自习，照例在院中等待集合点名，忽然远处传来了枪声。大家正在惊疑之际，队长的哨音已经吹响，我们赶紧趴在地上。这时，灯火熄灭，室内室外漆黑一团，枪声则愈来愈密，越来越近。本队四周忽然枪声陡起，子弹在头顶上空呼啸飞过，历久不息。队长、指导员和三个区队长，由室内用电筒四处照射，察看我们有没有动静，一面大声喊道：“共产党暴动，正在向保卫你们的部队激战。”约莫一小时后，枪声渐少，终于停止。邓一飞集合学生点名，一

无缺少。他宣布说：“共产党的暴动已被我们平息，现在你们可以安心去睡吧。”

第二天，各大队的学生奉命全部出动，对三个总队驻地附近地区的老百姓进行大搜查，以肃清“共产党暴动”在这地区所埋伏的人。这时，从带队官的口中传出一种神话，说共产党派在这里指挥暴动的是一个女的，扮成男装，时来时去，曾经有人发现她在五福场一家客栈里的楼上住过，所以要特别注意寻找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第七队担任搜查五福场街上，任务特别重要，由张少泉亲自指挥。这次搜查，既不通知地方官员，也不向老百姓说明情由。我们每到一家，将全家男女老少集中一处，首先查看有没有女扮男装的人，然后查对户口，搜摸身上，翻箱倒篋，到处查遍。老百姓无故受此骚扰，敢怒而不敢言。当我们搜查有一家烧饼铺的楼上，有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因病躺在床上，学生犹豫未前，张少泉骂道：“怕什么！”说罢，他掀去被盖，吓得那个少女惊慌大叫，其实什么也没有。我们全总队搜查整日，结果都是一无所获。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战干团进行这次大屠杀，最大的借口是说共产党在学生中“组织暴动”，要瓦解战干团，而且这种“暴动”已经发生并被“平息”了。可是不久之后，这个所谓“共产党暴动”之谜，在学生当中就已暗暗揭穿了。据那天晚上参加过“平息共产党暴动”的学生张亚夫（河南开封人，第七班班长，1942年在蒋军张轸部任搜索营营长）和翁立楚（第三班班长，湖北黄陂人）对我说，这是总队长肖劲（湖南湘潭人，国民党中央军校六期出身，留德学生，解放前任蒋军某军军长）和三个大队长杨天威、张少泉、曾传庆玩出来的鬼把戏。他们预定这天晚上来一次全总队的“预防演习”，事先由各队队长向各班班长作了秘密布置；当总

队部的枪声一响，各大队各中队同时响应，在各队学生于队长发哨一齐跌倒在地上时，各班班长就跑出室外在本队周围对空鸣枪射击。因此，那天晚上，以总队部为中心，周围12个队约20里方圆的地区里，一片枪声，宛同战场。老百姓在睡梦中被惊醒，莫不饱受虚惊。

肖劲等为什么要玩这个鬼把戏呢？不外是他们疑神疑鬼，心虚害怕，搞一次演习壮壮胆子；也是探听虚实，看看有没有人起来响应，借以追查和镇压；而更重要的是，捏造事实，制造借口，在学生和居民中造成对共产党的恐怖心理，便于他们进行反共和非法的迫害活动。不难想见，他们的这种行动，是得到他们上峰的指示和批准的。

在三个大队长（杨天威、张少泉、曾传庆）的直接主持下，被逮捕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被认为最重要的嫌疑分子或“罪犯”，分别关在三个大队的队部里，其余的则关在各个中队。我们第七中队被捕的学生中只有杨霞村一人被关在大队部，其余的分别关在第五、第六、第八中队，只记得其中有个名叫肖宗望，四川人，是总队的篮球队选手。在我们第七中队关押的则是第五、第六、第八中队的学生，先后共有30多人。当时所以这样各队交换分散关押，其原因与目的不外三个：（一）战干团本是训练机构，并无多余的房屋用作监牢；（二）被捕的学生数以百计，都是无辜株连，刑逼成供，生死交迫，如关押在一起，积怨成怒，难免不起反抗，人多势大，难以对付；（三）为了缩小目标，避免泄漏，便于非法处理。

第七中队的囚禁室，原是拴骡马、堆粪便的一个地下室，总共不过十米见方，仅有的一个小窗这时已用铁丝封住。室内阴湿黑暗，四壁生霉。时值盛夏，天气甚热，二三十个学生充塞其间，臭气薰人。这些学生，手被捆绑，脚戴铁镣，日夜蜷缩在潮湿的土地上，听凭蚊虫和当地特多的跳蚤叮咬。他们每天只有两顿吃不饱饿不死的稀饭。不少人或患疟疾或拉肚子，根本不给医治。加之不断刑讯逼供，人人伤痕累累，病

痛交加，莫不骨瘦如柴，形同骷髅。有三个人形象我记得最清楚，其中有第六队的两个华侨学生，他俩在总队举办的文娛会上演奏口琴，给人印象很深，我在囚室外值勤时，常听到他俩大声叫骂，毫无惧意；另一个学生因受电刑以致双目失明，他整日自言自语，时笑时哭，其状至惨。至于呼冤叫屈精神失常的，更是普遍。第七队囚室的情况如此，其他各队的惨状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情况并不至此为止，更惨烈的还在后面。

一天下午，我们全体学生集合在操场上休息，两个武装卫兵解押着杨霞村在大家前面经过，指导员胡寿昌忽然大声喊道：“杨霞村要离开我们了，大家该送送去！”他的话音刚落，人群中有人接着喊打，一声吆喝，一二十个人凶猛向前，拳足交加，把杨霞村打得半死，倒在地下。这分明是事先作好的布置，而胡寿昌却装作好人出来解围，将杨霞村从地上拉起来交警卫带走。

又有一天下午，大队长张少泉集合第七、第八两队学生在第八队的操场上训话，对共产党大肆诬蔑。最后他说：“你们当中还有共产党，现在还想捣乱，我把他们叫出来你们看看。”说着他就将第八队的两个学生叫了出来。他指着这两个学生对大家说：“这就是共产党。我现在交给你们，你们看该怎么办？”于是队伍中又有人喊打，又是数十人蜂拥而上，拳打脚踢，棍石齐下，霎时间，一人脑浆四溅，当场被活活打死；另一人头破指断，血肉模糊，拖走后不久亦告死亡。

事后所了解的情况

对所谓“共产党”学生，除了像上述在操场那样活活打死以外（这种情况当不只是我们第二大队和这一次），绝大多数是由各大队在大队长的直接主持下，用各种不同手段秘密杀害。我有个同队同学蒋志逸，

当时调在大队部警卫排担任警卫，是直接参与杀害的执行人之一。1944年4月，他随邓一飞由重庆到昆明去（当时邓被派往昆明蒋军远征军某部任参谋主任），路过泸州与我谈起这次大屠杀的一些情况。他说，关押在大队部（指第二大队）的几十个学生，都是警卫排在深夜里分批秘密杀掉的。张少泉指示他们尽量少开枪，以免惊动老百姓。因此他们行刑时，都是先挖好大坑，用刺刀戳死后推到坑里埋掉。他们杀杨霞村时，杨极力挣扎反抗，他们开了一枪也没打死，又用刺刀对准杨的太阳穴猛刺，刺刀被头骨卡住拔不出来，就连刺刀一起埋下。“忠诚剧团”^①的男女演员20多人，由綦江城里押解到大队部，也是他们用同样方法杀掉的。他还说，当时天气很热，坑土埋得不结实，不少尸体被野狗拖出，恶臭难闻，又由老百姓加以掩埋。第三大队靠近綦江河边，他们杀的人都搁上石块沉到河底里去。我问邓一飞，这许多学生被杀，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他说，谁知道是不是。

在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下，究竟死了多少人，有几个数字可供参考：（一）我们第五期第三总队共有12个中队，每中队约120人，计有1400多人，毕业时只剩下约1000人；（二）第六期第一总队也同时进行屠杀，其未杀完者后来被关到“綦江集中营”，最后又由军统局提解到重庆去的就有两三百人；（三）当时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报告中，说被杀害的为100多人（这个数字是当时任卫戍总司令部参谋处第二科科长邬国贤谈出，他看过这份报告）。但是，据邓一飞告诉我，因为他还比较“慎重”，所以第七队被捕和被杀的最少，其他各队仅被杀害的都在十人以上。就以每队十人计算，仅第三总队就是100多人；再加上第一总队和“忠诚剧团”以及其他部分，被害人数决不止于一两百人。

^① “忠诚剧团”是战干团政治部的话剧团，领导人李英，团员数十人，均系战干团先期毕业学生。惨案发生后该团解散，团员多被杀害。

国军将领芷江受降中的拙劣表演

严 怪 愚

漩
洞
沉
浮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我正在雪峰山前线采访。8月上旬，由龙潭司回到安江。8月15日，当时在安江出版的《中央日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安江全镇哄动，镇民及安江纺纱厂工人的欢乐，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8月20日，我奉报社派遣，就便乘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等候日本侵略军投降人员的到来。当日乘飞机到达芷江的有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以及华中、华南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下午，重庆飞来运输机四架，何应钦、肖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员及新闻记者50余人同时赶到。20日晚上，何应钦及各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汤恩伯、张发奎、王耀武与湖南省主席吴奇伟、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一度会商，认为接待日本侵略军投降专使人员的生活，应全部军事化，起居饮食不但要规定时间，且应以号音为准，严肃庄重，方不失战胜国风度。同时，所有标语、便条，亦应印上V字（victory胜利）。在这之前，筹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以第四方面军与新六军的两个副官处长赵汝汉、敬远平为主干，他们已忙碌了三日夜，才布置好这一宏伟的场面。会场原为空军第五、六队俱乐部，乃一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处及休息

室，正中部是会场。会场前有一旷地，左右皆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为V字，上扎有“和平之神”；右边亦然，缀以“正义”两字。会场前旷地，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东头墙上，有大红色V字，两旁各悬四国国旗。其前置一长桌，玻璃窗均糊上绿色纸。其间空隙处，又悬四国国旗各一小面，两边各摆有长桌。西墙上悬挂大钟一口，其下为新闻记者席。

在日本侵略军投降专使人员所乘飞机未到以前，记者们特驱车到为日方准备的招待所参观，该所位于空军总站合作社之后，有小马路可达，为一灰色平房，食宿房屋各一栋。宿处系门形平房，共六间，每室备有未加油漆的木椅、木桌、木床各一张，红色门帘、被单皆系新置。进食处在其左右，且有休息室，朴素而整洁，连日方投降专使人员都觉得中国方面宽大优遇。

参观后，数千人伫立在机场等候日机到来，谁知到了正午12时，还不见踪影。当时，机场广播台广播：日机已飞越常德，接着又说已过辰溪。但12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日机中途迷失方向，错认洪江作芷江，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

在机场上，我碰着冯英子。当时湖南新闻界就只《中国晨报》的我们和沅陵《力报》黎浩三人参加。英子是报社特派来的。他告诉我，报社曾发行“号外”，全体人员渡过沅水到辰溪市区散发，市民们无不欢欣鼓舞，特别是从外地流亡来的人，看了“号外”，彼此握手，拥抱，跳跃，含着眼泪，互询何日买舟东归。

12时11分，日机飞临芷江上空；20分，驶向指定地点着陆。飞机两翼下面各缀有日本国旗一面，两翼末端各系以四公尺长的红色布条。25分，在严密保护下启开机门。陆军总部派陈少校（实际上是新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接待。今井武夫在机舱口立正，问陈是否可以下机？陈答称：“现在可以下机了！”今井着军装，佩军刀，首先下机，

面有戚色，缄默无语。陈应庄检查前来联系人员的名单，宪兵草草检查行李后，12时30分，陈即引导今井及其随员等七人，分乘吉普二辆入城。中外记者沿途拍照，今井横目挺胸，手握军刀，情绪颇为紧张。

日本投降专使住的招待所距机场约两公里，周围设有数层宪兵岗哨严加戒备（据说足足用了一营的兵力），不让老百姓接近，也不许新闻记者进入采访。

21日下午3时20分，陈应庄等引今井及其随员分乘吉普开赴会场。会场正中桌旁坐着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右方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是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翻译官王武上校（其他翻译人员都立在王武左右）。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将领及文职人员顾毓琇、刁作谦、刘英士、龚德柏等亦都列席。中美新闻记者数十人，从走廊一直挤到会场外面。

会谈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5时半，所有发言均译成中、英、日三国语言，其实，这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实质性的问题，肖毅肃宣布将在今井逗留的三天之内随时解决。

肖毅肃以何应钦的备忘录一份交与今井，要今井转致冈村宁次。备忘录中关于日军投降及我方军事长官受降地点曾作详细规定，似乎把受降接收分成十几处，但中间没有一处有共产党军事人员，也没有划给共产党军队一个接收地区，仿佛共产党根本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应当由国民党独吞似的。这种情况，连美国记者也觉得奇怪。

肖毅肃在递交备忘录时，特别强调要日军保管各地武器及财产，说不得交与没有接收权限的任何军队及团体；否则惟日军是问。日译员木村没有将这一段话详细译成日语，中国译员即提出抗议，木村只好重译一次。今井答复：“日军的精锐武器都在满洲国；在中国华南、华东、华中、华北的武器都是陈旧的了！”这是挑拨，但也有几分真实。他接

着又说：“中国军队想接收我们的武器及物资的很多，我们很难对付。”肖说：“那些都是些土匪或地方杂牌部队，一点也不能交给他们；如他们强行接收，日军可采取适当防卫手段！”又说：“在冈村将军完成投降手续以前，中国方面决定派冷欣中将来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冷中将一行计划与贵方代表一同前往。何总司令决定在最短期间空运部队到南京、上海和北平去。为此，美国空军地勤部队将首先进驻。希望冈村将军配合我方，作好准备。”今井说：“本文件中有显然难以执行之处，希望在此陈述意见。”肖答：“有困难，留待以后再进行联系。”会谈即告结束。

在会谈中，冷欣时而站立，时而屈膝而坐，身体晃动不已，人又瘦小，简直有一点像一只猴子。新闻记者们都认为他有失国格。

芷江电信局任务繁重，新闻电报一时发不出去。我与英子商量，让他留在芷江，我于当日黄昏搭第四方面军吉普车回辰溪报社，将一切情况写成通讯发表。22日晨，再乘便车到芷江。

23日下午近3时左右，何应钦接见今井武夫，对他们“不辞辛苦远道来芷江，表示慰问”。并说中国决定8月26日至30日空运一部分部队至南京，希望日军加以协助。然后，今井等全体人员一起赴机场，下午4时飞回南京。中国陆军总部先遣人员陈昭凯少校和空军地区司令孙桐岗上校及译员一名同行。

当天晚上，何应钦就在空军驻地举行了一个鸡尾酒会，庆祝“胜利”，除了已经赶回自己的司令部部署部队调遣的几位高级将领之外，其他的人，包括新闻记者都参加了。何应钦捧着酒杯，到处找人交谈，喜笑颜开，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高兴过。有记者问：“为什么接收人员中没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没有给共产党一个接收地区？”何应钦反问：“你认为中国应该有两个政府、两个领袖吗？”记者再问：“日本投降以后，我们的政府对共产党如何处置呢？”何应钦说：“只要他们不捣

乱，服从指挥，政府中可以给他一个位置的。……不过他们现在就不听指挥，在各战场上抢夺日军的武器了。这是不能允许的。”

不知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汽车西瓜，半车梨子和一些高级糖果，我一边听他们谈话，一边饱吃了一顿西瓜、梨子。

自作孽，不可活：周佛海的最后岁月

沈 醉

自作孽，不可活：周佛海的最后岁月

1945年9月下旬，我当时在重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总务处处长，刚刚忙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的结束工作，送走在重庆的最后一批美方官兵（约100多人），正在清点美方丢下的10多个仓库的枪械与各种器材时，忽接到戴笠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有重要客人要来，要我立即把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那幢楼房打扫干净，家具检修布置一下，尽可能搞得好一点，并要调一个排的武装和一个班的便衣警卫，还要派一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并指名要我手下的一个科长去主持接待客人的工作。我当时还不太理解，这个时候大家都往上海南京等处跑，还有什么客人要来重庆住。戴笠在电话中指的美军校级军官住的楼房，就是过去看守所的白公馆，1944年后改成了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我正在按照戴笠的指示去做的时候，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又把我找去，一见面就问我：“接到戴先生的电话没有？”我说已接到并正按照他的指示去办，只等客人来了。他笑嘻嘻地问我：“你猜是什么客人来？”我说猜不着，他慢腾腾地抽了一口烟后阴阳怪气地说：“你早已闻其大名，可能还没有见到过，他是你的老乡。”一提到“老乡”，我即明白是指周佛海了。因为前两年周佛海

常从上海托人带东西给关在军统贵州息烽监狱的母亲和岳父杨卓茂时，毛人凤总是要我派交通科的人往息烽转交，并常开玩笑告诉我，这是你的老乡托人捎来的，一定要妥为转交。此刻毛人凤一提是我老乡来，我便略带惊异地问他：“周佛海不是替我们做过不少工作，现在还是京沪行动总指挥，怎么把他送到重庆来？”他便收敛起笑容，考虑了片刻才说：“上海老百姓对于我们重用他很反感，社会上也议论纷纷。我们不能不注意影响，更不能不要老百姓。他过去功劳再大，也得照顾我们当前的利益，要权衡得失，这就是政治！”我准备走时，他又提醒我一下：“一定要准备好，特别是要把警卫安排好。”

当天晚上，我刚上床，毛人凤又打电话给我，要我明天一早便去白公馆检查一遍，一定要负责保密，对客人生活方面要尽量满足。我回答都已办妥。他又告诉我，第二天上午10点钟后去九龙坡机场等他，他在11点前也去那里迎接戴笠和客人，同时要我通知杨家山戴笠的公馆厨师准备一桌丰盛的午饭。

当时重庆有好几处机场，除了最大的白市驿机场已由美国空军占用尚未全部交还外，戴笠平日总爱使用重庆市区内的珊瑚坝机场。除了春夏大水期间，流经重庆市内那一段扬子江中便有一处沙洲露出水面来，这是最理想的中型机场。稍远一点的是九龙坡军民两用较大的机场。那时正是使用珊瑚坝机场的季节，戴笠的专机却要在九龙坡降落，这说明是因为珊瑚坝机场的人多，怕外人看到这些怪客，同时九龙坡警戒也森严些，所以才舍近而就远。我于10点多钟赶到那里，军统局警卫团派去的便衣早已在附近布置了不少岗哨，戴笠的那辆漂亮汽车和平日常用来捕人的汽车也开去了，毛人凤和中美所的主任秘书潘其武也先后赶来。

11点半前后，一架军用客机出现在机场上空。在机场担任航空检查的一名军统特务急匆匆跑到我们面前，低声向毛人凤报告：“这架就是戴先生乘的专机，马上就要降落。”机场的舷梯推到刚停下的机舱门口，

机门打开后，第一个露面的便是戴笠。他站在舷梯上先向四面看一看才走下来，与我们打招呼后便叫我先回去准备。我来不及看“客人”下飞机，便赶紧架车赶到杨家山戴笠住处，见一桌丰盛的饭菜已准备好，又去白公馆检查了一遍，才回到杨家山。戴笠已先到了，之后毛人凤、潘其武便陪着“客人”走进了会客室。可能因为在下飞机时，戴笠已把“客人”向毛、潘二人介绍过了，所以落座后没有再介绍。我看过周佛海的照片，再听他一口湖南话，不用问我也知道是他，另外4个人我知道有周佛海的妻弟杨惺华，是伪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有罗君强，做过伪安徽省长和司法行政部长。以后在周佛海兼任上海市伪市长时，他任秘书长兼警察局长，代周主持上海工作，还有丁默邨，他一向在汪伪政权中搞特务，也做过伪政治部保卫部副监（总监由陈公博兼、实际由丁负责）和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等职。另有一个叫马骥良的我过去没有听说过，后来毛人凤告诉我，这人是伪中央储备银行负责总务工作的，一向照料周佛海的生活，所以也把他一道带到重庆。

在开始吃饭时，戴笠才向这些客人介绍了我和他们一下，并简单说今后生活上有什么事，可以要我去办，同时把等在饭厅门口的侯科长叫进来，当面关照他，要好好照应这些客人。

那天的气氛是阴沉沉的，虽然戴笠边向客人敬酒边讲讲笑话，可是客人都是强作欢笑来应付一下。可能是找不到什么话可以打破沉寂的局面，戴笠便向周佛海指指我，说这是你的老乡。我马上补上一句：“我是湖南湘潭的。”周也回我一句：“我是沅陵。”他正准备给我碰碰酒杯以表示老乡关系时，发觉我面前没有酒杯而只有一大杯汽水，便问我为什么不喝酒？毛人凤便给我解释，说我“在理，^① 所以不喝酒抽烟”。丁默邨和罗君强两人一听，都歪着头，几乎是同时问：“你也‘在理’

^① 在理：指在理教。

吗？”我还没有回答，潘其武也笑嘻嘻地说我名醉却从来没有看见我醉过一次。这时，戴笠也哈哈大笑，说不喝酒也有好处，不会误事。其实，我并非“在理”，而是因自己的工作不能随便说出，怕“酒后吐真言”，所以我便以“在理”来作挡箭牌。

饭刚吃到一半，戴笠的秘书走进饭厅，不像平日一样在他耳边轻轻说几句，而是有意大声说：“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马上去。”戴笠便用餐巾在嘴上一擦，站起身来说了一声：“很抱歉！不能奉陪，要先走了。”说完指指毛人凤、潘其武和我：“你们好好陪陪他们，代我多敬几杯酒。”我很清楚，不是蒋介石找他，而是他急于去向蒋汇报，他是不愿意再陪这些已成了阶下囚的客人的。周佛海一听是蒋介石找去，便站起来送戴笠走，并用恳求的口吻说：“见到委座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戴笠笑着满口答应，走到门口又转身和周佛海握了握手，很认真地说：“你们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座不会不重视，也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各位一下，一切包在我身上，请放心好了！”

周佛海等望着戴笠远去的背影，都不出声地低下了头，不难看出，他们似乎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到戴笠这次去见蒋介石的上面。我一想到毛人凤所说“这就是政治！”这句话时，又感到这几位未免太天真了。

饭后，我按毛人凤的要求把一切都安排妥后，便在大门口等候。一会，毛人凤和潘其武陪着周佛海等沿着白公馆长长的石梯走了上来。客人们边走边看，当他们一走进大门，看到房间窗门上都有铁栅栏，便显出不安的神色。毛人凤领他们上楼后，便指着靠西边一间大房间请周佛海进去。这个房间，过去叶挺将军也住过（解放后，我和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等也住在这里），前面一大间，后边一小间。周看过之后，勉强点了点头，毛人凤又让侯科长把另外几个人都按原指示安排好了。毛人凤临走时，又当着他们的面关照我和侯科长，一定要好好招待这几位客人，要什么便给什么，不准有半点怠慢。周佛海等送我们走出中间

大厅到下楼的门口，看到站在那里的武装和便衣警卫，便黯然神伤似地说了一句：“我们不便再送了！”

毛人凤走到楼下，叮嘱站在院子里的警卫连长：“今后要特别注意，没有事先得到通知，任何人都不准到楼上去。”我也补充一句：“发现什么事要马上告诉侯科长。”我说完回头向楼上一望，见他们5个人都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默然无声地目送着我们。

我当时对汪逆政权的许多内幕不了解，出于好奇心，便常常借照顾周佛海等人的生活去找他们聊天。他们也因为没有人去看望，对我十分欢迎。我前后与周佛海等谈过10来次，每次总是一两小时，主要是听周谈，有时由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补充几句，只有马骥良没有插过话。

我过去和周佛海不认识，抗战前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是自他逃离重庆及后来在南京汪逆政权中工作后，才逐渐了解了一些有关他的情况。

周佛海逃离重庆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到了汪逆政权中，虽然在汪精卫、陈公博之后居第三位，实际上他的权力却超过了陈公博。不过后来汪逆死后，陈逆当了伪代主席兼行政院长，表面上才比周重要一些。周从汪逆政权成立起到垮台止一直任财政部部长，并兼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警政部长和特工委员会主任委员、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最后还兼上海市市长，集权力财力于一身。胜利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指挥。他多次向毛人凤和我谈过，在抗战胜利后，如果不是他运用日寇大量武装部队和他掌握的伪军维护了上海、南京、杭州等东南大城市，在附近抗日多年的新四军和地方人民抗日武装便会先国民党军队而进入这些地方了。

我和周佛海谈的第一个问题，是问他们怎样脱离重庆的？因为那时

重庆军统和中统的特务那么多，而且水陆空交通都由军统严密控制，怎么能跑掉那么多的重要人员？

他说他们之决定出走，先是由汪精卫考虑了很久才决定的。汪走的前几天，便让他妻子陈璧君去昆明，借口游览地方名胜，实际上是去找当时云南地方的最高军政负责人，得到他的全力保证支持之后，由陈用约好的暗语与汪通长途电话，汪才叫当时交通部部长彭学沛给他弄3张去昆明的飞机票，那时买飞机票要通过军统直接掌握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航空检查所审批。由于彭学沛是以交通部长名义要买3张，所以航空公司便不经航检所审批，作为公司内部人员因公而拿到3张机票。汪精卫还不十分放心，又叫陈璧君从昆明飞回重庆，把她和云南地方负责人的态度和保证以及为他们包租去越南河内的飞机等等弄得很清楚，认为有绝对的把握后，才于1938年12月18日，在离飞机起飞前3分钟，才赶到机场。这时在机场担任检查任务的军统特务们一看匆匆赶来的客人中有国民党副总裁和夫人加上一位副秘书长，便不敢阻止他们登机，只好打电话向军统局的主管人员请示。接电话的是一位股长，不敢作主，等他去向科长请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当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时，云南地方某最高负责人早派专人前往迎接，并设盛宴款待。第二天即包了一架法国飞机，把他们送到河内了。

据周佛海告诉我，汪精卫离开重庆时，曾留下一封很长的信给蒋介石，不过是等他离开了中国国境后才送给蒋介石。汪在这封信中除了分析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战前途的艰难，诉说了他之离开有不得已之苦衷，希望蒋谅解他。并再三强调，国土已沦亡大半，所剩后方几个省欲再撑持恐非易事，不如分途挽救祖国危亡局面，故让蒋担任容易的方面，即继续抗战下去，他则担任最困难的方面，从敌人手下去拯救人民，实际上就是去搞所谓和平救国。周佛海说，汪在这封信中是说蒋介石继续主持抗日工作，将来不论是胜是败，凡参加过抗日的都将成为民

族英雄；但为了保全国家元气去与敌言和，不论其如何苦心为国，必将落得个千古罪人之名。所以汪精卫认为，为国家前途打算，只有和战并行才是万全之策。

周佛海说他偷偷离开重庆时，也留下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身边主持机要工作的陈布雷，请他等蒋出巡回来再转呈给蒋。也是说明自己离开重庆的苦衷，是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去为沦陷区人民做点工作。他很感难过的是只把他的老婆杨淑慧带走而把老母亲丢在重庆，被军统抓去当了人质，最后死在军统息烽监狱中。他多次对此表示过十分伤心，还说不谅解他的人竟说他不忠不孝。

由于汪精卫和周佛海行前都有信留给了蒋介石，而且是赤裸裸地说明虽是分道扬镳，目的都是一样。所以当时便传出了这是蒋汪在演双簧，一个在战场上唱红脸，一个则到敌人统治区去唱白脸之说。

有次在听周佛海在津津有味地说他们是如何苦心救国不惜牺牲个人名节时，我曾禁不住脱口便问：“你们不怕老百姓骂你们是汉奸卖国贼吗？”话刚出口，自己又感到太冒失而有点后悔，谁知他喇一下站了起来，在房中快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像要大发脾气又极力忍下去地长叹一声后，尽力压低声音说：“说我们是去当汉奸，我们承认，有时也感到这两个字的可耻。但说我们是卖国贼，杀了我我也不承认。因为我们无国可卖，只是替被敌人占领了的国土上的老百姓做点事。这些国土是敌人交给我们，怎么反而说是我们卖掉的？说实在的，有条件有权力卖国的决不是我们，而是……”看到他那满腹委屈的样子，我想他可能要说有条件有权力卖国的是蒋介石集团，但他没敢说出来。我本想再驳他几句，但见他已把头快垂到胸前，丁默邨也在外面长吁短叹。这些几月前还可随意杀人的大汉奸，今天已落到这可怜的下场，我也不愿再去刺激他们，便敷衍几句就走了。虽然这次没有因这句话而和他闹翻脸，但也使我懂得，即使到了那种地步，这些人还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自己是汉

奸卖国贼，还有一套为自己遮羞的谬论。

据周佛海告诉我，汪精卫去河内不久，日本即派特务头子影佐祯昭与汪在香港的一些骨干取得了联系。当时在香港的几个汪的得力助手陈公博、陶希圣、梅思平等，都住在香港荷李活道49号汪的对外联络处，影佐曾多次去与这些人联系。日方急盼汪早去上海和南京筹组伪政府，汪在河内则经常与影佐派遣的犬养健有密切联系。当时日方怕国民党的特务发觉，并避免法国方面的注意，犬养健与其手下人都化装在河畔垂钓，汪派去之人员也装作垂钓，而进行交谈和交换文件，汪已同意先去上海。正在这时，发生了打死曾仲鸣的事件，日方即警告汪如不再走，军统还会派特务去打死他，只有去上海，日方才能保证他的安全。汪也感到在河内危险性很大，也希望早日离开。日方特务机关又拟采用在天津用过的挟持溥仪去东北的老办法，想让汪精卫夫妇坐在一个大木箱内，在河内装上日本商船，当成货物一样运走。汪听后非常生气，曾坚决表示，宁可在河内被人打死，也不能让别人把他当成货物一样吊装到船上去。由于汪的态度很坚决，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才决定让汪先秘密离开高朗街，避居到日本特务安排的在河内附近一座小山上的别墅内，等日本派大船来河内将其接走。不久，影佐祯昭便从日本乘坐了一艘大货轮“北光丸”去了，不料由于船大不能停靠河内码头，只能停泊在红河口，无法开进去，只好又临时租了一条100多吨的小船。汪夫妇半夜上船悄悄离开了河内，坐上小船后还提心吊胆，害怕军统特务在红河中拦击。谁知，小船驶到红河入海处却找不到“北光丸”，这一下可把汪气坏了，也急坏了。陪同他一起上船的日本特务犬养健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赶忙上岸去联系，后来找到等在那里的特务，才知道影佐也害怕国民党特务发觉，已将“北光丸”驶往北部湾海面等他们，要他们赶快开去。小船向北部湾行驶时，虽没遇上大风，却也颠簸异常，汪精卫一直发脾气摔茶杯等，但由于已落入日本特务手中，无论怎样吵也得听人

摆布，只好躺在床上生闷气。小船摇晃了100多海里才找到了等在那里的“北光丸”。影佐把汪扶上大船后，一再解释，因红河口停泊的船多，怕人发觉引来麻烦，所以临时决定到北部湾的。汪对此虽气愤极了，也别无办法，只好和影佐敷衍一顿，随船直驶上海。这一情报被军统获悉后在重庆作了内部公布，过去把汪去上海投敌，而没有去法国的责任都归咎到军统和戴笠头上的人，看了后，才没有再责难。

汪精卫等到达上海后，影佐和日本上海驻军及特务机关早研究了很久，把汪等安排去虹口地区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北四川路底一座花园洋房内，汪精卫认为在那个地区活动处处会受到日军的限制，太不方便，一再表示要迁出那里才能有所发展。日本方面也希望汪能尽快组成一像样的伪政府，也同意他可以迁出虹口地区，很快又找到了英租界的愚园路1136弄口一座大花园洋房。汪夫妇和周佛海、褚民谊等都搬了进去，这所大洋房是原国民党交通部长后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的，该房是王任大夏大学校长时期，与该校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婚，特建此豪华住宅作为藏娇之金屋。上海战事发生，王离沪后，这房一直空着无人住。汪搬去后，立即在花园四周修建了瞭望台，墙上加了铁丝网，保卫十分严密，汪精卫就在这里指挥筹组伪政府的工作，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周佛海等也都设法把附近一些房屋占了下来，这一带便形成了各种残渣余孽们求名求利和出卖自己灵魂与人格的交易场所，清朝的遗老遗少及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官武将以及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们，每天都像苍蝇一样在这里飞来飞去，好不热闹。

当时他们的活动经费，是日本方面将抗战以来被日本冻结的中国关税拨出一部分，由日本正金银行支付，项目是作为“和平运动”的开支。另外，上海一些有意与伪组织合作的帮会头目，如：张啸林、季云卿等，也经常自愿提供一些。

汪精卫去上海筹建伪政权之前，就先建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公

开名称叫“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任务一是为了保卫汪精卫和周佛海等叛国诸逆的安全，害怕再发生“河内事件”，二是搜集情报和搜罗附逆分子，三是通过这一组织去筹措经费。周佛海自己常向我表示，他很懂得，一切事都要花钱，只要有钱就有权有势，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是汪逆身边主管财政的人，向日本正金银行去领钱和领出的钱如何开支，都是由他负责，这个最先成立的“特务委员会”便由他担任主任委员，下设的“特工总部”，设在英租界极司菲尔路76号，这所大花园洋房原是国民党安徽主席陈调元的别墅，也和愚园路1136弄一样，是英租界在沪西的越界筑路，路面归英租界管理，路旁的房屋却又是属中国主权，这是过去上海的特有畸形现象。

早在汪等去上海之前，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不久，日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便于1939年到了上海，在梁逆鸿志等组织“维新政府”时，土肥原即已收容了原中统特务李士群在上海忆定盘路诸安滨10号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李原为中统（即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一个中级骨干，留苏联学习过，本为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变当了中统特务，因利用职权搞贪污，受到处分后不满，由重庆逃到香港，经人介绍结识了土肥原，被任为上海日特机关中一个小单位领导，经常往来于香港上海间，为日本搜集情报和发展特务。中统头子徐恩曾很想利用这一关系去搞对日情报活动，派该局第二处处长丁默邨到香港找李士群，想说服他为中统继续工作，因丁是李过去的上级领导，与李也有一点私交。可是丁到香港很久没有找到李，当时李在上海的工作越来越发展，已不常去香港。丁却在香港遇到周佛海，周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是部长级领导，而且是C·C系10个最高骨干之一，丁又是周的老部下，所以经周一劝说，丁不再找李士群为中统工作，自己反而随同周佛海到了上海，与李士群合伙了。由于丁过去地位比李高，所以“76号”特工总部成立后，丁默邨当了主任，李士群甘愿当他的副主任，原在忆定盘路的那个特务

机关也并了进去，这个特工总部搜罗了在沦陷区不少败类，在上海几年中，真是坏事干尽，几十年后，人们对他们当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仍愤恨异常。

在76号中，除丁、李外，还有主任秘书黄敬斋、办公厅主任傅也文，下属几个行动大队长，更是一个比一个凶恶。尤以其中军统投顺去的林之江、王天木、万里浪和中统的胡均鹤以及原在公共租界的特警潘达，戴昌龄，和几个帮会分子夏仲明、杨杰、吴四宝等，这里只举吴四宝为例，他原是流氓出身，开过汽车，没有文化，但身材魁梧、体重达150余斤，生来野蛮成性，只要博得上司欢心，他几乎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他曾带人把江苏农民银行职工宿舍内几十名职工在一小时内全部杀死，老少一个不留。在中国银行营业厅放置定时炸弹，炸死10多人，都是他的得意之作。他的老婆余爱珍，也是一只母大虫，专门审讯搜查女犯，他俩人审讯被捕的爱国人士时，只要两三句话不合他们心意，马上一顿皮鞭，打得皮开肉绽。当时上海人民恨76号这些凶神恶煞，并不亚于恨日本宪兵、特务。

汪精卫到了上海后，国民党内大部分主战人士，还希望他能悬崖勒马，不要自绝于国人，并通过很多渠道去劝说他，他均置之不理。蒋介石又命戴笠倾全力去暗杀他，汪也特别提防，除与他有深切关系的人外，一概不见客人。更不出头露面。暗地里都叫周佛海与日本积极进行商谈，军统虽一批又一批派出了去执行暗杀汪的特务，结果都失败，有的被76号抓去处死了，有的投降了。蒋介石为此十分生气，怒骂戴笠太不中用。这个一贯自认擅长搞暗杀的恶魔，也不得不经常在军统局的“纪念周”或会议上大骂特务们太不中用！

日本方面很希望汪精卫早日出山，因为“维新”和“临时”等伪政府的梁鸿志等傀儡实在没有什么号召力，虽然他们俯首帖耳甘心为虎作伥，但作用不大，所以日本方面才不惜花费大气力把汪弄了出来。汪在

上海却先来一个装腔作势，采用欲擒故纵之术，故意向日方透露重庆正在极力争取他回去的消息，所以影佐和犬养便力劝周佛海去东京一趟，以便直接去和有关负责人商谈。周也故作姿态，自己不去而派他一个老朋友张彬人随犬养去日，没有料到日首相平沼竟接见了张彬人，当面表示，希望汪早日能出面组成一个有威望的伪政府。当张把这一情况从电话中向周佛海汇报后，周和汪精卫都感到是莫大荣幸，特别是张拿了平沼首相邀请汪赴日面谈的信回到上海后，周佛海便极力主张汪应当接受邀请赴日，以增加身价。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偕同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亲信，在影佐祯昭陪同下，乘坐日本派来的专机飞往日本横须贺追滨机场，平沼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还去汪下榻的宾馆拜会了汪，与汪进行了一次“恳谈”。同意汪逆以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身份在南京建立政府，自己成立军队接管日军所占据之华东华中领土，以便把这些地区的日占领军抽出，这些地区便可全部交给汪领导的伪组织去统治，今后继续占领的地区，一旦军事状况结束也交给汪，当时双方都保证暂不对外公布这一消息，可是汪逆等悄悄回上海后，军统已得到了这一情报。

在和周佛海谈到过去许多重大事件时，我总感到周对随汪投敌不但不认为是叛国投敌的丑行，有时还用很得意的口吻来大谈特谈，我虽认为他太不知耻，但为了想要了解一些内幕，也就不去反驳他，他一直吹嘘他在汪身边的重要性，说汪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有次我实在忍不住而问他，是不是他更能得到日本人的信任，所以汪才那样言听计从？他毫不考虑回答我：“当然是这样！”因为汪有些事还不便和日本人去直接交涉，都是通过他先去联系的，因为他在国民党内是“真正”的“日本通”。

有次周佛海用发牢骚的语气和我谈到在汪伪政权中，还有不少人说他是C·C系派来的，因他过去与汪逆的改组派向无渊源，汪过去的亲信

褚民谊等还常在汪面前说他的坏话攻击他，幸而他懂得“钱能通神”，一直掌握汪伪政权的经济，所以许多人即便不满意他，还不敢公开和他闹翻，怕他不给钱。

周佛海到了重庆以后，因为不能与外界接触，能去看他的只有毛人凤、潘其武和我几个人，所以他见到我们时，总是希望了解一点蒋介石将怎样处理他。毛人凤有次笑着对我说，他去看周的时候，周一再希望他能在戴笠面前为他美言几句，早日得到一个确信，对他怎样安排？毛说这人太无自知之明了，并说他过去搞了那么多钱，连一半都没有能拿出来，谁还会给他说话。没有几天，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和儿子也被军统从上海送到了重庆与周佛海囚禁在一起。我知道杨淑慧对军统处理周佛海十分不满。她在周解送重庆后，在上海便向许多熟人说过：周在抗战时为国民党和军统都做了不少的事，那都是冒生命危险去干的。他当时除了敢对她说一点外，谁都不让知道，所以她经常为此而提心吊胆过日子。没有想到胜利后，不但不认为周是立过大功的人，反而把他作为罪人囚禁起来，这是过河拆桥，太令人伤心了。谁知更使她伤心的，是军统把她从上海送到重庆的主要目的，不是她所想的是因她请求愿与周佛海一同坐牢共患难，而是认为她还有大笔财产没有交出来，把她押到重庆是向她勒索财物的。所以我不愿去见她 and 周佛海，怕这两位老乡向我发牢骚，我只从我派去照料他们生活的侯科长口中得到一些情况。

杨淑慧到重庆的第二天，就把她的弟弟杨惺华和丁默邨、罗君强都骂了一顿，说他们没有良心，到今天反过来不但不好好安慰周佛海，还对周责难，甚至说出是周害了他们。她质问他们：你们过去靠他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不是那样感激涕零吗？怎么今天反来怨他害了你们？特别是对杨惺华骂得更凶，还是周佛海一再劝阻才慢慢好了一些。我当时想，周佛海在那种情势下，仍不忘记把这些人带在身边，不让他们留在上海过其他汉奸一样的苦日子，已很够交情了。我去看他们时，

表面上还都过得去，而侯科长早就告诉我，他们对周佛海很不客气。我因不愿过问他们之间的事，所以没有劝过他们，只把听到的一些可笑的事，和毛人凤等在谈话中作为笑谈资料。如有次我听说周佛海感到有些上火，便请侯科长去叫人买些中药“六一散”，那是一种清火降热的常用冲剂。勤务兵买来后就放在桌子上，因看周佛海在睡午觉，没有叫醒他。等他醒来问勤务兵，知道已买回而被别人拿去冲服了，很不高兴。当时他们之间就为这点只值几毛钱的東西吵了起来。侯科长打电话告诉我，我叫他立刻再去多买些，每人给他们几包。毛人凤听了，连连大笑，说想不到这些过去一掷万金的人，今天会为几毛钱的東西而争吵。

杨淑慧到重庆和周佛海决心来共患难，但没有多久，军统就逼她把财产交出来，又把她从重庆押到上海去到一些银行的保险柜取金条、美钞。我只听说，又取出可值几百万美元的财物。除黄金、美钞、珠宝玉石等外，还有房地产不少，这是没有被军统查出的逆产，她都献了出来，但并没有因为这样再同意她去重庆陪伴周佛海，她更加感到气愤，成天发牢骚，但还有些小特务去找她的麻烦，想再从她身上刮点油水，她这才感到做汉奸老婆的苦恼。

周佛海对住在白公馆逐渐表现出烦躁不安起来，因为他们常常从照顾他们生活的勤杂人员口中，听到了这里过去是座可怕的监狱，曾死过不少的人。当侯科长把这一情况告诉我后，毛人凤很生气，让侯科长把原来的勤杂人员全部撤换，并用很严的办法，处理了两个爱和他们聊天的勤务兵，有一个差点被打死。所以后来换去的都不敢再和他们聊天了。

我把周佛海等对长住白公馆感到不满意的情况告诉戴笠后，他把眼一瞪，气愤愤地说：还要怎样招待他们？难道要替他们恢复过去在上海南京的待遇吗？我看他那么不高兴，知道他对这些不但再无用处而且还是累赘的人早不感兴趣了，便站起身要走，他把手向下压了两下，我知

道这是他要我留下的习惯动作，便又坐下来让他考虑。他搔了几下头皮，才告诉我：可以把原来中美所副主任美特梅乐斯和参谋长贝乐利住的那一排10来间平房收拾一下，把周佛海等搬到那里去住，不过外围警卫要加强，可由原来的一个排的武装警卫再增加一个排，生活方面还是要尽可能让他们过得舒适一些。临走他又关照我，听到他们有什么意见，不要直接回答他们，要随时告诉他。

周等搬去之后，我又去看过他们，周认为比在白公馆好得多，因为在白公馆只有一个小院供他们散步，而且要从楼上下去，每次下楼都得先与管理的人员打招呼，站在楼门口的两个便衣警卫才同意他们下去，否则会遭到有礼貌的拒绝，他们总是客气地说：“请等一等，我去请示一下。”等请示回来，才放他们下去。所以他们宁可在楼上活动，轻易不去碰钉子，而梅乐斯原来住的这座平房，不但里面安装有新式卫生设备，不用和白公馆一样上厕所，还可以在四面有竹篱的院内随意走动，空气也清新得多，因这里四面都有松林，而且鸟语花香，再没有是在坐牢的感觉了。

过去总是我向他们提出些问题，请他们解答，自搬迁之后，他们也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周佛海问我：为什么军统在河内刺汪之前，要派特务到香港去刺杀林柏生？因为这件事我知道一点，便告诉他，那是知道他们在香港没有回重庆的打算，为了杀一儆百，便决定先杀一两个来警告他们，不一定是林柏生，别的几个住在荷李活道的人只要有机会就干掉。那次认为林柏生很适合，结果却没有能击中，反而打草惊蛇，不久都纷纷跑到河内去了。周佛海认为那次他太庆幸了，因为他活动最多，几乎成天在外奔走，找他的人也多，当时他思想上完全没有戒备，以为在香港地区，特务不敢胡来，林柏生被打了两枪而没有打中后，他才警惕起来。我一句话几乎冲到了嘴边又压回去了，我本想说：“那次要把你打死了，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身败名裂。”因为曾仲鸣虽在汪精

卫身边被打死，但却没有把他定为汉奸。

还有一次，周佛海指指在隔壁房内咳嗽很厉害的丁默邨，小声问我：“默邨和戴先生也早有联系，为什么你们还要杀他？并且能找到那样一个漂亮小姐来搞这种工作，你们是怎样训练的？”我对这件事完全不了解，只说丁与军统的关系不及他与军统的关系，为什么要杀他，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不清楚，更不知道训练了什么小姐去搞这一工作。周听了我的回答才告诉了我这一简单经过，他说那个女孩子叫郑萍如，是伪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设在上海）首席检察官郑某之女，在上海法国人办的学校读书，还不到20岁，长得非常漂亮，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被丁默邨看中了。和丁发生关系不久，有天她搭乘丁的汽车出外，路过静安寺路一家大皮货店时，要丁挑一件皮大衣给她。丁同意了，下车一看，皮货店附近有两个人正在注视他，他估计可能发生意外，（因当时军统在上海已打死了几名汉奸）但仍故作镇定陪同郑进入商店，立即又从另一门冲出跑到他的保险汽车旁。（他每次停车下来，总是要司机不要熄火，随时可以启动）那两个人果然是军统特务，原来估计他进入商店，总得停留一下，没想到他一进入立即又冲出来，所以等到发觉他跑向汽车时，才抽出枪来连打几枪，他已躲进汽车开走，只在汽车门上打了几个浅浅的弹痕。他回去后找了几个特务一研究，肯定是郑萍如约好了军统特务在那里想干掉他，本来要立即把郑拘捕，可又想找到她的有关上级，便不动声色，只派出一批特务在她住的吕班路万宜坊和她读书的法国学校去监视侦察。第二天，郑还打电话慰问丁，说真没有想到会发生那样意外事件。接着还和过去一样到76号去找丁。丁表面上还和她敷衍，却不敢再和她外出。因为她生得太美，丁真不想丢掉她，可是丁默邨的老婆联合了周佛海等人的老婆，一致提出非严办郑不可，这才把郑逮捕起来。另一军统投敌特务林之江，也是色中饿鬼。一看到这小美人，便自告奋勇，愿意设法把她的上级关系查出来，但要交他带回去慢

慢侦讯，不能关押在 76 号监狱内，丁当然同意了。但过了几天，毫无结果，许多人都耽心林也被迷住了。丁默邨等人老婆便又提出，立即把郑萍如枪决，以免留下后患，周佛海也只好同意了，下令让林之江马上执行。据林之江身边的特务说，林确实被她迷住了，还准备带她逃走。到执行枪决时，她还拉着林的手说：“再不带我走你会后悔的。”因为派去监督的人一再催促，林才背过脸去，让他们把她拖走打死了。

听完周的叙述，我曾到军统人事处去查询郑萍如的档案。主管的科长告诉我，军统名单中并无此人。后来我到了上海，问上海的人事负责人，也说没有这个人。我很生气，说为了我们的工作，人都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保存，太不应该了！后来他们才去清查当时在上海干潜伏的几个特务，方弄清楚，郑萍如只是军统的一个“运用人员”，还没有让她填表正式加入军统。我便向军统人事处提出，才把她补上作为军统在抗战时在沦陷区殉职的烈士。据认识她的特务告诉我，说她完全是出于爱国和好奇，才去干这一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的。

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谁也没有心思去告诉周佛海这些人，但他们从报上看到之后，据侯科长告诉我，周竟放声大哭，连说：“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一天连饭都吃不下去，杨惺华再三劝他，他还是不停地哭。据说，当年他母亲病逝的时候，也没有这次哭得那样久，那样伤心。

戴笠死后，郑介民当了局长，毛人凤当了副局长，再也没有去考虑如何照顾周佛海等人了。一年之后，即 1946 年 9 月 16 日，便由重庆杨家山原来的梅乐斯公馆，解送到南京军统设在南京宁海路 21 号的看守所，作为重要汉奸囚禁起来。这座房屋原来是国民党一位高级将领的私宅，沦陷后，被汪伪上海的特工总部占据，作为南京站。军统于胜利后接收，有几个大特务想作住宅，一听到曾在这里杀害过不少爱国人士，便都不敢要而改作看守所，这座房子是前院大后院小，共有三四十间，

周佛海关在后院，我去看时，他与伪上海警察局长卢英同囚一室，抗战前，我在上海兼的公职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行动组长，卢英是上海警察局侦缉总队长，不但常在一起开过会，而且为了一些案件彼此争功时还吵闹过，所以他一看到我佩带少将领章，一改过去彼此怒目相向的面容，一个劲地奉承我，我向周佛海询问生活情况，周指指卢英，一看就知道他讨厌这人，我立即关照陪在我身边的看守所所长，马上把卢英迁到别的房间去，让周佛海一人住一间。因为这些小事，用不着找毛人凤商量，我就处理了。周对这样一件事，也表示感激异常，还没有忘记告诉我，他对戴笠之死的悲痛心情。

看过周佛海，我回到保密局见了毛人凤，便问他：为什么要把周等由重庆送到南京，他说送回南京是要把他们交法院去判刑，因为郑介民不敢负责再把他们留在重庆，将来向法院一送，就没有我们的事了。我一听就感到有点说不过去。周佛海真为军统做了不少的事，胜利后还保全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没让多年包围在这些大城市附近的新四军和人民武装力量进驻接收，总可以将功抵过了，今天却撒手不管。但我不便多说，怕别人说我包庇汉奸，起身便走。毛人凤又把我叫住，并让我把他办公室的门关上，才走到我身旁，轻声告诉我，说有人向他检举，周佛海的妻子托人送了一大笔黄金给了郑介民的老婆，要我去查查有没有这回事，我去上海和南京找了一些人问了一下，都只是听说有这回事，但给了多少，谁经手的？却没有查出来。

周佛海等解到南京一个月左右，便移交到了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10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开庭，由高等法院院长赵琛亲自任审判长，临时借用夫子庙大殿作为法庭。那天旁听席上挤得水泄不通。对周佛海的起诉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而周逆却强词夺理说他最初是“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到后一阶段便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并举出他一直与戴笠、蒋伯诚（蒋介石抗战时派驻上海的秘密

代表) 吴开先等有密切联系, 而且到了后来几乎是根据重庆的命令在工作……虽然旁听席上不少人为他的辩护而鼓掌, 但最后审判长还是严词驳斥了他这些无耻的丑表功, 并宣布改日再进行宣判。再次开庭时, 便在高等法院刑庭, 并限制了旁听人数, 因为怕发生意外, 这是由于上次周举出了在汪伪政府统治时期的物价, 比当时国民党统治下还要稳定一些之例子, 这些是深得一些人的同情的。因国民党于胜利后还都南京后, 物价猛涨, 接收的官员大搞“五子登科”, 逐渐使人民产生了还不如伪政府统治时期的感觉, 据说这也是促成判处他死刑的一个原因, 说他还在继续与国民党政府为敌, 所以便宣布判处他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当场便表示了不服这一判决, 之后又上诉。最高法院批下, 仍维持原判。

有天毛人凤告诉我, 说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就住在保密局附近成贤街某号, 要我去看看她。我去了, 没想到她住在那样两间破房子里, 见我去还吓一跳, 以为还要逼她交财产。我说毛人凤要我来看看你, 她表示万分感激, 希望能见见毛, 她惟一希望是能把周佛海的死刑改判。我便在谈话中暗示她, 如果谁得了她的金条, 就不应再有什么顾虑而跑去找他们拼了, 因为已判死刑, 反正不能再加刑了。如不能达到减刑的目的, 索性闹翻天。人救不了, 拿去的金条至少要退还。她听了频频点头, 我又借机追问她, 究竟谁拿了她的大量金条, 她一下泪流满面, 却迟迟不肯说出来, 只吞吞吐吐地说: 谢谢您的指点, 我豁出性命来也要去试试看。从此话可推断出确有人拿过她的金条, 但她不敢说, 我便和她扯了些别的话, 她才说她过去老是担心一旦日本人失败, 会无路可走。周佛海常安慰她, 说与重庆早有联系, 并把他与重庆联系的化名叫“蒋信”, 说此名就是希望蒋介石信任他, 没想到结果判了死刑。她还说胜利时, 周佛海可以调动几十万伪军。如果他不接受重庆的委任做什么京沪行动总指挥, 而是带着这几十万人去投共产党, 把京、沪、杭也交

给共产党接收，她相信定会对他将功抵罪，而不至于判他死刑……我看她越说牢骚越多，便引她谈她们家庭情况。她说周佛海过去家庭很贫穷，靠他自己努力，也得她父亲杨卓茂不少的帮助。她父亲是早年留美学生，虽未做过什么大官，但认识的达官贵人不少，对周佛海很有好处，周对之也如亲生父亲一样尊敬。最后她还谈到周在未投敌前，生活比较严肃，与她感情很好。投敌后，大家都一样醉生梦死，过一天便享受一天。周不但在南京、上海有了外室，连他常去的日本也有一个日本女人，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她说到这些，又很气愤，不过她还是很安慰，因为不管怎样，周对她始终是很好，没有因为有外室而对她的不如过去，所以她无论如何也要为保全周的性命而奔走。她希望我回去告诉毛人凤，不但要求毛接见她，还请求毛带她去见见蒋介石。我回去把这些都告诉毛人凤之后，他只笑笑说：“见见我还可以，要我带她去见蒋老先生，就是戴（笠）先生在世，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吧！”

虽然我再没有去见她，但却听到不少关于她到处去活动的事，甚至有人相信，毛人凤真的带她去见过蒋介石，而更多的是她扭着那个拿了她大批金条送给郑介民老婆的人去拼命，非要他带去找郑介民老婆，吓得郑的老婆躲到汉口老家去了。

事情却也出人意外，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果然用国民政府主席名义下了一道特赦令，说明周佛海在1941年以后，即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但在1945年8月19日军统续为转呈，该犯准备事实表现……该犯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究属不无贡献，故准将该犯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周佛海虽然被减了刑，但精神上的压力仍很大。此时他已5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很希望能“保外就医”，却没有得到批准，便认为只能庾毙狱中了。毛人凤又要我去看过他两次，一次是宽慰他，说将来还有希望可以将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他听了也只勉强笑了一笑。第二次

是他病重时我又去看过他，他当时执着我的手说：过去他虽做了一些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国家的事，但对蒋介石和戴笠是尽了一切力量的。他泪眼模糊地向我提出一个请求，说他如果死去，希望能在他尸体上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他就万分感激、无限安慰了。我当时还认为这不算是件大事，虽没有当面答应他，但愿意给他去请示一下，如准许了，下次就把国旗带来存放在他那里，准备以后可以用上。当我回去和毛人凤一谈，他马上表现出十分认真的样子，连说：“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我还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声：“给死人身上盖面国旗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我话一出口，他马上站了起来，很生气地说：“过去戴先生常说你年轻没有政治经验，这件事你就不懂得利害，我们同意给他死后尸体上盖国旗，最高法院提出来，谁把他的汉奸帽子摘掉而把他作为国家的功臣的？那我们怎样回答？这不是件小事，你太不重视这一分寸了……”他说了一大堆，我似懂非懂地答复他一句：“不给他，他自己买一面就行了。”我说完起身便走，他追到门口大声把我叫回去，要我告诉周佛海，就说他的请求没有批准，不准他死后盖国旗。刚说完又改口说，你就告诉他，这种事你作不了主，已代他向上面请求去了。由于他不同意给周佛海死后尸体上盖国旗，我便没有好意思再去看周佛海。

1948年2月初，监狱方面不断传出周佛海病危的消息，到后来据说已瘦得皮包骨，连肌肉注射都无处下针。杨淑慧还四处奔走，希望能够保外就医，仍未得到批准。拖到2月28日，瘐毙狱中，移葬于南京郊外永安公墓。那天去送葬的，都是他生前在南京上海的汽车司机、警卫、厨师。据杨淑慧后来对人说，朋友和旧同事中只有一位搞新闻工作的金雄白，他还是刚刚从军统的看守所释放不久，其余的人都不敢沾边。只有那些曾跟他工作过的司机等20多人仍是那么忠心耿耿，像生前服侍他一样，边哭边把那口薄棺轻轻放入墓穴。

旧上海黄金风潮：一条黑线通到底

何 汉 文

漩
涡
沉
浮

国民党政府从抗战末期到崩溃前夕，由于买办资本集团进行疯狂掠夺，前后发生过两次黄金风潮案。第一次是1945年3月间，发生在重庆，原因是由于蒋政府为了骗取人民的金钱，借口吸收游资，自1944年9月起，由中央银行开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和“法币预购黄金期票”。到1945年3月29日，黄金牌价由每两二万元提高到三万五千元时，加价之先，已经走漏风声，以致银行人员利用职权，乘机购储黄金。风声传出来后，蒋政府中的政学系、C. C. 派，为了夺取财政大权，乘机掀起风潮，闹得重庆满城风雨，经监察院检举后，由法院判刑的有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王绍斋、中央信托局储蓄处处长王华等，孔祥熙也因风潮影响，被迫下台。当时虽然像煞有介事，打了几个苍蝇，但对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彻底追查，只是含糊了案，并且给予新上台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以进一步加强向人民掠夺的机会。宋借口打击投机者，由政府宣布：凡购储黄金的存户和预购黄金期票的买主，都要“捐献”四成。据后来财政部的报告，总计这次“捐献”的黄金有820468两。而实际上真正的大户投机者，大都和中央银行有关系，消息灵通，办法很多，黄金早已到手，没有“捐献”分文；被“捐献”的都是些普通存户。经过

这次横暴的掠夺后，黄金储蓄和购买黄金期票的骗局被戳穿了，再没有人上当了，中央银行只好改用抛售黄金的办法，企图稳定金价物价。结果又引起了第二次黄金风潮案。这次黄金风潮是1947年2月发生于上海，接着波及全国，被牵及的贪污有关人员，上自宋子文、贝祖诒（淞蓀），下至中央银行职员、金号老板。案子发生后，在蒋政府内部引起了一场政潮，行政院长宋子文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都因此下台；蒋政权下的经济，因此加速崩溃。我是当时监察院派出彻查这个案件的四监委之一，并且是后来调查报告书的起草人，和对宋子文、贝祖诒提出弹劾案的领衔人，对于这次黄金风潮的内幕，略知梗概。现在就我所能回忆的略述如下：

黄金风潮是怎样发生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许多国民党的官僚、军人都在劫收中发了横财。他们除了大肆挥霍外，还握有大量的货币成为游资，寻求出路。在当时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他们感到：储存银行怕变水；投入工商业又担心时局的不安定，因此，大量游资都集中于市场上的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搞得抢购风潮日甚一日，物价更加狂涨，法币益趋恶性膨胀。这种现象在上海表现得格外突出。这时宋子文上台不久，中央银行还控制有900多万两的库存黄金，10亿美元的外汇，和大量的美援物资，同时20亿的美援贷款，也正在进行谈判。蒋、宋之流还妄想凭恃这笔有限的现金，来和那些泛滥成灾的游资作斗争，从而达到稳定物价和币值的目的。在美国顾问杨格的献策和怂恿之下，1946年3月行政院决定，实行开放外汇市场，规定外汇牌价的办法，同时由中央银行公布黄金买卖办法，以库存黄金向上海市面抛售。这个办法施行以后，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12个月中，上海的黄金市价，在最初几个月，波动还较小，

到1946年10月以后，便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当时金价波动的情形，如下表所列（按黄金每条（十两）折合纸币计算）：

1946年各月份	最高价格	最低价格
1至3月	1,940千元	795千元
4至6月	2,030千元	1,420千元
7至9月	2,300千元	1,863千元
10月	2,240千元	2,150千元
11月	2,727千元	2,340千元
12月	3,715千元	2,758千元

1947年开年以后，市面金价每天都是波动几次，到2月初，中行停售黄金的前几天，一天涨价竟达九次之多。现在仅就1月4日到2月13日上海市的金价波动情形表述如下（按每条黄金价格计算）：

激
涌
沉
浮

	最高价格	最低价格
1月4日	4,580千元	3,954千元
1月31日	4,630千元	4,190千元
2月4日	4,700千元	4,400千元
2月7日	5,330千元	4,840千元
2月10日	7,200千元	5,430千元
2月11日	7,340千元	5,810千元
2月13日	7,800千元	6,700千元

中央银行虽然逐日抛售金条，但是黄金涨风不但不能平息，上涨的幅度反而越来越大，涨风越来越凶，最后上海库存黄金快要完结的时候，更包用中航运输飞机，将重庆的库存厂条也运来济急，但是杯水车薪已无济于事，以致中行抛出黄金越来越少。在1月30日这一天抛售的黄金还有19000条，而2月份的上半个月，一共只售出了10900多条，其捉襟见肘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当上海市面发现了重庆厂条和售出金条

日见减少的时候，一般嗅觉很灵的黄金投机买卖者已察觉到库存濒近告罄的迹象，进一步引起了大量的购进。中行只好于2月8日停止抛售，市面上更掀起了抢购黄金的高潮，迫使中行于2月15日正式公告停止抛售黄金。至是，上海黄金市场顿时变成了只有黑市，没有牌价。于是有钱的人们集中抢购黄金美钞和重要的物资，进一步助长了一切物价狂涨，物资奇缺，市场和金融十分紊乱的局面。上海在当时是全国经济金融的重心，它发生了这样大的骚动以后，不能不影响到全国各城市，以致蒋管区的财政金融由紊乱发展到全部崩溃。原来中行的黄金抛售，只限于上海一处，其他各地都只逐日公布牌价，没有黄金出售。因此，形成各地的黄金市价都高出上海的牌价。例如在2月11日这一天，上海的最高金价是734万元一条，而南京为930万元，武汉为950万元，重庆为950万元，广州为1100万元，北平为860万元，天津为830万元，青岛为750万元。正因为各地的金价都高出上海，所以各地纷纷向上海抢购黄金，上海的黄金大量向其他各地流散。当时重庆、武汉、广州等地的中航飞机，常常被人包占，以至客机的包价也发生高出规定运费若干倍的黑市。其次，当时沿津浦、陇海一带，正是大军云集，进行内战，许多部队的高级军官都把领到的军饷钞票，措不发下，大批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甚至中行由南京开往徐州等地的运送钞票的专车，开到半途，便又掉转车头，运回上海。当时各部队为了争取交通工具运送钞票，经常发生争执，以至发生武装冲突。再次，上海当地金融、工商部门的C. C. 分子，江浙财阀，为了大量抢购黄金美钞，除了拿出他们自己的钞票外，还不能满足欲望，更设法向四行贷款。仅在12月初的头几天中，四联总处便放出了560亿元的“生产贷款”。这些贷款到手以后，他们都是马上用来抢购黄金美钞。甚至中行在上午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在当日下午抛售黄金的收款中，支票就回了笼。由于这些特殊的原因，更加剧了上海黄金美钞市场的紊乱。在2月初的十一二天中，黄

金涨了一倍，美钞涨了一倍半，跟着一般物价也都涨了两三倍。全国各城市都是一样的涨风凶狂，弄得人心惶惶。一般人民和低级职工，睡一觉醒来，十万元的生活用款已经有二三成化了水，一个星期下来，更是失去了大半。许多学校学生在饭馆吃零伙的，前几天1000元一顿，逐日涨为2000元、4000元一顿，许多穷苦学生都因此吃不起饭，饿着肚子。总之，当时凡是靠工薪吃饭的人们，在此风潮中，为了保家保命，都只好设法购买一些生活必需的物资，而其工薪又不能及时赶发，等到发下，实质上已经大打折扣，所以大家都弄得无法生活下去。中小工商企业者，没有豪门背景，分不到“生产贷款”，为了保本保值，就只好丢开生产，设法把流动资金移来购进一些与生产无关的物资，好多企业都在风潮中破了产。仅有官僚资本家互相勾结，上下其手，乘机抢购了大量的黄金美钞以及花纱布匹等重要物资，在这个大风暴中发了一笔大横财。

监察院为何打起老虎来了

面对这个严重的情势，当时国民党政府掌握财政金融大权的宋子文一系，已经吃饱了，把事情弄糟了；为了苟延残喘，在停售黄金以后，实行又一次的黄金掠夺政策。2月16日行政院提出了一个“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施行。根据这个方案，宣布禁止黄金买卖，取缔黄金买卖投机，规定“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十条，禁止商民把金条金饰在市场买卖，禁止用黄金代替通货，禁止人民携带黄金，把黄金冻结在中行停售黄金以前的价格，凡违反规定的，将其所有黄金充公或由中央银行照牌价兑换法币；同时宣布冻结一切职工的生活指数。这个办法公布实行后，在上海组织经济监察团，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担任团长，发动许多宪警特务，以检查为名，对于商民持有黄金

美钞以及重要物资的人实行搜刮；并且鼓励告密，来扩大和加深其搜刮范围。结果是：许多中小户当时在风潮中为了保全血本，抢购了一点黄金、美钞或物资，至是又都遭到了没收充公，还要坐牢；一般职工因为生活指数冻结，而物价依然不断上涨，生活更加痛苦。自从这个“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实施以后，上海的市场虽然在反动高压之下，表面上暂时稳定了一些，而实质上是经济崩溃进一步加深了，特别是广大人民和职工生活都已濒于绝境，反动政府反而从新的掠夺措施中再一次从商民手中抢得仅存的一些金钞和物资。我们在上海查案时，据宣铁吾很得意地告诉我们，在经监团成立后的十天中，经检查没收所获的黄金有20多万两，美钞有120多万元，棉纱布匹价值300多亿元。他还请托我们在查案中随时将所发现违反“紧急措施”规定的情事都转告经监团处理。我们也照他的要求在指挥上海审计处抽查上海某些有投机嫌疑的银行工厂时，举发了一些案件，例如当时的正泰橡胶厂、大中华造纸厂、生化制药厂等都因为以“生产贷款”买金钞、囤物资被举发而搞得吃官司。除了宋子文一系利用职权采取继续掠夺的措施而外，还有参政会、立法院、监察院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部分人，一方面同意采取上述掠夺政策来维持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又倡言要彻查金潮发生的责任，惩办失职人员。不过持这种态度的人，又各有不同的打算；在各派系中，如政学系因为自从宋子文上台以后，把张嘉璈从中央银行排挤出去了（原先张是中行的副总裁，宋上台后调张到东北搞接收）；张群之流也不得意，现在主张查办，是为了想乘机倒宋，攫取财政大权和行政院长；C. C. 派主张查办，是因为他们当时在财政金融上还只占有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还在争夺中，中央银行还无法插手，所以想乘机把宋子文在这些方面的垄断势力推翻，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垄断势力；孔祥熙和他的喽啰也在主张查办，是因为宋子文从1945年起把孔的财政大权夺去了，此时他想倒掉宋，好卷土重来；至于监察院，于右任和许多

监察委员过去一贯是以超然自居，自命不介入一切派别斗争，而现在也主张查办，而且是挺身而出实行查办的惟一机关，则是因为看到当时宋子文已经成了众矢之的，闲散多年，无人重视的“养老院”——监察院想乘机打打未断气的老虎，可以博得许多人的喝彩，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由于这种种不同的动机，汇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打倒宋子文的怒潮，酿成了当时国民党内部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监察院于2月16日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会中一致决定派员彻查这次金潮酿成的情形和负责者，会上并且有人慷慨激昂地说：“这次的查案，监察院必须下决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苍蝇，必须派几个精明干练的委员，才能完成任务，莫使各方失望。”结果，由院长于右任当场指派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楨四监委为上海黄金风潮案彻查委员，并责成上海审计处协助工作。为了使查案进行不至因为外间复杂情形的牵制发生困难，四监委决定于即晚赴沪，开始调查。

四监委抵沪以后，首先是考虑查案如何进行的问题，因为不但本案案情复杂，并且当时来沪查案的除监察院而外，还有两起：一是上海经监团已经在“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公布的前两天成立，开始活动，我们去时，他们已经在大于其对商民的检查没收工作；一是国防部也派了第二厅厅长郑介民、高参钟英、易伟等来沪调查军人在风潮中乘机投机囤积的情形。我们为了在工作上不致发生冲突，在警备司令部开了一次三方面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决定：凡是关于军人在风潮中投机贪污的事情都归国防部方面负责；关于商民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的事都归经监团负责；关于公务人员贪污投机的事都归监察院方面负责；三方面随时交换调查所得的重要情报。这个决定，表面上是职责上的分工，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查案的主要目标是对宋子文，恐怕范围牵及太广，会发生阻力；因为军人都是受蒋介石的支配，我们搞得不好，会碰钉子；商民在上海是五花八门，下自流氓，上至豪门，都有关系，搞得不好，也会碰壁，

所以情愿把彻查范围大大地缩小。其实军人何尝不是政府成员呢？商民的投机倒把何尝不是和官僚勾结一气甚至官商不分呢？因为这样分工的结果，所以当时我们所查的仅限于和中央银行有直接关系的少数人员和一部分的黑暗事实而已^①。

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内幕

自从1946年3月中央银行实行向上海市面抛售黄金，当时抛售的办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明配，每天上午10时由中行业务局根据当日上海黄金市场的金价规定牌价，由上海市金号、银楼两公会会员提出当日申请购进的黄金数量，交由公会负责人报请中行业务局配给，上午由中行将黄金配下，下午金市收盘时，配售户将配给黄金的价款缴库。第二种是暗售，由中行业务局于当日明配之后，根据市场情形，随时以波动的最高黑市价格（因为当时明配的黄金数量总是供不应求，所以市面交易

^①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载资耀华先生《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一文中说：“C. C. 派看到宋子文假借外力已不足恃，经济情形不可终日，抢购黄金已不可能，乃掀起第二次黄金大疑案。由参政会、监察院、立法院等机关联合对宋子文提出弹劾，并派大员到沪，会同淞沪警备司令部进行检查。声称要拘捕中央银行总裁，并立即拘捕了该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仁安及某金号经理。于是宋子文不得不辞职出走广东，中央银行要职又为C. C. 派所占据。”资先生这段记述和当时事实有出入。第一，当时参政会、立法院在其委员会议上虽然都有质询案提出，但是都没有派员到上海去查案，更没有和监察院联合进行检查。至于说三机关联合对宋子文提出弹劾，更是于法不许，因为弹劾权在当时是属于监察院的职权，立法院和参政会都没有弹劾权。当时对宋子文、贝祖诒的弹劾案是由四监委提出，由监委金毓麟、于树德等审查成立，移付惩戒。第二，说这次黄金风潮案是C. C. 派掀起的，也与事实不符。C. C. 派乘机参加倒宋是事实，但是把这一案都归之于C. C. 派所发动，未免抬高了C. C. 派，其情形已如上文所述。第三，说金潮案的结果是宋子文倒台，“中央银行要职又为C. C. 派所占据”，也非事实。宋辞职以后，行政院是张群接任，贝祖诒免职后是张嘉璈接充，副总裁由刘攻芸接充，上台的不是C. C. 派，而是政学系。

的金价往往高出牌价)，由中行暗地将金条交由委托的几家金号、银楼向市面抛售，中行不直接露面，其目的原来是想压平过于波动的黑市，但实际上只是追逐黑市而已。

中行内部关于抛售黄金，一直都是由总裁贝祖诒、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仁安负责处理，每天的抛售数量由三人决定，抛售价格由林、杨二人和公会负责人商定；每天黄金买卖的情形，都用英文向宋子文作出报告，连财政部长（当时财政部长是俞鸿钧）都不能过问。一直到1947年1月，因金价波动厉害，财政部指令中行按时报告，才每周呈送一份买卖统计表到财政部。俞鸿钧是和政学系勾结的圆滑官僚，非宋一系，所以中行虽与财政部的业务有关，但事实上是完全不许俞鸿钧过问。因此黄金买卖的勾当，完全是以宋、贝在上指挥，林、杨二人为执行者。当我们查案时，询问中央银行究竟原来库存有多少黄金，一年间抛售了多少黄金，现在还存有多少黄金，贝祖诒对我们的答复是：“中行原有库存总数，从1946年3月至11月的抛售总数和现存底数，以事关机密，奉主席（蒋介石）谕，对任何人不能公开。”其余据他的报告，1946年12月份计买入黄金2056条，售出78306条；1947年1月份买入300条，售出68454条；2月份至15日停售止，买入135条，售出10986条。贝虽借口机密不肯将库存原有总数和现存底数说出来，但是我们利用孔、宋之间当时的利害矛盾，访问了孔祥熙，据孔说，在他辞财政部长职时，交给宋子文的库存共计有900多万两黄金。根据上述中行两个半月的黄金买卖数字报告，大致每月售出黄金约在70万两左右，12个月中共计约售出850万两左右。当时所谓买进的黄金，仅有极少数的矿金。可见孔祥熙向我们说的数字是大致可靠的；中行在宣告停售黄金时，已经是库存告罄，无金可售无疑了。一年之间，为了蒋介石的内战军费和豪门官僚的投机侵夺，竟将国家这样一笔巨额的黄金花尽，无怪当时有人骂宋子文是蒋介石经济上的“败家子”。

中行抛售黄金的市场代理人是上海金业公会和上海银楼业公会。当时中行为了便于控制（其实是为了便于勾结舞弊），在金业公会的65家会员中指定同丰余、太康润、大丰恒三家金号，和银楼业会员中的方九霞昌记、杨庆和发记两家银楼，负责综核会员每日申请购金数目，经领和分发明配和暗售的黄金。这五家金号银楼是当时中行在上海抛售黄金的信用代表者。当时上海金交易所的成员分为金号和银楼两业：银楼业多半是历史悠久，注重信用，营业稳健，黄金的买卖数量也比较少。金号以投机买卖为主，大都和官僚资本、豪门资本有密切的关系；许多金号吞售量极大，在黄金市场上具有很大的操纵力量；它们多半是乘金价波动才设立的，其中有的甚至连正式的店面都没有；当时的65家金号中，有44家连营业执照也没有领到，登记的资本都很少，如同丰余资本为1500万元，太康润为2400万元，大丰恒为1000万元，方九霞为910万元，杨庆和为960万元，以当时法币价值论，都等于零；而据当时中行的报告，单是在1947年1月至2月15日，五家经手的配售黄金额共计有79540条，计同丰余占43597条，太康润占16247条，大丰恒占7359条，方九霞占4502条，杨庆和占7835条。以如此微小的资本，承办这样大的黄金买卖业务，已经充分证明了中行经理人员和他们的互相勾结，营私舞弊，疯狂到令人难于想象的地步。

以詹莲生为首的金牛党的神通

我们检查中行抛售黄金的程序和手续，发现：第一，行内经办抛售并没有规定什么法定的手续，一切都只要由宋子文、贝祖诒“O. K.”了事；因此林凤苞、杨仁安在承办售金业务时，得以为所欲为。第二，虽然规定两业公会会员要购买黄金，须填具申请书，由五家代表转呈批准，然后配发，但实际是当时中行只指定了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经

理詹莲生一人包办，其余四家都是由詹的关系介绍来的，每天配给金条多少都是由他决定，由他经领分发。第三，每天中行黄金牌价的公布，规定是由中行业务局和两会五代表商议决定，事实上都是由林凤苞、杨仁安二人和詹莲生用对讲电话（由中行和金号间直接通线，以防外间窃听消息）作出决定，暗售的黄金也都是由詹莲生一人承办分配。所以当时中行抛售黄金的决价、明配、暗售，詹莲生都是操纵者，他成了当时上海黄金商人和中行之间勾结的总代表。更重要的，詹莲生还掌握了当时中行全部金条的改铸。因为中行库存的黄金都是400两的金块，市面出售时是10两的金条，所以在抛售前须加以改铸。这项改铸的业务也是全部交詹莲生经办，由他分发与大丰恒、宏丰永、生元永、元成永、杨庆和、裕发、永祥等金号改铸。中行对改铸每条给以三分的火耗。我在2月19日讯问詹莲生时，据他说：“改铸金条，每条有三分的火耗，每天归同丰余的火耗约有240两，其余经手分铸的几家不过在成色上略微有些好处。”可知他是独吞了中行给与的全部火耗，估计每月他可以得到7200两黄金，一年中共计有86000两黄金落在他的手里。又由于他是明配和暗售黄金的包办者，所以中行抛售的全部黄金，同丰余占了55%以上，即中行一年中售出的850万两黄金中，由同丰余经售的有450万两左右。其经售所获的暴利，当时詹莲生虽含糊不肯说出具体的数字，其数额之巨，何止倍于火耗。我们估计詹莲生在中行抛售黄金一年间，利用两业公会五家代表首领的地位，其经售“利润”，即以三分计算，当在135000两以上，加上火耗的收入，成色的掠取，落到他手里的黄金总有20多万两。实际上这个估计还太低了，因为他还利用每日优先知道中行的黄金牌价，熟悉中行库存情况，从而操纵市场金价，以及大量吞进中行暗售的黄金，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暴利，更难于估计。据当时有一个在金交易所投机失败因而破产的黄金商人向我们控诉说，詹莲生在一年中所赚得的黄金有10万条以上。

詹莲生为什么有这样广大的神通呢？这是因为他凭借了两个集团作他的活动的本钱：第一个是在上海市场上以上述五家金号银楼作基础的金业公会，大部分的会员都受他的指挥；他的金号同丰余是在金价波动期间才成立的，在上海社会局一直没有批准备案，其余在他集团内的金号也大都是没有备案；他们操纵金价，打击集团以外的黄金买卖者，因此，在当时上海的黄金交易市场上谁都要看他的颜色。这个集团当时有“金牛党”之称。第二个集团是和中行的贝祖诒、林凤苞、杨仁安紧密勾结在一起。他们的勾结有其深切的历史关系：贝祖诒是苏州人，是当地一个地主兼买办阶级的世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的颜料大王贝润荪就是他的哥哥，他因为和宋子文是留美的同学，交情很好，在宋子文当中国银行董事长时，贝就担任过中国银行的纽约、香港等地行长和沪行经理，在抗战时是对黑市外汇处理的负责人，他很得美国人的赏识，据说，美国人认为中国只有半个人懂国际汇兑的，就是指他。所以他又被人称为中国国际汇兑问题的权威。因此，在宋子文和美国勾结，谈判20亿美援贷款计划时，他被选为谈判的代表，成了宋系下的第一个红人。詹莲生也是苏州人，又是贝家的亲戚，原来是贝家作颜料生意中的经纪人。贝祖诒当了中国银行沪行经理时，他便在上海金交易所暗地里与贝勾结，利用中国银行的资本，作投机生意，赚了大钱，因而在金业方面形成了他的势力。贝当了中行总裁以后，除了在外汇上与宋子文狼狈为奸，运用他的国际汇兑“知识”，大出其贪污花样，抢得了巨额外汇之外，还想在黄金买卖上再大捞一笔。他不好自己出面，所以运用詹莲生作为他的代理人。至于林凤苞、杨仁安一直是贝祖诒在中国银行时的亲信和得力爪牙，所以贝到中行时，二人也当了业务局长和副局长，成为他在中行干贪污勾当的重要走卒。因为贝、林、杨、詹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所以中行抛售黄金当中他们便结成一气，狼狈为奸。同丰余在实质上便是他们四个人结合而成的一个贪污机构。我们在检查

同丰余的账目和内部情形时，董事会的名单有两个假名查不出下落，据说便是贝、林、杨等的化名。同丰余这样大的买卖，连一本出进的日记账目詹莲生都说没有；直到送法院，才搞出了一本假账目。单从这两点看，贝、詹之间和他们所干的黑暗勾当是不能见天日的。上面说过，同丰余是一家没有向政府立过案的黑店。我们向上海社会局质问：“何以同丰余没有经批准立案，而他经理这样重大的业务，你们不加以取缔呢？”该局负责人向我们苦笑着说：“贝总裁招呼我们不要管，我们只好不管。”我们讯问林凤苞时问他：“黄金抛售业务，为什么委托一个没有批准立案的同丰余老板詹莲生呢？”他的答复是：“因为上海金业公会会员复杂，不可靠的多。詹是公会主席，熟悉情况，有信用，有号召力，贝总裁也知道他的负责可靠，所以选择他负责。”盘问贝祖诒也是同样的答复。显然可以看出；在当时黄金买卖中他们四人是完全串通一气的；詹莲生所获得的巨额黄金，并不是他一人独吞，而是四人朋比分赃。所以詹莲生在我讯问他：“你赚得的大量黄金哪里去了？”他答复说：“赚项也大，应酬也大，并没有得到多少金子。”当时我在东方饭店以迂回不着边际的谈话方式，讯问了大半天，起初他有恃无恐，毫不在乎，大谈他和宋子文、贝祖诒的关系，上海黄金交易的情形，同丰余的组织营业情形，中行和他的往来情形等等。及至把笔录给他看，要他签了字，他才有些感到不利。当时其他三监委都因事回到南京去了，留在上海讯问詹莲生的只有我一个人。詹在经过讯问以后，因为觉得事情不妙，在离开我的房间时，很恭顺地向我说：“我这些都是同何委员私人谈话随便讲的，有些欠妥之处，还是要请您包涵包涵！”当天晚上，王新衡（上海的军统大特务，杜月笙的徒弟，立法委员。）约我到 he 家里吃饭，饭后他问到我讯问詹莲生的情形，末了，他向我说：“我想以老同学的资格，对你谈一点知心话。詹莲生这班家伙的确可恶，要办一办；但是官场的事适可而止，不必太认真。反正今天讯问他的只有你一

个人，你如果不把笔录拿出来，或者改一下，开脱开脱，叫他拿出200根条子来，倒也是一件一方二便的好事。今晚本来杜老板（杜月笙）想来和你谈谈，觉得有些不便，我的意思可以说也是他的意思，不知道你以为何如？”他这一番话当时使我有些感到为难，正面拒绝吧，他已经搬出一个“杜老板”，上海是流氓世界，得罪了他，可能出毛病；答应吧，一来我当时还怀着一股当“铁面御史”（这是当时报纸上送我的“荣衔”）实行“整饬吏治”的幻想，觉得维护我的“令誉”比金条更重要些；同时我还警惕到怕宣铁吾、郑介民乃至军统故意弄出这一套来陷害我。因为我们和宣铁吾、郑介民虽然在查案开始时已经达成前述的协议，但是由于我们在查案中有些地方表现得很起劲，报纸上替我们大吹大捧，使得他们有些吃醋，用这样一手来对付我们是很可能的。我在这种为难的情况下，只好用推诿的口吻敷衍他说：“今天的讯问，当笔录的是上海审计处派来的人，和我过去不熟。几家晚报又已经把我讯问詹莲生的事大登特登。这样一来，恐怕有些不便。请杜先生放心，我总不把案子搞得太严重就是。”第二天，其他三监委恰好又回到上海来了。于是我们把詹莲生利用金业公会代表的地位操纵上海金市，以同丰余金号非法商号组织攫取巨额暴利，以及同丰余买卖黄金账目与中行抛售受主账目不符，显有情弊等罪名，连同笔录提出检举，送上海地方法院起诉审判。同时把林凤苞、杨仁安的利用职权，勾结贪污部分，也送法院起诉。结果詹莲生判了12年徒刑，林、杨二人判了7年徒刑。法院院长查良鉴是当时国民党司法界有名的“漂亮人物”，他一方面和我们几番商酌，顾到外间的注目，保持了司法的“尊严”，马上把詹、林、杨三个人判了刑；一方面在金条神通之下，不久三个人都以“保外就医”，逍遥法外了案。

究竟是谁的命令

我们了解，这个案子不止是贝、林、杨、詹的朋比为奸，造成百万两黄金的贪污问题，而是已经牵涉到宋子文乃至蒋介石的问题。对蒋、宋说来，究竟只是由于“失察”呢，还是在他们有意纵容包庇之下所造成的呢？这是案子的关键所在。

我们在查案中对于这一方面抓住了一点，即中央银行在1946年3月实行抛售黄金是经过行政院决定有案的；而此次中行于2月8日停止暗售黄金，15日停止一切黄金的抛售，以至引起大风潮，事先并没有由财政部或行政院向最高国防委员会提出市场金价不断狂涨，中行库存黄金告罄等严重情形的报告，通过讨论作出决定。事先行政院既无决定，究竟是谁发出的停售命令呢？当时我们问贝祖诒，他的答复是：“停售黄金是奉宋院长的指示。决策是上面的事，中行是业务机构，不能参与，只是奉令执行。”我们要他拿出宋子文的原令来，他说：“是电话指示，没有文字手令。”恰好当时宋子文到了上海，我们又到宋家去追问，他的答复：“停售黄金是奉主席的口头指示，我不过是奉令行事。”在谈话中他还说：“在停售黄金的两三个月以前，我看到事态严重，向主席请示过，并且表示工作困难，我干不下去。当时主席表示：‘因为时局紧张，前方百万大军的餉给重要，职是不准辞，办法由你去想，黄金能用到哪一天用完再说。’当时我以为美援贷款有实现的希望，把库存问题看成次要。贷款实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着力在贷款的进行。不料贷款搁浅，^①在紧急情况之

^① 在1946年初，宋子文勾结美籍顾问杨格，进行20亿美援贷款。蒋介石为了想取得这笔巨款，所以任用他为行政院长，同时以贝祖诒充任贷款计划谈判代表。宋上台以后，以为这笔贷款成功无问题，所以又接受杨格的主张，开放外汇市场，实行黄金买卖。结果，造成大量外汇和黄金直接间接流入外商之手，把中行库存的900多万两黄金和十多亿的美元外汇都搞光，而贷款却始终没有实现。

下，只有宣告停售黄金之一法了。至于事先没有提出讨论，一来事机迫切，二来主席的意思，大家也不会另有什么好办法，徒然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暴露国家的机密，影响戡乱大计。主席为国家元首，所以由他决定行事。现在责任落在宋某身上，我反正是奉命行事，我的能力不行，已经向主席提出辞职，一切听上面决定处理。”

贝、宋既然都把停售黄金的命令责任往上推诿，我们只好以四监委的名义于2月19日打了一个电报问蒋介石：“此次中央银行停售黄金，事出突兀，致引起风潮，摇动金融经济。据宋院长称，停售系奉钧座指示，确否祈赐电示。”这个电报发出后，一直等了一个星期，没有回信。于是我们于26日回到南京，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查询。当时文书局长许静芝向我们笑笑说：“主席批是批了，不好复电，你们看看吧！”原来蒋介石在电报上的批示是：“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我们看了以后，真是啼笑皆非。既然是“并无其事”，也不说“应予追究责任”，而仅说“事到如今，有何办法”，明明是要不了了之。事情已经非常明显，蒋介石对于这一案件的酿成应负主要的责任，但他既不愿意自己承认负责，又要庇护宋子文，并且实际上很可能是事先得到了他的同意，不过这时耍点流氓手段，这样一批了案。

由这些情形，可以看出这次黄金风潮案的演成，上自蒋介石、宋子文，下至贝祖诒、林凤苞、杨仁安、詹莲生，是一条黑线通到底的。

案子的结局

我们得知蒋介石这个无谓的批示后，对于这个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感到如果只把詹莲生、林凤苞、杨仁安几个小苍蝇送法院判几年徒刑，悄悄收场，那么，在全国人民面前太不好交账，于监察院的面子也太过不去。会商以后，决定进一步向宋子文、贝祖诒作正面进攻。首先

由我领衔，提出对宋、贝的弹劾案；并且打破过去的关于弹劾案处理程序的限制^①，将全案的调查报告书，由监察院正式公布，同时发动立法院召开临时院会。立法院开会时，宋子文、贝祖诒出席报告后，一些立法委员根据监察院调查报告的材料，正面提出尖锐的攻击，弄得宋子文面红耳赤，无法答复，愤然退席。接着参政会也向宋、贝提出质询攻击。全国的报纸舆论都纷纷发出猛烈批评。在这样四面楚歌之下，宋子文才提出辞职，溜到广东。蒋介石为了敷衍环境，才准许宋子文辞职，并免去贝祖诒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

宋、贝虽迫于形势去职，但是并没有因为监察院的弹劾而受到任何法律处分；并且蒋介石为了安慰他这位内兄，接着就发表他作广东省政府主席。

另一方面在这次风潮结局中收到实惠的是政学系。宋子文垮台后，张群继任行政院长；贝祖诒免职后，张嘉璈继任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当副总裁。他们登台后马上又发行了一亿美元美金公债和三亿元美金库券，进行新的搜刮，蒋家王朝财政金融的崩溃，更因此加速了。

在风潮结局中最失望的是 C. C. 派，他们在宋、贝倒台后，没有捞得什么好处，因此，大唱高调，主张进一步彻查宋系官僚的贪污。在 3 月 23 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纠集了 C. C. 中委黄字人等 100 人提案：“请政府迅速切实惩治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诒及其部属，并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在提案中还指出：“官办商号如一统公司、孚中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扬子建设公司等，皆有利用特权，套购巨额外汇，输入大量奢侈品情事。”他们这种做贼喊捉贼的姿态，无非是借此来掩饰他们自己的原形，并且向

^① 1932 年，汪精卫为怀恨监察院不该把弹劾曾仲鸣贪污案移付惩戒的案情在报上披露，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案，凡监察院的弹劾案件，在未经惩戒委员会决定执行以前，一概不准公布。

继宋系上台的政学系作出示威而已。

事实上宋子文当时贪污最重大的部分的确也是对中行十亿美元外汇和几十亿美援军用剩余物资的侵吞。所以在国民党中央把全会提案发交监察院执行后，监察院又第二次派遣何汉文、谷凤翔、田炯锦、王冠吾四监委彻查宋子文外汇贪污案。彻查结果，又把他在外汇上贪污的情形，作成调查报告公布，并且第二次对宋子文提出弹劾，作为弹劾黄金贪污案的补火。尽管大炮放得这样震天价响，全国舆论也加以支持，但是因为蒋介石的极力庇护，弹劾案终归石沉大海，宋子文依然安安稳稳作他的广东省政府主席，监察院也只好沉默不问了。

偷梁换柱，杀害闻一多真凶逍遥法外

王凌云

漩
涡
沉
浮

1947年7月初李公朴被害之后，西南联大师生罢课游行示威。当时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要第二军派一个师到昆明，归警备总司令直接指挥，准备镇压。我当时任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驻大理，奉令后即叫预备第二师师长杨宝珏带该部到昆明市归霍揆彰直接指挥，担任昆明市的警备任务。7月15日夜，杨宝珏用电话向我报告说：今天昆明又出了事情，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和他的儿子都被打死了。我当即问他是怎么样一回事，他说，电话上不好多说。以后见面，杨对我说：“7月15日下午，闻一多为李公朴之死抱不平，在某处开会，会后出来时，被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王子民（或者是王新民，记不很清了）等十余人，把他及他的儿子都打死在某街了（街名已忘）。”我问：“霍揆彰知道吗？”杨说：“这事是霍揆彰、刘淑琬（总部的参谋长）、王子民他们搞的。”我又问：“当时你知道吗？”杨说：“当时总部叫我们不要过问街上任何事情，事后才知道是打闻一多的。”

闻一多被杀害后，西南联大师生罢课游行示威，要求反动政府惩办杀人凶手，云南及各地学校都罢课响应。反动政府为正义呼声所迫，在昆明又玩弄了一套鬼把戏，这就是蒋介石叫当时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

自到昆明来干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约在7月底，蒋介石叫顾祝同借检阅第二军的部队为名，飞到昆明，住在云南省主席卢汉家里。他表面上装模作样，在北教场检阅了第二军的一个师；暗地里与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及教授傅斯年等人为闻一多被害事件秘密商议。商议了多日，结果公布：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撤职，总部参谋长刘淑琬撤职查办，杀人凶犯枪决示众。

但事实是怎样呢？顾祝同先用飞机把霍揆彰送走了（我还是到机场送行人之一），立即委何绍周（何应钦之侄）为云南警备总司令，并委我兼警备副总司令；又用汽车把刘淑琬也送走了（这是杨宝珏对我说的）。接着就把杀人凶手枪决示众，但这些被枪毙的凶手是假的，是用特务的压迫手段和花了金钱弄来的。这是当天晚上何绍周对我说的，何当时还说：“特务真厉害！”又据杨宝珏说，这是顾祝同带来的特务头子张振国一手包办的。

真正的杀害闻一多的凶犯是警备总部第二处处长王子民等人。

约在9月初的一天晚上，顾祝同叫何绍周和我二人到他住的地方（卢汉家里）商谈，同时在座的只有他带来的特务头子张振国（张是陈诚手里的特务头子）。顾祝同手里拿着一本名册极机密地作了如下的指示（这件事卢汉先生是不知道的）：

他叫张振国按名册将王子民（王是张振国手里的特务）等人于第二天早晨交给何绍周，又叫何绍周于第二天早晨派汽车派人带名册将王子民等约十人（确实人数记不清了）送到保山县后山寺院里交给我，由我派可靠官兵看管。当时何绍周为了加重我的责任，减轻他自己的责任，请求顾祝同准予将王子民等人送到第二军军部所在地大理县后山上的无为寺里，直接交给我。顾准了何的请求。

顾又当面对我交代看管王子民等的办法：不能把他们当犯人看待，又不能让他们跑掉一个；不准他们外出与外边通信，又不准外边任何人

去见他们。总之，要使他们与外边隔离。顾又说，还要对他们生活上予以优待，并叫我用专用密电本随时向陆军总部报告王子民等生活情况及报销王子民等人每月的生活费。

第二天早起，何绍周用汽车两辆将王子民等人及他们的眷属共二十多人，送大理无为寺交给我接收了。我当即派人事科长姜渊泉负全责与南京陆军总部联系，并叫姜参谋（名字忘了）带了特务连一排全副武装，驻在无为寺，专门负责保护王子民等人，并给以优待。

到了1947年1月初，蒋介石叫第二军开到汉口待命（这时候第二军已改为整编第九师）。我因要离开云南，即将王子民等人及他们的眷属按名册又用汽车送到昆明交给何绍周接收了，以后情况我就知道了。

此外，我再补充两点：

当时何绍周对我说：他害怕西南联大学生发现枪毙的不是真正凶手而再起来进行斗争，因此到不得已时，还得准备从王子民等人中再提出一二人，以资应付。何又再三说，必须看管好，万不能让王子民等走掉一个。

事情完了之后，有一天在卢汉家里由顾祝同出面约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教授傅斯年等人吃饭，何绍周、卢汉和我都在场。席上我还听到傅斯年谈了一些他去延安所看到的情况。

“头可断，国大代表不能让”

赵 遵 初

抗日战争期间，我由山西移居天津，改行经营颜料商业。1928年晋绥军进驻天津，我曾一度被任为天津市东六区（即南市三不管地区）警察署署员。1945年日寇投降后，我被选为天津市油漆颜料同业公会理事长，又当选为天津市总商会常务理事。次年12月，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决定于1947年选举所谓行宪的“国大代表”。我想弄个国大代表，不但可以在政治上有出路，还可以名利双收。

当时天津中统头子李实斋（山西人）为了给中统天津区长甘舍棠竞选国大代表，组织山西旅津同乡会，拉选票。三青团头子王任远为了竞选，也千方百计想插手总商会，竟把年近半百的一些理监事吸收为三青团员（我也在内），组成商业分团，以澡塘业公会理事长王鸿绪担任主任。王、李二人也都向我表示好感，争取我作为他们竞选的支柱。我为了利用他们的势力来达到自己夺取国大代表的目的，也虚与委蛇，表示同他们合作。他们给我出谋划策，帮助我奔走拉拢。我则来了个反利用，并充分利用帮会的关系，为自己活动。我由颜料同业和同乡亲朋垫出竞选费用，并用“专诚拜访、虚心领教”八字诀，走遍各行各业公会和不少理监事的家。这样赶到选期迫近，我已水到渠成。投票之日，各

「头可断，国大代表不能让」

选区绝大部分监选人员都和我有了直接、间接的联系，彼此见面，会心一笑。结果我以得票5万张以上而获选，在华北五省二市所选出的六名无党派签署代表中名列第一。但5万张选票并不是合法取得，而是请人填写假票，大把大把地塞进票匣，弄虚作假而来。

不料国民党为了拉拢民社、青年两党，竟然采取了指派圈定的手段，把我这个耗尽心血才弄到手的国大代表取消了，而代之以得票16张的绥远地区民社党人杨凌云。这不仅使我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而且同业、亲友所垫的竞选费用，即使倾家荡产也难以清偿。我日夜苦思，筹谋对策，终于想起古代庞令明“舆榘决战”的故事，决计假借“护党”为题，用陈棺行动来作孤注一掷。

1948年3月8日，我用民选国大代表名义，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主办的天津《新晨报》第一次发表了我告同胞书（当时天主教办的《益世报》和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均拒绝登载）。3月18日，天津《新生晚报》根据我的谈话，发表了以“赵遂初拼到底，明日起程赴南京，出席国大，要买棺材，以示决心”为题的一则新闻。我因恐受到阻挠，于19日夜通过天津旧英租界工部局警官和“万里号”轮船船长的帮会关系，潜入“万里号”轮船，蹲在火房，启程赴沪。

我在“万里号”轮船上又起草了一份《再告同胞书》，于抵沪后交上海《大公报》发表，表示“决于大会召开之日，协同民选合法代表，集体进入会场，作历史的‘护宪’流血。”等等。随即于3月25日只身进入南京，会同全国各地被迫退让的签署代表盛紫庄、马文车等200余人，在国民大会堂附近的钟南中学成立民选代表办事处，与当局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斗争。

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于3月27日上午在中央军校官邸邀请签署合法代表14人谈话。官邸内外，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我等14人被全副武装的警卫带领进一间大客厅。客厅里用15张沙发椅摆成圆

形，蒋介石坐在正中一张铺着虎皮褥子的沙发上，身后围坐着陈立夫、吴铁城、张厉生、谷正纲等人，代表们背后站着许多便衣侍卫。蒋介石用示威的姿态，虎视眈眈地扫视着我们14人，开口第一句话就说：“赵遂初，你在《大公报》的宣言，我看见了。”我说，我还有第一次宣言，同时立即打开皮包，取出那张天津《新星报》。这时有两个侍从迅速逼近我身边监视着我的举动。蒋接着说：“赵遂初，你晓得我是党的总裁吗？”我反问说：“你知道我不是国民党员吗？”蒋闻言愕然，立即转头向陈立夫问道：“怎么搞的，把社会贤达搞到这里来了？”陈答说：“他不是国民党员，是青年团员。”蒋才松了一口气说：“团员就是党员。”我说：“团员就是党员，为什么还搞党团统一？”蒋语塞，回顾坐在他左右的签署代表说：“大家要知道，今天不能单纯讲理，也不能单纯讲法，为了政治上的关系，要迁就事实。”各代表闻蒋言，都感到惊讶。我接上去说：“还政于民，关系百年大计，国家元首能说不讲理、不讲法吗？”蒋不理睬我的话，怒气冲冲地转问其他代表说：“谁愿退让，我自有的办法！”那十几个代表都一致表示坚决不退让。有一代表说：“我宁愿牺牲厅长，也要当选证书。”又有一代表说：“我现在对总裁声明脱党，我是人民签署当选的代表，根本与党无干。”蒋见谈话已陷僵局，即囑侍从预备点心，希图缓和气氛。这时陈立夫发言说：“请各位代表，先回寓所，改日再行商谈。”

各代表返回钟南中学办事处，立即集合全体代表，报告会谈经过。全体大哗，群情激愤，一致通过决议，于28日（国大开幕的前一天）由颜泽滋等10个代表，进入国民大会堂实行绝食，阻止大会开幕；其他大部分代表分头包围选举总所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不达目的，决不撤退；我负责陈棺大会堂事。我随即用380万元法币购得棺材一口，由少数代表协助抬到钟南中学。我还应美联社记者的要求，站在棺材上拍照。

签署代表准备进入大会堂绝食和我准备陈棺大会堂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慌忙于29日晨再邀签署当选代表40余人举行会谈。我首先对蒋介石说：“我今年四十有九，我的生命只有两天了。为国家民族牺牲，在我的生命史上是光荣的。”蒋介石假惺惺地对我说：“你不能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不料正当我坚决表示说“不成功，便成仁”之际，突然有几个代表起立，表示“服从总裁命令，愿意退让”。蒋介石自然十分高兴，连声对那些代表说：“好的，好的。”可是代表当中却吵成一团，会谈立刻陷于混乱。我和绝大多数代表立即退出，返回钟南中学，召集紧急会议，筹谋对策。

当我们在钟南中学召开紧急会议之际，大批警宪，包围并封锁了钟南中学。签署代表在戒备森严的钟南中学的铁栅栏内，面对着警宪举手高呼：“你们这是什么国民大会！这是狸猫换太子的滑稽戏！假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投的票是假票，选出来的总统是假总统！”谩骂声和嘘声，此起彼伏。围在铁栅栏外的警宪奈何我们不得，互相苦笑，又不停挥舞大棒，驱散围观的群众。我摆在钟南中学门里的棺材，亦于当日晨被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派武装警宪劫夺而去。当时有代表主张向法院控告洪兰友劫掠棺木罪，有的代表则说：“就让洪兰友自己用去吧！”

蒋介石用高压手段强制签署代表退让失败之后，又授意于斌、胡适等人以第三者身份出面调解，也遭到绝大多数代表的拒绝。签署代表还想乞灵于反动派的法律，向南京高等法院对“违法代表”之职业、妇女团体代表选举事务所主任谷正纲等人提起诉讼。南京高等法院并未正式开庭审理，竟以“缺席裁判”宣告谷正纲等人为无罪。

蒋政府鉴于威逼诈骗都不成功，乃转变花招，使用利诱收买伎俩，并由于斌再次出马。于斌用亲切口吻对我说：“赵同乡（其实他是黑龙江人，我是山西人），只要你肯于接受退让，我担保：第一，在总统就职之后，发表你总统府顾问；第二，凡是你在竞选中花的竞选费用，全

部由政府贴补。我们是大同乡，请你仔细考虑我的意见。”我对于斌说：“美联社记者已经拍了我站在棺材上的相片（以后这个照片在美国《生活》杂志封面上刊登过），中外皆知。你既然说我们是同乡，请你替我想想。我接受这个条件，退让了代表，我还值半文钱吗？”于见话不投机，便声明说：“我是代表陈立夫部长的意见，那么我就转达陈部长吧。”接着陈立夫在中央党部邀我一个人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又向我提出于斌所提的退让条件，并说：“政府还准备邀请各位担任戡乱委员。”我大声对陈立夫说：“头可断，代表不能让！”陈立夫脸色一变说：“蒋先生要竞选总统，你却抬棺材。现在还是头可断，你也太厉害了吧！”陈又说：“你不是疯子，你为什么要这样疯闹？”我说：“只要发给我当选证书，我立刻可以不疯。”陈凝思之后，无精打采地说：“那么你和王处长先谈谈吧。”（王是负责主办发证手续者，记不清他的名字。）

蒋政府见收买手段也告失败，乃一面派密探在开罗饭店我的寓所盯梢跟踪；一面扬言将给我以法律制裁；同时还放出我要自杀的谣言，企图暗害我。因此我又在报上发表声明，加以揭穿。

我们签署代表所采取的绝食、陈棺等等手段，并日夜包围总选举事务所和中央党部实行疲劳请愿，最后总算获得结果。由职业、妇女选举事务所发给我和少数代表当选证书，并说明委以戡乱委员名义，发给薪资，借以弥补竞选损失。可是这时大会已将闭幕，我报到后只出席两日就结束了。当时在蒋介石淫威之下，我独敢于同他顶撞，何所恃而不恐呢？无非为个人名利所驱使，故不惜破釜沉舟，成功是英雄，死亦不失为好汉，打的亡命之徒的主意罢了。

李宗仁费尽心机竞选“不值钱”的副总统

王捷三

我助李竞选的由来

漩
涡
沉
浮

1944年春，我离开陕西教育厅，任北洋大学工学院西安分院教授。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来西安视察，在友人宴会上，彼此相识。次日，李约我长谈过一次。抗战一胜利，我摆脱了在西安我极不愿担任的几种头衔，前往重庆，有意去北平教书。旅舍徬徨月余，正自无聊。一日，白崇禧见访，约午餐，并出示李宗仁请我任北平行辕中将政务处长电报，旋为我订好飞机票，这是1945年年终的事情。我和“桂系”发生关系，原来如此偶然。

到北平任职后谈及，方知李宗仁极注意我和他谈话时不满意蒋（介石）胡（宗南）军政措施的意见，故一经其秘书长萧一山提说，便诚心约我。相处三四年，李对我无长官习气，而极有礼貌。尤其我接办私立华北大学（后改华北文法学院），精力多用在学院方面，他反而支持我；我厌恶参加作为政务处长所应参加的特种会报，他允许我不参加。我甚至也可以不上纪念周。1947年国民党总登记时，我不登记，向他辞职，他认为我有不登记作党员的自由，但非党员也可以做处长。当处理1947年北平学潮时，他肯采纳我的建议。他常嘱我约些进步教授便餐，客人

谈话骂蒋介石，他只微笑笑。1947年，他给蒋介石上万言书，嘱我起草，他仅口授几条意见，内容一半以上，由我用激烈语句发挥我的改良主义。由于以上原因，我对李宗仁由陌生而逐渐亲近了，幻想他终可以走中间路线。就这样，我便作了原来我并不认为怎么光彩的“桂系”的一名走卒。

1948年春节后，李宗仁准备竞选，我虽入伙不久，时被引与计事。然而，毕竟关系太浅，全盘布置和个中秘密，自然我不能尽知。本文只就管蠡所及，洪纤必书，务求纪实，助成信史。

策划拉拢，费尽心机

1948年2、3月，北平北池子×号李公馆人来人去，倍形势闹，竞选策划开始了。住在李公馆的甘介侯是李的腹心之交，也是策士之首。最初谈兑竞选，甘赞成，我反对。我说：“依宪法，副总统有职无权，在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方得代理。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去年制宪，今年选举，自绝于人民，你何必奉陪？蒋当了总统以后，不能执行职务之‘故’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发生：死亡与失败。他何时死，难说；必待同共产党打仗失败，他才会辞职。到那时候，试问代理的副总统又能打胜人民军么？我陆，与其竞选，不如准备联合实力者，飞返西南，以武力反对‘戡乱’调停国共，于国于己，方为有益。”甘说：“不然。夺蒋政权，武干冒险，不知文干待时。至于对付共产党，蒋介石还不是靠美国吗？”李表示，他且缓议，先得竞选。我遂无言。次日，甘介侯对我秘密地说：“你不知道，美国要弃蒋扶李呢！”

虚伪欺骗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在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中，还谈什么民主选举呢！谁想竞选，无论党内提名或自由竞选，首先必须得蒋同意。有一天，李宗仁愤然作色地说：“他妈的，不同意也要干。”这是因

为已几次电蒋，均不得复的原故。又有一天，李大发脾气说：“白健生怕蒋介石，我不怕。”这是因为白崇禧曾派人（程思远？）来平劝勿竞选的原故。但李既一不做二不休，为达目的，终须先下功夫，求蒋同意。3月初，他派我飞南京见吴忠信和戴传贤，说吴会帮他，只须对吴表明他的竞选决心，请吴向蒋为力。因为曾在考试院做过专门委员，熟悉戴传贤及其左右人士，李以一尊金佛送给戴。据说这金佛是日本人由东京本愿寺移来北平，预备在北长街建寺供养，非常名贵，李不知怎样弄到手作为运动戴传贤的礼物。果然戴传贤一见，连忙合十膜拜道：“我无德消受，当转赠广东刘（？）大师供养。”经我说明来意，戴看在佛面上，满口答应，说：“德邻先生配名蒋公，真党国之福也。”如是念念有词地说了多遍，并亲笔作复，大有包在他身上之意。看来不辱使命，我曾天真地喜欢一阵。我第二次见到白崇禧，他派车给我，并请吃饭；但谈次对于李的竞选，确乎是不大热心的样子。

李公馆喧腾的气氛，随着国大开幕日的逼近日益浓厚起来。东北、华北各省市的“国大代”过平，李针对对象必派适宜的人招待一番。我的夹带中也配有一束对象。行辕高干中，广西人并不多，北方各省市人都有，分头拉拢，都很顺利。我并荐李瘦枝课长飞回西安活动一次。平津代表包括 CC、复兴特务在内，都乐得做口头人情，同声拥戴。李尤着眼在文化教育方面，曾函问胡适意见，胡复函赞同，李得意地送登报端，以扩大影响。3月中旬末，忽传蒋梦麟为选举事秘密到平，李即时要我往见胡适，一睹究竟。不料胡确得蒋内定孙科为副总统的密旨，明对我说，据他看，副总统人选以孙科为宜。我质问：“先生赞成李主任竞选，不日已喧腾报章，怎么好反汗呢？”胡说：“岂但李德邻可竞选，任何人都可以竞选呵，中国事由武人包办，东一个 general（将军），西一个 general，太不像样。这次副总统最好来个文人。”我第一次才明白胡适确乎是蒋介石的御用学者，漂亮话只不过解嘲欺世罢了。李宗仁自我陶

醉的发热头脑，这一下泼来一瓢冷水，李公馆助选集会，一时静穆起来。胡适一票打什么紧，倘使当面奉承主任的“国大代”都像胡适，前景真有些不妙，尤其内定孙科的消息，惹人头痛。

逐省计票，轮到山西。如今山西票号，阎锡山是号主，号主如果同意，可以稳拿整票。李说：“须向百公客气一番。”行人又派到我。其实我认识阎锡山，还是前年随李视察绥远路过太原时的事。太原阎王殿空气真热，火炉加电炉，弄得说客舌敝唇焦，所幸结果圆满，阎王目无代表人格，径答“一致选举德公”。他还有示信的特别作法，写就“与王代表谈话纪录”交我复命，李极满意。

像这样行人四出，分头拉票的活动，一定很频繁，我不悉知，也无须多叙。如同做生意要登广告一样，制造竞选口号，最后成为助选策士们的重要工作，值得一记。什么行宪、戡乱、革新政治、中立外交等等，一些人提出一套建议。我则本着我的极浓厚的改良主义思想，拟出实行民主主义、清算豪门资本、认真土改、铲除贪污等等第二套话说。李以为前者最低、后者最高，还是前一套通妥点。我虽心不谓然，也随它去罢。

自吹自擂，明争暗斗

3月23日，李宗仁飞往南京。策士、走卒、拉拉队随往，与京桂助选者合组助选委员会，一时大方巷二十一号白公馆热闹异常。我本是先年“制宪”时不终会而离会的“国大代”，此次毫无名堂，专来看戏。所谓“国民大会”从3月29日黄花岗纪念日开幕，至5月1日闭幕，滑稽戏连演一月有零。“国大代”总额3045名，报到2814名，最后投票的2648名。国民党装潢民主，拉来以曾琦为首的青年党和以张君勱为首的民社党，但给与这两党的代表席位，不到总数的九分之一。至于三党代

表成分，则一模一样。买办、军阀、贪官、污吏、地主、豪绅、CC和复兴特务，再加上反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大杂烩。在各地选举代表时，群犬争骨，久已闹得乌烟瘴气。开幕后，还插演不愿退让者颜泽滋等十人绝食的折子戏，煞是好看。

选举嘛，总统应该是竞选中心。但签署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的代表，竟有2489名（规定只须百人以上），还选什么。拉来居正陪衬，但报上刚看见居正的竞选主张，次日便急忙声明取消，有“吹笙引凤，识者窃笑”之语，真够滑稽了。19日蒋介石以2430票当选大总统，也奇怪，得票却比签署少了数十张。法西斯统治集团是在东北、华北、郑洛、泾渭各战场连吃败仗的时候，抱着“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的心情，故作镇静，硬着头皮演这出戏的。其实把蒋介石叫作“主离”或“总统”，并没两样，也救不了败北。在选举总统之前，4月5日忽盛传蒋介石不做总统，胡适将为总统候选人之说。据胡适左右说，确有此事，胡曾像煞有介事地查阅“宪法”内总统职权，说：“照这样当总统不算太忙，我还有写文章的时间。”构成一出令人发噱的插曲。

选举副总统倒成为剧情发展的高峰，竞选者有六人之多：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还缺此先例。六位竞选人讲演、请客一直闹了一个月，南京各饭店如百龄餐厅、重庆安乐厅、安乐酒家、龙门酒家、介寿堂、华侨招待所等处，天天花天酒地，闹嚷嚷的。

前面提过，蒋介石内定孙科为副总统。大概因为独裁形势不妙吧，不敢由党提名。4月6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党不决定候选人，但暗示于、李、程，并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放弃竞选。

李宗仁等不理睬蒋介石的暗示，竞选更积极了。蒋介石便企图用特务组织控制选票。在北平热心拥李的人如CC的吴铸人、军统的刘诚之等，都抱歉地向李声明他们已没有选举自由，吴铸人却用他个人关系为

李介绍几票，由我代李请他们吃过饭。特务组织又企图威吓或利诱助选者。韩练成（原国民政府参军，整编四十六师师长）得悉这一消息，秘密地告诉刘仲华和我，说CC和复兴组织先拟以高官相诱，又估计我们不肯，很可能要使我们失踪。不知又怎的终没下此毒手，但韩君的话必不假。为什么？我由大方巷移居旅馆，又由旅馆移居金城银行友人王君的经理室。三日后，王君称，秘警查账急且厉，且戒声张，逼问通过王某由平况款多少。这足证特务在行动了。他们哪知李宗仁的选举费用我一文也没经手哟。“蒋记”天下的民主内容，如是如是！

像盘点存货一样，要核实一下交易数字。李宗仁借我同车访戴传贤。不料戴传贤发疯无赖起来，说：“时局已弄到如此地步，我一切听蒋公，他说上天就上天，他说入地便入地。”不帮忙事小，弄得下不了台。适何应钦至，李才愤然而去。金佛算白丢了。后又同往山西办事处，其领队代表梁化之出阎电相示，谓俯械悉仰给政府，选举事项须听命主席云云，又令人失望！其实，既以反统制姿态竞选，戴传贤作用已失；山西扬言遵旨也难怪。结果走私举李者纷纷，阎的包办又何尝不是绝对的。惟探访东北、华北、西北若干代表，诺言犹昔，差强人意。但人心隔肚皮，又谁能保险呢？

国民党既宣布自由竞选，而“总裁”又伸出黑手支持孙科打击元老将军们，因此，统制与反统制激化了，舆论多同情反统制方面。竞选人用演说、谈话、广播、广告多种方式，自吹自擂，发表政见。一片“戡乱”、行宪、民主之声，人们听得真腻口了。惟于右任所说“穷是他竞选的本钱”，有点别致。李宗仁的调子随着掌声，越唱越高，从准备的第一套到第二套了，喊出实行民生主义、清算豪门资本、征用外国存款、实施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战士授田和保障人民四大自由（有免于贫困及匮乏之自由）。这些口号引起各大学教授共鸣，也引起统制方面的震怒，南京忽盛传李宗仁通共了。李在安乐厅宴千余代表，慷慨

陈词，说他“不怕戴红帽子”，不料这话反而在这样的代表面前，竟博得掌声震天。我方暗暗称奇，而李的话意又转到他的反共成绩方面，空气顿时冷却下来，经我忙寄纸条，这才转过话头，但掌声已稀落得可怜了。试一查李宗仁的历史，是1927年导演过“特别委员会”，反动极了，要他发“违心之论”的进步言辞，倒反而难于理解，我们枉费心机了。不过，在反动大杂烩的“国大代”面前，为什么却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中间分子颇多呢？还是即便特务有时也良心发现呢？我至今不得其解，提供研究政治心理者作参考。的确，伪装进步也是李宗仁当选原因之一。

23日的选举结果，李宗仁得票754张，考上第一名，其次为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24日依法就前三名重选，结果李宗仁得1163票，仍居第一，次为孙科、程潜。眼看孙科当选无望，统制者恼火了。黑手怎样统制，我不悉其详。25日程潜称“奉命放弃竞选”（旋又否认奉命）。李宗仁登报放弃，并订27日飞返北平，孙科最后也函主席团弃选。丑剧不能完场了。试场舞弊，举子罢考，国民党监委酝酿弹劾（随李见黄季宽，曾闻此息），一时舆论哗然。胡适毕竟是个书生，他竟说穿了黑手的秘密。他说：“一个总统如果高兴的话，表示一下愿意什么人做他的助手，也是正当的。”“正当”尽管“正当”，希而“总统”着急了，连忙又声明另作决定，派人劝李、程、孙继续竞选。民青两党也凑热闹，呼吁和谐。832名代表提案请保障投票自由。这是对于“高兴”的“总统”一拳沉重的打击。最堪注意的是蒋介石请出白崇禧代表他宣称“选举绝对自由”。狐搯狐埋，出尔反尔，法西斯头子貌似凶恶，其实胆怯，不但在人民面前战栗了，也低头在将军麾下。桂系李白的双簧，至是显出一点妙用。滑稽得很，“竞选”人变为“应选”人。28日三选结果，李宗仁依然第一，得1156票，但距法定半数1325票尚远。于是29日依法就前两名四选，李宗仁得1438票，比孙科多得143

张，依法当选了。午后，大方巷 21 号贺客盈门，第一个贺客便是指挥统制的陈立夫。

看完这出戏，在当时对我有很大影响，我看出南京政权崩溃在即，不想再攀附作官了。我对华北文法学院 1300 多名青年负有责任，遂结束自己经手的事务（愿意受帮助的代表，送飞机票或路费），5 月 2 日，我便赴沪转平。

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

余 港 邦

和谈前奏

一、蒋介石下野

漩
涡
沉
浮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解放大军一野准备向甘、宁、青、新挺进，四野、华野包围平、津、二野、三野直奔淮海，蒋介石吓得手忙脚乱，于11月4日在南京的国防部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除何应钦、陈诚、顾祝同、林蔚等人外，还特地电召北平的傅作义、兰州的张治中到会。会后到蒋的官邸晚饭，又继续谈。蒋决定把他手上全部精锐包括黄伯韬、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等兵团投入淮海，以杜聿明代替刘峙作主帅。会战从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蒋军全部被歼，黄伯韬自杀，杜聿明、黄维被俘，李弥仅以身免，其余的如丧家之犬，四散奔逃。12月25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国民党华中剿总白崇禧突然发出通电（电文由张群、张治中转）给蒋介石，力言大局至此，实不能再战，只有停战以言和。同时对记者透露，非蒋下野不能谈和，应该让别人来谈，背后还搞所谓“五省联盟”。用意非常清楚，这是逼蒋下野，让李宗仁来主持残局。蒋认为这是落井下石，祸不单行，万分恼怒，竟至拍桌破口大骂。

蒋电召张治中到南京是有用意的。12月8日已和张谈了一次，白通电发表后，又约张谈，大意说：翁（文灏）内阁是拖不下去了，我设想两个方案：一是你来组阁，不过你的态度太明显，恐怕立法院通不过，因为他们好些人还反对在不利态势下谈和。另一个是让孙科来组阁，你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这样就是个能战能和的内阁，你看怎样？张表示不愿组阁，最好副院长也不担任，国防部长更不合适；要谈和，也只能以代表身份去谈。蒋然后找孙科谈，孙一口答应了，但表示必须组织所谓“巨头内阁”，然后才能起作用。所谓巨头，包括张治中、张群、翁文灏、吴铁城、邵力子、陈立夫等，而且声明非张治中参加，他就不干，蒋又劝张说，提孙组阁已得立法院同意，你还是得帮他忙才行，你的意见可以和孙面谈。孙、张面谈时，张表示：局势太坏，谈和已经为时太晚，但还是非谈不可，希望仅在内阁担任个政务委员名义，不任实职，地位比较超然，谈和时容易出面。孙同意了，于是孙阁组成。后来孙还告诉张治中，说他曾就今后方针问题向蒋请示，蒋对他说：内阁组成了，你们大家研究去，如果大家认为非和不可，我也可以考虑。孙于内阁名单公布时还发表了一篇谈话，表示要争取“光荣的和平”，并曾尝试请美、英、法、苏调停中国内战，虽被拒绝，但宁、沪之间和谈空气还是逐渐浓厚起来。

这里还得补叙一笔。原来自1948年3、4月间蒋介石片面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充任总统以后，局势每况愈下，张治中曾于5月初给蒋上了一封万言书，于力言非和不可时曾暗示蒋须考虑下野让别人来主和，11月间和蒋在南京面谈时更直接把问题提出，蒋断然拒绝说：现在不能讲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张和吴忠信密商多次，后来再联合张群三人一起向蒋进言，劝他暂时休息，蒋亦未同意。及后，淮海战役惨败，白崇禧通电倒蒋，张、吴等三人又再向蒋详析利害，蒋才勉强同意。詎料山西的阎锡山适于此时到南京，对蒋下野极不

赞成，认为事尚有可为，何必出此下策。蒋又有些动摇了，但是严酷的现实已逼得蒋无路可走，孙科虽登台，军事、财政、金融仍毫无办法，社会人心不安已达沸点，蒋不得已，决定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这种毫无诚意的伪装和平，中共根本不予理会。至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时局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是贯申整个和谈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有必要抄录如下：

- (一) 惩办战争罪犯；
- (二) 废除伪宪法；
- (三) 废除伪法统；
- (四) 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 (五) 没收官僚资本；
- (六) 改革土地制度；
- (七) 废除卖国条约；
- (八) 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蒋介石从这八条中看到中共态度十分明确坚决，而各方对他的“元旦文告”反应又极冷淡，知不能再恋栈，于是在同年1月19日下午四时召开他最后一次的“御前会议”，参加者有张群、吴忠信、张治中、邵力子、孙科、吴铁城、陈立夫等人。蒋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李宗仁字）出来谈和，谈妥了我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蒋说完后，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人发言。事情本来很明显，蒋如不下野，中共怎会同意开始谈和，李宗仁又如何能主持和谈。最后吴铁城说：事关重大，是不是先召开中常会来讨论一下？蒋愤然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不愿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这话很快流传出去，南京市面就马上反应：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

的，是被蒋介石打倒的！)最后，蒋只好说：好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案，下野文告应该怎样措词，请大家去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张治中曾提出文告可否请邵力子执笔，邵谦辞，蒋就找别人写。到1月21日下午，蒋把国民党中常委请到官邸，正式宣布下野，并把文告念了一下。会上一些自命孤臣孽子如谷正纲之流，痛哭流涕，亦无法挽回。蒋即日登机飞返浙江奉化溪口而去。

这里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和谈的用心。在他对中常委宣布下野之后，张治中因逗留南京已两个多月，心里惦记着西北，曾当面请求回西北去，蒋立即制止说：那怎行，你一走李德邻就会多心了。张说：我现在内心非常苦闷，我还是先回西北吧！蒋严肃地说：我既然决定下野，以后就要谈和，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在座的人也纷纷附声劝告：你现在万万不能走。显然，蒋为了达到下野后幕后操纵的目的，不仅需要李宗仁当傀儡，也需要张治中等人去负责谈和。

蒋介石这次下野是第三次。三次都是以退为进，前两次后来重新登台，这次也不例外。

蒋既下野，按照蒋记宪法，应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李宗仁于1月22日一登台，就宣布接受毛主席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希望早日开始商谈。跟着孙科也发表声明，提出谋求所谓“光荣的和平”。以后报章又先后出现“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永久的和平”等论调，和谈的空气渐趋浓厚。

这时候，张治中曾经做过一件很天真的事。就在李宗仁代总统不久，张以西北公务积压亟待料理为词，向李提出暂回兰州一行，李同意了，但叮嘱早去早回。张乘机向李建议：为了进行和谈，必先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最好更换新人，不能老是一套班子，走马灯似的。李说：“你看找谁？”张说：最好能把孙夫人（按：指宋庆龄）和李任潮

(李济深字任潮)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谈和。你如能请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李当时表面上表示同意。据张说,李宗仁也进行过,但没成功。张治中没想到,李宗仁和李济深是有矛盾的。宋庆龄和李济深固然未必肯甘居李宗仁之下,为其所用,李宗仁亦不见得乐意让宋、李出山;更何况当时局势糜烂,宋、李怎肯被李宗仁拉下水去?这件事后来宋庆龄知道了,解放后史良曾告诉张治中:孙夫人对你的建议很不满意,说是你和她开玩笑。张在作回忆录时对笔者说:“在那种情况下,当然不会成功,在我,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想罢了。”

二、为和谈作准备

张治中是1月底回到兰州的,而北平不久就解放,同时中共中央发言人于2月6日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声明,着重指出惩办日本及国内战犯为和平谈判的必备条件。李宗仁看到和谈已有可能,就不断给张治中去电报和长途电话催促,张乃于2月22日飞回南京。

当时情势是很清楚的,一方面摆着中共所提的八项谈判条件,另一方面是蒋介石仍然牢牢地掌握实权,在溪口幕后操纵,李宗仁仅仅是个傀儡。李曾呼吁美、英、法等国调停中国内战,遭到拒绝,又提出七项政治措施,特别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政治犯无法兑现,感到脸上无光,牢骚满腹。在这样情势下,张治中动了去溪口的念头,就和李宗仁面商。李表示同意,并且希望就张组内阁问题代他向蒋请示。

3月3日,张治中和吴忠信(蒋介石的挚交和心腹)乘飞机去溪口,屈武和笔者则秘密地先一天从南京坐夜车到上海转海轮前去。我的印象很深刻。下车后先到蒋的故居,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庄院,面溪背山,前面是砖砌的大圆门,进院内又是一个半圆门,我们被引进到里面的候客室。坐片刻,我信步往里走,看到一大间木制厅堂,正面摆着蒋的祖先

牌位。据说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到此都要行三鞠躬礼。我们在候客室坐了一会儿，便被招待到蒋的新居。新居在故居右侧不远，枕溪卧流，一楼一底的小洋房，虽不大，但洋气十足。张、吴住楼上，我和随员住楼下，屈武则住到附近一栋二层楼的招待所。故居是封建味道十足的庄院，新居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洋房，两者合起来，正符合蒋介石的身份，看来这不是偶然的。那天，蒋不在山下，住到山上雪窦寺妙高台蒋母墓庐去了。墓庐是座小平房，就在墓侧，文武官员到此也必须先到蒋母墓前鞠躬如也。

张治中、吴忠信第二天就上山，连续和蒋介石谈了五天，下山后又住了三天，前后共八天。张下山后即把和蒋谈话内容详细口授，由我记录整理（全文要点已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张治中文《北平和谈前的几个片断》，不重录）。

张治中此行目的有三，其一是就中共所提八条向蒋摸底，为和谈作准备；其二是请示行政院长孙科辞职后的继任人选问题；其三是劝蒋出国，以便李宗仁放手主持和谈。

关于中共所提八条，蒋不太重视，和张治中、吴忠信谈话时仅涉及一、二、三、四、八条：（1）关于惩办战犯问题，蒋、张、吴都认为无法接受。（2）关于改编军队问题，蒋还念念不忘他的所谓“军队国家化”，主张双方军队保持一定比例，缩减到国防需要为度，三年之内完成。（3）关于政治体制问题，蒋根本回避“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的提法，只表示同意实行政治民主化和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4）关于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蒋回避了第八条的主要内容，即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接收南京政府的一切权力，而表示同意实行“三三制”或“六六制”，使双方在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权。另外关于和谈代表人选问题，李宗仁原提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彭昭贤、钟天心六人，中共方面反对彭、钟，蒋表示可于北方籍的立监委员中遴选

一人，结果挑选了向来办教育、政治色彩不太浓厚的李蒸，到3月28日李宗仁再提刘斐，凑成六人，中共表示同意。

关于行政院院长继任人问题，孙科坚持不干，3月3日提出辞呈，蒋表示不勉强。李宗仁提出何应钦继任，蒋初坚决反对，但经李再三请求，张治中、吴忠信又极力说项，蒋才同意。张于10日回京，翌日带了蒋给何应钦的亲笔信，会同顾祝同、白崇禧一起到杭州劝何，何才勉强答应，但对张治中提出：你一定要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张只好同意。同月12日，何应钦正式发表为行政院长。

关于劝蒋出国问题，蒋非常反感，反复说：我是一定不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这里又一次反映了张治中的天真。蒋介石怎会甘心退出政治舞台！3月3日一到溪口，我们便知道俞济时带来蒋记侍从室的一班人马在溪口照常办公，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员络绎不绝地到溪口见蒋请示工作。有一天，我到招待所看屈武，就看到谷正纲、郑彦棻等人也住在那里。蒋一方面背后操纵一切，另一方面又虚伪地对张治中、吴忠信表示：他一定竭全力支持李宗仁，说李现在负的责任就是他的责任，李的成败就是他的成败；甚至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终他的一生也不愿再度执政云云。

为和谈作准备的第二件事是研拟和谈腹案。何应钦就行政院长职后，一方面积极考虑阁僚人选，另一方面则忙于筹备和谈。他曾以院长身份先后四次召集会议研究和谈腹案。参加者：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李蒸（黄绍竑不在南京，刘斐还未任命），此外还有翁文灏、贺耀组、黄少谷、彭昭贤等人，笔者担任纪录。会议地点是行政院的小会议室，在院长室附近。第一次会议，何先作简单致词，然后由张治中详细介绍去溪口和蒋谈话的经过。谈到中共所提八条时，张亦陈述了个人意见，并作了轮廓的分析估计。其中特别强调中共八条中的第一条关于惩办战犯问题，指出中共把它列为八条之首，并已先后三次公

布战犯名单，2月6日又曾以中共中央发言人名义发表声明，指出这是“和平谈判必须具备条件”，足见中共之重视。但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估计和谈中它将会成为双方交锋的焦点，须详细讨论，预为之计云云。第二次会议，就中共八条和张治中的汇报展开讨论，国防部同时送来关于和谈中的军事参考资料和意见，于是合并讨论。第三次继续充分讨论，并决定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草拟和谈对案，作为“原则性限度”。对案分甲、乙两案，甲案偏重政治，乙案偏重军事，重点是立即停战，划江而治。但第四次会议讨论时，大家又认为分甲、乙案无必要，只用甲案。同时考虑到中共方面坚持以八条为基础，态度十分强硬，恐怕先提对案不合适，因此改对案为腹案，作为内部掌握之用。至于国防部提出的意见和要求，亦作为和谈时参考。此外还考虑到，和谈关系重大，而且局势变化急剧，为了适应实际情况，决定请已于2月间迁去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即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迁回南京，并指派大员组织和谈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

这个腹案和国防部意见与上下文关系密切，特抄录如下：

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于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实施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实施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附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通讯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拿这个腹案和中共所提八条对照，可见双方距离很远，有些地方简直是南辕北辙，尤其国防部七点要求，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徒然暴露他们的愚蠢无知而已。

何应钦认为和谈准备基本完成，同时国统区已至山穷水尽境地，不能再拖，而要求和谈的呼声更是甚嚣尘上，于是在3月23日宣布内阁改组名单，接着24日就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通过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名单是：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28日又增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已在北平）、刘仲华（同时是李宗仁的联络员），要求中共早日决定和谈的时间地点，以便开始商谈。

到同月26日，中共通过广播发表了和谈代表名单，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代表是：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以齐燕铭为秘书长。特别声明以毛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的八条为基础，要求国民党代表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于4月1日到北平开始谈判。

中共广播一公布，各方面都活跃起来，不仅老百姓街谈巷议，报章刊物纷纷作各种报导和推测，国民党的立监委尤其派系如CC等集团，亦纷纷举行集会，发表意见。卢郁文在张治中家召集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对筹备工作进行了讨论，大家分头办理。28日张治中要我把上述和谈腹案和国防部意见，用工楷抄写一份，29日他就带上这些抄件和屈武一起再飞溪口，向蒋介石汇报，到30日才返南京。后来张告诉笔

者，此行和蒋谈话多次，蒋看了和谈腹案之后，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离开时，蒋从妙高台一直送张到溪口，还重复地说，他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由溪口至笕桥飞机场，蒋经国和屈武同车，分手时刻蒋经国曾经对屈武说“文白（张治中的字）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回到南京时，屈把蒋经国的话告诉张治中。张老大不高兴，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要当面质问他教训他的！”老蒋说一切要当心，小蒋说会死无葬身之地，两句话合起来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蒋及其反动集团对和谈的看法和处心积虑。张治中回到南京已经很晚了，还马上口授我写了一个新闻稿，送到各报发表，主要是说蒋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用意是：一方面造成较良好的和谈气氛，另方面对反对和谈的死硬分子施加压力，为和谈减少一些阻力。但是张没想到，这次到溪口却引起了中共方面的严重抗议。

行期逼近了，代表团同人分两批飞北平。31日卢郁文率领第一批工作人员先行（包括电台的报务和译电人员）。张治中则应立法院邀请向立法委员会作报告。晚上，何应钦在他的官邸举行送行宴会，仅一桌，参加者六位代表，加上翁文灏、贺耀组、黄少谷，笔者亦被邀参加。何先举杯祝代表们一路平安，和谈顺利，并对大家的任务和辛苦表示慰劳祝贺之意。由于筹备工作早已全部就绪，有关和谈的各项问题亦已充分讨论过，所以席间再没有谈及关于和谈的话。总的说，是兵败求和，形势太坏，大家当时的心情都是够沉重的。据我所知，这六位代表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方面，怀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基本上是同床而异梦，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这留待后面再说。

4月1日上午，六位代表和顾问、秘书等驱车赴南京明故宫机场。立法院还特别休假半天，立法委员们到机场送行。在京的国民党党政军大员亦多到机场欢送。休息室中谈笑风生，气氛相当活跃。记得邵力老

还棋兴大发，与人从容对奕，李宗仁、张治中等旁立观战。

三、划江而治，平分秋色

在中共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之下，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但是对和谈却有一点共同的，就是希望划江而治，平分秋色。

蒋介石向来是把和谈作为反革命的一手使用的。他时刻不忘的是消灭共产党，绝不甘心于和平。所以张治中、吴忠信3月上旬在奉化溪口向他陈述意见，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时，蒋连连点首，表示同意。但是他又考虑到形势太坏，能否做到没有把握，所以向张、吴说：我们虽然想保有若干完整的地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是共产党是不愿意我们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做到。在谈到何应钦组阁问题时，蒋更赤裸裸地说：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宜分心。当时蒋的心腹参谋总长顾祝同曾向蒋建议，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残部全部撤至长江南岸，编组成若干强大兵团，防止共军渡江，以确保江南半壁。同时在江南把各军、师管区的新兵迅速编组成二线兵团，以备最后决战。蒋采纳了。防守长江的任务交由汤恩伯负责，编组二线兵团则由顾办理。

在蒋授意下，不仅军事上作划江而治的准备，政治上也是同样的配合。3月26日中共广播决定4月1日在北平开始和谈消息后，南京、上海等地以CC为骨干的各种团体纷纷举行集会，以各种名义如“全国和平促进会”、“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留穗立法委员联宜会”、“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委及政治委员谈话会”等等，大肆叫嚷什么“国体不容改易”、“宪法修改必须依法定程序”、“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军队国家化……仍应遵循不变”、“无条件停止一切

战斗行动”等等，以为这样就可以造成空气，对中共施加压力，为实现划江而治作后盾。

至于李宗仁，在和谈问题上同蒋介石有同又有不同，希望划江而治是相同的。他曾对刘斐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备战以求和，李、蒋也是相同的。李曾对唐生智说：能战方能和，和时方能对等。他们想的是对等的和平，而不是他对国民党和谈代表们所说：只要你们同意我就同意，纵然在和谈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也愿签字；更不是像他在和谈开始后给毛主席电所说：“协商问题，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但在和谈的动机和目的方面，则蒋、李大不相同。蒋希望在划江而治之下，积蓄力量，向中共反扑过去。李则希冀在划江而治之后，联美、联苏、联共以压蒋，取而代之。所以一方面通过傅泾波、司徒雷登向美国乞求军火，计划武装桂系部队；另一方面又派人拉拢苏联武官罗申。他交给刘斐的任务，就是要他到北平后见机行事，联共压蒋。李认为全国人民主和，立法院支持他，美国政府支持他，苏联不反对他领导和谈，只要把中共联络上了，就可以利用这几方面力量来压蒋。

至于六位代表，张治中、邵力子和蒋介石关系很深，黄绍竑、刘斐属桂系，李蒸派别色彩不浓，章士钊属社会贤达。他们对和谈的态度也各自不同。章是在2月间以上海人民代表团代表名义，邵是以个人名义到北平去过的，心中早已有数，知道划江而治不可能，而且早已做好不返回南京的准备。张治中长期参加国共和谈，对国民党军政腐败有深刻了解，照理也是心中有数，行前一再对友好和笔者都表示，此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他和蒋的关系太深了，所以仍然作划江而治的梦想，在溪口时也是同蒋这样谈的。黄绍竑和刘斐则受李宗仁、白崇禧之托，当然希望能取得划江而治的条件。

中共所提八条是要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国民党方面则作划江而治的美梦，双方可谓南辕而北辙，和谈的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4月4日毛主席发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明确指出：不管你们签字与否，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军的。这不管给蒋介石、李宗仁等人以当头一棒。

和谈经过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于4月1日上午由南京起飞，下午三时到达北平。一下飞机，看到迎接的人不仅寥寥可数，连一个中共代表也没有到场。经过介绍，才知道仅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府秘书长薛子正和一些其他的人。我当时觉得很纳闷，原来设想首席代表周恩来会来接，心下确实有点狐疑。同时大家随身的简单行李还要检查，心下也感不快。代表连工作人员一起被接到六国饭店（后改称国际饭店），又看到“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这几件事凑在一起，我的疑团更大。

一、初度交锋

一日晚上六时，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六人来六国饭店看望南京政府代表，并设便宴款待代表团全体人员。饭后双方代表即开始商谈。商谈采取分头个别对话形式。周恩来、林祖涵和张治中、邵力子对谈。

这次商谈，据我事后从张、邵口中所知，谈及三方面问题。

周一开始就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这样突如其来的质问，使张治中感到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周没等张多考虑，接着又说：你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

蒋介石所谓下野是假的，而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张治中仓卒间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想起要去的，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宗仁）要我去。我所以想起要去，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他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先生所提八条为和谈基础，但蒋究意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六位代表中除章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外，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都去。我是首席代表嘛，只好我去喽。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出许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的作用。蒋既然表示愿意和谈，愿意终老是乡，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这些人就不敢反对了。张的反复解释和补充，没有能使周满意。周最后还说：不管你怎样说，只能说明蒋还在操纵指挥，说明你们不是真要和平，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感到反复解释无效，也在言语间动了一点感情，引起双方的争执。以后在两次不同的场合下，周还一再提出责难。张在解放后写《七十回忆录》时还对笔者说：中共方面对我去溪口反应如此强烈，实非始料所及，这件事对商谈的情绪是确实有影响的。我认为，这段经过反映了周严肃的原则性，中共代表们不到机场迎接，以及六国饭店的标语，是绝非偶然的。

其次，谈及和平问题。周问：我们的广播（指3月26日的广播通知）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否？对和谈有无具体的意见？张答：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方的——当然，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周说，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五点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当然，你们也已意识到，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际上除

美帝及其追随者外，也都希望中国出现和平，这是不能拖延的。

然后，谈到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主要是张治中谈了他一贯的看法，而周、邵未作表示。张的话大意是：二次大战结束后，轴心国家失败了，同盟国家也是筋疲力竭，各国政府都希望有个长期的和平，以便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全世界的人民更是厌恶战争，渴望过和平的日子，中国也不例外。和平，是世界大势所趋，对中国人来说，和平统一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次到北平来，就是抱着一片真诚来谋取国家的和平统一的。不过，国家和平统一之后，最要紧的是有正确的对外政策。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长期奉行了一条一面倒亲美的错误政策。我主张我们今后要实行美苏并重的政策。就是说，亲苏也亲美，不反美也不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政策来消除美苏的对立，促进美苏的合作，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这对中国有利，对美苏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有利。别的不说，就单从军事观点来看，如果在美苏对立中，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对抗苏联，则美国为了支持中国，必须调动大量的海陆空军横渡太平洋到中国大陆，这样，中国就将成为美国的负担。反过来，如果中国联合苏联来对美作战，苏联为了支援中国，也必须出动大量的军队越过辽远的西伯利亚来协助中国，不仅中国成为苏联的负担，而且使苏联陷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所以，中国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们应该好好运用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首先要谋取中国的和平统一，国家不和平统一，是谈不到实行这个政策的。

这是一次泛谈。以后，从2日至7日，双方代表继续个别对话，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从8日开始，中共中央毛主席在石家庄分别会见国民党的六位代表：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章士钊，第三天黄绍竑、刘斐，第四天李蒸、卢郁文。事后张治中曾两次向我简略地谈到当时的情形。

毛主席一见到张就满面笑容地同他握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张来去接送，并且全家暂迁他处，把“桂园”和服务人员让给毛主席使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会），然后问到张身体和家人可好。张还说，那天谈的话很多，他曾根据和谈腹案以及在溪口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谈了一些意见，涉及以下几点：（1）关于战犯问题，张一再说蒋介石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并明确表示愿终老是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便利和谈进行，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写人条文。毛主席表示可予考虑宽大处理。（2）关于组设联合政府问题，张提到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协议的具体方案，如按此办理，国民政府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毛主席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3）关于今后建设问题，张表示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有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毛主席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毛主席并且问张对今后建国的意见。张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关于美苏并重的外事主张。其内容除了上述和周首席代表所说者外，还作了以下补充，大意是：（1）现在的世界是美苏两雄争长，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雄争取的对象，中国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打算，最好在政治上既不面倒向美国，也不面倒向苏联。国民党一面倒向美国，招致了今天的失败，希望你们今后也不要一面倒向苏联。（2）中国和平统一之后，就要从事和平建设，国家百年积弱，百废待举，又是个人口众多、领土广大的国家，光靠苏联帮助不够，还得同时利用英、美、法等国才行。（3）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促进经

济发展，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避免的。从长远看，英、美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也需要和他们做生意，如果关系处不好，生意就做不成。毛主席没同意，当时就给张作解释。（到4月21日解放大军渡江，英国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袭击解放军，解放军立即还击，击伤紫石英号，被围在镇江江面。张治中在和周首席代表谈话时，表示这样做，太刺激了，不好。所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批驳的七种错误论调中，有四种是张治中提过的。）

二、重要函电

从4月1日至12日，是双方代表不断对话商谈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三件比较重要的事。

第一件是李宗仁和毛主席的来往电报。（全文已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张丰肖所写《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的有关史料》一文，不重录。）李发出的“卯阳”电，经张治中收转毛主席。李电主要内容有三点：其一是表示谋和诚意。自称“排除万难，决定谋和”，“今日所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其二是关于战犯问题，是此电的重点，措词虽委婉，但用意则甚明。所谓“宗仁慄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已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一句话，希望取消八项条件的第一项。其三是针对八项条件的二至八项的。所谓“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表面上谈的是两党合作的大计方针，实际上是说，如果彼此都同意遵照孙中山先生遗嘱办事，则宪法与法统不必废除，政权不必接收，

土地不必改革，官僚资本不必没收，反动军队也不必改编，只要“国共合作”，“同守此义”，则其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这个电报的主旨，同上文所引和谈腹案一至八条是一脉相承的，甚至还有倒退的。

毛主席当天就给李宗仁复电，主要内容也是三点：其一是强调八项原则：“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其二是：“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其三是建议“早日成立和平协定”。

上述电文迅速在双方报纸、广播上刊播。虽然内容针锋相对，距离甚远，但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所以人们还是寄予希望的。

第二件是国民党反动派继续为和谈设置障碍。何应钦4月9日给张治中等卯佳电，据说他在4月6日到了广州，列席了国民党中常会的三次会议，决议要张等坚持以下各点：

（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方；

（二）为保守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以维持；

（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

（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

（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列（二）（三）（四）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讨论时各委员均发言激烈，反对联合政府甚力，对和谈特种委员会之设立及人选，亦几经磋商，始获协议。……（笔者按：所谓特种委员会即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成员是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董冠贤、孙科、张群、朱家骅、白崇禧等。）

从上述电文，可以看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昏愤无知，垂死挣扎，亦可看出李宗仁、何应钦根本无权决定和谈条件。

第三件是张治中继续劝蒋介石出国。张在第一次去溪口时曾劝蒋出国，遭蒋拒绝。张到北平后，综合各方情况，认为李宗仁对和谈虽别有用心，但确有求和之意，而蒋在溪口幕后操纵，则即使谈妥了，李亦无法采取行动。蒋留国内，终属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又动了劝蒋出国的念头，要作最后的努力。经过反复考虑琢磨，给蒋写了一信，其主要内容如下：

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之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和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纵以钧座英明，亦万难将此腐朽集团重新提振有所作为也。倘吾人知彼知己，即以吾党北伐时期北洋军阀腐溃失败之经过事实而益可证明。职是之故，惟有钧座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则腐朽集团经受剧变之深刻刺激，唤起淘汰作用。产生新机，将来尚有重新振起立一日。而不然者，将使失败之中遭受更大更惨之失败，而无复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实从任何方面冷静观察，皆为必然之情势与现实，摆在吾人

面前，显而易见，决非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之意也！

前与吴礼卿（吴忠信字礼卿）先生到溪口时，曾就两个月来大局演变情形加以研究判断结果，认为无论和战，大局恐难免相当时期之混乱，而钧座虽引退故乡，仍难避免造成混乱之责任，此最大吃亏处，亦即最大失策处，惟有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为最有利，当时亦曾面陈钧座，未蒙示可，谨再将其利害列述如下：

甲、出国之利

（一）不作反对者之攻击对象。反对者以“天下之恶皆归焉”之存心，任何问题如不能解决时，即认为钧座所操纵、所阻挠，横施攻击，无法剖白。

（二）对人民表示赞成和平，转移人民观感，以恢复人民之怀念与信仰。年来国人怨声载道，对于钧座之信仰，可谓低落至无以复加，甚至认为钧座如不远离国门，不但为和平之障碍，亦为战争之障碍，且为美援之障碍，此种众怒难犯之严重压力，何必负担？故钧座为恢复信仰计，自以及时摆脱为宜。

（三）避免和谈失败之责任与在和谈中提出有伤尊严之要求，并免将来遭遇进退两难之窘境。证以共党迩来之态度，可知如钧座仍留国内，则共方及反动者必将发动更大规模之攻击，极端难堪，殆无疑问。

（四）避免再负战争之责任。盖如和谈成功，则归功领袖下野出国所铸成；即如再战，亦不负任何责任，而可引起军民之回忆，并可转变友邦之观点。今日之情势，如和谈成功，自是幸事，倘不幸而和谈失败，亦惟有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与李、何两同志负责，乃为最明智之做法。盖若继续战争，而钧座或在幕后或径出面指挥，则桂系必掉头而去，引起内部之分裂，危险孰甚，真毫无是处也。

（五）对党政军干部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予以刺激，唤起觉悟，并恢复其对领袖之信仰。现时吾人所感失望者，阙为党政军

人员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为主要因素。而尤使吾人最感失望者，乃为党政军一般干部对于领袖貌似恭顺，实则背后均多怨言，牢骚满腹，皆谓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尤其黄埔高级将领，多认钧座之指挥方法太过陈旧，以数十年前之陈旧方法指挥新的军事，太不合原则，必然失败。在此种生活与心理状况之下，焉有恢复信心挽回颓势之余地？故为钧座将来革命大业计，目前惟有放下一切，飘然远引，静观大家之如何作为，如何因应，使之重受刺激，从而引起觉悟，恢复对钧座之信仰。

(六) 在个人方面，增强将来革命事业种种有利因素，如广益见闻，结交国际朋友等。钧座曩者虽曾留学日本，游历苏联，然而时代转变甚速，阅时既久，自有孤陋寡闻之感。尤其欧美方面，由于科学与工业进步，一日千里，时代之转变益剧，新的事物与新的潮流有不可想象者，倘能在欧美作一番游历考察，广交游而益见闻，则对将来之事业将有极大之神益，盖可断言。

乙、出国之害

(一) 在国外，安全问题不无顾虑，但可设法防范维护。

(二) 军事力量顿失维系中心，但只须付托有人，似无可虑，且在军事腐烂已极，不足珍惜，何况今后领袖事业，只有恢复信仰，争取政治上领导之胜利，而不在能否保有若干军事力量为转移。

(三) 党的领导，一时远离，不免更形涣散，但如能组成干部会议，亦可维持现状，何况本党早已解体，尚须彻底改造，始可复兴，然此非待大局明朗时莫办。

根据以上各项分析而言，均座倘能毅然出国，将有百利而无一害，盖甚明显。甚愿钧座再作一切实周详之考虑而及时采取行动，且愈早愈好愈有利。

抑更有陈者，此次到平以来，所受刺激之大，非可言喻，真是万感

交集。倘使三年以前，甚至去年六月在西安时钧座采纳职之建议，则决不致有今日如是之惨败，职亦可免今日在北平写此一篇忍辱受气一言难尽之痛史也。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应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今请再将往者一切失败经过作一检讨，昔日一切建议献策者孰是孰非，无不晓然。目前之情势，岂非铁的事实证明乎？

此信是由屈武带去南京交由吴忠信转交的。蒋之为人，是绝对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的，张治中此信，只能表露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可奈何的心情罢了。

三、一次会议

从4月1日至12日，经双方代表反复商谈，涉及八项原则的各种问题，都已经详细讨论过，充分交换了意见，但未作出结论。国民党方面的意图是非常清楚的。总的目标是希冀划江而治。当前的要求是双方停战——实质上是自己招架无力，请求中共停止进攻，并且认为和平的最大障碍是关于战犯问题。如果这一条得不到解决，则和平条款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即使谈妥了也无法签订，所以对此谈的最多，要求也最力。至于其余各项，也曾根据和谈腹案与何应钦4月9日来电所述，分别提出过，希望得到中共方面尽可能大的让步，争取到尽可能好的条件，以便说服南京党政顽固派接受。代表团同人确实是诚意谋和的。他们深知国民党无力再战，而全国人民厌战，渴望和平，到北平后所见所闻，对形势的发展更已心中了然。

到4月13日早，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送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并通知当晚九时开始正式会议。

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马上召集各代表、顾问、秘书长开会研究。

协定草案内容也马上传遍了代表团同人。当大家看到这个草案时，有的人感到：全篇充满了“降书”、“罪状”的语气，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和谈固然以毛主席所提八项原则为基础，但具体条件太高。从南京的顽固派看来，这个草案等于是“招降书”、“判决状”，和他们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幻想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和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事已至此，还不得不逐条逐款研究下去，提出一些初步的修改意见。

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压在大家的心头，时间如箭般飞逝，大家怀着沉重失望和苦恼的复杂心情在晚上九点前到达会场——中南海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排长桌，两端分坐双方代表。长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纪录人员的座位。布置简朴，但空气则显得异常严肃。

会议没有固定的程序，在双方首席代表同意会议开始后，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详细的长篇说明，主要是：

这个草案是根据毛主席在1月14日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12天来的商谈，双方交换了意见，对许多有距离的问题，得到了以张治中先生为首的代表团的同意，有了同一的理解。而南京代表团又声称没有具体的方案带来，愿意由我方草拟提出，因此我方根据这八项基础条件，综合12天来的讨论，草拟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供会议研讨。现在，先说明我方对这个草案所持的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历史的责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自执政以来，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一贯进行反共活动；尤其自1946年以来，在美帝鼓励下，违反全国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动战争，使全国遭受空前的灾难，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经过两年零九个半月的战争，国民党军队已经被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所彻底击败，表示愿意以毛主席所提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因此有今天的正式谈判。事实很清楚，战争和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负担。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定这个责任。

其次，对这个草案的各条各款略加说明。

第一条是关于战犯问题，分两款。第一款规定，主要战犯必须严惩，这是原则。但是在南京政府李德邻先生所承认的原则之下，经过南京代表团的再三请求，并得到中共中央毛主席同意的宽大办法下，规定不限任何人，只要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得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另一款，南京国民党政府违反全国人民意愿，把冈村宁次等战犯 260 多名释放送回日本，全国人民异常震怒，和平协定签订后，必须追回重办。

第二条是废除伪宪法，第三条是废除伪法统。由于伪国大是违背政协决定召开的，是非法的，所以由它而产生的伪宪法也是非法的，共产党以至各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的一部分爱国人士当时都坚决反对，所以完全废除就毋庸置疑，也毋庸再加解释。

第四条是根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为了永久和平，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负责解决，而且要谨慎将事。所谓负责解决，分两种方式：其一是以武力消灭武力，就是从事革命战争。其二是以和平方式改编一切反动军队，就是以民主的方式来改编，使它成为人民的军队，亦即国家的军队。所谓谨慎将事，因为国民党到现在还保有陆海空军、各军兵种乃至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后勤机构等等，如何改编，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必须谨慎将事，给他们以出路，并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集中整理阶段，依照原编制、番号、人数，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使各得其所，避免动乱。第二阶段是分区改编阶段，国民

党部队经分期分区按指定地点集中后，由整编委员会订出改编计划，定期实施。为了实施改编计划，组设一个整编委员会，以中共人员为主任，国民党人员任副主任。整编委员会应向中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整编期间如发现叛乱，应由革命军事委员会讨平之。

第五条是没收官僚资本。明确规定：凡是在南京政府统治时期依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才没收。至于在南京政府统治前，或虽为统治时期而为不大的企业，进行生产已久，对国计民生没有害处的，并不没收。不过如为众所公认的官僚资本企业财产合乎这一条各款规定的，就是转移到国外去，也得没收。

第六条是改革土地制度。全国农村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均应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解放军到达地区，先实行减租减息，再行分配土地。解放军未到达地区，南京政府所属地方政府应负责保护农民组织及其活动，不得妨碍，待解放军到达再行办理。

第七条是废除卖国条约。凡国民党政府对外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以及文件、档案，一律移交给联合政府审查，其中凡对国家不利，尤其出卖国家权利的，分别予以废除、修改或重订。

第八条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主要是个程序问题。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和生产，为了很好地贯彻和平协定，特规定在新政协召开和联合政府组成之前，在国统区南京政府暂时维持下去，准备交代。国民政府军队开出集中，人民解放军开进，随即实行军事管制，建立临时民主政权，如有人破坏协定，发动叛乱，就予以讨伐。对国民政府和各级政府所属人员，除为人民反对、声名狼藉的反动分子外，对广大公教人员和官兵一样，绝不使流离失所，对其中进步分子、有用人才，还给予民主领导和适当工作。对生产机构则尽力保存，不使破坏。

如果以上八条二十四款都得到实现，全国和平就有永久的保证，而

南京政府代表团和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赞许。中共代表团愿意提出保证，等新政协召开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参加，并参加联合政府。我们对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共同努力，促成和平协定的签订，这对全国人民，对民主党派，对一切民主力量，将是极大的鼓舞。

然后，由南京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大意如下：

12天来受到中共方面十分周到的接待，双方充分交换意见，尤其是承中共中央毛主席的亲切会见和谈话，十分兴奋和感谢。这个草案因时间仓卒，我们代表团只作了大体的研究，现在只能简单提一些意见。

关于草案的前文，我们很了解战争的责任问题。国民党是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和政策，是战败了。我们对于自己的错误，愿诚意承认；对于我们的失败，也有勇气承认。不过前文中有若干过于刺激的字句，希望能酌加删节。

第一条关于战犯问题。多次交谈中，我已希望不要写成条文，会见毛先生时我又再次陈述意见，毛先生表示很大的让步。我今天还是坚持希望不写成条文；如必须写，可否文字改为：凡今后拥护和平的，可以给予宽大待遇，有谁背叛和平，才应追究。但我们代表团诚意谋和，不想为这个问题而僵持。

第二、三条关于宪法和法统问题，我们没有多大不同的意见，但文字上有些似可删改。例如第三款“中华民国宪法是违反人民意志的，应予废除”，“应予废除”是目的，“违反人民意志”是理由，依照条款惯例，理由可删。又如第四款称宪法为“根本法律”，是否改为“根本大法”为宜。

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问题。第八款改编分两阶段，究竟以年月划分或事实划分，不够明确。第一阶段是集中和整理，希望由我们自行整理，自行改编。至于整理和改编的若干原则和注意事项，似可不必列入

条文，以另种方式提出。关于第七款整编委员会问题，第一阶段是整理，不是改编，名义是否改为监察、或监督、视察、指导委员会较好，到第二阶段才叫整编委员会。又刚才周恩来先生说，整编委员会要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值得考虑。因为整编委员会既然第七款规定由国共双方组成，就不能只受一方领导。同时第二阶段联合政府成立，自有新的军事机构负责。第七款文字刺激性太大，例如“……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有权命令南京国民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这样，在联合政府未成立前，国民政府还要行使职权，却已先变成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辖下的一个机构，这对国家体制和人民观感都很不好。

第五条关于没收官僚资本，第六条改革土地制度，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除文字上有太重处建议修改外，原则上完全同意。尤其第五、六条，本来我们早就应该做的，现在你方提出，我们只有惭愧，决无反对之意。

第八条关于召开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二十至二十四款除有些措词过重希望改轻一些，有些重复希望删去外，没有原则不同意见。但对十九项规定：“……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府、院、部、委、会等项机构，应暂予保留，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领导……”我到石家庄会见毛先生时曾谈到这问题，毛先生表示：今后联合政府不知哪天成立，在这时期内，南京政府应照常行使职权。还特别指出：要他们注意，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意思很明显，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还应继续行使职权，因为在江南还管辖这样多省份，许多政务要处理。如果南京国民政府要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领导，岂不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变成南京的太上政府？请再加考虑。

最后，张治中着重说：刚才周恩来先生说，我们争取和平，一定要

永久的和平。这是稍有国家观念的人没有不同意的。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铲除内战的因素，使国家真能从此获致永久的和平。战争是妨碍国家走向富强康乐之境的死敌，是建设的对头。中国实在太落后，今后要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道路。这次我们来和平商谈，同人没有别的意思，只希望国家经此划时代的转变后，能够避免再牺牲再破坏。草案的最后一段话，是毛先生那天也对我说过的：“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这是历史上最宝贵的话，是全国一致拥护的话，我们从毛先生的文章和中共许多先生的言论看，对这一点，没有比中共看得更确实更深刻的了。我今天固然代表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但个人同时向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唤起各位先生的注意：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你们的肩膀上，我谨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对于这个草案，我们预备明天提一个修改意见，等到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当派人回南京请示。

最后，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晚上11时15分宣告休会。

四、二次会议

4月14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研究和平协定草案，提出了40多处修正意见，写成了一个修正案。主要点在于词句力求缓和，避免刺激，目的是希望能为南京方面所接受，使和平不受破坏。当时代表团同人的共同看法是：国民党的失败是肯定了的，既然如此，何必还拖累国家和人民？中共方面的胜利，也是必然的，如果能促成和平解决，减少国家

元气的凋丧，避免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是更好吗？

到晚上，张首席代表把这个修正案面交周首席代表，还谈了很久。第二天，双方代表又分别交谈，希望能达成一致的意見，但进展甚少。到晚上七时，中共送来《国内和平协定》，不再写有草案字样，并通知即晚九时到勤政殿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

我们依时赶到勤政殿，会议开始，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作了长篇的发言，除了对南京政府代表团所提修正意见已接受的加以说明外，还再三说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在4月20日前，如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就马上渡江。发言要点如后：

经过13、14两天的商谈，双方意见已经基本趋于一致。我们对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许多修正意见，凡是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都尽量采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凡我们觉得应该妥协的，已尽量妥协，在这样原则下，拟订了这个定稿，现在有必要把修正的地方向南京代表团全体朋友说明一下。

首先，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亦即前者的权利问题。文白先生和其他代表反复多次希望能有变动，我们经过考虑，愿意让步。就是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双方机构采用合作的办法，以解决过渡时期的一切问题。南京政府暂时行使职权，直到联合政府成立移交为止。至于军事方面的整编委员会，亦不冠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指挥字样。就是说，军事整编双方合作，政权方面互相协商，这是我方的重大让步。但是在军队改编程序和人民解放军开往江南接收一部分地方政权两点，我们还坚持原议，特说明如后。

关于军队改编问题。南京政府代表团反复提出，希望划分为两时期：即联合政府成立前，国民政府所统帅部队由自己处理，联合政府成立后，再由整编委员会处理。我们郑重考虑，认为无论在整理与改编都不能这样划分，要一道来办。因为：第一，我们认为国民党一切武装力

量应即改编，全国军队必须编成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用意为使中国从此得到永久的和平，不能再敷衍。过去国民党打这么久的内战凭什么？武力。武力现在已失败，就应好好交出来。第二，无论集中整理和改编，双方都参加，完全站在一家人地位来办理。而且着重对官兵的教育说服，使他们明白改编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不是排挤倾轧，打击派系，而是走向正道，各得其所。最要紧的是避免过去国民党搞的所谓复员、裁兵、编遣，结果使官兵或回农村为害乡里，或飘泊城市流落街头，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借此把武力、枪枝、弹药埋伏下来，将来从事破坏，再打内战，增加人民痛苦。第三，搞的办法，我们非常慎重负责，无论集中整理和改编，都从具体情况出发，分期分区办理，时间最长的可能达到一年，总以稳妥、谨慎、负责为原则。

关于人民解放军渡江接收地方政权问题。我们是接受历史经验行事。辛亥革命是先由各省成立都督府、军政府接收，然后才成立临时政府。大革命是先以北伐军的总司令部辖下的政务委员会行使职权，国民革命军是政权的先锋队。这次解放战争也是采用这种方式，由人民解放军接收地方政权，非如此不可。

以上两点是我们决不能让步的，否则就失掉八项条款的基本精神。

其次，关于一些重要修正之点，总计20多处。除了一些南京代表团认为带刺激性的字眼措词如“反动分子”、“贪污分子”等通通去掉，“背叛”改“违背”等外，重大的修正如第一条战犯问题，名单既已不提，“元凶巨恶”、“首要次要”字样也删去，一款一、二两项的规定尤为宽大。第二、三条，对宪法、法统性质的解释也同意勾去。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让步更大，已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掉，改成“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第五、六、七条双方意见无大出入。第八条，采纳文白先生意见，南京政府暂行行使职权，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对协定全文的修改，总

是尽量求取原则上的同意与实施技术上的合理，以利和平事业的推行，以便利南京代表团说服南京政府，使协定早日签订。

再次，关于人民解放军渡江接收问题，还有几点说明。

第一，人民解放军没有宣布过停战。南京政府曾多次提出停战议和的要求，我们没有同意，只同意协定签订后永无内战。但愿意在谈判期间暂不渡江。这个协定是最后定稿，4月20日以前同意即签字，不同意即渡江。

第二，协定签字后，选定长江下游扬中、江阴和上游繁昌、南陵等十县由人民解放军和平渡江，接收江南地区，实施和平协定，如有率部叛乱破坏协定者，我们即协同南京政府讨平之。

第三，军队整编委员会于协定签字后随即成立，成立后决定对苏、浙、皖、湘、鄂、赣、陕、陇东等地的接收。

第四，南京政府部队如有破坏协定者，人民解放军进行讨伐时不受上述十县的限制。

第五，如南京政府同意于4月20日前签字，我们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何应钦字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居正字觉生）先生、童冠贤先生五位同来北平参加签字仪式。

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中共代表团的最后定案，张文白先生说要派人带回南京请示，我们希望回南京去的先生给我们转达，我们期望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说服南京政府接受这个协定。我们肩负历史使命，全国人民看着我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看着我们，希望协定早日签订，和平早日实现。

接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谈了一些意见和感想，大意是：

经过半个月来多次会谈，对最重大的问题已交换了很详尽的意见，可以说，应该说的话，通通说了。刚才恩来先生列举的接受我方提出修

正的地方和不能接受的地方，我们都听到了，了解了。两个钟头前，周恩来先生交给我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时，我问：所谓最后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通牒？只许说对或不对。他表示这是最后态度。周恩来先生还说，中共军队预定4月20日渡江。我说：你先前说协定签字后两三天就渡江的话我并没有同意，现在还未签字，怎能说预定4月20日渡江？周恩来先生说：如果同意签字，当然渡江的日期和办法是可以商量的。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对这个协定仅作了初步研讨，来不及作结论，还是要慎重研究后再派人去南京请示。

现在，我想谈一些个人的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告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

孙中山先生遗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他去世24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羞辱！同时我还觉得，2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国共产党实在太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在我们方面，应该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如果这样，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今后还有新生和改造的机会，还可以同别人重新团结合作，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当然，这要看我们内部和将来的努力，我今天实在还不敢讲这种话，还没有脸面讲这种话。

中国有一句古话，也许周恩来先生会觉得有封建意味，就是“兄友弟恭”，我觉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打个比方，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太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

外帮助他，使他做好。这不但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我们同一民族里，兄弟手足里，出来很好的兄弟，有能耐有魄力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邻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

我想，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所谓眼光放远些，从主义说，共产党主张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我们主张由三民主义到世界大同。大同之治和共产主义的民生经济，也是没有多大的差异，最少目标是一致的。总之，从人类的思潮来说，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实在远大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族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最后，我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我们极愿把眼光放远些，胸襟放宽些，来迎接这个新时代，共同担当伟大的新的历史责任。个人的意见和感想如有不对，请原谅和指教。

至此，周首席代表严肃地指出：刚才文白先生对于兄弟的比方，如果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仍可一道合作。但如果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尤其两年又九个月的蒋介石朝廷、小到四大家族和一切死硬派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当年孙中山先生对清朝那拉氏的斗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

还有，这个协定我们所以作为最后定稿提出，一方面是使南京代表团有个文件去说服南京政府；另一方面，这个协定是从远大的眼光、从人

民的利益出发的，今天南京不同意，明天也会同意。我们认为南京代表团、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乃至南京当局是会同意的。当然，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的。会议于晚 10 时 20 分结束。

五、百万雄师过大江

由于时间非常紧迫，南京代表团于散会后回到住处漏夜进行研究讨论，经过充分发言之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协定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 40 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第一条关于战争罪犯问题，先后删去了“元凶巨恶”、“首要次要”等字样；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把南京政府和所属军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一句也改了，让步是大的。从全文看，虽然条文过高些，但如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党一派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则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保全者实多，对国民党也并非不利，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为好。最后，大家一致表示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并决定推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

黄、屈两位于 4 月 16 日上午十时乘专机飞往南京，当天到达。从 16 日至 20 日这一段时间，商谈是完全终结了，但活动并没有停止。中共代表分日轮流请代表团同人聚餐，晚上有时还有文娱活动。这几天，大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情绪是动荡不安的。本来，从南京来时，大家就已预料到，任务异常艰巨，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看到《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后，就更认为完成任务的可能性非常微小，但是仍然希冀于万一。一种普遍的失败感迷漫于代表团同人心间（少数人如章士钊先生等除外），不仅是焦灼地等候着南京的答复，同时还盘算着今后的行止，何去何从，每个人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7日黄绍竑代表从南京来电，只说：各项问题刻正研究中，俟商妥即行电告。18日收到南京广播：对八条二十四款或可忍让，但对渡江问题须郑重考虑；还说，黄代表因血压高，不能于20日前返回北平云云。代表团同人对此作种种推测，但焦灼也是无用。19日晚南京又广播：对和平协定未便全部同意，渡江一节实难接受云云。看来凶多吉少，大家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便急电南京催询，亦未得复。事后获悉，黄、屈16日到南京即见到李宗仁等人，简要汇报了商谈经过，呈上了文件。当时，白崇禧表示坚决反对。李宗仁则表示犹豫。一则说，须得请示溪口，再则说，签字不便，怕在南京安全有问题。顾祝同则火速把协定电告蒋介石。蒋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在蒋的示意下，逃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包括所谓和谈指导小组成员在4月19、20两日连续举行了两天的会议，通过了对中共《国内和平协定》绝对不能接受的声明，指示李宗仁、何应钦照办。会后吴铁城和程天放（国民党中宣部长）还对报界发表了谈话。

到21日凌晨，才接到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不仅对《国内和平协定》完全拒绝接受，而且要代表团向中共建议先订立临时停战协定。来电全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张首席代表治中并转邵、章、李、刘诸代表均鉴：黄代表绍竑、屈顾问武返京备述和谈进行经过，并携回中共代表团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全文得悉。今日国家破残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在八年惨烈抗战获得光荣胜利之后，国际地位反一落千丈，此皆由于战乱之所致。但求能彻底消弭战祸，实现真正和平，使人民获得休养机会，国家进入建设途程，吾人自应不惜一切牺牲，以促其成，庶几毋背革命之初志；上可以对中华民族之列祖列宗，下可以交代后世子孙。政府方

面，自蒋总统之元旦文告倡导和平，以迄宗仁、应钦等主政后之一切措施，无一非遵循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之意旨，以国家人民最高利益为前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开诚布公，苦心谋和。蒋总统之毅然引去，与宗仁前致毛泽东先生卯阳电，即在欲牺牲一己，以成大局，耿耿此心，宜为全国同胞所共鉴。乃纵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挟隘与威压作用，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能力所能挽救。良以此种协定果一旦订立，所给予人民者将非真正之和平，而为更残酷更大规模之长期战争，迫切渴望和平之人民，亦必决不愿政府接受此一名为“和平”实为“战争”之协定，招致全国人民重罹浩劫，岂徒显背谋和之初衷，抑必造成仇讎相报永远砍杀之悲惨局面。原文前言，全属对政府及中国国民党诋毁谴责之词，等于对罪犯之判决，何能称为和平协定？即以条文内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之原则，而该项协定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均应编为人民解放军，政府一切军事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亦应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民主原则”，竟成共军独占之制度。关于整编程序，规定为集中整理与分区改编两个阶段。所谓集中整理，即是由共方所控制之整编会，命令国军将防区与仓库物资先行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再开赴共军认为适当之地点集中，以便分区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如此改编工作完成之日，即国军全被消

灭之时。在政治方面，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政府虽被允许暂时行使职权，实际上是奉共军总部之命办事。其主要任务为协助共军“办理各地的接受和移交事项”，中共不但要接收政府的军队和政权而已，且要通过军事管制委员会之统驭形式，以“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关于决定国家人民命运之政治协商会议问题，照协定条文第二十三款：“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方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质言之，政府参加政协，须俟中共考察政府执行“和平协定”之成绩，认为满意始允负责提议，以待批准。又照协定，政府即获“批准”参加政协，而能否参加联合政府，仍须待共党之提议；而且政府参加政协及联合政府之人数及人选，均预先听命决定。上述云云，不过略举数项，以为例证，则该项协定全文，均充满以中共武力控制全国之意味：一则曰“人民解放军”开进，再则曰“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和平协定，实际为欲政府承认中共以武力征服全中国。政府军队，固等于全部缴械投降，即全国各城市乡村，亦将因中共军之普遍开进，原有之社会组织与人民生活方式，亦将依中共之意旨而彻底改变。如此，势必激起军民之愤怒。若中共部队向各地开进，中共人员向各地渗透，其必然遭遇军民抗拒，殆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结果战火与屠杀即将遍及全国之每一城市与乡村，人民之痛苦愈益加深，国家之损失愈益增重，势所必然，无待深论。事果演变不幸至此，则谋和适以制造乱源，弭战反而扩展战祸，岂忠于谋国爱护人民者所宜出此，所忍出此？总之，吾人如真能体认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共同具有谋和之诚意，则

必须消除一切敌对与报复之心理，根据事实，适应环境，共策合理有效之方法，以达到彻底消弭战争获致真正永久和平之目的。因之，政府除对此次中共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表示上述原则性之意见外，仍希望中共方面，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至于自今年元旦以来，政府军队每遇共军进攻，均尽可能极力退让，事实具在，有目共睹，然中共方面不但未能停止进攻，且自四月一日政府和谈代表抵达北平以后，衔接地区之攻势，较前愈趋猛烈，殊堪遗憾。兹为培育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即将上述各项意见传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李宗仁、何应钦卯号印。

代表团对此电约略讨论之后，就匆促地照抄一份送给中共代表团，这是4月21日上午九时的事。不久，街上到处喧嚷着“号外”、“号外”之声，原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了。急买“号外”一看，百万雄师已于20日深夜在荻港、21日凌晨一时在江阴先后渡江成功，长江天堑已被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踩在脚下。

会后余波

和谈至此宣告完全破裂，政治谈判让位于军事斗争，到这时候，代表团同人转而考虑今后行止的问题。4月21日上下午都举行了全体人员会议，讨论善后事宜。

一、荣获新生

4月21日晚12时接到李宗仁、何应钦卯马电：“张文白兄并转行严

(章士钊字)、云亭(李蒸字)、为章(刘斐字)诸兄暨代表团全体同志：共方本日广播毛、朱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悉。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谐，俯仰无愧，谨先奉慰，诸容面罄。李宗仁、何应钦叩马印。”

究竟是回南京还是留北平，这是几天来代表团同人一直在反复考虑的问题，李、何电来就得要作出最后决定。当时代表团同人大致分三种态度：一种是大多数人的主张，认为和谈失败回去，绝不会有好结果，徒作无谓牺牲，毫无意义，还是认清形势，辨明是非，留在北平，静待形势发展，再为和平努力。邵力子和章士钊两代表早已心中有数，不作回去的打算，邵老连爱人都带来了。工作人员中有些已盘算着到华北革大学习，弃暗投明。另一种人，由于种种因素，颇有顾虑，或想回南京，或想回新疆或其他地方，没有明确肯定的表示。最后一种，主要是首席代表张治中，他天真地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来的，和谈既已破裂，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同时，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終了，理应回去“复命”。别人不回去可以，他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不能不回去“复命”。无论在会上会下，乃至和中共代表谈话，他都反复强调所谓“复命”。22日，他要我复电南京，请于23日派机来平，预定24日回去，同时通知中共方面查照。周首席代表知道了，当天到六国饭店和张治中谈话，表示恳切挽留，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然为南京政府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亦可能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协定还是用得着的。至此，张治中还是重复他所谓“复命”的理由。最后，周首席代表非常恳切地说，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

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按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周的词意恳切、温和而又坚决，使张治中十分感动。中共代表团的代表们也先后来六国饭店看望南京代表，一再劝留。有的说：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方代表并不撤退，保留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同样意思。到此，南京代表团中原来想回去的人也都打消了原意。不过，由于张治中对“复命”主张反复强调，周首席代表也曾经嘱咐王炳南同志，到万不得已时也只好听之任之。

同一天晚上，李宗仁给张治中来长途电话，说中共军队确已渡江，问及代表团同人情况。张告诉李，中共方面恳切劝留，希望随着形势的转移，协定仍有签订的可能，并劝李暂留南京，更不可去广州。23日晨，又从长途电话中得知南京军警已开始撤退，市区陷入一片混乱。24日，南京派专机来接，民革李民欣先生带来何应钦23日函。但由于上海地下党的掩护，反而把张治中的家属送来北平。何应钦的来函如下：

文白吾兄并转邵、章、李、刘诸兄均鉴：此次和平谈判，经兄等尽最大之努力，仍未能克底于成，此属国运使然，凡我爱国之士，莫不同声悲叹。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人即日径飞上海为盼。专此敬颂勋安。弟何应钦敬启。四月二十三日。

经中共代表团恳劝后，全体同人已坚决留平，张治中也不坚持“复命”，因此就复了何应钦一信，由留平代表签名：

敬之院长先生：李民欣先生带来二十三日手示奉悉。和谈破裂以后，同人等正待命南返中，二十二日晚接奉德公电话，谓于翌日派机来平，当即转告同人准备南行，并即函告共方查照。旋由周恩来、林祖涵、李立三诸位分别访问同人等，坚相挽留，并表示随着

将来新的形势发展，尚可为和平努力等语，曾于二十二、二十三两日两电并于二十三日晨以电话向南京请示数处，均未得通。昨闻中央航空公司今日有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申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等待而已，尚祈亮察。再同人等此行未克达成任务，乃荷李代总统与先生函电相慰，殊深渐汗！并请为转陈德公为禱。专此奉复，敬颂勋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四月二十四日。

至此，除黄绍竑由沪去港以后再来北平及屈武须协助陶峙岳、刘孟纯等在新疆起义暂回新疆，以及个别人先回南京、新疆处理事务外，代表团人员大部分都留在北平，没有一个人坐南京政府的飞机回去的。周首席代表对张治中说，你们回去特务将不利于你们，这话是有根据的，完全正确的。代表团到平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就扬言：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我要用手枪对付他。弄得邵力子常常晚上不敢回家睡觉。事实证明，重庆解放前，蒋介石指挥特务把杨虎城、宋绮云两人和家属都杀掉了。北平市长何思源为和平奔走，军统头子毛人凤奉蒋命派特务要干掉何，结果杀何未成，只杀了何的一个女儿。蒋逃台以后，为了找失败的替罪羊，也把追随他多年曾任参谋次长的吴石等人杀掉了。张治中、邵力子等人是蒋介石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的工具，蒋沈离大陆，“和”的一手已失去作用，根据“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逻辑，张、邵等人的使用价值已经消失，而作为替罪羊倒很合适，所以张治中等人回去，必定会成为阶下之囚，其下场不是杨虎城就是张学良。正是共产党、毛主席、周副主席挽救了我们，哪能不感恩戴德、永世不忘！周还说，退一步即使全面和平办不到，亦会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估计也是正确的。例如新疆起义、绥远起义、湖南起义、四川起义、云南起义等等，虽在方式方法上

或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根据《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的精神解决，这个协定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二、两个电报

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江后，势如摧枯拉朽，国民党的党政军纷纷作鸟兽散。从4月20日至5月20日，南京、武汉、上海、西安、榆林、太原、大同、青岛、杭州、苏州、九江、南昌等地先后解放。李宗仁不接受代表团劝告，24日飞逃桂林，不久又经不起蒋介石的拉拢，又飞到广州。阎锡山更鼓其如簧飞舌，劝李与蒋合作到底，坚守华南，积蓄力量，妄图阻挠历史车轮前进。李宗仁在广州竟发表声明，一面侈言一贯谋和，进行欺骗，另方面对中共大肆污蔑、颠倒黑白，同时怪责代表团未能克尽职责；继且放出谣言，说代表团已被中共扣留，丧失行动自由云云。至此，邵力子、章士钊于5月18日，张治中等五代表于5月20日先后给李宗仁去信。（全文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张丰肖《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的有关史料》一文，兹不重录。

邵、章去电偏重辩理，是一篇剖析详确、情文并茂的文章。张治中等电则偏重劝李恢复和谈，力图补救。首先指出和谈前夕南京政府的两种人：一是借议和喘息，妄图城借一，阳主和而阴主战；一是主张划江为界南北分治，而李则力言：愿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宁向本国人屈膝，决不向外国人低头，更保证只要代表团同意他就签订。依此，应与上述两种人有别，而于代表团同意《国内和平协定》之后，竟一反初衷，食言而肥，出尔反尔。其次指明，蒋介石元旦文告所提五项原则，中共表示坚决反对，所提八条除第八条外，余七条即系针对蒋元旦文告而发，李既一再声言同意以八条为和谈基础，如今竟斤斤以蒋之元旦文告五项原则为训，怪责代表团未能力争，前后矛盾，莫此为甚，乃反而侈言一贯谋和，试问横贯底于何地，纵贯起自何时？若谓和平协定

条款及措词过酷，则协定前言已大量删改，战犯问题，“元凶巨恶”、“首要次要”皆已剔除；关于军队改编，改由国民政府协助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理；至于稍带刺激性词句大都已加删减；且天下事酷不酷，何常之有。考诸历史，重庆政协，中共军队仅占五分之一，国务委员悉由国民政府任命，重大事件，中共须受三分之一的否决权限制，对中共岂非酷甚，而蒋尚靳而不与！至曰和平名耳，其实降也。则同族之争，败固非辱，政权过久，交迭有时，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已即不能，应让能者，于降何有？最后作恳切之忠告：大军渡江，甫及一月，而东南形势日非，武汉三镇亦失，大势已去，徒苦人民，此岂我公倡导和平之本意，更何以对子孙万代！甚望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人溺己溺，剑及履及，痛定思痛，悬崖勒马，同人等愿循孙总理和平奋斗救国之旨，作最后最大之努力。

在这里需要倒叙一笔，就是双方代表团对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和谈中所处的地位和可起的作用的估计可以说是大致不谋而合的。双方都知道，蒋虽表面下野，但背后仍指挥操纵一切，和平协定没有蒋的同意很难签订。中共方面对蒋是不抱幻想的，所以周首席代表的发言中已明确指出：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的。对李宗仁，则认为他虽不掌握实权，但名义是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如能说服李同意签署，虽不能使协定一一贯彻，起码亦可部分实现，并对国民党内部起分化瓦解的作用。所以，决定不以蒋为对手，而以李为对手，对张治中到北平前的溪口之行一再提出严重抗议。而且于和谈开始时就表示：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先生、童冠贤先生五位，到北平来参加签字，使中国早日变成和平的国家。这样说，是考虑到：（1）南京在蒋介石控制下，李顾虑安全，不敢同意签字，所以请他到北平来。（2）六人并列，是考虑到他们对国统区的影响，如六人能同来更好，部分来亦有作用。

(其时何、于、居、董是国民党的行政院长、监察院长、司法院长、立法院长，但考试院长戴季陶则不列，他属反共顽固派。)南京代表团亦深知蒋的一贯顽固，希望不大。张治中所以一再到溪口去，主要还是进行摸底，希望于万难中找出一条缺口。同时一再劝蒋出国，就是为了去掉和谈障碍。李虽无实力，但有名义，且与蒋向有矛盾，可资利用。所以动身来平前代表们和李多次恳谈，争取其最大让步(李确曾说过，只要你们代表团同意我就签字)。由平派人返南京时所以推黄绍竑，是由于黄是桂系三巨头之一，希望他多做李的工作。所以派屈武，是由于屈是于右任的女婿，于与张治中关系较好，希望屈说服于右任在国民党元老派中多起作用，协助李宗仁，减轻蒋对李的压力。可惜李乏远见，终作蒋氏王朝的殉葬品，解放时逃美，后来多次请求回国，投向人民，到1964年才成行。1966年至1967年，李曾多次和笔者谈话，回溯往事，表示悔意。至于于右任，据于的亲信严庄(曾任国民党省级厅长、监察使等职，解放后是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在解放后告诉笔者，于原定4月15日飞平(周首席代表已知)，连行李都准备好了，动身前发生故障，未能成行。

三、一项声明

代表团4月24日拒绝回南京去，南京政府于27日明令解散和平商谈代表团。代表团本身事务于5月10日办竣，亦不得不宣告结束。在这段期间，形势发展迅速，浙、苏、鲁、晋等省全部解放。这时，蒋介石重新登台，从后台转到前台，因而签订全面的和平协定已不可能，局部和平则多处酝酿中。当时代表团同人都是以个人身份由中共方面分别安排，或参加党派活动，或到革大学习，或暂时离开北平。这期间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张治中发表的一项声明。这个声明经周恩来副主席亲笔修改，毛主席审阅批示，刊登于194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全

文如下：

新华社北平二十六日电：广州中央社十五日电传广州《西南日报》香港航讯，曾报导张治中在北平被共产党扣留之详情，接着，广州中央社二十、二十二日两次电讯，又对张治中将军等进行攻击和诽谤。现居北平之张治中将军特为此事发表声明如下：

这几篇电讯，一派胡言诬语，没有驳斥的必要。不过我来平以后，颇承各地同志和友好关怀，我倒想就这个机会说几句话。

实在说起来，我现在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留居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国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看来，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愧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我多年来内心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真是精神上获得解放，怎能不令人欣慰不已呢！

我要再为关心我的同志们特别指出：这次和谈破裂，在我们国民党内有些人认为条件太苛，类似投降。其实平情而论，这八条原则早为南京政府李代总统所承认的和谈基础，二十四款就是实行这八条原则的具体办法。在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已经同中共代表恳切磋商，并提出书

面修正意见四十余处，被中共接受过半数。如战犯只作原则规定，名单完全不提，就是中共最大让步之一例；并且口头约定，如果南京政府同意签字，还可作文字上的修改。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例，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异国。试想清廷末季，要是没有我们孙先生号召革命，推翻专制，中国不早就遭受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了吗？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当然，我是党的干部，也要负一份责任。所以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表示一种革命事业成功固不必在我的态度，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如果还是昧于人心与大势所趋，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其结果徒然损伤了大众，贻害了自己，这是无从索解的！

本人虽然身在北平，而心念战区。回想个人的主张，一向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九一八”变起以后，力主全国团结，坚决抗战。对国内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这些，都是大家共见共闻的。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

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这个声明，虽然以张个人名义发表，却反映出代表团同人的一致观点。这里头，不但表达了他的立场的转变，更主要的还是号召国民党各方接受和平协定，和中共方面合作，所以事实上也等于一篇起义声明。它对进一步分化国民党内部，推动各地起义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后来，好些地方的俘虏收容所还把这篇声明连同张治中在新疆对起义人员的讲话《怎样改造》作为学习材料印发。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为此刊出了一篇新华社短评——《评张治中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了唯一的光明出路”，但也严正地指出，真正的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所拥护的国民党是可以而且应该“新生”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已被亿万人民所唾弃，是不可能“新生”的。

当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正在积极进行，毛主席同张治中谈话时，表示邀张参加政协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毛主席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责任编辑 于保政

封面设计 王 堃

善读史者不能不关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它们是历史演进的链条、时局转折的枢纽、世事变换的关节、人生福祸的注解。本书所选即为晚清至民国末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其讲述者均为各事件的亲历亲见者。作为知情人、见证人，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详情细节，无疑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能为你披露更多隐情，揭示更多内幕。展卷一读，必能让你对历史的了解更全面，认识更深入。



百年人物演绎百年故事
世纪沧桑展现世纪人生
走出虚幻 走近真实
告诉你百年历史上的真实故事

ISBN 7-5034-1116-3



9 787503 411168 >

ISBN 7-5034-1116-3

K·0774

定价：18.00元